

列寧選

集 第三卷

解社初版

1936年6月

列寧選集

第三卷

解放出版社 新華日報 總經理

一九三九年印行

目次 第三卷

編譯部底話.....	一
火星報編輯部底申明.....	三
我們的運動底迫切任務.....	一三
從何着手?.....	二三
做什麼?(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三五
序言.....	三七
(一) 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四一
A. 什麼是『批評自由』?.....	四一
B. 『批評自由』底新的擁護者.....	四六
C. 在俄國的批評.....	五三
	六二

D ·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意義……………六二——六九

(二)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七一——一〇三

A · 自發高漲底開始……………七二——七八

B · 崇拜自發性。『工人思想報』……………七八——九二

C ·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務報』……………九二——一〇三

(三)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一〇五——一五六

A · 政治鼓動和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動……………一〇六——一一八

B · 馬丁諾夫怎樣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底意思……………一一八——一二二

C · 政治揭露和『革命積極性底訓練』……………一二二——一三〇

D · 在經濟主義與恐怖主義間有什麼相同之點？……………一三〇——一三四

E · 工人階級是爲民主制度而鬥爭的先進戰士……………一三四——一五三

F ·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一五三——一五六

(四)經濟派底手藝主義與革命家底組織……………一五七——一六四

A · 什麼叫做手藝主義？	一五八——一六三
B · 手藝主義與經濟主義	一六三——一七〇
C · 工人底組織與革命家底組織	一七一——一九一
D · 組織工作底規模	一九一——二〇〇
E · 『密謀』組織與『民主主義』	二〇〇——二一一
F · 地方工作和全國工作	二一二——二三四

(五)全俄政治報紙底『計劃』

B · 報紙能否成爲集體的組織者？	二二六——二四一
○ · 我們需要何種樣式的組織？	二四一——二四九

結論

爲什麼社會民主黨應向社會革命黨人宣佈堅決無情的戰爭？	二五七——二六三
----------------------------	----------

社會革命黨人所復活起來的庸俗社會主義和

民粹主義

二六五——二七五

地方自治運動底追究者和自由主義底安尼巴

二七六——三〇二

第五章

二七九——二九二

第六章

二九三——三〇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綱領草案

三〇三——三一四

對於普列漢諾夫第二個草案的批評

三一五——三一九

工黨與農民

三二一——三三二

告鄉村貧民書（爲農民解釋社會民主黨底要求）

三三三——三四一

一·城市工人底鬥爭

三三五——三三七

二·社會民主黨人所要求的是什麼？

三三七——三四九

三·鄉村中的財富和貧困、有產者和工人

三四九——三五六

四·中農到那裏去？到有產者和富人方面去，還是到工人和無產者方面來？	三六六——三七五
五·社會民主黨人要為全民和工人爭得那些改善？	三七五——三八六
六·社會民主黨要為全體農民爭得那些改善？	三八六——四〇四
七·鄉村中的階級鬥爭	四〇四——四一二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	四一三——四二七
第七章	四一五——四二七
我們的綱領中的民族問題	四二九——四四二
猶太無產階級是否需要『獨立的政黨』	四四三——四五二
註釋	四五三——五三五

編譯部底話

本卷所包含的，都是俄文原版「列寧選集」第一卷的第三部分。這些著作，是列寧在舊「火星報」時期內所寫的。這些著作所講的問題，主要的是：確定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底政治的綱領，建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底強固的組織，規定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底正確的策略等等。

爲要幫助讀者了解列寧底著作，所以在本卷末尾附錄有各種的註釋。在閱讀正文時，讀者可按正文中的註釋號碼去在「註釋」欄裏找到相當的解釋。

此外，在正文裏面，還有下三種腳註：第一種是著者本人註的，在這種腳註後面，並沒有指明是誰註的；第二種是原版編輯部註的，在這種腳註後面，便有「編者註」三字；第三種是編譯部註的，在這種腳註後面則註明有「譯者註」或「校者註」等字樣。

「列寧選集」中文版編譯部

一九三三年一月

火星報編輯部底申明

火星報編輯部底申明

編輯部底話

在着手出版政治報——「火星報」(註釋一)的時候，我們認爲必須用幾句話來說明：我們的目的的是什麼，我們怎樣了解自己的任務。

我們所處的時期，是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上極重要的一個時期。最近幾年來的特徵，就在於：社會民主派的思想，在我們智識界中間，傳佈得非常之快；而獨立發生起來的工業無產階級的運動，却起而迎接這種社會思想潮流。這個工業無產階級已開始聯合起來並反對自己的壓迫者，已開始熱心趨向於社會主義。工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智識份子底小組是在各地出現，各地的鼓動傳單都廣泛地散佈着，對社會民主黨刊物的需求，日益增長起來，致遠遠超過供給，而變本加厲的政府的追究已無力阻止這個運動了。監獄已有人滿之患，流戍地更無插足的餘

地，差不多每月都可以聽到俄國各地有「破獲」的消息，關於拿獲私運刊物的消息，關於沒收宣傳品和印刷所的消息；可是運動則日益增漲，日益蔓延，日益深入工人階級，日益引起社會的注意。況俄國底整個經濟發展，俄國社會思想和革命運動底全部歷史，都可保證：不管一切的障礙，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運動將要增漲起來，而且歸根結底將要克服這些障礙。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運動中的最近表現得特別顯著的主要特點，就是牠的渙散性，牠的所謂手藝性；各地小組底產生和活動彼此沒有聯繫，甚至（這特別重要）與在一大城市裏活動的各小組也沒有聯繫；沒有形成傳統，沒有繼承性，地方刊物完全反映出渙散性，以及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所已造成的東西沒有聯繫。

這種渙散性與由運動底強度及廣度所引起的需求，是不相適合的，據我們的意思：這種不適合在運動發展上正造成一個危急關頭。在運動本身上，非常急迫地需求鞏固，要求創造一定的綱領和組織，但是有些實際行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於這種過渡到較高的運動形式的必要性，遠非各地都已了解。而且相反，在許多人中間還可看到思想底動搖，傾心于時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時髦的「伯因斯坦主義」，傳佈所謂「經濟派」底觀點，以及與此有密切關係的企圖，想使運動停滯在牠的較低階段上，想把組織引導全民鬥爭的革命黨這個任務放在次要的地位。在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可以看到這一種思想底動搖；脫離對於整個運動的理論的解釋的那種狹隘的實際主義，可使運動有走上錯誤道路的危險，這都是事實：這點凡是直接熟悉我們的大多數組織底實情的人，都是不能懷疑的，而且還有許多作品可以證實這點。我們祇要舉出那引起了完全正當抗議的「信仰」(Credo)，露骨地表現了貫注於「工人思想報」全報的傾向的「工人思想附刊」(一八九九年九月)(註釋二)，本着這種「經濟主義」精神擬就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社」(註釋三)底宣言這三個文件就够了。「工人事務報」說：「信仰」不過是代表幾個人底意見，「工人思想報」底趨向祇是表現牠的編輯部底糊塗和魯莽，而不是俄國工人運動進程本身中的特別趨勢，——這個斷言是完全不對的。(註釋四)

同時，在許多至今有相當理由被讀者認為是「合法」馬克思主義底著名代表的著作中，日益暴露出轉向資產階級讚美主義底觀點。下述一種分離現象和無政府狀態也是這些事實底結果。因為有這種分離現象和無政府狀態，所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正確些說，過去的社會主義者伯因斯坦，在歷數自己的成績時，竟能不受別人反駁而作文申明，說在俄國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大多數都是他的信徒。

我們不願誇大實況底危險性，可是看不見這種危險性，則害處便更大得無所度測了；因此我

們竭誠地歡迎「勞動解放社」底決議——恢復牠的文字工作和開始作有系統的鬥爭來反對曲解和俗化社會民主主義的企圖。

由此得出這樣的實際結論：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團結起來，竭盡全力來組織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統一旗幟之下進行鬥爭的堅固的黨。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發表工黨宣言的一八九八年的代表大會所早已指出的，正是這一個任務。

我們承認自己是這個黨底黨員，我們完全同意「宣言」底基本思想，我們認為牠有重大的意義，牠是黨底目的底公開申明。因此，在我們——這個黨底黨員——看來，關於我們最切近和直接的任務的這個問題，是應該這樣提出來：我們應當採取那種行動計劃來盡可能鞏固地恢復黨。對這個問題通常的答覆就是：必需重新選舉中央機關和委託牠來恢復黨底機關報。可是在我們現在所處的分離時期，這個簡單的方法是未必適當的。

建立和鞏固黨就是建立和鞏固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底統一，而根據上述的原因，這樣的統一是不能用頒佈法令來做到的，牠是不能祇根據什麼代表會議底一紙決議來達到，而是必需加以創造才行。第一，必需創造出穩固的思想上的統一，這種統一是不容現時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間——我們公開地說——佔統治地位的那種意見分歧和紛亂現象的；必需拿黨綱來鞏固這種思想

上的統一。第二，必需創造出一個組織，專門來聯絡各個運動中心，來傳達關於運動的完備及時的訊息，來正確地供給定期刊物於俄國各地。祇有造成了這種組織時候，建立了俄國社會黨的郵便的時候，黨才能穩固地存在而成爲實在的事實，因而成爲強有力的政治勢力。這個任務底前半部份，即是創造一般的原則上堅定的，能在思想上統一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刊物，我們正是想把自己的力量用到這一方面，我們認爲這是現代運動底迫切要求和恢復黨底工作的必需的準備步驟。

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思想上的統一還須加以創造。照我們的意思，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公開地和各方面地來討論現代「經濟派」，「伯因斯坦派」和「批評家」所提出的原則上和策略上的基本問題。在統一以前而且爲了統一起見，我們首先應當堅決地明確地分清界限。不是這樣，我們的統一，就不過是一種空話，祇是掩飾現有的分離現象和妨害澈底剷除這種分離現象。因此，很明顯的，我們不想使我們的機關報成爲各式各樣的觀點底簡單的貯藏所。正是相反，我們將要本着嚴格一定的趨向來辦理這個機關報。這種趨向可用馬克思主義這五個字來表示。不消說，我們主張澈底發揮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思想，堅決反對現在盛行一時的伯因斯坦、司特魯威和其他許多人輕易作出的那些不澈底的和含糊的機會主義的修改。可是，用自己一定觀

點來討論各種問題的時候，我們並不反對在我們機關報上作同志中間的爭辯。要說明現有意見分歧底深刻程度，要從各方面來討論爭論的問題，要進行反對極端態度（不僅是各種觀點底代表們，而且甚至各地方底代表們或革命運動中各種「職業」底代表們都不免墜入這種極端態度）的鬥爭，在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和覺悟工人而前作公開的爭辯，這是必須的，而且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甚至認爲（這點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了）現時運動底缺點之一，就是各個斷然分歧的觀點彼此沒有進行公開的爭辯，有人企圖把關於很重要問題的分歧意見隱藏起來。

凡列入我們機關報綱領的那些問題與題目，我們不來詳細列舉。因爲這個綱領是從下面這個總概念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這個總概念，就是在現條件下行將出版的政治報應當成爲何種刊物。

我們要按我們的力量，使一切俄國同志把我們的刊物看作是自己的機關報；在這個機關報上，每個團體可以通知關於運動的一切消息，每個團體可以向這個機關報商量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意見，自己對刊物的需要，自己對社會民主黨刊物的估計，總而言之：凡是牠所給予運動的和得自運動的東西，都可與這個機關報商量。祇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才能成立真正全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祇有這樣的機關報，才能引導運動走上政治鬥爭底廣闊道路。「展開和擴大我們宣

傳鼓動工作及組織工作底範圍和內容」——阿克雪洛德底這句話，應當成爲決定最近將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活動的口號，——而我們現在把這口號列入自己機關報底綱領。

我們不僅號召社會主義者和覺悟的工人，同時還號召受現代政治制度壓迫和蹂躪的一切人們，請他們在我們刊物底篇幅上來揭破俄國專制制度底一切腐敗情形。

誰要是把社會民主黨了解爲純粹供無產階級自發鬥爭之用的組織，誰就能專以地方煽動和「純粹工人的」刊物爲滿足。我們却不是這樣了解社會民主黨的；我們把社會民主黨了解爲反對專制政體的，與工人運動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革命黨。祇有組織成爲這個黨的無產階級，祇有在現代俄國內這一個最革命的階級，才能執行牠所担負的歷史任務：在自己的旗幟之下統一國內一切民主份子，澈底戰勝可恨的制度，以完成歷代所作的堅決鬥爭。

★

★

★

報紙每月底篇幅約有一大張至兩大張。

因爲俄國秘密出版的條件，出版期限不能預先決定。

國際社會民主黨底幾個著名代表願與我們合作，「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阿克雪洛

德、查蘇利赤）願作親近的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有幾個組織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幾個團體都願幫助我們，——這都是他們已經答應了我們的。

一九〇〇年九月

我們的運動底迫切任務

我們的運動底迫切任務

俄國社會民主派已屢次申明過：推翻專制制度，奪取政治自由，應當是俄國工黨底最近的政
治任務。這點在十五年以前，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代表，「勞動解放社」底社員早已申明過；而且
在兩年半以前，在一八九八年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俄國各社會民主派組織底代表，也已
申明過了。可是，不管屢次的申明，俄國社會民主派底政治任務問題，又重新放在目前的日程之
上。我們的運動底許多代表，對於這個問題底上述解決方法之正確性，表示懷疑。他們說：經濟
鬥爭有統治一切的意義，他們把無產階級底政治任務放在次要地位，他們縮小和限制這些任務，

○這篇文章是「火星報」第一期底社論，在這篇社論上面，列寧代表編輯部指出了革命社

會民主派底策略。（編者註）

他們甚至說：在俄國組織獨立工黨這種論調，祇是重複別人的話，工人只要進行經濟鬥爭，讓智識份子聯合自由派去幹政治。新的信仰象徵（著名的「信仰」）底最近這個申明，就是公開承認俄國無產階級幼稚和完全否認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而「工人思想報」（特別是在「附刊」上）所說的，實際上也是如此。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正處於動搖時期，處於懷疑時期，這種動搖和懷疑竟達到自我否認的程度。一方面，工人運動脫離了社會主義；人們幫助工人進行經濟鬥爭，但同時並沒有向工人解說，或者沒有充份地解說整個運動底社會主義目的和政治任務。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脫離了工人運動：俄國社會主義者又在日甚一日地開始講這樣的話：智識界應當只用自己的力量來進行反對政府的鬥爭，因為工人是祇限於經濟鬥爭的。

據我們的意思，有三種情形造成了這種可歎的現象底基礎。第一，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其活動開始時只限於一種小組的宣傳工作。當我們轉而做羣衆中之鼓動工作的時候，我們常常不免墜入另一極端。第二，我們在活動開始時就不得不常常在反對民意黨人的鬥爭中來擁護自己的生存權。民意黨人把「政治」了解為脫離工人運動的行動，他們把政治縮小到單是密謀家鬥爭的地步。社會民主黨人在駁斥這種政治的時候，自己却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把一般的政治推到次要地位。第三，社會民主黨人在各地方工人小組內零星活動的時候，沒有充份地注意到必需組織革命黨

來統一地方團體底一切活動，來正確地進行革命工作。而零星工作之佔優越地位，是與經濟鬥爭之佔優越地位，自然而然地相聯繫着的。

上面所指的一切事情，就產生了傾心於運動底單方面的現象。「經濟派」（如果可以談得上牠是一派的話）造成了下述這些企圖：把這個狹隘觀點推尊為特別的理論，爲了這個目的而利用時髦的伯因斯坦主義和時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這種主義和「批評」都是在新的旗幟之下發揮舊的資產階級思想。祇是這些企圖才產生了下述一種危險：削弱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社會民主派——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先進戰士——之間的聯繫。而我們運動底最迫切的任務，就在鞏固這個聯繫。

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底結合，牠的任務：不是在工人運動每個階段上消極地替工人運動服務，而是代表整個運動底利益，指出這個運動底最終目的及其政治任務，保持牠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獨立性。工人運動既脫離社會民主黨，就要縮小自己的範圍，就必然要陷入資產階級的道路；工人階級祇作經濟鬥爭時，就要失去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就要成爲別黨底尾巴而背叛這個偉大的遺訓：「工人們底解放應是工人們本身的事情」。各國都有過這樣一個時期：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底存在各不相關，各走各的路，——各國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這種分離，結果

是削弱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在各國，祇有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底聯合，才造成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底穩固基礎。但是在每個國家中，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這種聯合底造成是帶有歷史性的，是依地方條件和時間條件，循特別道路所造成的。在俄國，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聯合之必要，在理論上早已宣佈過了，但在實際上，這種聯合僅在現時才着手創造。這種創造底過程是一個很困難的過程，各種的動搖和懷疑隨着這個過程而發生，這是毫不奇怪的。

從過去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教訓呢？

整個俄國社會主義底歷史使得：牠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反對專制政府，奪取政治自由，我們的社會主義運動會集中在反專制制度的鬥爭上。另一方面，歷史已指明出來：在俄國，社會主義思想之脫離勞動階級底先進代表，比別國還要厲害得多，在這樣一種脫離的情形之下，俄國革命運動定會軟弱無能。這裏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所應實現的一個任務：把社會主義觀念和政治覺悟性灌入無產階級羣衆，組織與自發工人運動有密切聯繫的革命黨。在這一方面，俄國社會民主黨已做了許多工作；可是要我們做的工作還更多哩。隨着運動底增長，社會民主黨底活動地盤也逐漸廣闊了，工作也逐漸複雜了，運動底活動者也一批一批地集中自己的力量來實現宣傳鼓動工作底日常需要所提出的各種局部任務了。這個現象完全是合於法則的而且是必不可免

的，可是這個現象使我們不得不特別注意：使得活動底局部任務和鬥爭底個別方法不致推尊爲一種最重要的東西，使得準備工作不致推尊爲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進工人階級底政治發展和政治組織，是我們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誰要是把這個任務放在次要地位，誰要不使鬥爭底各種局部任務和單個方法服從這個任務，誰就是走上了錯誤的道路而給運動以極大的害處。把這個任務推在次要地位的，第一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號召革命者用脫離工人運動的單個密謀小組底力量來與政府鬥爭；第二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縮小政治宣傳、鼓動和組織底內容和範圍；他們認爲祇有在工人生活中的某個特殊時期，祇有在得意時期才可以而且應當請工人來嘗嘗「政治」的味道；他們過於關心把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兌換成爲要專制制度實行單個讓步的要求，而不十分關心把這些單個讓步的要求，變爲革命黨反對專制制度的有系統的和一往直前的鬥爭。

『組織起來吧！』——『工人思想報』用各種聲調向工人們這樣重複着說，『經濟派』底一切擁護者都這樣重複着。當然，我們是完全贊成這個號召的，可是我們定要補充一下：組織起來，不僅要組織到互助會，罷工基金貯蓄所和工人小組中去，而且也要組織到政黨裏去；組織起來作反對專制政府和反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堅決鬥爭。沒有這樣的組織，無產階級不能進到覺悟

的階級鬥爭，沒有這樣的組織，工人運動必會軟弱無能，光是靠貯蓄所、小組和互助會底力量，工人階級永遠不能執行牠所負擔的偉大的歷史任務：解放自己和全體俄國人民，使他們脫離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束縛。在歷史上，沒有那一個階級能不提出自己的政治領袖，自己的先進代表來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而能夠達到統治的。俄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指明，牠能夠提出這樣的人。最近五六年來俄國工人發展了極廣大的鬥爭，這已經指明：工人階級中是隱藏着多大的革命力量，無論政府怎樣最拚命的追究，不但不減少而且增加了疾趨於社會主義，走向政治覺悟和政治鬥爭的工人底數量。一八九八年我們同志底代表大會，很正確地提出了任務，而沒有重複人家的話，牠所表現的並不只是一種「智識份子」底狂熱……。我們應當堅決着手執行這些任務，把黨底綱領、組織和策略這些問題提到日程上面去。我們怎樣觀察我們綱領底基本綱要，這點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這裏當然不用詳細說明。組織問題呢，我們打算在本報最近幾期中發表幾篇文章來說明。這是我們最痛苦的問題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比俄國革命運動底舊人物落後多了。我們應當公開承認這個缺點，把自己的力量用來規定比較秘密的辦事方法，來有系統地宣傳辦事規則和欺騙憲兵以及逃避警察法網的方法。我們要培養這樣的人：他們不祇在空暇的晚上幹革命，而且要終身幹革命。我們要建立這樣大規模的組織，使得我們的各種工作之間，能實行嚴格的分工。最

後，至於策略問題，我們這裏僅限於下面幾句話：社會民主黨不用一種預先想好的政治鬥爭計劃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足，來縮小自己的活動範圍；牠承認所有的鬥爭方法，只要這些方法適合於黨底實力和能够達到在現有條件下可以實現的最大的結果。要是有強固而有組織的黨，則單個罷工可以變爲政治示威，變爲對政府的政治勝利。要是有強固而有組織的黨，則單個地方的暴動可以發展成爲勝利的革命。我們應當記着：爲單個要求而與政府鬥爭，奪取單個的讓步，這祇是與敵人的小接觸，這祇是前衛底小戰，決戰還在前面哩。在我們面前高高站着的一座敵人的砲台，向我們施放雨滴般的砲彈，來殺害我們優秀的戰士。我們應當奪取這個砲台，而且假使我們能把醒悟的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與俄國革命者底一切力量統一於一個政黨（俄國一切有生氣和有志氣的人都會傾向於這個黨）之內，則我們定能奪取這個砲台。祇有在那時候，才能實現俄國工人革命家彼得、亞歷克舍也夫（Peter Alexeev）底偉大預言：「百萬工人將舉起筋肉條條的拳頭，把兵士刀槍所圍繞的專制政體打得粉碎！」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

從何着手？

從何着手？

「做什麼」這個問題，最近幾年來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面前更特別嚴重地發生起來了。問題不在於選擇道路（好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樣），而在於在已知的道路上我們應當實行那些實際步驟，到底應當怎樣做。問題在於實際行動底系統和計劃。我們應當承認：鬥爭底性質和方

法這個問題，在實際的政黨看來是基本的問題，這問題在俄國還沒有解決，還能激起許多嚴重的分歧，這種嚴重分歧暴露出思想上的悲痛的不堅定和動搖。一方面，想限制和縮小政治組織和統治煽動工作的「經濟派」，還遠未死亡。另一方面，只會迎合每個新「潮流」而不會區別臨時要求和整個運動基本任務及經常要求的無原則的折衷主義，仍舊在雄糾糾地高舉頭角。大家知道，這派底巢穴就是「工人事務報」。牠的最近的「綱領式的」申明，標題為「有歷史意義的轉變」的這篇大吹大擂的文章（「工人事務小報」第六期）（註釋五），特別顯著地證明了我們這一個估

計。昨天他們還在與「經濟主義」吊膀子，對堅決責備「工人思想報」這點憤憤不平，「緩和了」普列漢諾夫的反對專制制度的問題底提法；但今天他們已經引證李卜克內西底話了：「假使環境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那末，策略也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他們已經講到：建立「堅固的鬥爭組織」來直接進攻專制制度，「在羣衆中進行普遍的革命政治煽動」（這是多麼有勁呵；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煽動！），「努力號召示威抗議」，「舉行極有（是呵！）政治性的遊街示威」等等。

我們已在「火星報」第一期上提出了一個綱領：建立強固而有組織的黨，這個黨，不僅要奪取單個的讓步，而且要奪取專制制度底砲台的本身，——「工人事務報」能够這樣快地領悟這個綱領，我們本可表示滿意，可是領悟者之缺乏各種堅定觀點，却能够把這種滿意打消。

當然，「工人事務報」標榜李卜克內西這個名字是徒勞無益的。關於某個專門問題的煽動策略，黨組織內某項工作進行的策略，在二十四小時內是可以改變的；可是像這種問題：羣衆中的鬥爭組織和政治煽動是否一般地、永遠地和絕對地需要——，這種問題莫說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是在二十四月內要來改變自己對牠的觀點，也祇有沒有任何原則的人，才能辦到。藉口於環境不同，時代變遷，這是很滑稽的：在任何「灰色的和平的」環境中，在任何「革命精神衰落」的時

期內，着手建立鬥爭的組織和進行政治煽動都是必需的。不僅如此，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這樣的時期內，上述的工作特別需要，因為到了革命爆發時期，建立組織已是太晚了；組織應當已經準備妥當，以便一下子來擴張自己的活動。『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策略』！要改變策略，先要有策略；如果沒有在各種環境和各種時期的政治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堅固組織，那就談不到什麼有系統的，有堅定原則的和堅決實行的活動計劃，而祇有這種計劃才值得稱為策略。看看事實上怎麼樣呢：有人已向我們說道：「歷史時機」在我們的黨面前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恐怖問題（註釋六）。在昨天，政治組織和政治煽動的問題是「完全新的」問題；在今天，恐怖問題是「完全新的」問題了。這樣自己忘記來歷的人公然來討論根本改變策略的問題，聽了不是奇怪麼？

好在『工人事務報』說得不對。恐怖問題完全不是新的問題，我們祇要約略記起俄國社會民主黨固有的觀點就夠了。

在原則上我們從來未曾拒絕而且也不能拒絕恐怖手段。這是一種軍事行動，在戰鬥底某個時期中，在軍隊底某種狀態下和某種條件下，牠是完全適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可是問題底實質是在於：目前所提出來的恐怖手段，並不當牠是作戰軍隊底一種行動，並不當牠是與整個鬥爭系統密切聯繫和聯成一氣的一種行動，而當牠是與整個軍隊毫無關係的一種單獨襲擊底獨立手段。的

確，在中央革命機關沒有和地方革命機關軟弱的條件之下，恐怖行動也不能不是這樣的。因此，我們堅決宣佈：這樣的鬥爭方法，在現條件下是不合時的、不妥當的，可以使最積極的戰士忽視他們真正的、在整個運動利益上最重要的任務，可以擾亂革命底力量而不能擾亂政府底力量。你們試回憶最近的事變吧（註釋七）：我們親眼看到廣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羣衆已拚命進行鬥爭，而革命者倒沒有領導者和組織者底司令部。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最努力的革命者之走向恐怖行動，不會削弱那些唯一有希望的鬥爭隊伍麼？這一點不會使憤憤不平的、正在反抗的、準備鬥爭的、散漫的以及正因其散漫而軟弱的羣衆與革命組織之間的聯繫，發生破裂麼？要知道，這一個聯繫就是我們勝利底唯一保障。我們絕不想否認英勇突擊底一切意義，可是我們的任務就在竭力使人不要醉心於恐怖行動，不要承認恐怖行動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鬥爭方法，現在有許許多多人就很厲害地傾向於這一點。恐怖行動始終不能成爲通常的軍事行動，牠至多只能成爲堅決衝鋒底方法之一。試問我們現在能不能號召作這樣的衝鋒呢？「工人事務報」大概以爲是能夠的。至少牠是這樣呼喊着：「排成衝鋒隊吧！」可是，這種熱情又是不合理性的。我們軍事力量底主要羣衆是自願兵和暴動者。常備軍我們祇有幾小隊，而且就是這幾小隊也還沒有動員起來，彼此之間也還沒有聯繫，還沒有學會排成普通的作戰隊伍，更不要說排成衝鋒隊了。在這樣的條件之

下，凡是能够考察我們鬥爭底一般條件而在事變歷史過程底每個「轉變」中不忘記這些條件的人，都應當明白：目前我們的口號，不能是「上前衝鋒」，而應是「正確地包圍敵人的砲台」。換句話說：我們黨底直接任務，不是號召現有一切力量立刻向前攻擊，而是號召建立革命組織，使其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能够統一切力量 and 領導運動；就是說，應當時刻準備幫助一切的抗議和一切的發動，利用牠們來增加和鞏固可供決戰之用的軍事力量。

二月和三月事變底教訓，竟這樣動人，結果使這個結論現在未必還能遇到原則上的反駁了。可是，現在我們應該做的，並不是原則上的解決問題，而是實際上的解決問題。我們不僅要明白：對於那種工作必需要有那種組織；我們還須要規定組織底一定計劃，以便各方面能够着手把組織建立起來。因為問題底迫切重要的緣故，我們要請同志們注意在準備付印的小冊子上所詳細闡發的計劃草案。

據我們的意思，創辦全國政治報，應當是行動底出發點，是着手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並且是我們藉以不斷發展、加深和擴大這個組織的基本線索，我們首先需要報紙，沒有報紙就不能有系統地進行原則堅定的和各方面的宣傳與煽動。進行這種宣傳與煽動一般地是社會民主黨經常的和主要的任務，尤其是目前的迫切任務，因為目前在最廣大的民衆中喚起了

對於政治，對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興趣。個人影響，口頭宣傳，地方傳單，小冊子等等零散的煽動，需要用那種歸納性的和經常的煽動來作補充——這種要求，從來沒有感覺得像現在這樣厲害過；但要進行這種普遍的和經常的煽動，就只有利用定期的報紙。報紙出版（與傳佈）底定期性和次數可以成爲最確切的尺度，來測量我們這個軍事行動底最初步的最迫切的工作，好到什麼程度，——這種說法未必是誇大的。其次，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全國的報紙。假使我們不會和當我們還不會用出版物來統一我們對人民和對政府的影響時，那末，要想法去統一其他更複雜的、更困難的、却是更堅決的影響方法，那就是烏托邦了，無論在思想方面或在實際方面和組織方面，我們的運動所最吃虧的，就是自己的散漫性，就是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幾乎完全從事於純粹的地方工作。這種純粹的地方工作，既縮小了他們的眼界和他們活動範圍，又縮小了他們的秘密技能和準備程度。我們上面所說那種不穩固和動搖，其最深的根源正是這種散漫性。創辦全俄報應當是走上免除這個缺點、變幾個地方運動爲一個全國運動這條路線上的第一步。最後，我們一定需要政治報。沒有政治報，在現代的歐洲就不能有值得稱爲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報，絕對不能

⊙關於政治報的詳細議論，可參看本卷「做什麼？」第五章第一節（B）。（編者註）

執行我們的任務——把一切政治上表示不滿的和表示反抗的份子集中起來，用他們來滋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我們已經走了第一步，我們在工人階級中間已激起了熱情，去進行『經濟的』工廠揭露的熱情。我們現在應當再前進一步；在凡是有些覺悟的人民階層中間都要去激起他們作政治揭露的熱情。政治揭露的呼聲現在這樣無力、稀少和怯懦，我們不要因此而心慌意亂。這種現象底原因，並不是因為大家都屈服於警察的專橫了。牠的原因是：能夠而且準備揭露的人，沒有他可說話的講台，沒有熱烈聽講和鼓勵演說家的聽衆，他們在人民中間各處都看不到一種力量，值得來向他控告『萬能的』俄國政府底罪惡。可是現在，一切事情都變得很快。這樣一種力量現在已是有了，這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牠已證明牠不僅準備聽從和幫助政治鬥爭的號召，而且準備勇敢地上前作戰。我們現在能夠而且應當建立講台，來把沙皇政府揭露給全體民衆看，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就應當成爲這樣的講台。俄國的工人階級與俄國社會其他階級和階層不同，牠對政治知識發生不斷的興趣，對秘密刊物常常（不僅在特別風潮的時期）有很大的需求。在這樣的大批需求的條件之下，在有經驗的革命領導者已在開始培養的條件之下，在工人階級底集中化使工人事實上成爲大城市工人區和工廠區底主人翁的條件之下，——創辦政治報是無產階級完全能夠担負的事情。而經過無產階級，報紙可以深入到城市平民，鄉村手藝工人和農民中間去，以成爲真

正的人民政治報。

可是，報紙底作用還不僅限於傳佈思想，限於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上的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在後面這一點上說來，我們可以把牠比作造房子時的大木架。木架搭在建築着的房子底周圍，形成房子底輪廓，促進各匠人間的關係，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考察用有組織的勞動所達到的總成績。在報紙底幫助和聯繫之下，自然可以形成經常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要做地方的工作，而且要做經常的一般的紅作，來教導自己的組員留心考察政治事件，估計這些事件對於各人民階層的意義和影響，規定革命黨影響這些事件的妥當辦法。單就一個技術任務——保證正確地供給報紙以各種材料和正確地推銷報紙——而論，已使我們不得不建立統一政黨底地方代辦機關了；這種代辦彼此應當發生活的關係，知道一般的工作情形，慣於經常執行全俄工作底各種零星職務，試用自己的力量去組織某種革命行動。這種代辦機關⊖將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組織底骨節；這種組織，其規模之大足以包羅全國；其組織之廣泛和複雜足以實行嚴格精細的分工；其組織之堅定足以在各種狀況、各種「轉變」和意外情形之下都能一貫地進行自己的工作；其組織之靈活，一方面能够避免與勢力過大的敵人公開作戰（當敵人集中其全力於一個地方的時候），另一方面能够利用這個敵人底動作滯緩而加以攻擊（在他

最難料到進攻的地方)。今天我們的任務還比較容易：幫助大城市內遊行示威的學生。明天我們的任務就比較困難了：例如要幫助某區的失業工人運動。後天我們就應當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對農民暴動作革命的參加。今天我們應當利用因政府進攻地方自治局所造成的政治形勢底緊張。明天我們應當幫助人民的騷動來反對某個兇暴的沙皇走狗，用抵制、攻擊、遊行示威等等方法來教訓他，使他不得不作公開的退却。戰鬥準備底這種程度，祇有在常備軍經常活動的條件之下才能養成。假使我們團結自己的力量來創辦全國報紙，那末，這樣的工作不僅可以準備和提拔最能幹的宣傳者，而且可以準備和提拔最靈巧的組織者，最英明的黨底政治首領，他們能够在必要時提出堅決戰鬥的口號而領導戰鬥。

最後，爲着避免可能的誤會起見，我要申明幾句。我們曾經時常祇講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準備

○很明顯地，這樣的代辦，祇有在他們完全接近吾黨地方委員會（團體，小組）的條件之下，才能順利地工作。而且一般說來，我們上面所指出的整個計劃，當然也祇有在黨委員會最積極的幫助之下才能實現。黨委員會對黨底統一已採取許多步驟，我們相信他們會達到這個統一，其時期不在今天便在明天，其形式不是這樣便是那樣。

，可是我們並不會因此想說：專制制度祇能受正確的包圍或有組織的衝鋒才會倒台。這樣的觀點是荒誕的信條主義。正是相反，專制制度將受一次自然掀起的爆發或不可逆料的政治糾紛（隨時隨地都有這種危險）底壓迫而倒台，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用歷史的眼光看來是更靠得住的。可是，無論那個政黨，如不想陷於冒險主義，則決不能把自己的活動建築在這樣的暴發和事變的希望上面。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不斷地進行自己有系統的工作；我們愈不靠望意外的事變，則我們愈有把握使任何的『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都不能令我們倉皇失措。

一九〇一年五月

做
什
麼
？

做什麼？（註釋八）

（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黨的鬥爭給黨以力量與生氣；黨底渙散及其嚴格分明的界限底模糊，是黨底軟弱底最大明證；黨是由於清洗自己而鞏固起來的……」

（摘自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沙爾給馬克思的信）

序言

照作者原來的計劃，這本小冊子應當詳細發揮在『從何着手？』（『火星報』第四期，一九〇一年五月）那篇文章內所發表過的那些思想。我們首先應該向讀者道歉的，就是我們那裏的

○參看本卷第二五頁——三四頁。（編者註）

約言（在答覆許多問題和信件時所重複說過的約言），實踐得比較遲緩。遲緩底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會企圖把所有國外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組織統一起來，這是在去年（一九〇一年）六月所着手進行的事（註釋九）。我們那時候自然應當等待這個企圖底結果，因為這個企圖假使能够成功，我們也許要在稍微不同的觀點之下來說明「火星報」底組織問題上的觀點；至少，這樣的成功將要很快地消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兩個思潮底存在。但是讀者知道，這個企圖沒有成功，而且在「工人事務報」第十期重新轉變到經濟主義之後，這個企圖底結果也不能不是這樣，這一點我們以後要來證明。這一派雖很渙散而少明確性，但比較穩固而善于在各種形式中復活起來；與這派作堅決的鬥爭已感覺有絕對的必要。於是這本小冊子底原來計劃就改變了，而且是大大地擴大了。

這本小冊子底主要的題目，本來是三個問題，就是在「從何着手？」這篇文章上所提出的三個問題：我們政治煽動底性質及其主要內容問題，我們的組織任務問題和在各處同時建立全俄鬥爭組織的計劃問題。這些問題，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引起作者底興味。作者還是在「工人報」上，在有一次企圖恢復牠而沒有成功的時候（參看第五章），就已經想提起這些問題了。原定的計劃，打算在這本小冊子內祇來討論這三個問題，而且儘可能地用肯定的形式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不去或差不多不去進行爭辯；可是，這個計劃由於下面的兩個原因而完全不能實現。一方面，經濟

主義比我們所預料的要有生氣得多（我們是在廣義上應用經濟主義這個名詞的，這個名詞在「火星報」第十二期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與經濟主義底擁護者的談話」這篇文章中已經講明了，可以說，這篇文章會定出這本小冊子底大綱）①。無疑的，對於這三個問題的解決之所以有各種不同的觀點，這主要的是因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派根本上的互相對立，而局部的意見分歧却比較次要得多了。另一方面，經濟主義者不瞭解「火星報」在事實上是貫徹我們的觀點，而這種不瞭解，很明顯地指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講各的語言；因此，假使我們不是從頭講起，便什麼也講不通；我們必需要引用無數具體的例子，極通俗地、極明白地和極有系統地來對一切經濟派「解釋」我們意見分歧底一切根本點。我就決定實行這種「解釋」的企圖；同時，我明知道，這可以使這本小冊子底篇幅大大增加，而且可以使出版日期延遲下去；但是除此以外，我再找不出別的方法來履行我在「從何着手？」這篇文章上所給與讀者的約言。這樣，除了請讀者原諒我這本書底出版遲緩以外，我還要請讀者原諒的，就是這本書文字上有很大的缺點，因為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時間非常匆忙，同時因別的工作底阻撓而不能下筆直書。

①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九頁——三四四頁。（編者註）

研究上述的三個問題，仍舊是這本小冊子底主要題目，但是我在本書的開端，不得不講到兩個比較一般的問題：爲什麼像「批評自由」那樣好像是「天真的」和「自然的」口號，在我們看來是一個真正的宣戰的信號呢？爲什麼甚至關於社會民主黨在羣衆自發運動上的作用這種基本問題，我們都不能講通呢？其次，關於對政治鼓動性質和內容的觀點的發揮，變成了關於社會民主黨政策與工聯主義政策間的區別的說明；關於對組織任務的觀點的發揮，變成了關於經濟派所認爲滿意的手藝主義與我們所認爲必需的革命家組織間的區別的說明。再其次，我堅持出版全俄政治報的「計劃」：反對這個計劃的異議不能成立，他們愈不能據實答覆我在「從何着手？」這篇文章裏面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怎樣能够在各地同時着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組織這個問題），那我就愈要堅持這一個計劃。最後，在這本小冊子底結尾中，我想指點出來：我們做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來預防與經濟派完全破裂，可是這一個破裂却還是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工人事務報」已有特殊的「歷史」（如果願意這樣說）意義，因爲牠所最充分和最明顯地表現出來的，並不是澈底的經濟主義，而是那種造成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上整個時期特點的散漫性與動搖性；——因此，我們與「工人事務報」所作的初看起來似乎是過分仔細的爭辯，也有意義，因爲我們假使不能澈底消滅這個時期，我們就不能前進。

一九〇二年二月

(二) 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A · 什麼是「批評自由」？

無疑地，「批評自由」是現時最時髦的口號，這口號在各國社會黨人和民主黨人的爭論中用得最多。爭論雙方的一方面，得意揚揚地依據批評自由，初看起來，這是再奇怪不過的。難道在各先進政黨底隊伍內，有人聲言反對大多數西歐國家所頒佈的藉以保證科學自由和保證科學研究自由的法律麼？我想，凡是聽見這個大街小巷中所傳說的時髦口號而還不了解雙方爭論實質的人，都應該說：「這好像不是這樣的吧！」「大概，這個口號是這樣的一種暗號，像稱呼一樣，日益用慣，幾乎成了一種普通的名詞」。

實際上，誰都知道，現代國際社會民主黨內已形成了兩派。這兩派之間的鬥爭，有時燃燒起來，火燄騰騰；有時在動人的「講和決議」底灰燼之下暫熄下去。對「舊的教條式的」馬克思

主義採取批評態度的這個「新」派，其內容如何，伯因斯坦已經講得很清楚，米萊蘭已經表演得很明白（註釋十一）。

社會民主黨應該從社會革命底黨變為社會改良底民主黨。伯因斯坦底這一種政治要求，是以他全部并非有條而前後一貫的「新」論據來作護身符的。他否認了社會主義可有科學的根據；他

○這裏附帶地說一下：社會主義內部各派底鬥爭第一次從民族現象變成了國際現象，這在近代社會主義史上幾乎是唯一的，而且是非常足以告慰的現象。過去，拉沙爾派與愛森拿赫派間的爭論，蓋斯德派與可能派間的爭論，費邊派和社會民主派間的爭論，民意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間的爭論，——這些爭論仍舊是純粹民族性的爭論，他們反映了純粹民族的特徵，他們發生在所謂各個平面上。現在（現在已看得很明白），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閻員派，德國的伯因斯坦派，俄國的批評家，——他們都是一家弟兄，他們彼此稱揚，彼此學習，共同起來反對「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註釋十）。在這一次與社會主義中的機會主義所作的第一次的真正國際的鬥爭中，國際的革命社會民主派也許可以充分地鞏固起來，足以推倒早已統治歐洲的政治反動罷？

否認了可以用唯物史觀來證明社會主義底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否認了正在增長的貧困，無產階級化和資本主義矛盾加劇的事實；他認為「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本身不能成立，並且絕對否認了無產階級專政底觀念；他否認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原則上的對立；他否認了階級鬥爭底理論，以爲牠不能適用於照多數人意旨來管理的真正民主社會等等。

這樣，便要求由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堅決轉變到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派，同時，也同樣堅決轉變到對一切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作資產階級式的批評。可是，因爲在政治的講台上，在大學的教席上，在大批的書冊中，在許多的學者的著作裏，這一種資產階級式的批評，早已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因爲在幾十年來，一切受過教育的階級底青年們，有系統地受了這種批評底教育；所以毫不奇怪的，社會民主黨中的「新批評」派一跑出來就立刻成了全形，好像「才藝女神」從「神皇」腦袋內誕生出來一樣。這個派別，按其內容，本不待發展和形成：牠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著作那裏搬到社會主義的著作上來的。

其次，要是伯因斯坦底理論批評和他的政治期望還有人不明白的話，那麼法國人却已經關切到「新方法」底具體表明了。法國在這一次也證實了自己國家的舊名譽，「在這個國家底歷史上，階級鬥爭比任何地方都進行得更徹底」（恩格斯在馬克思所著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

上的序言)。法國的社會黨人並不談理論，而去直接行動；法國在民主關係上比較發展的政治條件，使他們立刻過渡到「實際的伯因斯坦主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結果。米萊蘭對於這一種實際的伯因斯坦主義，就給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伯因斯坦和福爾馬(Vollmar)之所以這樣熱心地擁護並贊揚米萊蘭，並不是徒然的！實際說來：社會民主黨如果在實質上只是一個改良的黨，並且牠應當有公開承認這點的勇氣，那麼社會黨人不僅有權加入資產階級內閣，而且應時時努力做到這點。假使民主制實質上就是消滅階級統治，那末社會黨人開員爲什麼不用階級合作的話來誘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呢？即使在憲兵屠殺工人已經千百次指明各階級民主合作底真義之後，他如何不依然留在內閣之內呢？他如何不要親身去祝賀沙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現在稱沙皇爲絞刑架、鞭笞、放逐底英雄）呢？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受了無限屈辱和貶降，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意識（這是可以保障我們勝利的唯一基礎）遭了蠱惑，結果祇換得一張微小改良底宏大草案；而這一種改良竟小到這個程度，以至於比在資產階級政府那裏所能達到的還要少些！

誰要是不故意閉着眼睛，誰就不能不看到：社會主義中的新「批評」派，並非別的，祇是一種新式的機會主義而已。假使我們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按着他們自己所穿的漂亮服裝，不是按着他們自己所取的尊號，而是看他們的行動怎樣，他們實際上所宣傳的是什麼，那末就可明白：

『批評自由』就是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派底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改良民主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份子灌輸到社會主義中去的自由。

自由是偉大的字眼，但是在工業自由底旗幟之下，進行了強盜式的戰爭；在勞動自由底旗幟之下，掠奪了勞動者。現時所用的『批評自由』這幾個字，其內部也包含着同樣的虛偽東西。真正相信自己把科學推向前進的人們，他們所要求的應當不是新觀點與舊觀點並立的自由，而是以新觀點代替舊觀點的自由。現在高呼『批評自由萬歲！』這太像那關於空桶的寓言了（註釋十二）。

我們緊握着手、靠着肩、按着險阻崎嶇的路徑而進行着。我們的四面都是敵人，我們常常要在他們的敵火下面來進行。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大家聯合起來，正爲的是要與敵人鬥爭，不使自己陷落到鄰近的泥潭中去。住在泥潭裏的人們老早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擇鬥爭底道路，而不選擇調和底道路。於是，我們中間有幾個人就叫道：我們到這個泥潭裏去吧！人家開始譏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反駁說：你們這些人是何等落後呵！你們竟這樣狠心地否認我們叫你們到好路上去的自由！哦，是的，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地叫，而且可以自由地走你們的路，那怕就是走到泥潭裏去也好；我們甚至認爲你們的真正位置正在泥潭中，而且我們準備極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裏去。可是，只要請你們放鬆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也不要弄污自由這

種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我們要走的路，我們不但自由地與泥潭鬥爭，而且還要與轉到泥潭裏去的人們鬥爭。

B · 『批評自由』底新的擁護者

最近第十期的『工人事務報』（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底機關報）所得意提出的，便是這個口號（『批評自由』）。牠把這個口號並不看作是理論的定理，而把牠看作是政治的要求，把牠看作是對於『能否統一在國外活動的社會民主黨組織』這個問題的答覆。牠說：『要達到堅固的統一，就須要批評自由』（第三六頁）。

從這話中可以得出兩個明確的結論：第一，『工人事務報』袒護一般的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派；第二，『工人事務報』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底自由。我們現在來考究這兩個結論。

『工人事務報』『特別』不喜歡『火星報』和『曙光』雜誌預料『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山岳派與基爾特派間的分裂』①。

『工人事務報』底編者克里却夫斯基(Krichevskij)寫道：

「說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有山岳派和基朗特派，這是淺薄的歷史的比擬：馬克思主義者寫出這樣的話來，這是很奇怪的。山岳派和基朗特派所代表的，並不是兩種不同的秉性，或是兩種不同的思想，好像歷史家思想家所想像的那樣，而是兩種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一方面是中等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是，在現代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沒有階級利益底衝突，牠的各派（克里却夫斯基加上着重點）（最厲害的伯因斯坦派也包括在內），完全都是站在無產階級階級利益及其奪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鬥爭底基礎上面的」（第

①在『火星報』第二期（一九〇一年二月）社論中，曾把革命無產階級中間兩個派別（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與十八世紀革命的資產階級中間兩個派別（雅可賓派——『山岳派』——和基朗特派）作過比擬。這篇社論底作者就是普列漢諾夫（註釋十三）。無論立憲民主黨人，無論『無題派』（註釋十四），無論孟塞維克，他們至今都愛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可賓派』。可是普列漢諾夫究竟怎樣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底右派，——關於這點現在他們則寧願不做聲或……忘記。（這是作者對一九〇八年版的註解，——編者

註。）

好一個胆大的斷語！正是因爲最近幾年來「學士」階層廣泛地參加了社會主義運動，所以伯因斯坦主義能够這樣快地傳佈起來，這件事實，難道克里却夫斯基沒有聽見過嗎？而主要的，就是我們的作者，根據什麼來斷定，「最確信的伯因斯坦派」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鬥爭底基礎上面？這是不得而知的。牠這樣堅決地擁護最厲害的伯因斯坦派，却完全沒有拿出一點論據與理由來。很明顯的，我們的作者以爲他既然重複了最厲害的伯因斯坦派自己關於自己所講的話，那末，他的斷語也就無需證明了。根據這派代表自己關於自己所講的話，來判斷這一個整個的派別，這難道不是再「淺薄」不過的麼？以後的關於什麼兩種不同的話，甚至絕對相反的黨的發展形式或道路的「議論」（見「工人事務報」第三四頁——三五頁），難道不是再淺薄不過的麼？看哪，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承認批評底完全自由，而法國人則不承認，他們的例子正是指明出「無忍耐性底害處呀」。

我們對於這點的答案：克里却夫斯基底例子正是指明出，按「依洛瓦斯基（註釋十五）的方法」來觀察歷史的人們，有時也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據這些人們底意見，要解釋德國社會黨底一致對法國社會黨底散漫，完全用不到去研究兩國歷史底特徵，用不着把軍事的半專制制度和共和

的代議制度底條件兩相對照，用不着分析巴黎公社和關於社會黨人的非常法（註釋十六）底結果，用不着把經濟生活和經濟發展拿來比較，用不着提起『德國社會民主黨空前的發展』怎樣同時進行過社會主義歷史上空前的劇烈鬥爭，不僅反對理論上的錯誤（米別赫（Muhlberger）、杜林①，大學教授社會主義者（註釋十七），而且反對策略上的錯誤（拉沙爾），以及其他等等。這些都是

①當恩格斯攻擊杜林（Dühring）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中許多代表都傾向於杜林底觀點，有人甚至在黨底代表大會上罵恩格斯態度激烈，無容忍性，不以同志態度來爭辯等等。在一八七七年的代表大會上，莫斯特（Most）和他的同志提議在『前進報』（Vorwärts，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者註）上取消恩格斯底文章，其理由是說這些文章『對大多數讀者沒有興趣』；而瓦爾特（Valteich）則申明：登載這些文章對黨有很大的害處，杜林對社會民主黨是有功勞的，『我們應當為黨底利益而利用一切，假使大學教授要起爭論，那末『前進報』決不能變為這種爭論底場所』（『前進報』一八七七年六月第六十五期）。你們可以看到，這也是擁護『批評自由』的例子，我們合法的批評家和不合法的機會主義者這樣喜歡引證德國人的例子，他們不妨來想想這個例子罷！

用不到的！法國人之所以彼此吵嘴，是因為他們彼此不相容洽；德國人之所以互相一致，是因為他們是好孩子。

你們看：人們用這種絕頂深奧的話，輕輕地「移去了」一件事實，這一件事實完全可以推翻對伯因斯坦派的擁護。伯因斯坦派是否站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基礎上——這個問題，祇有歷史經驗才能澈底解決。因此，在這一點上有最重要的意義的，正是法國的例子，因為只有在法國，伯因斯坦派會在自己的德國同志底熱烈贊助之下（和俄國機會主義者底熱烈贊助之下：請拿『工人事務報』第二三合期，八三頁——八四頁來比較一下）（註釋十八），企圖樹起獨立的旗幟。藉口於法國人底『不調和性』，這種藉口除掉自己的『歷史』（諾士德列夫式的歷史，註釋十九）意義而外，只是想用氣忿的話來抹煞極不快意的事實的一種企圖罷了。

而且，我們也還不想把德國人送給克里却夫斯基和其他許多『批評自由』底擁護者。要是『最厲害的伯因斯坦派』還能容忍於德國黨內，那末，這只是因為他們服從漢諾維決議（這個決議會堅決反對伯因斯坦底『修正』）和劉比克議決（這個決議雖然帶有一種外交性質，但終究給了伯因斯坦一個直接的警告）（註釋二〇）。從德國黨底利益上看來，我們本可以爭論一下：這種外交性質是否適當；當時壞的和平是否要勝於好的吵嘴；一句話講來，對於反對伯因斯坦主義的某

種方法是否妥當的估計，我們可有分歧之處。可是，德國黨曾經兩次駁斥伯因斯坦派，這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如果有人以為德國底例子是證實了『最厲害的伯因斯坦派是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經濟和政治解放的階級鬥爭底基礎上面』這個觀點，那就等於完全沒有了解有目共見的事情。

不僅如此。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工人事務報』在俄國的社會民主黨面前，提出了『批評自由』底要求，並且擁護伯因斯坦主義。很明顯的，牠一定以為我們這裏有人不公道地侮辱了我們的『批評者』和伯因斯坦派。可是侮辱了誰？誰侮辱了？在甚麼地方？什麼時候？到底有甚麼不公道的地方？關於這些問題，『工人事務報』却默不做聲，從沒有提起一個俄國的批評者和伯因斯坦派來！這裏我們祇有兩個可能的假設：或者是被人不公道地侮辱的那方面，就是『工人事務報』自己（『工人事務報』第十期上兩篇論文中都祇講到『曙光』雜誌和『火星報』對『工人事務報』的侮辱，這一點即可證實）。那時候，怎樣來解釋這件奇怪事情：『工人事務報』既然始終堅決否認與伯因斯坦主義一致，那末，爲什麼不袒護『最厲害的伯因斯坦派』及批評自由，就不能替自己辯護呢？或者是被人不公道地侮辱的是什麼第三者，那末，對第三者抱緘默態度，這能有什麼理由呢？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工人事務報』還在繼續演牠一成立之後就演起的（這點我們下面再

講）那套迷藏的把戲。其次，請注意這種被人讚揚的『批評自由』底第一次實際的應用。事實上，這種批評自由，結果不但一下子就弄得沒有任何批評，而且一下子就弄得沒有一般獨立的判斷。正是這個把俄國伯因斯坦主義這種秘密病（用斯大羅維底中肯的說法來講）（註釋二）瞞着不講的『工人事務報』，現在却提議簡。單。地。抄。寫。一。張。最。新。的。醫。治。這。類。德。國。病。的。德。國。藥。方，來醫治這種病！不是批評自由，而是奴隸式的模仿，——不，更壞些，是猴子式的模仿！現代國際機會主義底同樣的社會政治內容，隨着民族的特點而表現為各種變態。在第一種國家內，機會主義派早已樹起特別的旗幟；在第二種國家內，機會主義派則輕視理論，而在實際上進行急進派社會黨人底政策；在第三種國家內，革命黨裏面的一部份黨員，跑入機會主義底營壘，他們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起見，不來作為原則為新策略的公開鬥爭，而漸漸地、不知不覺地、不受處罰地（假使可以這樣的講話）來使自己的黨墮落下去；在第四種國家內，同是這些跑來跑去的人，在政治束縛底黑暗之中，在『合法』行動和『非法』行動特殊的相互關係之下，使用同樣的方法及其他等等。空講批評自由和伯因斯坦主義底自由，把這種自由當作統一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條件，而同時又沒有分析俄國伯因斯坦主義到底表現在什麼地方，牠有怎樣特殊的結果，——這就是等於無所謂的說話。

西。

我們自己現在要用幾句話來講一講『工人事務報』所不願意說的（或許竟不能了解的）東

C · 在俄國的批評

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關係上，俄國的基本特點，就在於：在自發工人運動開始發生和先進輿論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各種顯然不同的份子就在共同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以反對共同的敵人（陳舊的社會政治世界觀）了。這正是『合法馬克思主義』底蜜月。一般地講來，這曾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底開始，誰也不會相信這種現象是可以發生的。在專制的、完全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在兇猛的政治反動勢力摧殘任何政治不滿和任何反抗的時代，革命馬克思主義底理論驕然爲自己打出一條道路，而成爲經過檢查的刊物，這樣理論是用伊索寓言式的體裁來說明的，但是牠所用的字句是爲一切『注意這問題的人』所了解的。政府慣於只把（革命的）民意派底理論當作危險的理論，而沒有看到牠的內部的演進，凡是反對這理論的一切。

○這是指民粹派的世界觀。（編者註）

批評，政府都高興聽。在政府察覺以前，在稽查官和憲兵這支笨重軍隊找着新的敵人來加以攻擊以前，時候已經過去不少（照我們俄國的計算）了。在這個時期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已一本一本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的雜誌和報紙已創辦起來，而大家都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人們都來諂媚馬克思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獻起慇懃來了。出版家因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銷路非常廣闊而興高采烈起來了。很明顯地，被這種空氣所圍繞的初出茅廬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決不會祇有一個『趾高氣揚的作家』……。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當做過去的時期來平心靜氣地講牠了。誰都知道，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在我們著作界上盛極一時，是由於持極端的人物和最溫和的人物底聯合（註釋二二二）。實際上，這些溫和和人物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而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已爲他們以後的『批評的』發展過程所顯然證實），在這個『聯合』還未破裂的時候，就已經有人提起過了。①

①這是指士林（K. Tulin）即列寧，編者註）反對司特魯威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他那個標題爲『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作品上的反映』的報告作成的。（這是著者對一九一八年版的註解。請參看本版第二卷，——編者註）

如果是這樣，那末，以後的『混亂』底最大責任，是否要由與後來的『批評者』作聯合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來負擔呢？這樣的問題及其肯定的答覆，有時從那些過於死板地觀察問題的人們那裏可以聽到。可是這些人是完全不對的。祇有那些自己沒有把握的人，才懼怕同不可靠的人作暫時的聯合。無論那一個政黨沒有這樣的聯合，是不能存在的。我們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聯合，曾經是俄國社會民主派底第一個特別的真正的政治聯盟。我們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戰勝民粹派和很廣地傳佈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雖然是取着被庸俗化了的形式），就是因為有這個聯合。而且這個聯合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任何『條件』的。一八九五年被檢査局焚燒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論文集：『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材料』，就是一個明證。假使我們與合法馬克思主義底文字上的聯合可以比作政治上的聯合，那麼這一本書也可以比作政治上的條約。

分裂底發生，當然不是因為『同盟者』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恰恰相反，資產階級民主派底代表，正是社會民主黨底自然的和所希望的同盟者，因為現時黨底任務還是俄國現在時局所首先要求的民主任務。但是這一種聯合底必需條件，就是要使社會主義者有完全的可能，來把工人階級底利益和資產階級底利益底敵對性，揭示給工人階級看。可是，伯因斯坦主義和現在大多數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所崇尚的『批評』派，剝奪了這一種可能，淆亂了社會主義的意識，使馬克思

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和緩下去的理論，把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底觀念稱爲荒誕無稽，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歸結爲狹隘的工聯主義和爭取區區的、漸漸的、改良的「現實主義」的鬥爭。這完全等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之否認社會主義底獨立權，因之就是否認牠的存在權。這也就是實際上想把剛開始的工人運動變成自由派尾巴。

自然，在這些條件之下，破裂會是必需的。可是，俄國底「特殊的」特點就在於：這個破裂就等於把社會民主黨人從大家最易得到的傳佈極廣的「合法的」刊物上簡單地趕走出去。在這個刊物上，「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他們站在「批評底旗幟之下」，差不多得到了一種用以「譴責」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權。「反對正統」和「批評自由萬歲」底呼聲（現在「工人事務報」正在重複這些口號），立刻成了時髦的字眼，就是稽查官和憲兵也不能反對這一時髦；「著名的」（海洛斯多得式的著名的）伯因斯坦作品底三種俄文譯本出版，蘇巴託夫之介紹伯因斯坦和普羅科波維奇底著作等等（註釋二三）（參看「火星報」第十期），都可以表示這一點。社會民主黨現在負有與新派鬥爭的任務；這個任務本來已很困難，再因純粹外力的阻礙而越發艱難了。而且，這一派底活動還不僅限於文字工作。在人們轉向於「批評」的時候，實際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也跟着傾心於「經濟主義」。

合法的批評和非法的經濟主義底聯繫與相互關係是怎樣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可以專作一文來討論。我們這裏祇要指出這一個聯繫底無疑的存在就够了。著名的「信仰」，其所以能够這樣出名，祇因為牠公開地說明這個聯繫，而且說出「經濟主義」底基本的政治傾向：讓工人去作經濟鬥爭（正確些說，就是讓工人去作工聯主義的鬥爭，因為這一種鬥爭也包括特殊的工人政策），讓馬克思主義的智識份子同自由派結合起來作政治「鬥爭」。「民間的」工聯主義的工作是履行這個任務底第一部份，而合法的批評是履行這個任務底第二部份。這種說法，會是反對經濟主義的如此良好的武器，以至於如果沒有「信仰」，都值得杜撰出一篇「信仰」來。「信仰」不是杜撰出來的，可是，他的發表却沒有得着作者底同意，或甚至是違反了作者底意旨。至少，曾參加了發表新「綱領」^①的本書作者，已經聽到過這種怨聲和責備：爲什麼把演說人

①指「反對信仰的十七人抗議書」而言。本書作者曾參加草就這個抗議書（一八九九年底）。一九〇〇年春，在國外發表了抗議書，並附有「信仰」一文。現在從古斯科娃女士底文章中，已經知道：「信仰」底作者就是她，而當時國外「經濟派」中間最著名的角色就是普羅科波維奇。（這段註解是列寧於一九〇八年本書出版時補充上去的。——編者註）

所草就的闡明他們觀點的綱要，抄寫起來而散發出去，並加以「信仰」底頭銜，而且甚至與抗議書一同刊印出來！我們所以要講到這一段事情，是因為牠把我們經濟主義懼怕公開的特點揭穿出來。這正是一般經濟主義底特點而不祇是「信仰」作者底特點：「工人思想報」（牠是經濟主義底最公開最忠實的信徒），「工人事務報」（牠反對把「經濟主義的」文件編入「指南」上發表（註釋二四），基輔的委員會（牠在二年以前也不允許把自己的「信仰錄」與別人反對牠的駁議一同登載出來），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經濟主義底代表，都表現了這一個懼怕公開的特點。

贊成批評自由的人所表現的這種懼怕批評的心理，不能祇拿他們的狡猾這一點來解釋（雖然有時候不能不用一些狡猾手段：新派別底嫩芽尙未鞏固，就讓敵人來攻擊，這是很不合算的）。不，大多數的經濟主義者是真心帶有惡意來觀察（並且按經濟主義底實質講來，他們應當這樣來觀察）一切理論上的爭論，政派的分歧，廣泛的政治問題，關於組織革命者的草案以及其他的問題。有一次一個很澈底的經濟主義者對我說過：「所有這些都交給國外的人去做罷！」，他用這句話來表現了一種非常盛行的（又是純粹工聯主義的）觀點：我們的事業，是工人運動，是我們這個地方的工人組織；至於其他的東西，則都是理想家底虛構，都是「過於估計思想底作用」，如「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的一封信底作者們與「工人事務報」第十期都是異口同聲地這樣說着。

現在來問問：既然俄國的「批評」和俄國的伯因斯坦主義有這樣的特點，那末，如果不只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願意反對機會主義的人，他們的任務應當是怎樣的呢？第一，他們應當關心恢復理論工作；恢復那種在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時代才開始了的而現在還是落在秘密活動的人們身上的理論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工作，運動就不能有順利的發展。第二，他們必須要積極地與淆亂理智的合法的批評作鬥爭。第三，他們應該積極地起來反對實際運動中的散漫和動搖現象；揭穿和駁斥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降低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的任何企圖。

這三項任務，「工人事務報」一項都沒有做到，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們以後還要從各方面來詳細解釋這一個盡人皆知的真理。現在我們只要指出，「批評自由」底要求與我們俄國批評底特點和俄國經濟主義底特點，是處在怎樣一種激烈的矛盾狀態中。實際上，請你們看一看「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批准「工人事務報」的觀點的這個決議內容吧：

『爲社會民主黨今後思想上發展的利益起見，我們認爲在黨的刊物上自由批評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是絕對必要的，假使這種批評是沒有與這個理論底階級性和革命性相抵觸的話。』

（「兩個代表大會」（註釋二五）第十頁）

並解釋道：決議的「第一部份是與劉比克代表大會關於伯因斯坦的決議相符合的」……頭腦

簡單的「該協會的會員」却不知道，他們這樣抄襲，是證明他們何等可憐！……「但是……決議的第二部份，對於批評自由的限制，要比劉比克大會所規定的來得嚴格些」。

這樣看來，「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底決議是要反對俄國的伯因斯坦派麼？否則引證劉比克代表大會，是十分悖理的。但是說該決議「對於批評自由的限制來得嚴格些」，這是不正確的。德國人在自己的漢諾維決議上所逐條駁斥了的，正是伯因斯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劉比克決議上，指出伯因斯坦底名字並給他本人。下了一個警告。可是我們的「自由的」倣效者，對於特殊的俄國的「批評」和俄國的經濟主義底任何表現，則一字不提。他們這樣的默不作聲，而只是空空洞洞地說什麼理論底階級性和革命性，這祇是替理論底曲解多留些地步，尤其是如果「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不把「所謂經濟主義」（「兩個代表大會」第八頁）當作機會主義的時候。然而這都是附帶的話。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機會主義者對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態度，在德國和在俄國是完全相反的。大家都知道，德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是贊成保持現有的東西的：贊成保持那個大家都知道的根據幾十年的經驗逐條解釋過的舊綱領和舊策略。可是「批評家」則想改變綱領。正因為這些批評家人數太少，而他們的修正主義的企圖又很怯懦，所以大多數人之所以祇限於枯燥地反對「新奇」，其用意是可以了解的。但是俄國的批評家和經濟主義者却主張

保持現有的東西：我們的「批評家」要別人繼續稱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保證他們會用在各意識上的那種「批評自由」（因為他們實際上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黨的拘束）。不錯，我們也沒有過這樣一個為大家所公認的黨的機關，來限制批評自由——那怕用規勸的方法也罷。我們的經

①單就缺少公開的黨的拘束和黨的傳統這一點來講，這已經是俄國和德國之間的重要區別了；這個區別，應該是可以拿來警告一切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免得他們陷於盲目的模仿。下面就是一個榜樣，表明俄國的「批評自由」達到了何種程度。俄國的批評家布爾加科夫先生（Bulgakov），給了奧大利的批評家赫爾茨（Hertz）以這樣的一個責備：「不管赫爾茨底觀點如何獨立，他在這點（指論合作事業問題）上的見解，看起來終究太為他自己的黨底見解所拘束了；固然在細小的地方是有分歧的，可是在一般的原則上畢竟還是不敢相分離。」（見「資本主義與農業」一書，卷二，第二八七頁）。政治上受束縛的國家（在這國家中，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民，由於政治的奴役和對黨的道德與對黨的聯繫底完全不了解，而十分墮落）底臣民，傲慢地在責備立憲國家底公民：說他們「太為黨的見解所拘束了」！好像我們的秘密組織只須從事草定關於批評自由的決議案似的……。

濟主義者要革命者承認『現時運動底全權性』（『工人事務報』第十期第二五頁），就是承認現有東西的存在底『合法性』；使得『思想家』不要使運動『脫離』那條『由物質原素和物質環境底相互作用所決定』（摘自『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的『一封信』）的道路；使得人們認為最好是來進行那種『祇是工人在現條件下可以進行的鬥爭，使得人們認為，可能的鬥爭就是』工人們目前實際上所進行的鬥爭』（『工人思想附刊』第十四頁）。我們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則相反，我們不滿意於崇拜自發性，崇拜『目前』已有的東西。我們要求改變近年來統治着的策略，我們說：『在統一以前，並為着統一起見，必須要堅決明確地分清彼此的界限。』（『火星報』發刊詞）總之，德國人保持現有的東西，而反對改變牠；我們却要求改變現有的東西，而反對崇拜牠並反對與牠調和。

可是我們的『自由』抄襲德國人的決議的先生們，却沒有看到這一個『小小的』區別！

D ·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的意義

『教條主義，理想主義』，『黨底硬化——思想底勉強糾合底必然結果』，這些都是在『工人事務報』上『批評自由』底健將們所奮勇起來反對的敵人。他們能够立刻提出這個問題來，我們是很高興的，不過我們要提議加上另一個問題：

誰做裁判人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關於刊物出版的通告：一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底定期機關報」（工人事務報）底綱領」（『工人事務報』第一期），另外一個是關於恢復勞動解放社底刊物（註釋二六）的通告。兩個通告都公佈於一八九九年，當時「馬克思主義底危機」問題早已發生了。怎麼一回事呢？在第一個通告中你們就找不到關於這個現象的指示，找不到這個新機關報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之確定的說明。關於理論工作及其在目前的緊急任務，則在第一個綱領中和對這個綱領的補充中（一九〇一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補充——見「兩個代表大會」一書第十五頁——十六頁）一字都沒有提到。在整個時期內，「工人事務報」底編輯部把理論問題都丟在一邊，雖然這些問題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底注意。

第二個通告則恰恰相反，牠首先就指出了近年來對於理論的興味底減少；牠竭力要求「留神地注意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理論方面」，並號召「無情地來批評我們運動中的伯因斯坦主義和其他違反革命的傾向」。已經出版的幾期『曙光』雜誌可以證明，這個綱領是怎樣履行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反對思想硬化等等的那些響亮的詞句，祇是用來掩飾理論思想發展中的廢弛與窮蹙罷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例子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種全歐皆有的現象（這點德

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早已指出來了）：著名的批評自由，其意義並不在於以一種理論來代替別種理論，而在於自由離開任何完整而周到的理論，在於折衷主義和無原則性。誰要是知道一些我們運動底實際情況，誰就不能不看到：馬克思主義廣佈，同時理論水平綫也就跟着有些降落。因為運動具有實際意義和實際勝利，許多的人，許多在理論上很少準備或者甚至完全沒有準備的人，都加入了運動。由此可見「工人事務報」之得意洋洋地提出馬克思底一句格言：「一步實際運動重要於一打綱領」，牠提得何等不合節奏呵。在理論散漫零落底時代而要來重複這些字句，這就等於在遇見人家出喪時，喊「我願意你們抬之不勝其抬！」。而這些話是從馬克思「論哥達綱領」的一封信上摘下來的。但在這封信上，馬克思很嚴厲地責備在說明原則時所犯的折衷主義。馬克思向黨的領袖們說：假使已應該聯合的話，那末爲着達到運動底實際目的起見，你們可以締結條約，但是你們決不要拿原則來做交易，你們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底意思便是這樣，而我們中間，竟有人敢假冒馬克思底名義來減輕理論底意義（註釋二七）！

①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當醉心於最狹隘形式的實際運動的情緒與機會主義底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是必須始終努力堅持這種思想的。而對於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底意義，由於下面三種情形（許多人常常忘掉這三種情形）而更加重大：第一，我們的黨剛剛正

在形成，還祇是正在規定自己的綱領，還遠沒有同革命思想中其他足以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各派別算清賬目。正在最近以來，非社會民主派的革命思潮，反而活躍起來了（阿克雪洛德早已向經濟主義者說過這一點⊖）。在這些條件之下，初看起來『並不重要』的錯誤，可以引起極壞的結果。祇有近視的人才以為政派的爭論和嚴格地區別各派色彩，是一種不合時的或是多餘的事情。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許許多多的前途，都可以由這一「派」或那一「派」底鞏固如何來決定。

第二，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按其實質講來，是國際的。這不僅是說我們應當與狹義的國家主義鬥爭；而且也是說：在後進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祇有在牠能够利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之下，才能獲得勝利。但是，要真能利用別國的經驗，則單單認識這些經驗或是單單把最近的決議抄襲一遍，是不夠的。要真能利用別國的經驗，就必需要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考察這種經驗，而且要獨立地審查牠。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底發展是何等廣大，誰就會懂得，為要履行這個任務，須要多少的革命的力量和政治的（及革命的）經驗。

⊖ 這是指阿克雪洛德著作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現時的任務與策略的問題」，曾於一九〇八年，在日內瓦出版。（編者註）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民族任務，是爲世界上各社會黨所沒有過的。關於這個任務——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加在我們身上的各種政治和組織的責任，我們以後再說。我們現在只想指出一點，就是祇有以先進理論作指南的黨，才能完成先進戰士底作用。讀者如果要稍微具體地知道這句話底意思，那末祇要請讀者想起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前輩，如普爾真、拜林斯基、齊內雪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許多光榮革命家；祇要請讀者想起現代俄國著作所具有的全世界的意義，祇要請……這也就够了！

我們現在想把一八七四年恩格斯關於理論在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意義所說的話，引一段出來。社會民主黨底偉大門爭底形式，恩格斯承認不止有兩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像俄國許多人所想的那樣；而有三種，與這兩種門爭並立的還有理論的門爭。從現代各種問題和爭論底觀點上看來，他在實際上和政治上所給與已經強固的德國工人運動的指導，是非常可供效法的；因此我們從「德國農民戰爭」（牠早已成爲非常珍奇的一本書了）這本書的序言上摘下一大段來，希望讀者不要責備我們：

「德國的工人、與其他的歐洲工人比較起來，具有兩大優點。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的那個民族，他們保持理論思想，這種理論思想，德國的所謂「受過教育的」階級差不

多完全失掉了。如果沒有在牠以前的德國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底哲學，那就不會形成德國的科學社會主義——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思想，那末，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能够深入工人底骨肉。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單個職業有很好的組織，但前進得如此遲緩，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因原始形式的普魯東主義之傳播而發生混亂與動搖，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因巴庫寧所滑稽化了的普魯東主義之傳播而發生混亂與動搖：這些都可以證明，德國工人底這一種優點是如何偉大了。

「第二個優點就在於：德國工人之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都要遲些。德國理論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牠是站在三大思想家——聖西門、傅立葉和過文——底肩膀之上的，這三大思想家底學說，雖然有許多玄想和空想，他們終究是屬於自古迄今最偉大的智士，他們獨具天才地預先見到了無數的真理，而我們現在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這些真理底正確性；同時，德國實際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忘記，牠是在英國和法國運動底肩膀之上發展起來的，牠可以現成地利用英、法運動以高價買來的經驗；牠現在可以避免當時牠們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所不能避免的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底榜樣，如果沒

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的那種偉大的推動力，那末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麼境地呢？

『我們應該替德國工人說一句公平話：德國工人之善於享用自己的優越地位，是罕見的。自有工人運動以來，在鬥爭之互相調協、互相聯繫的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鬥爭都能有計劃地進行，這要算是第一次了。德國工人運動底力量和牠的不可克服，可以說也就在於這一種集中的進攻上面。』

『一方面因為德國工人有這種的優越地位，另一方面因為英國工人運動帶有島國的特徵，法國工人運動受暴力的鎮壓，所以德國的工人現在是處在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地位。事變容許他們能够多麼長久地佔居這種榮譽地位，這是不能預斷的。可是當他們佔居這個地位的時候，他們就（應當這樣希望）要切实履行他們所負擔的義務。要做到這點，就必需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面，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底責任是要使自己更加明瞭各種理論問題，更加解脫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詞句底影響，永遠要注意到：自社會主義成為科學以來，牠要求也用對待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牠，就是說，要研究牠。必需把這樣得出來的、日益明顯的意識，以日益加甚的熱忱，傳佈到工人羣衆中間去，必須日益加強地來團結黨底組織和工會底組織

……

「……假使德國的工人將來也前進的話，那末，他們將——並不是當運動底前鋒領袖（要某國底工人當運動底前鋒領袖，這並不是運動底利益），可是他們將在戰士的行伍間佔住光榮的地位；將來意外的患難或偉大的事變要求他們更有勇氣，更有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將是全副武裝起來應付的。」

恩格斯底話果然預料中了。過了幾年之後，德國的工人遇到了意外的患難——關於社會黨人的非常法律。德國工人的確能够全副武裝起來應付，並能够勝利地逃出患難。

俄國無產階級將來更要遭遇莫大的患難，將要與怪物作鬥爭，立憲國家底非常法，與這個怪物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小把戲了。現在歷史給了我們一個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其他任何國家底無產階級最迫切的任務中最革命的一個。實現這個任務，不僅把歐洲最強的反動支柱破壞，而且也（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最強的反動支柱破壞，這可以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我們可以相信：我們的前輩，七十年代底革命家已經當起了這個光榮的稱號，現在的運動更廣大而深刻千百倍，如果我們能用同樣的奮不顧身的決心與毅力，來鼓勵現在的運動，那末我們定能得到這個稱號。

(二) 羣衆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

我們上面已經講過，我們的運動比七十年代更加廣大和深刻千百倍，這需要我們以當時那種奮不顧身的決心和毅力來鼓勵牠。事實上，直到現在，大概還沒有一個人懷疑這點：現代的運動底力量就在於羣衆（主要的，是工業無產階級）底覺醒，牠的弱點就在於領導的革命者底缺乏覺悟性與主動性。

但是最近以來，却有人作了一個天翻地覆的發明，這個發明，使從來在這個問題上佔統治地位的一切觀點，都有被顛倒的危險。這就是『工人事務報』底新發明。『工人事務報』在同『火星報』和『曙光』雜誌作論戰的時候，並不限於一種局部的反駁，牠還想把『一般的分歧意見』引到更深的基礎上去，引到『對於自發的成份和覺悟的』有計劃的』成份底相。對。意義作不同的

估計」這點上去。「工人事務報」底控訴提綱說：「縮小發展中客觀成份或自發成份底意義。」

①我們對這一點的答復是：假使「火星報」及「曙光」雜誌底論戰，除了激起「工人事務報」想到這種「一般的分歧意見」之外，竟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其他結果，那末，單是這一個結果也已經使我們很滿意了：這一個提綱底意義何等的重大；這一個提綱把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理論和政治分歧底本質說得何等明顯呵。

因此，覺悟性對自發性的關係底問題，是大家對牠都很有趣味的的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十分詳細地來討論牠。

A · 自發高漲底開始

我們在前章中已經講過：在九十年代中葉，俄國受過教育的青年都風行一時地傾心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約在那時候，在一八九六年有名的彼得堡工業戰爭（註釋二八）之後，工人的罷工，也採取了這樣一種風行一時的性質。這些罷工底廣佈於全俄，已很清楚地證明重新高漲起來的民

①見「工人事務報」一九〇一年九月份，第十期，十七頁——十八頁。着重點係該報所加。

衆運動底深度，假使要說什麼『自發的成份』，那末，自然，我們首先就應把這種工人運動認爲自發的運動。但是自發性底自發程度就各有不同。在七十年代以及在九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都有過罷工，罷工的時候，工人『自發地』起來毀壞機器等等。九十年代時罷工與這些『騷動』比較起來，甚至可以稱爲『覺悟的』罷工——工人運動在這時期內，已進步得這樣遠了。這給我們證明：『自發的成份』實際上無非就是覺悟性底雛形。而且原始的騷動也已經表顯了一些覺悟性底激發：工人已經不復堅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之堅固而不可動搖，他們已開始感覺得……（不說他們已經開始明瞭）必須要共同起來反抗，他們已經堅決地拒絕向官長作奴隸式的服從。但這種情形與其說是鬥爭，不如說是拚命與報仇底表現。九十年代罷工，其覺悟性底色彩就大得多了：工人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他們預先顧到鬥爭底適當時機，他們討論了別處發生的某些事情和實例等等。假使騷動僅是被壓迫人民底暴動，那末有系統的罷工已經表現爲一種階級鬥爭底萌芽，不過祇是一種萌芽而已。就其本身講來，這些罷工會是工聯主義的鬥爭，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牠們表示工人和業主間的對抗底喚起，但是工人那時還沒有（而且也不能）覺悟到他們的利益與現代整個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有不可調和的衝突，就是說他們那時還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社會民主主義底意識。在這一意義上講，九十年代罷工，雖然比較過去的

「騷動」要進步得多，但終究還是一個純粹自發的運動。

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工人那時還不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一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祇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底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單靠自己的力量，就祇能鍛鍊出工聯主義的意識，就是說祇相信必需要組織工會，必需要與業主作鬥爭，必需要求政府頒佈某些工人所需要的法律等等①。社會主義底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中受過教育的代表——智識界所製造出來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理論中生長出來的。現在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講，也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智識界。俄國也是如此，俄國社會民主派理論學說底產生，完全無關於工人運動之自發增漲，牠的產生，乃是革命社會主義的智識界底思想發展之自然的和必然的結果。在我們所講到的這個時候，即是說在九十年代底中葉，這種學說不僅成了勞動解放社底已完全形成的綱領，而且已經奪得俄國大多數的革命青年。

① 工聯主義並不排斥一切「政治」，如人們有時所設想的一樣。工聯組織也常常作過某種（但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鼓動與鬥爭。關於工聯主義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間的區別，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說明。

這樣看來，一方面有工人羣衆底自發的醒覺，趨於覺悟生活和覺悟鬥爭的醒覺，另一方面有已用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武裝起來的並極力底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時，特別重要地在這裏我們要指出一件事實（這件事實爲人家所常常忘掉，而且知道的人也比較少）：這一個時期底第一批社會民主黨人，曾熱心地從事經濟鼓動（在這一點上他們會完全注意到當時還沒有付印的『論鼓動』（註釋一九）這本小冊子中許多真正有益的指示），但他們不僅沒有把經濟鼓動當作自己唯一的任務，反之，一開始就一般地提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極廣泛的歷史任務，特別地提出了推翻專制底任務。譬如，在彼得堡創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社的那些社會民主黨人，在一八九五年末就編好了第一期的『工人事務報』。但是在二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八日）夜裏，當這期報紙正要拿去付印的時候，就被憲兵從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社底一個社員瓦涅夫（ \ominus ）手上奪去了，因此第一次的『工人事務報』就沒有出版。這一期報底社論（也許過了三十年之後，有什麼『俄羅斯古董』雜誌要從

瓦涅夫(Van'kov)曾因孤獨地坐拘留所而得到肺病，他於一八九九年因肺病死於東西伯利亞。因此，我們認爲可以公佈在本文中所引證的消息，我們擔保這些消息是確實的，因爲這些消息是從那些最熟悉地知道瓦涅夫的人那裏得來的。

警察局底陳案庫中找出牠的原稿來），指明了俄國工人階級底各個歷史任務，而且把奪取政治自由底任務當作這些任務中的主要任務。還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的總長們想些什麼」①，牠是敘述警察摧殘識字運動委員會的，又有許多彼得堡和別地的通訊（如記載雅羅斯拉夫省內工人血戰的通訊）。這樣看來，假使我們沒有錯的話，九十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第一次嘗試」，是一種並不帶有狹隘的地方性的報紙，更不是帶有「經濟主義」性的報紙，這種報紙，曾想把罷工鬥爭同反對專制的革命運動聯絡起來，想吸引在暗無天日的反動政治之下的一切被壓迫者起來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要是稍微知道一些當時運動底實況的人，他就會相信，這種報紙可以得到都會中的工人和革命的智識份子底同情，可以極廣泛地流行。這項工作底失敗祇是證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因為缺乏革命經驗和實際準備的緣故，無力滿足當時底迫切要求。關於「彼得堡工人小報」，尤其是「工人報」和一八九八年春季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所發表的「宣言」，也應當說同樣的話。當然，我們絕不是想把這種無準備性歸咎於當時的活動人物。但是爲要利用運動底經驗和從這個經驗中得到實際教訓起見，我們就必需了解這種缺點或那種缺點底原因和

① 這篇文章印在『列寧全集』第一卷上。（編者註）

意義。因此極重要地應當指出：一部份（也許甚至是大多數）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活動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自發』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以爲可以提出極廣泛的綱領和鬥爭的策略①，這是完全正確的。大多數革命者底沒有準備，本來是極自然的現象，決不會引起任何特別的顧慮。如果任務是提得正確的，如果有毅力再仆再起地來實現這些任務，那末暫時的失敗只是小小的

①經濟派在其『致俄國社會民主黨各機關報的一封信』（見『火星報』第十二期）中申言道：

「『火星報』反對九十年代末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牠忽略了，當時除爭取細小要求的鬥爭以外，是沒有進行別種工作所需要的條件的」。本文中所以引的事實，證明『沒有條件』這個斷語，是與真理絕對相衝突的。不僅在九十年代末，即在九十年代中葉，除爭取細小要求的鬥爭以外，進行別種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當時都是完備的：除缺乏領袖人物底充分準備外，其他一切條件，當時都是完備的。『經濟派』不去公開承認我們思想家、領導人方面之缺乏準備，他們却想把一切東西委之於『沒有條件』，委之於決定運動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運動離開這條道路——的物質環境底影響。試問這不是屈服於自發性是什麼？這不是『思想家』寵愛自己的缺點是什麼？

不幸事。革命底經驗和組織者底敏捷，是可以取得的東西。只要熱心來替自己造就這些需要的品質！只要覺悟到缺點，這在革命事業上就等於改正一大半！

可是當這一種覺悟消滅下去的時候（而這一種覺悟在上面所說的那些團體中間會很活躍地存在着），當一部份人（甚至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想把缺點推尊為美德，甚至想對於自己的盲從與崇拜自發性加以理論基礎的時候，那末，這個小小的不幸事就變為真正的大不幸事。對於這一派思潮（用「經濟主義」這個概念來表示這派底內容，是很不妥當的，因為這個概念太狹隘了），現在就應當來作一些總結。

B · 崇拜自發性。『工人思想報』

在我們未講到這種崇拜在刊物上的表現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下面這件可注意的事實（這是我們從上面所說過的那個事情中得來的消息）。這件事實指明，曾在彼得堡工作的同志中間，怎樣產生了和發展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後來的兩派思潮的差別。在一八九七年底開始，瓦涅夫和他的幾個同志（在他們動身到充軍地方之前）曾參加了一次私人的集會。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社底『老年』社員和『少年』社員都到了。討論的問題主要的是關於組織問題，尤其是關於『工人儲蓄會

章程」(即是在「工人小報」(註釋三〇)第九至十期上(第四六頁)所發表的最後修正章程)的問題。在「老年派」(彼得堡社會民主黨人又戲稱他們爲「十二月黨人」)與「少年派」中幾個人(他們後來會密切參加「工人思想報」底工作)之間，立刻就發生了激烈的分歧意見和熱烈的爭論。「少年派」曾擁護照後來發表的那個章程底要點。「老年派」則說：我們首先所需要的並不是這點，而是要把鬥爭社鞏固起來，變成革命家庭組織，各種工人儲蓄會及青年學生間的宣傳小組等都要聽牠指揮。當然，爭論者從沒有想到，這個爭論就是分歧底開端，正是相反，他們以爲這是單個的和偶然的現象。可是這件事實指明：『經濟主義』之產生及其傳佈，即在俄國也並不是沒有與「老年」社會民主黨人作過鬥爭的(現在經濟主義者常常忘記這點)。要是這種鬥爭大部份沒有留下「文件上的」痕跡，那末這僅僅是因爲當時工作的小組底成份變動得異常之快，沒有什麼繼承性，因此分歧意見也沒有正式寫在什麼文件上。

「工人思想報」底產生，使經濟主義得見天日，但這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應當具體設想當時俄國許多小組底工作條件及其生命底短促(但是祇有閱歷過這件事情的人才能具體設想牠)，以便了解新派別在各城市裏勝利或失敗中曾經有過多少偶然現象，以便了解這個「新」派別底擁護者或反對者多麼長久地不能、而且簡直沒有任何可能來斷定：這真正是一種特殊的派別抑或祇

是個別的人沒有準備底表現。譬如『工人思想報』頭幾期的油印版，甚至絕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完全不知道。假使我們現在能够引證『工人思想報』第一期社論①上的話，那末這僅僅因爲在依凡與底文章（『工人小報』第九和第十期合刊四十七頁和以下各頁）中把這篇社論重印出來的緣故，而依凡與自然沒有錯過機會，會努力——不合理智的努力——贊揚這個新的報紙——這個與上面我們所說的各種報紙及報紙草案大不相同的報紙②。這篇社論值得我們來敘述一下，因爲他把『工人思想報』和一般經濟主義底全部精神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社論指出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運動底發展，並繼續說道「……工人運動之所以能够這樣活躍，是因爲工人到底從領導者手裏奪去了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來處理自己的命運」，並把這

①這篇社論載在『列寧全集』第二卷底附錄中。（編者註）

②這裏要附帶說一說，一八九八年十一月（當時經濟主義特別是國外的經濟主義，完全形成起來了）『工人思想報』底這種贊揚，正是從這位依凡與（Ivanshin）口裏發出來的，他不久就當了『工人事務報』底編輯之一了。而『工人事務報』當初就否認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有兩個派別底存在，直到現在牠還是繼續否認這一點！

個主要提綱更詳細地發揮下去。實際上，領導者（即社會民主黨人，鬥爭社底組織者）可說是被警察從工人手中奪去的⊖。但該社論竟把事情看作這樣：好像工人是與這些領導者作了鬥爭而擺脫了他們的束縛！人們不號召前進去鞏固革命的組織和擴大政治的活動，却反而去號召向後退去。單作工聯主義的鬥爭。人們宣佈：「經常不忘政治理想這種傾向，會蒙蔽運動底經濟基礎」，工人運動底格言是「工人為經濟地位而鬥爭」（！），或者說得更好些，「工人為工人」。他們說：罷工基金儲蓄會，「對於運動比千百個其他的組織還要來得貴重」（請你們把一八九七年十月間說的這段話與一八九七年初「十二月黨人」與少年派的爭論比較一下吧）及其他等等。說什麼我們用來做基礎的不是工人底「精華」，而是「中等」工人，普通工人，說什麼「政治常常順從經濟」⊖；這一種話現在已經成爲一種時髦之談，而且牠對於大批參加運動的青年（這些青年大

⊙我們只要看下面所舉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就可以知道這個比較是正確的。這一個事實是這樣：在「十二月黨人」被捕之後，在席魯舍堡路（Schlisselburg Road）底工人中間盛傳出一個消息，說這次破獲是一個與「十二月黨人」有關的一部份人相接近的奸細米海洛夫（Mikhailov 牙科醫生）所促成的。因此這批工人表示異常憤激，曾決意要殺米海洛夫。

多數祇是讀了幾段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所敘述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有了極大的影響。

這就是自發性完全壓倒了覺悟性，——有些『社會民主黨人』曾經重覆伏龍超夫先生底『思想』，有些工人曾經屈從一種論據，以為一盧布上加一哥比要比一切社會主義和一切政治都更切實更寶貴，以為他們應當進行『鬥爭』，同時知道他們的鬥爭不是為着什麼未來的後代，而是為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工人思想報』第一期社論），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和這些工人底自發性完全壓倒了覺悟性。這些人所說的話常常是西歐資產者最愛使用的武器。西歐的資產者因為仇視社會主義，所以他們親自圖謀（如德國的『社會政治家』喜爾雪之流）把英國的工聯主義搬到本國來，向本國工人說：祇有職業的鬥爭①才是為自己本身和自己子女，而不是為什麼將來的後代，為

①這是從『工人思想報』第一期底同一篇社論中摘錄下來的。根據這點我們可以判斷，這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伏龍超夫先生們』底理論程度是怎樣；當此在文壇中馬克斯主義者已經實行與真正的伏龍超夫先生（Vorobiov）作戰的時候，他們卻來重覆關於『經濟唯物論』的粗俗論調；伏龍超夫先生早就因他這樣的了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而得到『反動事業底能手』這個雅號了！

着什麼將來的社會主義而鬥爭，而在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伏龍超夫』也開始重覆這些資產階級的話。這裏主要的應當指出三點，這三點對於以後研究現代的分歧意見②是很有用處的。

第一，我們上面指出覺悟性被自發性所壓倒，這個壓倒過程本身也是自發地發生的。這好像
是無稽之談，但——可惜！——這却是一種令人痛心的真理。這種壓倒底發生並不是經過完全相反的兩種觀點底公開鬥爭，由一種觀點戰勝別種觀點；而是由於『老年派』革命家逐漸被憲兵『奪去』，『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伏龍超夫』、『少年派』逐漸上台。凡是——我不說：凡是參加過現代俄國運動的人——只要開過一些運動氣味的人，就很知道事情正是這樣。我們之所以一定要

①德文內有『Nur Gewerkschaftler』這個名詞，其意義就是『祇是職業』鬥爭的擁護者。

②我們這裏着重的說『現代的』三個字，這是指那些人的：他們虛禮十足地聳聳自己的肩膀說道：現在很容易來叱責『工人思想報』，可是這不過是陳舊的話！我們對於這班現代的偽君子要這樣答覆他們：我們用變形的名字，來講你的故事（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這班偽君子是完全被『工人思想報』底觀念所束縛了的，關於這點，我們要在下面來證實。

讀者把這個大家知道的事實澈底弄清，我們之所以爲明瞭起見而要把第一種『工人事務報』材料和一八九七年初『老年派』與『少年派』的爭論引證出來，這只是因爲有些以『民主主義』自誇的人們，利用很多的人（或極年輕的青年們）之不知道這件事實來作投機生意。我們以後還要講到這一層。

第二，在經濟主義第一次出現於著作上的時候，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對於了解現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的各種分歧意見，是非常特殊而極可注意的，這就是：『純粹工人運動』底擁護者，主張與無產階級的鬥爭作最密切和最『有機的』（照『工人事務報』底說法）聯絡的人，一切反對非工人的智識份子（雖然是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的人，爲要擁護自己的立場，都不得不採用資產階級的『祇是工聯主義者』底論據。這一點告訴我們：『工人思想報』，開始就着手——自己是不自覺的——來實現『信仰』底綱領。這一點指明（這是『工人事務報』無論如何也不能了解的）：凡是崇拜工人運動底自發性，凡是縮小『自覺成份』底作用和社會民主黨底作用，就都是等於——從事縮小的人自己是否願意這樣，這是完全沒有關係的——資產階級思想對於工人的影響底加強。凡是說什麼『過於看重思想底作用』⊖，說什麼過於誇大自覺成份底作用⊖等等的人，都是以爲，祇要工人能够『把自己的命運從指導者手中奪去』，則純粹的工人運動，本身是可

以創造而且正在創造出獨立的思想系統來。但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爲要補充我們上述的話起見，我們現在再來引用一段話，這是考茨基對於奧國社會民主黨底新綱領草案所說的極公平而重要的話⑤。

他說：

「在我們的修正派的批評家裏面，有很多人以爲馬克思說過，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會主義生產底條件，而且還直接產生那感覺社會主義生產之必要的意識（考茨基加上着重點）。於是這些批評家就起來反對道，資本主義最高度發展的國家如英國，爲什麼就最缺乏這種意識。根據草案看來，我們可以想到：被上面那種反駁所推翻的這一個彷彿是正統

①「火星報」第十期上「經濟主義者」底一封信。

②「工人事務報」第十期。

③『新時代』(Neue Zeit, 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份第二十二期，第十三號、第七九頁。起草委員會底草案（考茨基所說的就是這個草案），經維也納代表大會（去年末）稍加修改後通過。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國社會民主黨綱領底起草委員會也是主張的。草案上寫着：「資本主義底發展越是增加了無產階級底數量，則無產階級就越不得而且越有可能來作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就發生認為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必要的『意識』」。那末，社會主義的意識乃是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之必然的直接結果。可是這是完全不正確的。當然，社會主義這種學說，與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同樣是在現代經濟關係這個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同樣是從反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羣衆底災難和貧困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可是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是相並而生，而不是這一個產生於那一個的，牠們是在各種不同的前提之下產生的。現代的社會主義意識，祇有根據深刻的科學知識，才能產生出來。實際上，現代的經濟科學與現代的技術（比方說）同樣是社會主義生產底條件，但是無產階級，雖十分願意，既不能創造現代的經濟科學，也不能創造現代的技術；這兩種東西，是從現代社會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科學底代表，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智識界。（着重點是考茨基加上的）：現代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從這一界底個別份子底頭腦中產生出來的，他們又把這種社會主義傳給智力發展上出色的無產者，後者又把牠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在條件允許這件事情的地方。這樣看來，社會主義的意識是一種由外界灌輸到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並不是什

麼從這門爭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海因斐綱領」(Hainfeld Programme)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就在把無產階級地位底意識及其任務底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逐字譯起來：去充滿無產階級)。假使這一種意識自然而地可以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那末也就用不到這樣辦了。新的草案採取舊綱領中的這個條文並把牠與上面所引證的那個條文相縫合。但這完全打斷了思想底進程……』。

假使工人羣衆自己決不能在他們運動過程中創造獨立的思想系統⊖，那末，現在的問題只是這樣：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還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系統。在這裏，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因爲人類沒有創造出什麼『第三種』的思想系統，並且在被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裏，永遠不能有階級以外的或是階級以上的思想系統)。因此，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系統的任何輕視與任何離棄，都是等於資產階級思想系統底加強。人們在談論自發性。但是工人運動底自發的發展，正是使牠服從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正是照着『信仰』底綱領而進行的，因爲自發的工人運動就是工聯主義，就是祇是職工主義，而工聯主義就恰恰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思想上的束縛。因此我們的任務，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就在與自發性作鬥爭，就在於使工人運動脫離資產階級羽翼下的工聯主義底自發傾向，而把牠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羽翼之下來。因此，『火星報』第十二期上一封『經濟主義

的「信底作者說：無論最有天才的思想家怎樣努力，終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由物質成份和物質環境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那條道路，——這幾句話是完全等於放棄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說的話不害怕地和澈底地思索一下（凡是跑到文字生涯和社會活動底舞台上的人，對於自己的思想都應當這樣思索一下），那末他們只有「把兩隻無用的手放在空洞的胸前」，把

○自然這不是說，工人不參加這種創造。但是他們不是以工人底資格來參加創造，而是以社會主義底理論家底資格來參加，以蒲魯東和惠特林（Welling）這類人底資格來參加的。換句話說，就是祇是當他們和因為他們多少已經能够具有自己所處那個時代底知識而且能够把這種知識推往前進的時候，他們才會來參加這種創造。爲要使工人更加時常地能够具有這種知識，就必須盡可能地多注意於一般的提高工人覺悟程度，必須使工人不拘束於「工人讀物」的人工的狹隘範圍之內，而要使他們多多了解一般的讀物。說得更正確些，我們不說他們「拘束於」，而應該說他們「被拘束於」「工人讀物」，因爲工人自己是在閱讀、而且願意閱讀一切爲智識階層而作的讀物，而只有一些（劣等的）智識份子在想：「對於工人」只要講些關於工廠規矩的情形和咀嚼些早已人所共知的事就够了。

活動地盤讓給司特魯威和普洛科樸維奇之流去把工人運動拉到『阻力最少的道路上去』，就是說引到資產階級工聯主義底道路上去，或是讓給蘇巴託夫之流去把工人運動拉到神父憲兵的『思想系統』底道路上去。

試回憶德國底例子，拉沙爾對於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功績在什麼地方呢？他的歷史功績就在：他能够使這個運動脫離進步派的工聯主義和協作主義底道路（這個運動曾在素立茲，德里赤（Schulze Delitzsche）等類人底懇切參加之下自發地走上了這條道路）。要履行這個任務，就用不到講什麼過於輕視自發成份，什麼過程策略，什麼成份和環境底相互作用等等的話。要履行這個任務，就需要與自發性作拚命的鬥爭。而且祇有這一種多年鬥爭底結果，才能使（舉例來說）柏林的工人從進步黨底支柱變成社會民主黨底一個很好的堡壘。這種鬥爭至今還並沒有結束（那些普洛科樸維奇式地研究德國運動底歷史，司特魯威式地研究牠的哲學的人們就會認為已經結束了）。德國的工人階級，至今還為幾種思想系統所分裂（假使可以這樣講的話）：一部份工人組織在天主教的和帝制派的工會之內，另一部份工人組織在喜爾雪——董克爾（Hirsch Dun-ker）的工會之內（牠是英國工聯主義底資產階級的崇拜者所創立的）（註釋三二），還有一部分人則組織在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之內。最後的那一部份工人要比其他的不知多過多少，可是，社會

民主黨的思想系統之所以能够獲得了這種首位和將來還能够保持這種首位，祇是由於牠與其他一切的思想系統進行不斷的鬥爭。

但是讀者要問：自發的運動，向阻力最少的方向發展的運動，爲什麼恰恰會造成資產階級思想系統底統治呢？原因是很簡單的：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其產生要比社會主義的思想系統早得多，牠所經受過的製煉也比較更爲周到，牠佔有過多。不知多少的傳佈工具。所以某一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愈是幼稚，則愈應當起來作積極的鬥爭去反對想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系統的一切企圖，愈應當堅決地起來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從那些高喊反對『誇大覺悟成份』等等的壞願

○有人常常說：工人階級是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在下面一個意義上講，這是完全對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比一切理論都更深刻更正確地斷定工人階級困苦的原因，因此，祇要這個理論自身不拜倒於自發性之前，祇要他不爲自發性所屈服，工人是很容易了解這個理論的。這往往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可是『工人事務報』恰恰忘記和曲解了這個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階級是自發地被引向社會主義，但是最廣佈的（而且經常地取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而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却最能自發地在那裏束縛工人。

問。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與『工人事務報』同一鼻孔出氣，起來打擊爲運動萌芽時期所具有的那種無容忍性。我們對於這一點的答覆是：不錯，我們的運動的確處在萌芽的狀態；要運動能够更快發展起來，就正要對於那些崇拜自發性而障礙運動底發展的人，採取一種毫不容忍的態度。裝做早已經歷過一切鬥爭底嚴重事變的老頭子，是再可笑再有害不過的東西！

第三，『工人思想報』底第一期告訴我們：『經濟主義』這個名稱（我們自然不想放棄這個名稱，因爲無論如何這個稱呼已經被大家沿用了），不能充分地確切地把新派別底實質表示出來。『工人思想報』沒有完全否認政治鬥爭。『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中公佈的那個工人儲蓄會章程，也曾說到與政府鬥爭的問題（註釋三二）•不過『工人思想報』以爲『政治永遠順從經濟』（而『工人事務報』則給這個提綱以別種措詞，牠在自己的綱領上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不可分離，在俄國比其他各國更要厲害）。假使所謂政治是指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而言，那末『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務報』底這種說法完全是不正確的。我們已經看見，工人底經濟鬥爭，時常是與資產階級的、教士的等等的政治發生關係的（雖然這種關係並不是不可分離的）。假使所謂政治是指工聯主義的政治而言，即是說是指一切工人都想從國家方面得到某種辦法來防止工人地位所特有的困苦（但還沒有來消滅他們的這種地位——即勞動屈服於資本的地位）這種一般傾向而言，那末『工人事務報』底這

種說法是對的。這種傾向，實在是爲仇視社會主義的英國工聯主義派、天主教派的工人，「蘇巴託夫主義的」以及其他的工人所共有的。所謂政治，各有不同。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工人思想報」對政治鬥爭的態度，與其說牠是否認政治鬥爭，不如說牠是崇拜政治鬥爭底自發性，崇拜政治鬥爭底不覺悟性。牠一方面完全承認從工人運動自身中自發生長出來的政治鬥爭（正確些說：工人底政治願望和政治要求）；同時又完全不肯獨立定出特殊的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能够回答社會主義一般任務和現代俄國環境的政治。下面我們就要指出，「工人事務報」底錯誤也是這樣。

C ·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務報」

「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中社論，本來現在很少人知道而且差不多已被人忘記了，我們在上面之所以這樣詳細講牠，就因爲牠最早而最明顯地表現了一個總的潮流，這個潮流後來就以無數的支流而出頭現面。依凡興曾經稱贊第一期「工人思想報」和牠的社論，說牠寫得「很厲害而且帶有鬥志」（「工人小報」第九至十期第四九頁），這是完全正確的。凡是堅信自己的意見，以爲自己可以發表一些新意見的人，他寫出東西來總是「帶有鬥志」的，總是很清楚地來發表自己的觀點的。祇有那些模稜兩可的人，才沒有一點「鬥志」。祇有這樣的人物才會昨天稱贊「工人思想報」底

鬥志，今天却因「工人思想報」底敵人有了「爭論的鬥志」而加以攻擊。

我們現在不講「工人思想報附刊」（我們以後在各種論據上還要來引證這個東西，牠是最澈底表現了經濟主義底思想），我們現在祇簡單地講一講「工人自我解放社底宣言」（發表於一八九九年三月，轉載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倫敦的「前夜報」(Hakamuyev)第七期)。這篇宣言底作者說得很公允：「工人的俄國。剛從夢裏醒來，剛在那裏四向張望。並出於本能地。握取初次碰到的鬥爭工具」。可是他們像「工人思想報」一樣，從這裏得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他們忘記了，本能性就是一種不覺悟性（自發性），社會主義者應該跑去幫助牠，他們忘記了現社會裏「初次碰到的」鬥爭工具總是工聯主義的鬥爭工具，而「初次碰到的」思想系統總是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的）思想系統。這些作者也沒有「否認」政治，他們只是（只是！）跟着伏龍超夫先生說：政治是上層建築，所以「政治鼓動應該是經濟鬥爭鼓動底上層建築，牠應該在經濟鬥爭底基礎上生長起來，而跟着牠走」。

至於講到「工人事務報」，那末牠的活動就直接從「擁護」經濟主義者開始。「工人事務報」一方面在第一期上會公開撒謊，說牠「不知道阿克雪洛德所說的年輕同志是指那些人」（阿克雪洛德在自已的一本有名的小冊子上①會向經濟主義者下過警告）；另一方面牠與阿克雪洛德及普列漢諾夫關於這種撒謊的辯論中，却不得不承認：牠「曾經想以驚訝的形式來擁護國外一切比較年輕的

社會民主黨人，使他們不受這種不公平的責備（阿克雪洛德會責備經濟主義眼光狹小）。實際上，這種責備是很公平的，而且『工人事務報』也明明知道，這種責備也落到了牠的編輯者依凡與身上。我順便說一說：在上述爭論中，阿克雪洛德是完全正確的，而『工人事務報』之解說我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這本小冊子，是完全不正確的。這本小冊子是在一八九七年『工人思想報』還沒有出版的時候寫的。當時我認爲而且是有權認爲我上面敘述過的彼得堡鬥爭社這個最初的路綫會佔到了統治的地位。至少在一八九八年上半年以前，這條路綫確是佔到了統治的地位。因此『工人事務報』絲毫沒有權利引證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上所發揮的那些觀點，在一八九七到一八九八年的時候在彼得堡已被經濟主義觀點所排擠了），來否認經濟主義底存在與危險。

但是，『工人事務報』不僅『擁護了』經濟主義者們，而且連牠自己也常常迷亂於他們的基本錯誤之中。這種迷亂底來源，就在於模稜兩可地了解下面這個『工人事務報』底綱領提綱：『我們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目前任務和策略問題』。一八九八年寫於日內瓦。致『工人報』的兩封信，寫於一八九七年。

◎見本版『選集』第二卷。（編者註）

認為近年來產生的羣衆的工人運動（着重點是『工人事務報』加上的），是俄國生活中最重要的現象，這個現象將在大體上決定協會底文字活動底任務（着重點我們加上的）和性質。『說羣衆運動是最重要的現象，這是毋容爭論的。但是整個問題，就在於怎樣了解由這個羣衆運動來『決定任務』。這裏可以有兩種了解法：或者是崇拜這種運動底自發性，即是說，把社會民主黨底作用降到只替這樣的工人運動當聽差（這是『工人思想報』、『自我解放社』和其他經濟主義者所了解的）；或者是工人運動在我們面前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任務，這些任務要比工人運動產生以前可以認為滿意的那些任務，要複雜得多。『工人事務報』過去和現在正是傾向於第一種的了解，因為牠從來就沒有明確地講過什麼新的任務，牠始終總是這樣來評判：這種『羣衆運動』使我們不必一定要去明白地了解和決定牠所提出的任務。『工人事務報』會認為推翻專制政體不能作為羣衆工人運動底第一個任務，牠把這個任務（在羣衆運動底名義之下）降低到爲目前政治要求而鬥爭的任務（回答第二十五頁），我們只要引證這一點就够了。

我們現在不講『工人事務報』編輯克里却夫斯基在第七期上所作的『俄國運動中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這篇重複了同樣錯誤的文章^①，我們現在直接來講『工人事務報』第十期。自然，我們這裏也不想把克里却夫斯基和馬丁諾夫（Martinov）反對『曙光』雜誌和『火星報』的反駁，都一一加

◎政治鬥爭中的『階段論』或『委曲』論，例如這樣表現在這篇文章中：「然而按其性質爲全俄所共同各種政治要求，在第一個時期」（這是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寫的！）『應該適應某階層（是呵！）工人從經濟鬥爭中所得的經驗。祇有（！）根據這種經驗，才可以而且應該着手進行政治鼓動』等等（十一頁）。在第四頁上作者因爲有人責備（在他看來，這個責備，是毫無根據的）他們宣傳經濟主義的邪說而起來反抗，他長嘆道：「那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不知道：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各個階級底經濟利益在歷史上有左右一切的作用，所以（我們加的着重點）無產階級爲自己經濟利益而作的鬥爭，對於牠的階級發展和解放鬥爭，應該有首要的意義？」，「所以」這兩個字這裏完全用得不恰當。從經濟利益有左右一切的作用這句話中，絕不應作出什麼經濟鬥爭（即職工鬥爭）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爲一般講起來，最切實的『能左右一切的』階級利益，祇有由根本的政治改造才能滿足；局部講起來，無產階級底基本的經濟利益，祇有用政治革命的方法，以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才能滿足。克里却夫斯基先生只是重複『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伏龍超夫』底話（政治應當順從經濟等等）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伯因斯坦派底話（如沃特曼（Wolffmann）正是用這種論斷來證明：工人應該首先獲得『經濟力量』，然後再來想到政治革命）。

以分析。這裏對於我們有興味的祇是『工人事務報』第十期所站的原則立場。我們也不去講這種奇怪的東西，例如『工人事務報』認爲下面這兩個立論之間有『絕對矛盾性』：

第一個立論是——

「社會民主黨不用一種預先想好的政治鬥爭底計劃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足，來縮小自己的行動範圍；牠承認所有的鬥爭方法，祇要這些方法適合於黨底實力」等等（『火星報』第一期）。

第二個立論是——

「如果沒有在各種環境和各種時期的政治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堅固組織，那末，就談不到什麼有系統的、以堅定原則爲嚮導的以及堅決實行的行動計劃，——祇有這種行動計劃，才配稱爲策略」（『火星報』第四期）①。

原則上承認一切鬥爭工具、一切鬥爭計劃和一切鬥爭方法（祇要牠們是適當的）是一回事，在目前政局下要求以堅決實行的計劃（如果想談策略的話）作爲指南，這是另一回事。把這兩件

①這兩段話都是列寧說的。（編者註）

事混淆起來，這就等於把醫學之承認各種治病方法，同要求在醫治某種病時採用某種治療方法這兩件事混淆起來一樣。可是問題也正在這裏：『工人事務報』一方面自己是患了病（這種病我們稱牠是『崇拜自發性』的病），但另一方面又不願承認這種病底任何『治療方法』。因此牠作了一個很好的新發明：『計劃策略是與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精神相抵觸的』（第一期第十八頁），策略是『與黨一同增長起來的那些黨的任務底增長過程』（第十一頁。着重點是『工人事務報』自己加的）。這一句格言很有機會成爲有名的格言，成爲『工人事務報』『派』底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對於『往那裏去？』這個問題，領導的機關報底答覆是：運動乃是運動底出發點與往後一點中間距離改變底過程。這種絕頂深奧的話不祇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不值得來講了），而是整個派別底綱領：這一種綱領，R·M·（在『工人思想報附刊』上）是用下面這几句话發表的：我們所希望的，是可能的鬥爭，而可能的鬥爭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鬥爭。這恰恰是一種無邊際的機會主義底派別，而這種機會主義是消極地適應於自發性的。

『計劃策略是與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精神相抵觸的！這是誣蔑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諷刺畫——民粹派在與我們論戰時用來向我們對立的諷刺畫。這正是賤視自覺的行動家庭創造力和毅力。馬克思主義却是相反，牠給了社會民主黨人底創造力和毅力一個很大的推動，替

他開闢了極廣大的前途，把『自發』起來鬥爭的工人階級底千百萬人底偉大力量交給（假使可以這樣說）他處理！國際社會民主黨底全部歷史，都充滿着各種計劃，這些計劃有時爲這個政治領袖，有時爲那個政治領袖所提出，牠們證實這一個人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觀點底遠見和正確，暴露另一個人底近視和政治錯誤。當德國遇到了一個最偉大的歷史轉變——成立帝國，設立國會，實行普選權（註釋三三）的時候，那時李卜克內西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和一般工作底計劃，斯維采爾（Schweitzer）另有一個計劃。當頒佈非常法以壓迫德國社會黨人的時候，莫斯特和哈雪爾曼（Hasselmann）有一個計劃，他們公開號召採用暴力和恐怖；黑伯爾（Hochberg），斯拉姆（Schramm）和局部地伯因斯坦有另外一個計劃，他們却向社會民主黨人宣傳，說他們這種無理的激烈性和革命性引起了非常法底頒佈，說他們現在應當做出模範行爲來得到赦免；那些準備和實現發行秘密機關報的人則有第三個計劃。爲選擇道路的問題而作的鬥爭，完結已有多年了，歷史關於已選擇了的道路底適當性已有最後的決定，在這個時候，回轉頭來看看，用關於與黨一同增長起來的那些黨的任務底增長的那個格言來表示深奧的思想，這自然是不難的。但是在混亂時代①俄國的『批評家』和經濟主義者把社會民主黨降低到工聯主義底地位，而恐怖主義者則竭力宣傳採取那種重複舊錯誤的『策略計劃』，在這個時候只限於這種深奧思想，這就等於『

證明自己的窮困」。當許多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正缺少創造力和毅力的時候，當他們正缺少「大規模的政治宣傳、鼓動和組織」的時候——在這樣一個時候來說：『計劃策略是與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精神相抵觸的』，這不僅在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而且在實際上把黨拉着向後退。

『工人事務報』又這樣教訓我們說：

『革命家的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祇是要以覺悟的工作來加速客觀的發展，而不是要以主觀的計劃來取消或代替客觀的發展。』「火星報」在理論上是知道所有這些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所公道地賦予覺悟的革命工作的巨大意義，使「火星報」在實踐上，因為牠對於策略具一種理想主義的觀點，偏向於過分輕視發展之客觀的或自發的成份底意義。』（十八頁）

這又是一個爲伏龍超夫先生及其弟兄們所應有的極大的理論上的迷誤。我們倒要來問問這位哲學家：編製主觀計劃的人之『輕視』發展底客觀意義，這能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這大概是表

① 梅林格（Mehring）所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歷史』這本書上有一章叫做『混亂之年』；

在這章內他描寫社會黨人在選擇適應新環境的『計劃策略』時開始表現出動搖與不堅決性。

② 引自『火星報』第一期社論。

現於：編者沒有看到，這個客觀發展能建立或鞏固，能傷害或削弱某個階級、某個階層、某個集團、某個民族、某個民族集團等等，這個客觀發展因此而能決定某種國際政治力量底配合和革命黨底立場等等。可是如果是這樣，編者底過失，就不是輕視自發成份底意義，而是輕視覺悟成份底意義了，因為他還沒有充份的「覺悟性」來正確了解客觀發展。所以單就談論自發性和覺悟性底「比較」（「工人事務報」加點）意義底估計」這一點來講，就已經表現出他們完全沒有「覺悟性」。假使某種「自發的發展成份」是為一般的人類意識所能了解的，那末對於這種自發的發展成份之不正確的估計，就等于「輕視覺悟成份底意義」。假使牠們是為人類意識所不能了解的，那末，我們就不能知道牠們而且也不能來談論牠們。克里却夫斯基先生所講的到底是什麼呢？假使他以為『火星報』底『主觀計劃』是錯誤的（他正是宣佈牠們是錯誤的），那末，他就應當證明：這些計劃到底忽略了那些客觀事實，就應當因這種忽略而責備『火星報』缺之覺悟性和「輕視覺悟成份底意義」（照他的話來說）。假使他不滿意於主觀計劃，同時除藉口於「輕視自發成份底意義」（二）而外，又沒有其他的理由，那末，他這樣祇是證明：第一，他在理論上了解馬克思主義，正如卡立也夫（Karejev）如米海洛夫斯基（Mikhailovsky）之流一樣（這些人已被白爾託夫（Beitov）笑得够了）；第二，他在實際上完全以這些「自發的發展成份」為滿足，——這些成份，曾把我

們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引誘到伯因斯坦主義的路上；而把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引誘到經濟主義路上；證明他對於那些無論如何要使俄國社會民主黨逃出這條「自發」進展底道路的人，表示「非常的憤怒」。

「工人事務報」責備「火星報」和「曙光」雜誌，說牠們「把自己的綱領拿來與運動對立，把自己的綱領當作在混沌狀態上面飛翔的精神」（第二九頁）。社會民主黨底作用，如果不在於做一種不僅在自發運動上面飛翔的，而且把這種運動提高到「自己綱領」底水平綫上的「精神」，那末，到底在什麼地方呢？要知牠的作用並不在於做運動底尾巴；如果是這樣，那末，好則對於運動沒有益處，壞則極有害處。但是「工人事務報」不僅附和這種「過程策略」，而且把牠當作一種原則。因此正確些說來，牠這種傾向，不應稱爲機會主義，而應稱爲尾巴主義（由尾巴兩個字得出來的）。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人們既是堅持永遠做運動底尾巴，他們就永遠而且絕對有了保證，不會「輕視自發的發展成份底意義」。

★

★

★

因此我們深信：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新派」底基本錯誤，就在於牠之崇拜於自發性，就在於牠之不了解，羣衆底自發性需要我們社會民主黨員底很多覺悟性。羣衆底自發高潮愈增長，運動

愈擴大，則要求社會民主黨在理論，政治和組織的工作上都具有很覺悟性的這種要求，其發展也愈加快得不可比擬。

俄國羣衆底自發高潮，曾經進行得（現在還繼續進行着）這樣的快，致使社會民主黨的青年來不及準備去執行這些偉大的任務。這種無準備是我們大家底不幸，是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不幸。羣衆底高潮已經繼續不斷地擴大起來了，牠不僅在已開始的地方沒有停止下去，而且已經蔓延到新的區域和新的民衆（青年學生，一般知識份子，甚至農民底運動，也在工人運動的影響之下活躍起來了）。但是許多革命者在自己的『理論上』和行動上，倒落在這種高潮之後，他們不能建立起一種能夠領導整個運動的繼續不斷的和前後相承的組織。

在第一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工人事務報』降低了我們的理論任務，牠『自發地』重複了『批評自由』這個時髦的口號；重複這種口號的人，不够『覺悟性』來了解，在德國的機會主義者批評家底立場與革命家底立場是和俄國的機會主義者批評家底立場與革命家底立場，完全相反的。

在下幾章中我們要來觀察這一種對於自發性的崇拜，在社會民主黨政治任務和組織工作上，是怎樣表現出來的。

(三) 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

我們還是從稱讚『工人事務報』開始吧。馬丁諾夫在『工人事務報』第十期上，做了一篇論與『火星報』意見分歧的文章；這篇文章題名為『揭露的刊物與無產階級的爭鬥』。他對於分歧意見底實質底說法是這樣：『我們不能祇限於揭露那些阻礙牠（工黨）發展的制度。我們也應該響應無產階級底最近的日常的利益』（第六三頁）。『……『火星報』……實際上是一個革命反對派底機關報，牠揭露我們的制度，而主要的是揭露政治的制度……。但是我們在現在和將來，都要為工人底事業，而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緊密聯繫起來去進行工作』（同頁）。馬丁諾夫說出這些話來，我們不能不向他表示感謝。他這一段話却值得一般人底十分注意，因為牠實質上不僅講到我們同『工人事務報』的分歧意見，而且還包括我們同『經濟主義者』關於政治鬥爭問題的一般分歧意見。我們已經說過：『經濟主義者』並不是無條件地否認『政治』，他們只是經常離開

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觀念，而跑到工聯主義的政治觀念上去。馬丁諾夫也完全是這樣地跑過去了。因此我們同意就是用他來作爲經濟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迷誤底模範。無論是『工人思想報附刊』底作者，或是『自我解放社』宣言底作者，或是『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都沒有權利因這種選擇來責備我們（我們以後努力來證明這一點）。

A. 政治鼓動和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動

大家都知道，俄國工人經濟鬥爭底廣佈和鞏固，是伴着經濟的（工廠的和職業的）揭露底『刊物』底創立而發展起來的。這些『傳單』底主要內容，是工廠制度底揭露，因此，在工人中間就很快地爆發了對這種揭露的眞正熱情。當工人們一知道社會民主黨人底小組願意而且能夠給

○爲避免誤會起見，我們要指出：在我們以後的敘述中，我們所謂經濟鬥爭（按我們所習慣的用字方法）是指那種『實際的經濟鬥爭』而說的，這種『實際的經濟鬥爭』，恩格斯在上面所舉的引證中稱他是『對資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國內稱他爲職工的、工團的、或稱爲工聯的鬥爭。

他們一種新的傳單，來敘述他們的貧窮生活、困苦不堪的勞動和無權的地位等等實情的時候，他們就大投其工廠的通訊。這一種『揭露的刊物』，不僅在該刊物所攻擊的某工廠裏有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在凡是聽到該刊物所揭穿的事實的一切工廠裏也有了很大的影響。正因為各企業和各職業中的工人底貧乏和痛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所以『關於工人生活的實話』，激動了所有的工人。在最落後的工人中間，就發展了想『印刷』的真切熱情——想採用戰爭底萌芽形式，來反對建立在掠奪和壓迫之上的整個現社會制度的良好熱情。而且這些『傳單』在大多數情形之下的確是一種宣戰書，因為這種揭破工廠內幕的事情，發生莫大的影響，引起工人一般地要求消滅這種最惡劣的現象而準備用罷工來擁護這些要求。結果，廠主自己不得不這樣厲害地承認這些傳單是一種戰書，以至於他們往往不願等待到這種戰爭本身底到來。這種揭露，只要一出現，照例就發生了力量，獲得了強大的精神上的強制底意義。往往只要傳單一出現就可以滿足全部或一部份的要求。總而言之，經濟的（工廠的）揭露，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經濟鬥爭底重要工具。而且在必定使工人起來自衛的資本主義一天沒有消滅以前，牠的意義也就存在一天。在最先進的歐洲各國，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窮鄉僻壤中的某種『行業』裏，或是大眾所忘記了的某個家庭工業部門裏，一旦揭露黑幕，就可以成爲激發階級覺悟的出發點，成爲職工鬥爭的開端和傳佈社會主義的開端①。

最近極大多數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全部力量，差不多都化費在進行揭露工廠生活的工作上面。你們只要看一看『工人思想報』就可以知道：他們忙於這項工作到了什麼程度，同時他們怎樣忘記了，這種工作底本身，實質上還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而只是工聯主義的活動。揭露的

○在本章中，我們所講的，只是關於政治鬥爭，關於廣義的或狹義的政治鬥爭。所以我們只是附帶提及『工人事務報』之責備『火星報』對於經濟鬥爭之『過分的節制』（見『兩個代表大會』第二七頁，同時又為馬丁諾夫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階級』那本小冊子中所詳加咀嚼），而把這個責備當作奇物看待。假使這些責備他人的先生們把一年來『火星報』的經濟鬥爭欄用普德或印刷張（他們愛做這件事）來表示，並把他拿來與『工人事務』和『工人思想』兩報總加起來的經濟鬥爭欄相比較，那末他們就很容易看到：即在這點上，他們也是落後的。很明顯的，對於這一個簡單的真理的覺悟，迫着他們提出一些理由來為自己辯解，可是這些理由恰恰很明白地暴露着他們的慌張。他們這樣寫道：『『火星報』無論願與不願』（！）總只好（！）估量到那有支配力量的生活要求，至少（！）也得把關於工人運動底通訊登載出來』（見『兩個代表大會』第二七頁）。這便是真正足以打倒我們的一個論證！

工作實質上祇概括了某一個職業中工人對業主的態度，祇達到了，勞動力底賣主學會更有利地來出賣這種『商品』，學會在純粹商業交易的基礎上來與勞動力底買主鬥爭而已。這些揭露工作雖可以成爲（在革命家庭組織善於利用牠們的條件之下）社會民主黨活動底開端和組成部份，但同時牠們也可以（而且在崇拜自發性的條件之下一定會）變成『只是職業的』鬥爭和非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人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目的，不僅是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個使無產者不能不賣身給富者的那個社會制度。社會民主黨之代表工人階級，並不在於工人階級對某部份業主的關係上，而在於工人階級對現社會各階級，對國家這個有組織的政治勢力的關係上。因此很明顯地，社會民主黨人不但不能只限於經濟鬥爭，而且決不能讓經濟揭露底進行成爲他們的主要活動。我們應當積極地做政治上訓練工人階級的工作，做發展牠的政治意識的工作。現在在『曙光』雜誌和『火星報』向經濟主義作了第一次的攻擊之後，『大家都同意』這點了（雖然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有些人祇是在口頭上同意）。

現在要問，政治訓練到底應當怎麼樣呢？我們能不能只限於宣傳關於工人階級仇視專制政體的思想呢？當然是不能的。單是解釋工人底政治壓迫是不够的（正如單是向工人解釋他們的利益與資本家的利益相衝突，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利用這種壓迫底每個具體表現，來從事鼓動（

正如我們過去利用經濟壓迫具體表現的機會來從事鼓動一樣。但是因爲這種壓迫是落在社會裏各種極不相同的階級身上，因爲這種壓迫是表現在各種不同的生活和活動上面（職業的、公民的、個人的、家庭的、宗教的、科學的及其他的生活和活動上面），所以假使我們自己不來擔任從各方面在政治上揭露專制政體，那我們就沒有履行自己發展工人底政治意識的任務，這點難道還不明顯麼？爲要利用壓迫底具體表現來從事鼓動，應不應當把這些表現揭露出來（正如要從事經濟鼓動應當把工廠中的惡現象揭露出來一樣）呢？

這一點看來是明白的吧？但是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大家』祇是在口頭上同意必需要各方面發展政治意識。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譬如『工人事務報』不懂自己沒有起來負責進行各方面的政治揭露（或是提倡進行這項工作），反而要把已經起來負責實現這個任務的『火星報』拉向後退。你們聽吧：『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只是』（恰恰不只是！）『經濟鬥爭底最發展、最廣泛和最切實的形式』（『工人事務報』底綱領，『工人事務報』第一期第三頁）。『現在擺在社會民主黨人面前的任務，就是儘可能的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工人事務報』第十期第四二頁，馬丁諾夫底文章）。『經濟鬥爭是吸引羣衆參加積極的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社會民主黨人協會代表大會決議案和『修正案』：見『兩個代表大會』第十一頁和第十七頁）。讀者可以知道，所有這

些文句，自『工人事務報』產生起直到最近『編輯部底訓令』爲止，始終是貫徹『工人事務報』，而且所有這些文句，顯然是表現對於政治鼓動和政治鬥爭的一個觀點。你們試根據政治鼓動應隨從經濟鼓動這個在一切經濟主義者中間盛行的意見，來觀察這個觀點吧。說經濟鬥爭，一般地講◎是吸引羣衆參加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這種觀點是不是正確呢？完全是不正確的。一切的和任何的警察壓迫和帝制橫底表現，都是這種『吸引』羣衆的同樣『普遍適用的』手段，並不僅與經濟鬥爭有關的那些表現才是這種手段。地方官底行動和農民底肉刑，官僚之受賄和警察

◎我們之所以要說『一般地講』，就因爲『工人事務報』所講的正是全黨底一般的原則和一般的任務。無疑的，在實際中有這種事情：政治確應隨從經濟——但是要在應用於全俄的決議中來載明這點，那祇有經濟主義者才會做得出來。而且也有這樣的事情：『一開始』祇有在經濟鬥爭底基礎上』才可以從事政治鼓動——但是『工人事務報』畢竟已經想到，以爲這沒有什麼必要』（『兩個代表大會』，第十一頁）。我們在下一章中指出，『政治家』和革命家底策略不僅沒有輕視社會民主黨底工聯的任務，而且正相反，祇有這種策略才能保證這些任務底澈底執行。

對城市「平民」的態度，打擊饑民，壓制人民底知識慾，勒索賦稅和究辦異教徒，虐待兵士以及用對待兵士的態度來對待學生和自由派的智識階層——這一切表現以及千百種諸如此類的「不與經濟鬥爭直接有關的壓迫底表現，爲什麼一般地是政治鼓動和吸收羣衆參加政治鬥爭的比較不『普遍適用的』手段和緣由呢？恰恰相反，工人苦於（爲自己或是自己親近的人）沒有政治權利，苦於專橫和強暴，在這些切身事件總合中，那末職業鬥爭中的警察壓迫底事件，無疑地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試問爲什麼預先要縮小政治鼓動底範圍，只把一種手段稱爲「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而不知除此之外社會民主黨還有別的同樣「普遍適用的」手段呢？

……社會民主黨人協會以爲，拿「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這句話來代替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上所說的「最好的手段」這句話（註釋三四），是有一些意義的。我們實在很難說，這兩個決議那一個要好些：照我們的意思，兩個決議都是壞的。無論是社會民主黨人協會，或是猶太工人同盟，牠們都是跑到（一部份也許甚至是不自覺的，祇是受了傳統底影響）經濟主義，工聯主義的政治觀念上去了。單單調換幾個字眼：說「最好的」或是「最普遍適用的」，這絲毫沒有改變問題底實質。假使社會民主黨人協會說：「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是最普遍適用的（而不是「適用的」）手段，那末，牠這種觀點，對於我們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底某個時期是正確

的。牠這種觀點，對於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年代的經濟主義者，對於許多（假使不是大多數的話）實行家，是正確的，因為這些經濟主義者實行家，的確是差不多完全在經濟基礎上應用了政治鼓動（既然他們一般地應用了牠）！我們已經看到：「工人思想報」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認了而且介紹了這種政治鼓動。經濟鼓動這種有益事業，同時却伴着政治鬥爭底有害的縮小，「工人事務報」對於這一層本應加以嚴厲的斥責，但牠不這樣做，反而把最普遍應用的（被經濟主義者應用的）手段稱為最普遍應用的手段！

……馬丁諾夫口中提出的社會民主黨底任務：『要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有什麼具體的切實的意義呢？經濟鬥爭就是工人爲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爲改善工人勞動及生活條件而與資本家所作的集體鬥爭。這種鬥爭必然是一種職業的鬥爭，因爲各個職業中的勞動條件非常不^等，所以爲改善這些條件而作的鬥爭，不能不是按職業來進行的（西歐的職工會，俄國的臨時的職業的聯合和傳單等等）。因此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也就等於說，用「立法上和行政上的辦法」（像馬丁諾夫在自己文章中下一頁，第四頁上所說的一樣）來達到這些職業要求，這種改善勞動條件底實現。所有的職工會正是這樣做的，而且過去經常是這樣做的。你們只要看一看偉伯夫婦那些澈底的學者（「澈底的」機會主義者）底著作①，你們就可以知道：英國的

工會老早就了解「給經濟鬥爭以政治性質」這個任務，而且正在實現這任務，老早已經爲罷工自由，爲消滅一切法律上之阻礙合作運動和職工運動，爲頒佈保護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爲改善勞動條件（用衛生法和工廠法）等等而從事鬥爭了。

這樣看來，「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句漂亮話聽起來是「非常」深奧而革命的，實際上，牠後面暗藏着把社會民主黨政治降到工聯主義的政治的傳統的企圖！他們在表面上是要糾正「火星報」底片面觀察，說「火星報」是「把信條底革命化放在生活底革命化之上」^①，暗地裏却是要求我們爲經濟改良而鬥爭，並把這種鬥爭當作甚麼新東西。實際上，在「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

① 韋伯（Weber）夫婦著：『英國工聯主義底理論與實際』，共兩大冊，曾由列寧從英文譯成俄文。（編者註）

② 見『工人事務報』第十期第六十頁。這祇是馬丁諾夫式地把下面這個提綱應用到我們運動底現代的混亂狀況中來：『一步實際運動要重要於一打綱領』，關於這種應用法，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了。實際上，這句話祇是把有名的伯因斯坦底話譯成俄文罷了：『運動等於一切，最終目的等於烏有』。

性質』這句話中間，除掉爲經濟改良而鬥爭之外，絲毫沒有包含別的東西。假使馬丁諾夫能够好好地想一想自己這句話底意義，他就可以想到這一個很普通的結論。當他用自己極重大的武器來反對『火星報』時，他說：『我們的黨本來可以而且本來應當向政府提出具體的要求，要牠採取立法上和行政上的辦法，來反對經濟剝削，防止失業，防止飢荒等等』（『工人事務報』第十期四二——四三頁）。具體地要求採取辦法，難道這還不是要求社會改良嗎？我們現在再再一次問毫無偏見的讀者：當『工人事務』派出提必需爲經濟改良而鬥爭這個提綱出來，作爲自己與『火星報』的分歧意見的時候，我們稱『工人事務』派爲暗中的伯因斯坦主義者，這是不是誣蔑了他們？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始終是把爭取改良的鬥爭包括在自己的活動之內的。但是牠之使用『經濟』鼓動，不僅是爲的向政府要求採取各種辦法，而且也爲的（首先就要）要求政府不再是專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認爲自己的義務，不僅要在經濟鬥爭底基礎上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而且要在一般社會政治生活底表現基礎上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總而言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使爭取改良的鬥爭服從爭取自由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正如部份服從全體一樣。但是，馬丁諾夫則在另外一種形式下使階段論復活起來，力圖規定政治鬥爭發展底經濟的道路。他在革命高漲的時候，提出一種爭取改良的鬥爭底特殊『任務』，這樣，他就把黨拉向後退而幫助『經

濟派』的和自由派的機會主義。

其次，馬丁諾夫差答答地提出『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一種漂亮提綱來掩飾爭取改良的鬥爭以後，却又單單只提出一種經濟的（甚至只限于工廠的）改良。作為什麼特殊的東西。他為什麼這樣做，我們不知道。也許是他的忽略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廠的』改良，那末，我們剛才所引過的他那整個提綱，就失掉了任何的意義。也許他以為政府只有在經濟方面的『讓步』才是可能的和靠得住的吧？如果是這樣，那末這是一個奇怪的迷誤：關於鞭答，通行證，贖金，教派，稽查等等的立法方面都有讓步的可能，而且是常有這種讓步。『經濟的』讓步（或假讓步），對於政府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事，因為他希望以這點來使工人羣衆信仰他。唯其如此，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無論如何絕對不應容許這種意見（或是這種誤解）：以為經濟改良對於我們是貴重些，所以我們正要把牠們當作特別重要的東西等等。當馬丁諾夫講到他上面所提出的，採取立法上和行政上辦法的具體要求的時候，他說道：『這種要求，並不是一種空話，因

○第四三頁：『自然，我們之所以要工人向政府提出某種經濟要求，這是因為在經濟方面，專制政府因必要而準備作相當的讓步。』

爲，這種要求既能給與一種可以感觸到的結果，就能够得到工人羣衆底積極贊助」……我們不是經濟主義者。不，我們那裏是經濟主義者！我們不過與伯因斯坦，普羅科波維奇，司特魯威和R·M這些先生們，同樣奴隸式地崇拜具體結果底『感觸性』！我們不過（與拿爾齊斯·杜波立洛夫）一塊）要人們了解：凡是不能『給與一種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東西，都是一種『空話』！我們不過這樣講：似乎工人羣衆不能夠（似乎工人羣衆還沒有不管人們怎樣把自己的庸俗無能卸到他們身上而證明過他們能夠）積極幫助對專制政體的任何反抗，甚至於絕對不能給與他們以任何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反抗！

……「工人與資本家及政府作經濟鬥爭（『同政府作經濟鬥爭』）」，除了牠的直接革命意義之外，還有一種意義；就是牠可以使工人不斷地碰到他們沒有政治權利這個問題」（馬丁諾夫底文章，第四四頁）。我們把這段話抄下來，並不是要來把上面講過了的東西重複千百遍，而祇是要來感謝馬丁諾夫，因爲他發明了一個新鮮而高明的公式：「工人與資本家及政府作經濟鬥爭」

○拿爾齊斯·杜波立洛夫是馬爾託夫在其『近代俄國社會主義者底讚美歌』這篇諷諧詩上的署名；他在這詩中嘲笑了當時的機會主義。這詩登載於『曙光』雜誌第一期。（編者註）

』。說得何等美妙動人呵！這裏經濟主義底整個實質都表現於簡單明瞭的幾句話上，——始則號召工人做『政治鬥爭以擁護一般的利益，即是改良全體工人底地位』[⊖]，繼則大談其階段論，終則在代表大會決議上說什麼『最普遍適用的手段』等等，他有多麼大的才幹，他把各經濟主義者間的各種觀點上局部的區別與分歧抹煞得多麼機巧神妙呵！『與政府作經濟鬥爭』，這正是工聯主義的政治；這種政治離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還很遠很遠哩。

B • 馬丁諾夫怎樣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底意思

馬丁諾夫說：

……『自從普列漢諾夫寫了這本書（『俄國社會主義者在反對饑荒鬥爭中的任務』）以後，已經過了許多時間了。社會民主黨人，雖然十年間領導了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但是他們還不能給黨的策略作一個普遍的理論基礎。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成熟了。假使我們願意給牠一個這樣的理論基礎，那我們就無疑地應該把普列漢諾夫所曾經闡發過的那些策略原則，

⊖『工人思想報』，附刊，第十四頁。

大大地加深起來……我們現在決定宣傳和鼓動間的區別，應當與普列漢諾夫不同些」（馬丁諾夫剛剛引了普列漢諾夫底話：「宣傳家給一個人或幾個人以許多的觀念，而鼓動家則只給一種或幾種觀念，但是他却把這些觀念傳給大批的羣衆」）。『所謂宣傳，應當是用革命的精神來說明整個現存制度或是牠的局部的表現——所用的方式爲幾個人還是爲廣大羣衆所了解，這都是沒有關係的。所謂鼓動，嚴格講來（是呵！），應當是號召羣衆來作某種具體行動，促進無產階級之直接地革命地干涉社會生活』。

俄國的——而且是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有了這樣新穎的馬丁諾夫的更嚴格更深奧的一套名詞，真值得我們慶賀。直到現在，我們以爲（同普列漢諾夫和一切國際工人運動底領袖們一起以爲）是這樣：一個宣傳家，假使他要講到失業問題的時候，他就應當解釋危機底資本主義本性，指出危機在現社會內必不可免的原因，說明必需要把現社會改造成爲社會主義的社會等等。總而言之，他們應當給「許多觀念」，其觀念之多，以至於祇有少數人（比較上講）才能立刻完全領悟，領悟這些觀念底總和。至于鼓動家，講到同樣的問題時，他只是拿全體聽衆都能知道的和最出色的例子——如某個失業家庭底餓死，貧困底增加等等事情。他的全副力量，就在于利用這種人人都知道的事實，給「羣衆」一個觀念：財富增長和貧困增長之間的矛盾性是毫不合理的。

；他極力激起羣衆中對於這種極不公平的事情的不滿和忿怒，而把這種矛盾性底澈底解釋工作交給宣傳者去擔任。因此宣傳家底活動主要的是文字上的，而鼓動家底活動主要的是口頭上的。宣傳家所應具備的品質，是和鼓動家所應具備的品質不同的。例如考茨基和拉法格，我們稱他們爲宣傳家；培培爾和蓋斯德，我們稱他們爲鼓動家。這裏想分出第三部份實際工作或是第三種實際工作底職務，把「號召羣衆來作某種具體行動」歸入這個職務，這是極不相稱的，因爲，要是把「號召」看作單一的事實，牠或者是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補充理論著作，宣傳書籍和鼓動演講，或是成爲一種純粹執行上的職務。實際上，就拿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糧食關稅的鬥爭爲例吧。理論家寫了一本研究關稅政策的書，「號召」羣衆爲商業協定爲商業自由而鬥爭；宣傳家在雜誌上也是這樣寫，鼓動家在羣衆大會上也是這樣說。在這裏，羣衆底「具體行動」，就是署名於呈交國會的請願書上，要求不增加糧食稅。這些行動底口號，間接是出自理論家，宣傳家和鼓動家；直接出自那些把簽名簿分送于各工廠各住家的工人。照「馬丁諾夫的名詞學」講來：考茨基和培培爾兩個人都是宣傳家，而分送簽名簿的人是鼓動家，是不是這樣呢？

舉德國人底例子，使我想起了了一個德國字：Verballhornung。這個字譯成俄文恰恰就是：巴爾洪式的修正。約翰·巴爾洪（Johann Ballhorn）是十六世紀萊布齊地方的一個出版家。他出

版了一本識字讀本，並且照例也印上了一張雄雞的圖畫；不過他所畫的不是通常有腳爪的雄雞，他却不要腳爪而只在旁邊畫上兩個蛋。讀本底封面上加上一行字：『約翰·巴爾洪底修正版』。所以至今德國人講到那種實際上修得更壞的『修正』的時候，就說是 Verballhornung。當你們看到馬丁諾夫之流怎樣『加深』普列漢諾夫底意思的時候，你們定會無意中想起巴爾洪底故事……。

馬丁諾夫『發明』這種糊塗觀點，其用意在什麼地方呢？他的用意就在於說明：『火星報』『只注意到事情底一方面，正如普列漢諾夫在十五年以前所做的一樣』（第三九頁）①。『火星報』，至少是現在，重視宣傳任務而輕視鼓動任務』（第五二頁）。假使我們把最後這句話，從馬丁諾夫的話譯成普通人類的話（因為人類還沒有採用這新發明的名詞），那我們就可以得出下面一句話：『火星報』重視政治宣傳和政治鼓動底任務，而輕視下列的任務：『向政府提出具體要求，要牠採取立法上行政上的辦法』，『能給與一種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要求（或是社會改良的要求，假使還可以再用一次舊人類底舊名詞來講的話，而這個舊人類還沒有發展到馬丁諾夫底程度）。請讀者把下面這一段文章同這個提綱比較一下吧：

①『工人事務報』第十期上馬丁諾夫底文章：『揭露的刊物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編者註）

「這些綱領中」（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綱領中）「使我們吃驚的，就是：他們永遠看重工人在國會（我們這裏所不存在的）中的活動底優點，而完全忽略（由於他們底革命虛無主義）工人參加我們現有的廠主的廠務立法會議之重要……或者忽略工人參加城市自治機關之重要……」

這一段文章底作者，把馬丁諾夫用自己腦子所想到的這個思想，說得更爽直，更明確而更坦白。這一段文章的作者，就是「工人思想報」底附刊（第十五頁）中的R·M·O。

C · 政治揭露和「革命積極性底訓練」

馬丁諾夫提出了自己的「提高工人羣衆積極性」底「理論」來反對「火星報」，但他實際上却表現了降低這種積極性的傾向；因為他把一切經濟主義者所崇拜的那種經濟鬥爭，稱爲激發這種積極性的特別重要而「最普遍適用的」手段，稱爲這種積極性底表演場所。這一種迷誤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這決不是馬丁諾夫一個人所特有的東西。實際上，「提高工人羣衆底積極性」，祇有在我們不只限於作「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的條件之下，才可以達到。必須擴大政治鼓動底基本條件之一，就是進行各方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作這樣的揭露，就不能訓練羣衆底政

治意識和革命積極性。因此這一種工作乃是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黨底最重要的職務之一，因為就是政治自由也毫不取消這種揭露，而只是將揭露之方向底範圍稍稍移動而已，舉個例吧：德國黨，正因牠在政治揭露運動上毫不鬆懈的努力，所以能够特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如果工人沒有學會反應（由社會民主黨觀點看來的反應，而不是由別的什麼觀點看來的反應）一切和任何的專橫與壓迫，暴力與淫威這些事情（不管這些事情是對那個階級的），則工人階級底覺悟還不能成爲真正的政治覺悟。如果工人沒有在具體的而且一定是迫切的政治事實和事變中來學會觀察其他每個社會階級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現，如果工人沒有在實際中學會對各階級各階層的活動和生活之各方面應用唯物的分析和唯物的估計，則工人羣衆底意識還不能成爲真正的階級意識。誰要是把工人階級底注意，觀察及意識，專門地或主要地集中在牠本身上，誰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因爲工人階級要認識自己，須得對於現社會各階級底相互關係，不僅在理論上——更正確些說：與其說是在理論上，不如說是在政治生活的經驗上——得出完全明確的概念。所以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宣傳，說經濟鬥爭是吸引羣衆參加政治運動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就其實際意義講來，是極有害而且極反動的。工人如要成爲社會民主黨人，他就應當明確地了解地主和牧師，大官和農民，學生和流氓等等底經濟實質和社會政治面貌，應當知道他們的強點和

弱點，應當懂得每個階級每個階層用以掩飾其自利傾向和真正「內貌」的流行辭句與各種詭辯，應當懂得某些設施和法律是反映着並怎樣反映着某些人底利益。但是這一種「明確的概念」，在隨便那本書上都是找不出來的，要得到牠，只有看活現的圖畫，只有及時揭露目前在我們周圍所發生的東西，大家和每個人依照自己所講的或所私談的東西，在某些事變上、某些數目字上、某些法庭的判詞中所表現的以及其他等等東西。這一種各方面的政治揭露，是訓練羣衆革命積極性底必要的和基本的條件。

俄國的工人，對於警察底虐待人民，對於異教徒底受壓迫和農民底受鞭笞，對於稽查官底作惡，兵士底受拷問，無辜的文化運動底受摧殘等等，爲什麼還不大表現自己的革命積極性呢？莫不是因爲「經濟鬥爭」沒有使他「碰到」這些問題？莫不是因爲這一點很少「給與」多少「可以覺觸到的結果」，很少給與「好處」？決不是的，我們再重複說一遍：這種意見，並非別的，只是企圖把自己的過錯加在別人身上去，把自己的庸俗主義（伯因斯坦主義也在其內）卸到工人羣衆身上去。我們應當責備自己，責備我們自己落在羣衆運動之後，責備我們還不能極普遍，明顯而迅速地揭露一切這些醜態事情。假使我們做了這項工作（我們應當而且可以來做這項工作），那每個普通的工人都會懂得或感覺得：欺侮學生和異教徒，虐待農夫和著作家的，正是時時刻刻壓

迫和蹂躪工人生活的那種黑暗反動勢力。工人感覺到這點之後，他自己也就願意，止不住地願意來響應，那時候他可以——今天作諷刺的叫囂鼓舞，來嘲笑稽查官，明天在鎮壓農民暴動的省長衙門前舉行示威運動，後天就會懲罰那些虐待異教徒的穿袈裟的憲兵。在工人羣衆中作各方面的新鮮的揭露，這項工作我們過去還做得很少，而且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做。我們中間許多人還沒有知道這是自己的責任，他們只是在工廠生活底狹隘範圍內自發地幹「普通的日常鬥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而說：「『火星報』打算看輕普通的日常鬥爭進程之意義而推重高明與完備的思想之宣傳」（馬丁諾夫底話，第六一頁①）——這就等於把黨拉向後退，等於擁護和讚美我們的沒有準備和落後。

至於講到號召羣衆行動起來，那末，只要有了積極的政治活動和活躍顯明的揭露，自然會產生出來的。就地捉住犯人，立刻把他拿來遊街示衆——這種行動，本身要好於一切「號召」，這種行動發生之後，常常可以使人難於判斷：到底是誰「號召了」一大堆人，到底是誰提出某個示威底計劃等等。號召（不是一般地講，而是在這兩字底具體意義上講）祇有在行動地點才有可能，

①『工人事務報』第十期上馬丁諾夫底文章：『揭露的刊物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編者註）

而且能够號召的祇有當時自己也行動着的人。但是我們的事情，社會民主黨的政論家底事情，却在於加深、擴大和加強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動。

現在我們就附帶地來講一講『號召』吧。在春天事變以前，曾經號召工人積極干與罷學生去當兵這種問題（這種絕對不能給與工人以任何可以感覺到的結果的問題）的唯一的機關報，就是『火星報』。在正月二十四日（十一日）『勒令學生一百八十三人當兵』這個命令公佈之後，『火星報』立刻就登載了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二月第二期），而且在任何示威開始以前，就直接號召了『工人起來幫助學生』，號召了『民衆』公開起來回答政府底這種挑戰行爲。我們要問一問大家和每一個人：馬丁諾夫關於『號召』講得這樣多，把『號召』甚至看作一種特殊的活動，但他對於我們上面所講的這一個號召一字都沒有提起：這件彰明較著的事實怎樣來解釋呢？

……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工人事務報』也包括在內），他們之所以有了成功，因為他們是迎合了一部份落後工人。可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工人，革命家的工人（這種工人底人數是在不斷地增長）却忿怒排斥那些什麼爲『能給與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要求而鬥爭等等諛調，因為他們懂得這祇是爭得一個盧布上增加一個哥比的老調底變形而已。這種工人向『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務報』方面的顧問說：先生們，你們把我們自己能够應付的事情過分關心，而反把你們真正

的責任却推斷不執行，你們白操心了。你們說：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就在於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說得太不聰明了。你們要知道這只是一種開始，而社會民主黨人底主要任務却不在這裏，因爲在全世界各國和俄國，警察自己常常開始給經濟鬥爭以政治性質，工人自己學會了解：政府是擁護誰的。你們當作你們新發現的美國看待的那種「工人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在

○「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種要求，最明顯地表現在政治行動方面來崇拜自發性。經濟鬥爭之採取政治性質，往往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說，沒有「知識階層這種革命的細菌」底干與，沒有自覺的社會民主黨人底干與的。例如英國工人經濟鬥爭會帶有政治性質，也並沒有社會主義者底任何參與。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並不限於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他們的任務就是在於把這種工聯主義的政治變爲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鬥爭，利用經濟鬥爭所給與工人的一些政治意識，把工人提高到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意識上來。但馬丁諾夫派則沒有把自然激發的政治意識提高而推向前去；他們反而崇拜自發性而斷定說（他們常常說這種話）以至令人作嘔）經濟鬥爭使工人「碰到」他們政治上全無權利這個問題。先生們，可惜得很，工聯主義的政治意識底這種自發的覺醒，沒有使你們「碰到」你們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這個問題！

許多俄國的窺鄉僻壤中，是由那些聽過罷工而差不多沒有聽過社會主義的工人自己來進行的。要知你們想提出具體要求（能給與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要求）來幫助的那種「積極性」，我們工人是已經有了，而且我們自己在我們日常的、職業的、細小的工作上，常常沒有知識份子底任何幫助而提出了這些具體的要求。可是這樣的積極性對於我們還是不夠。我們並不是小孩子，祇拿「經濟主義的」政策這個餛飩餅可以養活的；我們想知道別人所知道的一切，我們想仔細認識政治生活底各方面和積極參加各個及每個政治事變。但要做到這點，就需要智識份子少講些我們自己也知道的东西，而多給我們些我們還沒有知道的東西，從自己工廠的經驗和「經濟的」經驗中所永遠

○爲要證實工人向經濟主義者所說的這種話決不是我們憑空想出來的，我們就來舉兩個見證人罷，這兩個見證人對於工人運動無疑地是有直接的認識，而且對於我們這種「信條主義者」是極不會偏袒的，因爲一個見證人是經濟主義者（他甚至於說，「工人事務報」是政治機關報！），還有一個見證人是恐怖主義者。第一個見證人是「工人事務報」第六期上「彼得堡工人運動與社會民主黨底實際任務」這篇文章底作者。這篇文章就其描寫逼真和活現講來真是一篇頂好的文章。他把工人分成幾部份。一，覺悟的革命家，二，中間階層，三，其

不能知道的東西——政治智識。這種智識你們智識份子是可以獲得的，你們必須把這些智識傳給我們——比過去要多千百倍地傳給我們，而且你們所傳給我們的，不要只限於議論、小冊子和文章（恕我們說句坦白話吧：這些東西常常是枯燥無味的），而且一定還要把目前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統治階級在各方面的生活上所幹的勾當活活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誠懇些來執行自己底這一個責

餘的羣衆。照他說來：中間階層「對於政治問題，要比對於自己目前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與一般社會條件的關係人家早已明瞭了），常常來得有興味些」……「他們很厲害地批評『工人思想報』」：「你們講來講去，總是這一套，這些東西人家早已知道了，人家早已讀過了」，「你們在政治評論上又是沒有什麼東西」（三十——三二頁）。但是就是第三類工人：「這是比較更活潑、更年輕的、比較沒有被酒色及宗教所腐化的工人羣衆，他們差不多從來沒有獲得政治書籍的可能，他們對於政治生活現象信口亂談，對於學生鬧事的斷片消息作『仔細的思索』等等。而恐怖主義者則這樣寫道：『關於非本城的，其他各地的工廠生活的小節，把他們流覽一兩遍，便停止不看了……枯燥無味……在工人報上不談國事……這是把工人看作小孩兒……工人並不是小孩兒。』（『自由』，革命社會主義社出版，六九——七十頁）。

任吧，請你們少講些什麼『提高工人羣衆積極性』的話吧。我們所有的積極性，實際上要比你們所想的得多；我們可以用公開的街道上的鬥爭，來擁護甚至絕對不能給與『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那種要求！我們並不要你們來『提高』我們的積極性，因為你們自己的積極性恰恰就不够！先生們，請少崇拜自發性而多去想『提高自己的積極性吧！』

D · 在經濟主義與恐怖主義間有什麼相同之點？

在上面的附註中間，我們已把經濟主義者和非社會民主黨人的恐怖主義者兩相比較；他們兩者偶然成爲一致的東西。但是一般講來，他們兩者之間，有一種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內部聯繫存在着。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而且必須要在訓練革命積極性的問題上來講。經濟主義與現時恐怖主義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這就是崇拜自發性，——關於這種崇拜我們上章已經把牠當作一般的現象講過了，現在要來考察牠對於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的影響。初看起來，我們的斷語似乎前後矛盾，一種人特別注重『普通的日常鬥爭』，另一種人號召單個人去作極不要命的鬥爭，這兩種人中間的差別是多麼大呵。但是這並不前後矛盾。經濟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他們各向自發潮流底兩個極端鞠躬：經濟主義者崇拜『純粹工人運動』底自發性，而恐怖主義者則

崇拜智識份子底極其憤激底自發性，這些智識份子是不善於或是沒有可能來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聯成一氣的。凡是已停止相信或是從來未曾相信這種可能性的人，除恐怖之外，的確難於尋找別的出路，來發洩自己的忿激情緒和革命毅力。這樣看來，這兩方面的崇拜自發性，無非是開始實現「信仰」底著名綱領：工人自己「與資本家及政府作經濟鬥爭」（「信仰」底作者，對不起你，我們用馬丁諾夫底話來表示綱領底意思！我們以為我們有權這樣做，因為在這篇「信仰」上也說到經濟鬥爭中工人怎樣「碰到政治的壓迫」），而智識份子用自己的力量去進行政治鬥爭，鬥爭底方法自然要借助於恐怖！這是一個完全合於邏輯的和不可避免的結論，不能不堅持這個結論，雖然那些開始實現這個綱領的人自己也還沒有知道牠的必然性。政治活動是有自己的邏輯的。這種邏輯，與那些好意號召採取恐怖政策或是號召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人們底意識沒有關係。地獄為好意所鋪成，在我們現在所講的情形下面，好意也不能使他們不致傾心於「阻力最小的路線」，「信仰」底純粹資產階級綱領底路線。因此，許多俄國的自由派——公開的自由派和戴着馬克思主義假面具的自由派——竭誠同情於恐怖政策，他們極力幫助目前恐怖主義情緒底高漲，這也不是偶然的（註釋三五）。

當「革命社會主義自由社」（註釋三六）產生的時候，牠所提出的任務正是各方幫助工人運動，

但是牠把恐怖政策包括於綱領之中，並使自己解脫社會民主黨。這一件事實再三證實了阿克雪洛德底眼光銳利。阿克雪洛德還在。一八九七年末就已預先說準了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動搖底結果（『現時任務和策略問題』），而且寫了一本著名的書：『兩個前途』（註釋三七）。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以後一切爭論和分歧意見，都已包含在（正如植物包含在種子內一樣）這兩個前途之中。

○馬丁諾夫『却看出另外一種比較實在的（？）兩條道路』（『社會民主黨與工人階級』一文十九頁）：『或者是社會民主黨自己直接領導無產階級經濟鬥爭，由此（！）把這種鬥爭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所謂『由此』，當然是指直接領導經濟鬥爭。請馬丁諾夫告訴我們罷：什麼地方見過只須單單領導職業鬥爭就可以把工聯主義的運動轉變為革命的階級運動？他沒有想到：要達到這種『轉變』，我們就應當積極從事『直接領導』各方面的政治鼓動？……『或者是另外一種前途：社會民主黨放棄對工人經濟鬥爭的領導，因而截去自己的羽翼』……照上面所引證的『工人事務報』的意思，『放棄』對經濟鬥爭的領導的就是『火星報』。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火星報』對於領導經濟鬥爭所做的工作，要比『工人事務報』多得多，同時他並不以此為限，他並因此來縮小自己的政治任務。

從上面所說的這個觀點看來，很明顯的：『工人事務報』既沒有起來反對經濟主義底自發性，也沒有起來反對恐怖主義底自發性。這裏我們很有興味地要指出『自由社』所提出的擁護恐怖政策的特殊論據來。牠『完全否認』恐怖政策底恐嚇作用（『革命主義底復活』，第六四頁），可是牠却推重牠的『激發的意義』。這一點值得注意的，第一，因為這正是過去那種逼使他們採取恐怖政策的許多傳統（社會民主黨以前的）觀念底瓦解與衰落底階段之一。承認現在用恐怖政策不能恐嚇政府，因而也不能破壞政府，這實質上就是完全斥責恐怖，不承認牠是一種鬥爭底系統，不承認牠是一種應當用綱領來規定的活動範圍。第二，更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這是不了解我們在『訓練羣衆革命積極性』方面的迫切任務的一個標本。『自由社』把恐怖政策宣傳成爲『激發』工人運動的手段，給工人運動以『有力的推動力』的手段。立論之自相矛盾，真是無過於此了！難道在俄國的生活中，還缺少謊謬絕倫之事，而需要想出另外一種特殊的『激發』手段來麼？在另一方面，誰要是沒有激發起來，而且就是俄國專制政府底專橫也不能把他們激發起來，那末即使政府與一小部份恐怖主義者單獨決鬥，這種人也將採取旁觀的態度：這難道還不明白麼？問題也就在這裏：工人羣衆是因俄國生活底齟齬而十分激發起來，可是我們還不能匯合（假使可以這樣講的話）和集中民衆激怒底一切水滴和細流：這些水滴和細流是被俄國的生活所榨出來的，牠們

的數量比我們所想像的不知要大得多少；但是我們正應當把牠們匯集成爲一條大流。這個任務是可以實現的；工人運動底高漲和上面已經指出的工人對政治刊物的渴望，就足以切實證明這一點。號召採用恐怖政策，或者號召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都是拋棄俄國革命者底最迫切的任務：『進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動』。『自由社』想以恐怖政策來代替鼓動，牠公開地認爲：『如果在羣衆中開始有力的熱烈的鼓動，那末，恐怖政策的激發作用也就盡了』（『革命主義底復活』第六八頁）。這也恰恰可以指明：恐怖主義者和經濟主義者都是輕視羣衆底革命積極性，不顧春季事變『這種明顯的證據；一個是拚命去找人工造就的『激發者』，另一個則高談『具體的要求』。他們兩者都沒有注意到在政治鼓動和實施政治揭露這種工作上來發展自己本身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工作，無論現在或其他任何時候都不能拿別的什麼東西來代替。

E · 工人階級是爲民主制度而鬥爭的先進戰士

我們已經知道，進行最普遍的政治鼓動，組織各方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社會民主黨的活動

◎這裏是指一九〇一年春季大遊街示威運動。這是由著者在本書底一九〇八年版上所加入的腳註。（編者註）

底絕對必需的，比什麼都更迫切的任務。但是在我們做這個結論的時候，是只以工人階級對於政治知識和政治訓練的迫切需要爲出發點的。然而只是這樣的提出問題，還是過於狹隘，而且是忽略了一切社會民主黨底、尤其是現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一般民主的任務。爲要儘可能具體地來說明這個基本觀點，我們現在就從對於經濟主義者最『切近的』東西——從實際方面——來考察問題。○必需要發展工人階級底政治意識，這是『大家同意的』。○但試問怎樣來做到這點呢？要做到這點，需要什麼呢？經濟鬥爭只使工人『碰到』政府對工人階級態度的問題，因此無論我們怎樣費力來解決『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我們也永遠不能在這個任務範圍內來發展工人底政治意識（把工人底政治意識提高到社會民主政治意識的程度），因爲這些範圍本身就太狹隘了。○馬丁諾夫底公式對於我們之所以有價值，並不是因爲牠表明馬丁諾夫之善於走入迷途，而是因爲牠露骨地表示一切經濟主義者底基本錯誤：以爲工人階級政治意識，可以從他們的經濟鬥爭底內部發展起來，就是說，只是（或者主要的是）以經濟鬥爭爲出發點，只是（或者主要的是）以經濟鬥爭爲基礎，就可以發展他們的階級政治意識。這種觀點根本上是錯誤的。○正因爲經濟主義者，因我們反對他們而對我們生氣；他們不願好好地想一想分歧意見底來源，結果弄得這樣，就好像彼此講彼此不同的語言，彼此都聽不懂。

階級的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是說只能從經濟鬥爭底範圍之外，從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範圍之外，灌輸給工人。只有在各階級及各階層對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只有在各階級之相互關係方面——才可以吸取這種知識。所以我們對於『怎樣才能把政治知識灌輸給工人』這個問題，決不能單單回答一句：『到工人中間去』。這個答覆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實行家是認為滿意的，至於傾向於經濟主義的實行家是更不用說了。爲要把政治知識灌輸給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就應當到各階級的人民中去，就應把自己的隊伍分散到各方面去。

我們故意選擇了這樣一種方便的說法，我們故意說得這樣簡單鋒利；我們所以要這樣，並不是因爲我們想說些強調奪理的話，而是想好好地使經濟主義者『碰到』那些被他們所不容許地忽略了的任務，『碰到』那種他們所不願了解的在工聯主義政治和社會民主黨政治間的區別。所以我請讀者不要着急，而仔細聽我們說到底。

你們就拿近年來最盛行的那種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爲例，來考察牠的工作吧。牠『與工人發生關係』，而且以此爲滿足。牠發行傳單，在傳單上責備工廠中的惡現象，政府偏袒資本家的行動和警察底強暴行爲；在會議上與工人的談話，通常也不外是或者幾乎是這一類題目。關於革命運動史，關於俄國政府內外政策問題，關於俄國和歐洲底經濟進化問題和現代社會中某階級底狀況

等等——關於這些問題的報告和談話，實在非常之少。至於在其他社會階級內有系統地取得和擴大聯繫，那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實質上，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這種小組組員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政治領袖，不如說是工聯會的書記。因為各國（如英國）工聯會的書記，經常幫助工人做經濟鬥爭，進行工廠生活底揭露，解釋那些阻止自由罷工和自由組織糾察隊（其目的是在預告大家及每個人，該工廠已經罷工了）的法律與辦法之不公平，說明屬於資產階級的仲裁人之偏袒等等。總而言之，每個工聯會底書記，進行和幫助進行『與資本家及政府的經濟鬥爭』。因此，我們應當始終堅持說：這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理想中的社會民主黨人不應該是工聯會書記，而應該是人民的喉舌，他們應該善於反應一切和任何的專橫與壓迫底表現（不管牠們表現在什麼地方，牠們牽連到那個階級或者那個階層），善於把這一切表現歸納成爲一幅警察強橫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圖畫，善於利用一切瑣屑小事，來向大眾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觀點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來向大家及每個人解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世界歷史意義。你們試把羅伯·拿依特（Robert Knight，他是一個製鑄工人工會——英國最有力的工會之一——底有名的書記和領袖）這類行動家同威廉·李卜克內西比較一下，你們試將馬丁諾夫用來形容自己與『火星報』的分歧意見的那些對照詞句應用到他們身上去。你們可以看到（我開始來摘錄馬丁諾夫底文章）：拿依特

對於「號召羣衆去幹某種具體行動」這種工作做得多得多（第三九頁），而李卜克內西對於「用革命觀點來說明現制度或其局部表現」的工作則做得比較多（第三八——三九頁）；拿依特「規定了無產階級底最近的要求而且指出了實現牠們的方法」（第四一頁），而李卜克內西連這點也是做的，但並沒有拒絕「同時領導各反對階層底積極行動」，「替他們指出實際的行動綱領」；「這種工作（第四一頁）；拿依特所努力的正是「盡量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第四二頁），而且善於「向政府提出能給與可以感觸得到的結果的具體要求」（第四三頁），而李卜克內西則多注意於「片面的」，「揭露」（第四十頁）；拿依特比較注重「普通日常鬥爭底進程」（第六一頁），而李卜克內西則多注意於「宣傳高明完備的觀十」（第六一頁）；李卜克內西把自己所指導的報紙變成了「革命反對派底機關報，來揭破現制度，主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為這些政治制度是與極不同的人民階層利益相抵觸的」（第六三頁），而拿依特則「在與無產階級鬥爭密切的有機的聯繫之下，爲工人事業而工作」（第六三頁）（假使所謂「密切的有機的聯繫」，就是我

○例如在普法戰爭的時候，李卜克內西指出整個民主派底行動綱領，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這一項工作做得更多。

們上面已拿克里却夫斯基和馬丁諾夫做例子而加以研究的那種對自發性的崇拜），他『縮小了自己影響底範圍』，他當然和馬丁諾夫一樣，相信『他這樣一來就把影響底本身弄複雜了』（第六三頁）。總而言之，你們可以看到：實際上馬丁諾夫是把社會民主黨降到了工聯主義。自然，他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不對社會民主黨懷好意，而只是因為他不去費力來了解普列漢諾夫，而急於加深普列漢諾夫底意思。

現在要回轉去說明我們的意見了。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僅僅在口頭上贊成須要各方面發展無產階級底政治意識，那他就應當『到人民底各階級中去』。這裏就發生許多問題：怎樣來做到這點？我們有沒有力量來做這一點？要在其他各階級中做這種工作有沒有基礎呢？這是不是放棄了或者趨向於放棄階級觀點？我們現在就來講這些問題吧。

我們應當以理論家的資格，宣傳家的資格，鼓動家的資格，組織家的資格，跑『到人民底各階級中間去』。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工作，應該用來研究各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底一切特點，這一點是誰也不懷疑的。但這一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少很少，與研究工廠生活特點的工作比較，是太不相稱了。在委員會中，在小組中，你們可以找到一些人，他們對於某種製鐵生產甚至有專門的研究；但是，你們找不到這樣的例子，指明組織中的組員（有時常因某種原因而不得不脫離

實際工作）專門來收集我們社會政治生活中某個切要問題的材料，這個問題使社會民主黨人在其他人民階層中有進行工作的機會。當我們說到現代大多數工人運動領袖缺少準備時，我們也不能不提到這方面的準備問題，因為這也同「與無產階級鬥爭的密切的有機的聯繫」底「經濟主義的了解聯繫着的。但是最主要的，當然是在各人民階層中的宣傳與鼓動。西歐因有民衆大會，凡是願意的人都可參加這些大會，有國會，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在各階級代表面前講話，所以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容易解決這個任務。我們既沒有國會，又沒有集會的自由——但是我們會把願聽社會民主黨人說話的工人，召集來開會。我們也應當會把人民各階級底那些只要是願聽民主黨人說話的各人民階級代表們，召集來開會。因為誰要是在實際上忘記：「共產主義者應該幫助一切革命運動」，忘記我們應該向全體民衆說明和指示出一般的民主任務，同時一分鐘都不遮蔽自己的社會主義觀點——誰要是忘記了這些，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在提出、加劇和解決任何一般民主問題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底責任就是要站在大家前面，誰要是在事實上忘記了這一點，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不耐煩的讀者也許要插嘴道：「對於這點大家都是同意的！」在最近的這次協會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對「工人事務報」編輯部的新訓令，簡直地說：「社會政治生活上的一切現象和事變，

只要牠們直接牽動到無產階級這個特殊階級，或是無產階級這個爭自由的。一切。革命。力量。底。先。鋒。隊。的時候，牠們都應該成爲政治宣傳和政治鼓動的機會」（『兩個代表大會』，第十七頁，着重點是我們加的）。不錯，這些話講得很對而且很好；假使『工人事務報』懂得這些話，假使牠說了這些話之後不說與這些話相矛盾的話，那我們是非常滿意的了。

……實際上，請你們來想一想馬丁諾夫下面這個論調吧。他在四十頁上說：『火星報』底揭露策略是片面的，『我們無論怎樣散佈不信任和仇恨政府的種子，如果我們不能發展充分積極的社會力量來推翻牠的時候，我們是不能達到目的的。』我們順便說一說，這是關心提高羣衆底積極性，同時却降低自己的積極性，這種關心我們早已認識了。可是現在的問題不在這裏。馬丁諾夫這裏所說的，是革命力量（『用以推翻』政府的革命力量）。可是他的結論是怎樣呢？因爲在平常的時候，各社會階層一定是各走各的路，『因此，所以很明顯的，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不能同時領導各反對派階層底積極行動，不能給他們指出實際的行動綱領，我們不能替他們指出，應當用那種方法來逐日爲自己利益而鬥爭……自由主義的階層，他們自己已經關心到這種爭取自己目前利益的積極鬥爭了，而這種鬥爭使他們當面碰到我國的政治壓迫』（第四一頁）。這樣看來，馬丁諾夫一開始說到革命力量，說積極鬥爭來推翻專制政體；就馬上說到職工的力量，說到積

極鬥爭來爭取目前的利益！我們不能領導學生、自由派和其他份子爲他們的『目前利益』而作的鬥爭，這是很顯明的事；可是，最可敬的經濟主義者，過去講的並不是這個問題呵！過去講的是在推翻專制政體的時候，各社會階層是可以參加而且必須參加的問題；我們不僅可以領導這一種「各反對派階層底積極行動」，而且絕對應當領導牠，假使我們打算做『先鋒隊』的話。至於講到我們學生、自由派和其他份子之『當面碰到現時政治的壓迫』，則不僅他們自己關心這件事情，專制政府下的警察和官僚本身首先就最關心這件事情。但是『我們』，假使我們打算做先進的社會民主黨人，那我們所應當關心的就是：使那些只不滿意於大學內的制度或者只不滿意於地方自治局內的制度和其他制度的人，碰到整個政治制度之不適用的思想。我們應當擔任在吾黨領導下組織這種各方政治鬥爭的任務，使得一切和任何的反對派階層，能够而且確實給這個鬥爭和這個黨以竭力的幫助。我們應當從社會民主黨人底實行家內，造就出這樣的政治首領來，他們能够領導這種各方鬥爭底一切表現，能够在必要時，『把實際的行動綱領指示給』憤怒的學生，不滿意的地方自治派，忿忿不平的異教徒和受辱的國民教員以及其他的人們。所以馬丁諾夫說：『對於這些人我們祇能盡一種揭露現制度的否定作用……我們只能打破他們對於各種政府專門委員會的希望』（着重點是我們加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馬丁諾夫這樣說，就是證明他全不懂得革命

「先鋒隊」底真正作用。假使讀者注意到這點，他就可以了解馬丁諾夫下面這個結論底真實意思了：「『火星報』是革命的反對派底機關報，牠揭露我國的制度，而且主要的是在揭露我國的政治制度，因為這些制度是與各種人民階層底利益相抵觸的。而我們在現在和將來，却要在與無產階級鬥爭密切的有機的聯繫之下，爲工人事業而工作。我們縮小自己影響底範圍，因此就把影響本身弄得複雜了」（六三頁）。這一個結論底真實意思是這樣：『火星報』想把工人階級底工聯主義的政治（我們有些實行家由於誤解和準備程度不够，或者是由於信念，常常被這種政治所限制）提高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但『工人事務報』則想把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降低到工聯主義的政治。而且牠還向大家說：『這兩個主張在共同事業上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六三頁）。何等神聖的爽直精神呀！

再講下去。我們有沒有力量使自己的宣傳和鼓動，到各人民階級中去呢？當然，是有的。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常想否認這點，他們沒有看到：約自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一年，我們的運動已經是長足地前進了。真正的『尾巴主義者』，他們還是在已經過去好久的運動開始時期的印象中過生活。那時候我們的力量確是非常之小。那時候決定專在工人中間工作，嚴厲責備放棄這項工作的人，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合理的事情。那時候全部任務，是在工人階級中間穩固自己的基礎。

現在極大的力量已經捲入了運動漩渦之內，受過教育的階級中青年底一切優秀代表都在走向我們了，在外省各地已經有參加過運動或願意參加運動的人，已經有傾心於社會民主黨的人（而在一八九四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人數，竟是屈指可數）。我們運動中政治上與組織上的基本缺點之一，就是我們還不會利用這一切力量，給一切力量以適當的工作（這一點我們在下章更要詳細說到）。這些力量底極大部份，都完全沒有『到工人中間去』的可能，所以談不到什麼使力量離開我們基本事業的危險。但是要給工人以真正的、各方面的和活躍的政治知識，就須要隨時隨地，在各社會階層中，在各個陣地中，有『自己的人』——社會民主黨人，以便能夠知道我們國家機體底內部構造。我們不僅在宣傳上和鼓動上需要這樣的人，而且在組織上更需要這樣的人。

在各人民階級中活動底基礎有沒有呢？誰要是沒有看到這點，誰的覺悟性就又是落在羣衆自發高潮之後。工人運動引起了而且現在還在引起一部份人對政府發生不滿情緒，另一部份人希望得到反對派底幫助，第三部份人感覺到專制政體不能存在而必然要破產。如果我們不了解自己的任務，來利用不滿情緒底一切和各種表現，來收集和研究的甚至於處在萌芽狀態的抗議底零星事實，那我們就僅是口頭上的『政治家』和社會民主黨人（在實際上常常是有這種事情的）。至於勞動農民、家庭手藝者、小手工業者等等所有這千百萬羣衆，他們之常常貪聽稍微會做工作的社會民

主黨人底宣傳，那更不必說了。可是難道你們能够指出一個階級，其中沒有不滿意於自己的無權地位和官場專橫因而易受社會民主黨人（最迫切的一般民主要求底表現者）底宣傳的個人、小組和集團呢？誰想具體觀察社會民主黨人在各階級和階層中的這種政治鼓動，我們就指示他把廣義的政治揭露作為這種鼓動底主要（自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從何着手」這篇文章（登載於一九〇一年五月『火星報』第四期。關於這篇東西，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討論）上寫道：

「我們應當在一切有些覺悟的人民階層中，激起政治揭露底熱情。現在政治揭露的呼聲，這樣軟弱，稀少而怯懦，我們不要因此而心慌意亂。這種現象底原因，並不是因為大家都屈服於警察的專橫了。牠的原因是：那些能够而且準備作揭露工作的人，沒有他們發言的講台，他們沒有熱烈聽講和鼓勵演講者的聽衆；他們在民衆中間各處都看不到一種力量，值得來向牠控告「萬能的」俄國政府底罪惡……現在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建立這一種講台，來把沙皇政府揭露給全體民衆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就應當成爲這樣的講台。」

工人階級正是政治揭露方面的優秀的聽衆，他們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各方面的活躍的政治知識；他們最能把這種知識變成積極的鬥爭，雖然這種鬥爭也沒有給與什麼「可以感觸到的結果」

。但揭露給全體民衆看的講台，祇有全俄的報紙才可以。「如果沒有政治的機關報，則現代歐洲配稱爲政治的運動是不可能的」；無疑的，俄國在這點上也是同現代的歐洲一樣的。刊物在我們俄國早已成了有力的東西——否則政府就不會出幾萬盧布來收買牠，來接濟加特可夫(Katkovs)和米徹爾斯基(Meshchersky)這般人了。非法的刊物衝破了檢查的障礙，逼使合法的和保守的機關報公開說到牠。這在專制的俄國並不是新奇的事。在七十年代，甚至在五十年代，就已經是這樣了。但在現在，人民願讀秘密刊物，願意在這種刊物上學習「怎麼生和怎樣死」（借用工人給『火星報』第七期的一封信上的話）——這些人民階層要比過去不知深廣多少倍。經濟揭露是向廠主宣戰，而政治揭露正是向政府宣戰。這種揭露運動愈普遍愈有力，那個爲開始戰爭而宣佈戰爭的社會階級底人數愈多且愈堅決，則這種宣戰底精神上的意義也愈大。因此，政治揭露就其本身講來，已經是一個使敵人制度解體的有力的手段，已經使敵人底偶然的或臨時的同盟者離開敵人的手段，已經是在經常參加專制政權的人中間散播互相仇恨和互相猜忌的情緒的手段。只有進行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的黨，現在才能成爲革命力量底先鋒隊。「全民的」這三個字，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從非工人階級出身的極大多數揭露者（但要成爲一個先鋒隊，就應當吸引別的階級），都是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和頭腦冷靜的幹事者。他們很知道：不要說「控告」，「萬

能的「俄國政府，就是「控告」下級官吏，也不是沒有危險的。祇是當他們看到向我們控告真能發生作用，看到我們是一種政治力量的時候，他們才會向我們來控告。要在旁邊人眼裏成爲這樣一種力量，我們就要多多地毫不鬆懈地做提高我們的覺悟性、主動性和毅力的工作。但要做到這點，僅在後援隊底理論和實際上掛起「先鋒隊」的招牌是不夠的。

如果我們應當担任組織真正全民的揭露（揭露政府），那末我們運動底階級性質表現在什麼地方呢？——我們的那些盲目熱烈崇拜「與無產階級鬥爭作密切的有機的聯繫」的人，會要這樣問，而且已在這樣問我們了。我們的答覆是：我們運動底階級性，正是表現在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組織這種全民揭露的工作；正是表現在說明一切由鼓動所提出的問題，始終是本社會民主黨的精神，而對於有意無意地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則毫不寬容；正是表現在進行這種全民的政治鼓動的將是這樣的黨，這個黨，代表全民攻擊政府，用革命精神訓練無產階級，同時保護無產階級底政治獨立性，領導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利用工人階級和牠的剝削者間的自發衝突（這種自發衝突正在把新的、一批一批的無產階級激發起來並吸引到我們的營壘中來！）等等，這個黨把這些工作聯繫起來，成爲整個的不可分離的東西。

經濟主義底最顯明的特點之一，正是不懂得這一個聯繫，而且不懂得無產階級最切身的要求

（用政治鼓動和政治揭露的方法來作各方面的政治教育）與一般民主運動底要求互相符合。這不僅表現在『馬丁諾夫的』辭句上，而且還表現在按意思與這種辭句相同的援引所謂階級觀點的論調上。比方，且看『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的『經濟主義的』信①底作者關於這點是怎樣說的：「『火星報』底這個主要缺點（過分估計思想底作用），就是牠在社會民主黨對於各個社會階級和派別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態度不徹底的原因。牠用理論盤算的方法」（而不是用『發展與黨一同發展起來的黨的任務的方法』），『來解決立刻進行反對專制政體的鬥爭的任務，牠大概也覺得，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任務對於工人是很困難的……』」（並且不僅覺得，而且明明知道：這個任務在工人看來，要比關心小孩子的『經濟主義的』智識份子看來比較不困難些，因為工人甚至準備為那些要求而鬥爭，雖然這些要求，用不朽的馬丁諾夫底話來說，並不給與什麼『可以感觸

①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不能在『火星報』上充分地答覆這封信。這封信是最足以代表經濟主義者底觀點的。這封信的出現使我們非常快樂，因為說『火星報』階級觀點不堅定這種話，早已從各方面傳到我們耳鼓裏來了，我們會經尋找方便的機會或這種流行責備底肯定說法，來加以答覆。但在回答攻擊的時候，我們慣用的方法不是防守，而是反攻。

到的結果的」……「但是「火星報」沒有耐性來等待工人繼續積蓄他們的力量來做這種鬥爭，牠就開始在自由派和智識階層隊伍中找尋同盟者……」。

是的，不錯，我們實在已經沒有任何「耐性」來「等待」由一切「調和者」老早答應給與我們的那個幸福時候了——不能等待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停止把自己。的落後性卸在工人身上，停止用工人力量似乎不足的話來辯護自己力量的缺乏了。我們要問我們的經濟主義者：所謂「工人積蓄力量來做這種鬥爭」，應當是怎樣呢？不明明是應當在政治上訓練工人，應當在工人面前把我們腐敗的專制政體從各方面揭露出來嗎？我們之需要「自由派和智識階層隊伍中的同盟者」（他們準備與我們一塊揭露政治上對於地方自治派、小學教員、統計者、學生等等的壓迫），恰巧是爲了這一種工作，這難道還不明顯麼？了解這一種非常「巧妙的機密」，難道果然這樣困難麼？難道阿克雪洛德不是從一八九七年就向你們說過①：「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非無產階級中間奪取信託與直接或間接的同盟者這個任務，首先而且主要的是由無產階級自己隊伍中的宣傳活動底性質

①參看阿克雪洛德著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時的任務與策略問題』。日內瓦一八九八年版本，第十六至十七頁。（編者註）

來解決』麼？但馬丁諾夫和其他的經濟主義者，還是以爲：工人開始應當用『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方法來積蓄自己的力量（來實行工聯主義的政治），然後從工聯主義的『積極性底訓練』『過渡到』社會民主黨的積極性！

經濟主義者繼續說道：「……『火星報』在尋求同盟者的時候，常常離開了階級的觀點，抹煞了階級矛盾，把對政府表示不滿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雖然這種不滿底原因與程度，各『同盟者』極不一致。譬如『火星報』對地方自治派的態度就是這樣……似乎『火星報』曾『拿工人階級底援助來答應不滿於政府禮物的貴族，同時却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些人民階層底階級的分歧』。如果讀者來看一看『火星報』第三第四兩期上的『專制政體與地方自治』這幾篇文章（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所說的大概是這幾篇文章），你們就可以看到：這些文章①是講政府對於『等級的官僚的地方自治派底溫和鼓勵』的態度，對於『甚至有產階級底自動性』的態度的。在文章中說道，工人對於政府反對地方自治派的鬥爭，不能採取觀望的態度；當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用全力起來反對政府的

① 而且在這些文章之間（『火星報』第三期），還登載着一篇文章，是專門講到俄國鄉村中的階級衝突的。（參看本卷所載的『工黨與農民』，編者補註）

時候，也要請地方自治派拋棄溫和的言論，而來講激烈的硬話。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所不同意的到底是那一點，我們却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以為工人「不懂得」「有產階級」和「等級的官僚的地方自治派」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為推動地方自治派去開軟話講硬話，這就是「過於估計思想底作用」呢？他們是不是以為，假使工人連政府專制對地方自治的態度也不知道，還可以「在本身積蓄力量」來與專制政體鬥爭呢？這些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作者對於社會民主黨底政治任務的了解是很模糊的。這點從下面這幾句話中間更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

『火星報』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也是如此』（即是說，也是「蒙蔽了階級的對抗性」）。照他們的意思，我們不必號召工人用示威的方法來說明：暴力、無理和放肆底真正柱石不是學生界而是俄國政府（『火星報』第二期）——而應當發表『工人思想報』式的議論！在一九〇一年秋天，二月和三月的事件①之後，學生運動新高漲底前夜社會民主黨人也發表過同樣的思想。當時學生運動的高漲暴露出：在這方面的反抗專制政體的『自發性』，曾超過社會民主黨對運動之覺悟的領導。工人袒護被警察與哥薩克兵痛打的學生的自發傾向，曾超過社會民主黨組織底覺悟的行動！

①參看本卷註釋七。（編者註）

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繼續說道：「然而在別的文章裏，『火星報』則嚴厲地責備任何的妥協，和起來擁護蓋斯德派底不肯容忍的行動」。有些人對於現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的分歧意見，普通總是這樣自信這樣輕浮地說：這些分歧意見並不重要，分裂是無理由的。我們勸這些人好好地來想一想這些話意底思吧。有一種人說，我們在解說專制政體對於各階級的仇視性這方面，在使工人認識反對專制政體的各階層這方面，工作做得還是非常之少；另一種人則以為做這個工作，就是「妥協」，大概是同「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種理論妥協；這兩種人在一個組織內，能不能順利地進行工作呢？

在說到農民解放四十週年紀念問題時，我們會說必需把階級鬥爭灌輸到鄉村中去（『火星報』第三期），在說到維特底祕密呈文的問題時，我們會說自治制度和專制政體是兩不相容的（第四期）；在頒佈新法律的問題上，我們會攻擊過地主和政府（替地主服務的）底農奴制度（第八期），我們會慶祝過非法的地方自治派的代表大會，鼓勵地方自治派放棄卑屈的請願而進於鬥爭（第八期）；我們也會勉勵過那些已經開始懂得政治鬥爭底必要而前去幹政治鬥爭的學生（第三期），同時我們曾經打擊那些主張「只是學生運動和叫學生不參加遊街示威的人底愚昧觀點」（第三期，關於三月十日（舊歷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學生總會底宣言的一篇文章）；我們揭破了

『俄羅斯報』自由派狡猾者底『妄想』與『虛偽』（第五期）；同時我們指出了政府『拷問所對於和平作家、老教授和學者、以及有名的自由主義的地方自治派的極力摧殘』（第五期，『警察壓制文藝』一文）；我們揭穿了『政府關心工人生活幸福』這個綱領底真正意義，我們歡迎過下面這種『有價值的自供』：『要等自下而上地起來要求改革，不如自上而下地自行改革』（第六期）；我們鼓勵過反抗政府的統計者（第七期），責備過工賊式的統計者（第九期）（註釋三八）。誰要是把這種策略看作是蒙蔽無產階級底階級意識，是同自由主義妥協，誰就表示他完全沒有懂得『信仰』這個綱領底真實意義，而且事實上就是實行了這個綱領，無論他怎樣否認這個綱領！因為他這樣就是把社會民主黨拉到『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道路上去，向自由主義投降，拒絕積極參加每個『自由派的』問題與決定社會民主黨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的任務。

F ·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這是屬於『工人事務報』所愛用的幾個字眼；當我們責備牠『間接準備基礎來把工人運動變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工具』時，牠總是用這些字眼來答覆的。『工人事務報』頭腦簡單，牠認為；這種責備不過是論職的謾罵罷了，牠說，這些惡意的信條主義者，總是用一切難堪的話來罵我

們：但是那裏還有比做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工具更難堪的呢？於是就用頭號字印成「駁斥」：「毫不掩飾的造謠誹謗」（見「兩個代表大會」第三十頁），「捏造」（第三一頁），「假面舞蹈會」（第三三頁）。『工人事務報』也像雷神一樣（雖然牠本身很不像雷神），牠之所以生氣，正因為牠自己錯誤了：牠的急燥的謾罵，就證明牠不能把自己對方底思想過程，加上一番思索。爲什麼凡是崇拜羣衆運動自發性，凡是把社會民主黨底政治降爲工聯主義底政治，就是準備基礎來使工人運動變爲資產階級民主底工具：要了解這一點，須要經過一番思索。自發的工人運動，本身只能造成（而且一定會造成）工聯主義；而工人階級底工聯主義的政治就正是工人階級底資產階級政治。工人階級之參加政治鬥爭，甚至參加政治革命，這還絲毫不能使牠的政治成爲社會民主黨底政治。

『工人事務報』以爲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俄國是一種「幻想」（見「兩個代表大會」第三二頁）⊙。真是紅運亨通的人！他們好像駝鳥一樣，把頭縮在翅膀內，以爲這樣一來，周圍的東西就都消失了。許多自由山派的時評家，每月向大眾奏一次凱旋，說馬克思主義底衰落甚至消滅；許多自由山派的報紙（如『聖彼得堡導報』、『俄羅新報』以及其他許多報紙），讚揚把勃連唐諾式的階級鬥爭底觀念（註譯三九）和工聯主義的政治觀念傳給工人的那些自由派；批評馬

克思主義的人氣盛一時，他們的真實傾向已由「信仰」發表得非常完善，他們的著作商品獨可以不抽捐稅而暢銷於全俄；非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思潮底活躍（尤其是在二月和三月事變之後）；——照「工人事務報」講來，所有這些都是一種幻想！所有這些，都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沒有絲毫關係！

「工人事務報」，同「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一樣，應當「想一想，爲什麼春季事件引起了非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派別底活躍，而沒有引起社會民主黨威望底增高？」——這是因爲我們竟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工人羣衆底積極性超過了我們的積極性，我們沒有充分有準備的革命指導者和組織者，即熟悉反政府的各階層底情緒，善於領導運動，能變自發示威爲政治示威，能擴大此種示威底政治性質等等的指導者和組織者。而且在這些條件之下，我們的落後性

○這裏他們以「俄國具體條件必定推動工人運動走上革命道路」這點爲依據。這些人不願意了解：工人運動底革命道路也還可以成爲非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他們不知道，在專制政體時代，整個西歐資產階級會推動而且會有意地推動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是我們是社會民主黨人，我們不能以此爲滿足。假使我們無論用什麼東西來把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降低到自發的，工聯主義的政治，那末我們這樣正是幫助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將來必然會被非社會民主黨人的比較活動和比較積極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則無論怎樣犧牲和怎樣積極與警察軍隊肉搏，他們無論怎樣起來作革命運動，他們都會只成爲幫助這些革命者的一種力量，都會只成爲資產階級民主底後衛隊，而不會成爲社會民主黨的先鋒隊。就拿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吧，——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只想仿效牠的弱點。爲什麼德國每個政治事變，一定使社會民主黨底威信逐漸增高呢？因爲社會民主黨在最革命地估計這種事變方面，在擁護反對專橫的任何抗議方面，都是站在一切人底面前的。牠並不空談什麼經濟鬥爭促使工人碰到他們毫無權利的問題，說什麼具體條件必定推動工人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牠干涉到社會政治生活底各方面和各問題：威廉不批准資產階級進步黨人常市長的問題（我們的經濟主義者還來不及告訴德國人，說這實際上是與自由主義妥協！），頒佈法令禁止「不道德的」書籍及圖畫的問題，政府影響大學教授底人選問題和其他等等的問題。他們到處都站在一切人前面，激發各階級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喚醒睡夢的人，推動落後的份子，供給各種材料來發展無產階級底政治意識與政治積極性。結果，甚至社會主義底自覺的敵人都對於先進的戰鬥員表示尊敬；不僅是資產階級方面約重要文件，而且甚至官僚的及皇家的重要文件，也不知怎麼樣往往竟落到「前進報」底編輯室裏來。

○「前進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者註）

(四) 經濟派底手藝主義與革命家底組織

我們上面所分析過的「工人事務報」底斷語，說經濟鬥爭是政治鼓動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說我們目前的任務是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等等，這就表現出他們不僅是狹義地了解我們的政治任務，而且是狹義地了解我們的組織任務。對於「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完全不需要（而且在這樣的鬥爭中也不能形成）全俄集中的組織——這個組織把政治上的反對態度、抗議和憤激底一切和各種表現匯合為一個總的攻擊，這個組織由職業的革命家組成而由全體人民底真正的政治領袖所領導。還是很明顯的事。一切機關底組織性質自然而且必然是由這個機關底活動內容來決定的。因此「工人事務報」用上面那些斷語，不僅使政治活動底狹隘性，而且使組織工作底狹隘性，都成為神聖和合法了。在這一個問題上（同在別的問題上一樣）講來，「工人事務報」是覺悟性投降在自發性面前的一個機關報。而崇拜自發形成起來的組織形式，不覺悟到我們的組織

工作如何狹隘以及何等原始，不覺悟到在這項重要工作中我們還是何等的「手藝者」，我以為這是我們運動底真正病態。當然，這不是衰落底病態，而是發展底病態。但是，現在自發憤激的浪潮震盪我們——運動底指導者和組織者，正在現在的時候，特別需要不調和的鬥爭，來反對一切擁護落後性的主張，反對在這件事情上使狹隘性成爲法則的一切企圖；特別需要激起每個參加實際工作或預備做這項工作的人，起來對我們現在盛行的手藝主義表示不滿，下一番大決心來解說這種手藝主義。

A · 什麼叫做手藝主義？

我們拿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一年標本式的社會民主黨小組底活動這幅小小的圖畫，來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講過：當時的青年學生都風行一時地傾心於馬克思主義。自然，他們所以這樣傾心，不僅是而且主要地不是傾心馬克思主義這種理論，而是把牠當作「做什麼？」這個問題的答覆，當作向前進攻敵人的號召。新的戰士就這樣帶着非常原始的武裝和準備程度向前進攻。在許多情形之下，武裝和準備差不多一點都沒有。他們跑去作戰，正像農夫丟掉鋤頭，祇抓到一根木棒一樣。學生底小組，與參加運動的舊人物沒有絲毫聯繫，與別地的，甚至本城的（或別個學

校的)小組沒有絲毫聯繫，各部分的革命工作絲毫沒有組織，比較長時期內的有系統的活動計劃也絲毫沒有；但是他們與工人建立聯繫而從事工作。這些小組逐漸擴大着日益廣大的宣傳和鼓勵，以自己的發動來吸引着很廣大的工人羣衆底同情，有教育程度的團體中一部分人底同情，這些團體供給他們以金錢，給予『委員會』以一批一批的新青年。委員會(或稱鬥爭社)底威信是增長了，牠的活動範圍也是擴大了。牠擴大這種活動完全是自發的：一部分人一年或幾月以前在學生小組講過話，解決過『往何處去？』的問題，刊印和出版過傳單，同工人建立過并保持過聯繫，——同是這一部分人現在與別的革命家團體建立聯繫，設法取得刊物，出版地方報紙，開始講到舉行示威，最後還進到公開的軍事行動(同時，第一號鼓動傳單，第一期報紙和第一個示威，在某種情形之下，都可以成爲這種公開的軍事行動)。通常這種行動底初次發動，總是歸於立刻完全失敗。其所以立刻完全失敗的，就因爲這些軍事行動並不是長期堅決鬥爭底有系統的，預先想好和早有準備的計劃底結果，而祇是照例進行的小組工作底自發的增長；因爲警察差不多經常知道本地運動底各個主要人物(在他們求學時代，他們就同警察『相識』了)，警察祇在等待相當時機來逮捕他們，警察故意要使小組充分地發展和擴大起來，以便有明顯的犯罪的證據，警察常常故意讓他們所知道的幾個人去『繁殖』(據我所知道的，我們的弟兄們和憲兵們，都使用這個

術語）他們的種類。我們不能不把這一種戰爭，來與農民拿着木棒反對現代軍隊的作戰比較。我們所覺得奇怪的，是作戰的人雖是全無準備，但是運動很有生氣：運動是擴大了，增長了，而且往往取得了勝利。誠然，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武裝底原始性，在開始的時候，不僅是必不可免的，而且是合乎規律的，因為這是一個普遍吸收戰士的條件。但是，當嚴重的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時候（而牠們實質上從一八九六年夏季罷工起就已開始了），我們軍事組織的缺點就日甚一日地暴露出來了。政府在第一個時期表示手足無措，做了許多錯誤（譬如向社會散發通告，描寫社會主義者底惡行，把工人從首都放逐到各省底工業中心去等等）之後，牠已很快地適應了新的鬥爭條件，牠已能在相當地方設置自己的有精良武裝的奸細、偵探和憲兵隊伍。摧殘的事情常常發生，牽連的人這樣多，地方小組劃除得這樣乾淨，以至於工人羣衆失去了所有的指導者，運動帶了非常突變的性質，同時絕對不能建立什麼工作底繼承和聯繫來。各地行動家庭異常散漫；小組成份底偶然性，理論、政治和組織問題上的無準備和眼光狹小；這些便是上面所說的各種條件底必然結果。事情竟弄到這樣：有幾個地方，因為我們缺乏堅定性和祕密性，工人不相信智識界而離開牠。他們說：智識份子太隨意地弄得我們遭受破獲！

一切有思想的社會民主黨人終究都覺到這種手藝主義是一種病態——這一點，凡是熟悉一些

運動情況的人都是知道的。爲要使不熟悉運動情況的讀者不以爲我們是故意「造出」運動底特殊階段或特殊病態起見，我們還是來引證上面已經提到過的見證人底話吧①。我們的引證很長，請讀者不要責備我們。

伯：夫在「工人事務報」第六期上寫道：

「如果逐漸過渡到更廣大的實際行動（這種過渡是直接由俄國工人運動現在所處的總過渡時期來決定的），是目前運動底一個特點……，那末，在俄國工人革命的總機體中，還有別的同樣有興味的一個特點。我們所說的就是：不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都能感覺到適於行動的革命力量底一般缺乏②。隨着工人運動底一般的活躍，工人羣衆底一般的發展，隨着日漸頻繁的罷工事件，隨着工人們底日加公開的羣衆鬥爭（這種鬥爭，使政府的追究、拘捕、放逐和充軍更加厲害），這種缺乏高度質量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加明顯了；而且無疑地，這不能不影響到運動底深度和一般的性質。許多罷工都沒有受到革命組織底有力的

① 這是指在本卷第一二八頁底腳註七說過的那位見證人。（編者註）

② 這一段話裏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

和直接的影響……鼓動傳單和秘密刊物感覺缺乏……工人小組內沒有鼓動員……此外，金錢也常常感到缺乏。總而言之，工人運動底增長超過了革命組織底增長和發展。現有的革命行動家人數太少，不足以把對於整個正在騷擾的工人羣衆的影響集中在自己手裏，甚至不足以使一切騷擾事件帶有幾許嚴重性和組織性的色彩……單個小組，單個革命家，沒有集合起來，沒有統一起來，沒有組成一個統一的、有力的和有紀律的、有發展得很有計劃的各分部的組織」……作者說：「暫的小組破壞以後，新的小組迅速產生，這『祇是證明運動之有生氣，而還沒有證明完全有用的革命行動家底數量已是足够了』。作者於是做了一個結論說：『彼得堡革命家底實際工作的沒有準備，在他們工作底結果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最近的審判案，尤其是自我解放社和勞資鬥爭社（註釋四〇）底審判案很清楚地表明：青年的鼓動員不詳細知道本工廠內的勞動條件因而也不知道本工廠內的鼓動條件，不知道秘密原則，祇領悟了』（領悟了麼？）『社會民主黨底一般觀點，他們進行工作祇能達四五六個月。接着就碰到拘捕的事情，這種事情，常常引起整個組織或至少是組織之一部分底破壞。如果這種團體底存在時期祇有幾個月，試問這種團體底活動能否有成就和有效果？很明顯的，現有組織底缺點，不能完全委之於過渡時期……很明顯地，現有組織底數量上的尤其是質量上的成

份在此地有很大的作用，而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底首要任務……應當是在嚴格挑選黨員的條件之下，把各組織切實統一起來。」

B · 手藝主義與經濟主義

我們現在要講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大概每個讀者已經都在設問的。我們可不可以把這種手藝主義（爲整個運動所具有的發展病態）同經濟主義（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種思潮）聯繫起來呢？我們以爲是可以的。不會做實際工作，不會辦理組織工作，這確是我們大家底通病，就是一開始就堅決抱定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也在此內。自然，誰也不能因無準備性本身，來責備實行家。但是，手藝主義這個概念，除了無準備的意思之外，還有別的意思：一般的全部革命工作底狹小範圍，不了解在這種狹小工作上，是不能形成很好的革命家底組織的，最後（這是最重要的），就是企圖袒護這種狹隘性，把牠推尊爲一種特別的「理論」，就是說，在這一方面也崇拜自發性。這種企圖既已發現，那麼，已經毫無疑義，手藝主義是與經濟主義有聯繫的，我們如不先擺脫一般的經濟主義（一般的經濟主義即是狹隘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和社會民主黨底作用以及牠的政治任務），便不能擺脫我們組織工作底狹隘性。這些企圖，發現在兩種派別上。

而。一派人說：工人羣衆自己還沒有提出那些革命家「強給」他們的這樣廣泛的鬥爭的政治任務，工人羣衆還沒有爲最急迫的政治要求而奮鬥，還應進行「反業主以及反政府的經濟鬥爭」①（甚至最無準備的青年也「力所能及」的組織，也自然適應於這種羣衆運動「力所能及」的鬥爭）。另一派人則與一切「流運派」相去甚遠，他們說：可以而且應當「完成政治革命」，但是要做到這點，完全用不到建立用堅決努力的鬥爭來教育無產階級的堅強的革命家庭組織；爲要做到這點，我們祇要抓住「力所能及」的和大家已經知道的棍子就够了。不用警喻來說；要做到這點，我們祇要實行總罷工②；或者祇要用「激動人心的恐怖手段」來激發工人運動底「萎靡」過程就够了③。這兩派人——機會主義者和「革命主義者」，他們都在佔統治地位的手藝主義面前鞠躬行禮，他們不相信擺脫他的可能，不了解我們首要的、最迫切的實際任務：建立能够保障政治鬥

① 見「工人思想報」，「工人事務報」，尤其是給普列漢諾夫的「答覆」（註譯四一）。

② 摘自「誰可完成政治革命？」這本小冊子，登載於俄國出版的論文集：「無產階級的鬥爭」。基輔委員會也重印出版。

③ 見「革命主義之復活」和「自由」雜誌。

爭底力量、穩固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

我們剛才引了伯：夫底話：『工人運動底增長超過了革命組織底增長和發展』。這一個『近觀者底有價值的報告』（『工人事務報』關於伯：夫底文章的批評），對於我們有兩種價值。他指出：我們以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目前危機底基本原因，在於指導者（『思想家』，革命家，社會民主黨人）落在羣衆自發運動之後，這是正確的。他指出：『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經濟主義的信底作者，克里却夫斯基和馬丁諾夫之所謂輕視自發成份與普通的日常鬥爭底意義的危險，所謂過程策略等等的議論，正是讚揚和擁護手藝主義。這些人不蔑視地皺起眉頭就講不出『理論家』這幾個字來，這些人崇拜對於實際工作之無準備性和不發展性，並把這種崇拜叫作『對於生活之感覺』，這些人，實際上表露出不懂得我們最迫切的實際任務。他們向落後的人們高喊：『隨着脚步走！不要超過前面去！他們向着苦於組織工作上缺乏毅力和主動性的人們，苦於缺乏廣大的勇敢的事業『計劃』的人們高喊『過程策略』！我們的基本過失，就在於把我們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降低到日常經濟鬥爭底最近的、『可以感觸到的』『具體的』利益，而人們還在繼續地向我們高喊：應該給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我再重複一遍吧：這種的所謂『對於生活之感覺』真像民歌中的一個英雄，遇見人家出喪却高喊：『你們抬之不勝其抬！』』

你們要記得，這些聰明人，用何等的真正拿爾息蘇斯式的高傲態度（註釋四二），把普列漢諾夫教訓了一頓。他們說『一般說來（是呵！），政治任務，就此名詞真正的實際意義講來，即是就爭取政治要求的妥當而有成就的實際鬥爭的意義講來，對於工人小組是力所不及的』（「工人事務報編輯部底答覆」，第二四頁）。但是先生們，有各種不同的小組呵！當然，在手藝家沒有覺悟到自己的手藝主義，沒有擺脫手藝主義以前，政治任務對於『手藝家』底小組，自然是力所不能及的。如果這些手藝家除此以外，並且還愛慕自己的手藝主義，如果他們寫到『實際』這兩個字的時候一定要加上着重點，並且以為實際性要他們把自己的任務降低到羣衆中最落後階層底了解程度，那末在這種時候，這些手藝家當然是無希望的，政治任務，對於他們自然一般地確實是力所不及的。但是對於像亞歷克舍也夫（Alexeev）梅實金（M. shkin）哈爾都林（Khalturin）和謝略波夫（Zhelevov）①這些頭領底小組，政治任務就此名詞最真正最實際的意義講來，是力所能及的，其所以如此的，正是因為他們的熱烈的宣傳，得着自發激起的羣衆底反應，因為他們的沸騰的熱情，得着革命階級之熱情底迎合和擁護，而且力所能及的程度，隨這私情形底程

①俄國七十年代的著名革命家。（校者註）

度爲高低。普列漢諾夫不僅指出了這個革命的階級，不僅證明了牠的自發覺醒之必不可免，而且還在「工人小組」面前提出了崇高而偉大的政治任務——他這樣做是萬分正確的。但是你們却想援引從那時候起發生的羣衆運動，以來降低這個任務，縮小「工人小組」活動底力量和範圍。這不是手藝家之愛好自己的手藝主義是什麼呢？你們矜誇自己的實際性，但是沒有看到俄國每個實行家所知道的事實：不僅是小組底力量，甚至於個人底力量在革命事業上能够做出何等驚奇的事業來。或者你們以爲在我們運動中不能有七十年代那樣的頭領麼？爲什麼這樣？是不是因爲我們缺少準備？可是我們現在正在準備，將來還要準備，而且定能準備起來！不錯，不幸在「反業主以及反政府的經濟鬥爭」的污水中，養成了一些黴菌，出現了這樣的一些人，這些人總是向自發性跪着祈禱，敬謹地注視着俄國無產階級底「屁股」（照普列漢諾夫底說法）①。我們是能擺脫這一種黴菌的。正是在現在，以真正革命理論爲指導的俄國革命者，依靠着真正革命的和自發覺醒的階級，終究（終究！）能够盡量伸張並發展自己全部的力量。要做到這點，祇要使那

① 這樣的說法，曾見於普列漢諾夫底論文中：他給「工人事務報編輯部的「指南」」……書所作的序言：見『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二卷十七頁。（編者註）

種想降低我們政治任務和我們組織工作範圍的企圖在實行家中斷，在更多的還在小學時代兼委實際工作的人們中間，遭受到嘲笑與輕視。先生們放心罷，我們是一定能做到這點的。

假使讀者想看看「經濟派」愛好手藝主義的顯例，自然應該離開折衷的和無定的「工人事務報」，而看看澈底的和堅決的「工人思想報」。『工人思想報附刊』第十三頁上，R.M.寫着：「關於所謂革命的智識界的問題，我們現在來講一兩句話」，不錯，革命的智識界實際上已經屢次表明自己完全打算『與沙皇制度作堅決的鬥爭』；一切的不幸，只在於為政治警察所殘酷究辦的我們的革命的智識界，以為與這種政治警察鬥爭，就是與沙皇制度作政治鬥爭。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還不明白：『從什麼地方去獲得力量來與專制政體鬥爭呢』。

自發運動崇拜者（在壞意義上講）底這一種輕視反對警察之鬥爭的高傲態度，恐怕是無可比擬的？他們說，在羣衆自發運動的條件之下，反政治警察的鬥爭，對於我們，實質上是不關重要的，他們想用這樣的說法來袒護。我們的不會應付秘密工作且對這些驚人的結論簽字同意的人是很少的，可見關於我們革命組織底缺點的問題，使大家何等的感受痛苦。但如果馬丁諾夫也不簽字同意這種結論，那末，這只是因為他不會或是沒有勇氣來澈底思索自己的觀點。實際上，由羣衆提出能給與可以感觸到的結果的具體要求，這樣的「任務」難道還要特別關心來建立鞏固的

集中的革命家底鬥爭組織麼？——難道那些完全不「與政治警察作鬥爭」的羣衆，也不是能夠執行這個「任務」麼？這還不够：難道除掉少數領袖之外，那些完全不能「與政治警察鬥爭」的工人（絕對大多數的工人）不來解決這任務的時候，這個任務還能完成麼？這樣的工人，羣衆中的中等人物，他們在罷工中，在反對警察與軍隊的巷戰中，能夠表現巨大的毅力和犧牲精神，能夠（而且祇有他們能夠）決定我們整個運動底結局，——可是，與政治警察作鬥爭，却正須要有特別的品質，須要以革命爲職業的革命家。我們不僅要關心到使羣衆「提出」具體的任務，而且要關心到使工人羣衆多多「提出」這樣的職業革命家。這樣我們就講到了職業革命家組織與純粹工人運動相互的關係問題。關於這個問題雖然寫得很少，但是在我們同多少傾心於經濟主義的同志們的談話和爭論中，我們這些「政治家」已講過很多。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特別來討論。但是開始讓我們再引一段話來結束我們對於手藝主義與經濟主義底聯繫的意見：

普羅科波維奇在自己的「答覆」上寫道：「『勞動解放』社要求與政府公開鬥爭，而事先却沒有計量這種鬥爭所需要的物質力量在什麼地方，沒有指出鬥爭底道路何在。」作者把最後一句話加上着重點之後，就對於「道路」這兩個字作了個註釋：「這件事情是不能以秘密目的來解釋的，因爲綱領中所說到的並不是密謀，而是羣衆運動。但羣衆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難道能有秘密

的罷工麼？難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秘密的請願麼？」（『指南』第五九頁）。鬥爭底物質力量（進行罷工和示威的人）以及鬥爭的『道路』，作者都直接講到了，可是作者終究還是盲無所措，因為他『崇拜』羣衆運動，就是說他把牠看作是使我們放棄我們革命積極性的東西，而不當作是應當鼓勵和督促。我們革命積極性的東西。秘密罷工，對於參加罷工的人和與罷工直接有關係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於俄國工人羣衆，這個罷工是可以始終成爲（而且大部份竟始終成爲）『秘密的』，因爲政府總是想法斷絕外界與罷工者的任何關係，總是想法使關於罷工的消息無任何傳佈的可能。於是這裏就需要專門的『反政治警察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永遠不能由像參加罷工的那樣廣大的羣衆來積極進行的。以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應當『按照一切藝術規則』來組織這種鬥爭。這種鬥爭底組織，並不因爲羣衆自發地被捲入運動底漩渦而比較不需要。恰恰相反，正是因爲這樣，這樣組織更。需要，因爲我們社會主義者，如果不能防止警察把一切罷工和一切示威弄成秘密的（而且有時我們自己也並非秘密地準備了罷工和示威），我們就不能在羣衆面前執行自己的直接責任。我們之所以能够做到這點，正是因爲自發激動起來的羣衆也將從自己隊伍中多多地提出『職業革命家』來（假使我們不想用各種方法，使工人們老是停在一箇地方的時候）

C · 工人底組織與革命家底組織

假使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政治鬥爭底概念，就等於「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個概念，那末自然可以推想到：「革命家底組織」這個概念，在他看來也多少等於「工人底組織」這個概念。而且實際上也正是這樣：我們講到組織問題時，我們真是彼此各講彼此不同的語言。現在我記起我同一位十分澈底的經濟主義者（這個人我過去不知道）的談話。當時我們講的是「誰可以完成政治革命」這本小冊子[⊖]，我們大家立刻就認為這本小冊子底基本缺點，就是忽視組織問題。我們已經以為我們彼此意見相同，但是……談話繼續下去，就看出我們是各講各的話。我的談話的對手，責備作者忽視了罷工基金儲蓄處和互助會等等，但是我講的却是為「實行」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底組織。這種分歧意見一發現後，我竟記不起在什麼一個原則問題上我會經同意這個經濟主義者！

我們分歧意見底根源到底在什麼地方呢？牠的根源正在於：無論在組織任務上或在政治任務

⊖該書底作者是列寧。（編者註）

上，經濟主義者常常離開社會民主主義而陷於工聯主義。社會民主黨底政治鬥爭，比工人們反業主及反政府的經濟鬥爭，更廣泛更複雜得多。同樣（而且因為這樣），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必然地應該與做這種鬥爭的工人底組織種類不同。工人底組織，第一應當是一個職業的組織；第二應當是一個儘可能的廣泛的組織；第三應當是一個儘可能的少祕密性的組織（自然，我在這裏和後面所講的話，祇是指在專制的俄國而言）。革命家底組織則恰恰相反，牠首先而且主要的應當包括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所以我講的正是革命家底組織，即指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家）。既然這個組織中的各份子都應具有這種共同的特徵，那末工人與智識份子間的任何區別都應該完全消除，更不用說他們彼此各種職業上的區別。這種組織必須是一個不十分廣泛而儘可能祕密的組織。我們現在就來講這三種區別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內，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間的區別非常清楚，與工聯會和社會民主黨間的區別同樣明顯。當然，後者對於前者的關係，在各種國家內，將必然地隨歷史的、法律的和別的條件之不同而發生變更——牠們的廣泛程度和複雜程度可以不等（而且在我們看來，這些關係應當盡可能地廣泛而儘可能地簡單），可是自由國家內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符合，是談不到的。但在俄國，初看起來好像專制政府的壓迫把社會民主黨組織和工會間的區別抹煞了，因為

任何的工會和任何的小組都被禁止，因為工人經濟鬥爭底主要表現和主要工具——罷工，一般的是一種刑事犯（有時甚至是政治犯！）。這樣看來，我們的條件，一方面，很可以使進行經濟鬥爭的工人『碰到』政治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可以使社會民主黨人『碰到』工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底混淆（我們的克里却夫斯基、馬丁諾夫之流時常講到第一種的『碰到』，而沒有看到第二種的『碰到』）。實際上，就拿那些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注意於『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人來說吧。其中有一部份人，在他們活動底整個時期中（四個月至六個月）⊖，一次都沒有碰到需要比較複雜的革命家組織的問題；另一部份人，他們大概『碰到』了正是比較盛行的伯因斯坦派的著作，從中得出一個以為『普通的日常鬥爭底進程』極其重要的信念；第三部份人則妙想天開，急於要拿一個『同無產階級鬥爭有密切的有機的聯繫』及職工運動和社會民主黨運動底聯繫底新榜樣，來貢獻於世界。這些人可以這樣推想：一個國家走上資本主義舞台的時期愈晚，也就是說走上工人運動舞臺的時期愈晚，則社會主義者愈能參加職工運動和贊助職工運動，則非社

⊖四個月至六個月的時期，是指『手藝家』的革命家做工作的大概時期，這些人是不被黨的組織性和秘密性所拘束的。（編者註）

會民主黨的工會，可以而且應當愈少。以上這些推論是完全正確的；可惜，他們還要往下走，妄想把社會民主主義和工聯主義完全混淆起來，例如在「聖彼得堡鬥爭社」社章上，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妄想我們的組織計劃上是怎樣有害地反映出來了！

做經濟鬥爭的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每個工人社會民主黨員應該儘量幫助這些組織，在這些組織內積極工作。這是對的。可是要求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能成爲「行業」工會會員，這完全不合我們的利益：這會縮小我們對於羣衆的影響範圍。凡是懂得必須要統一起來同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工人，讓他們都參加行業工會。如果這些行業工會不是一種廣泛的組織，那末牠們的目的是不能達到的。這些組織愈廣泛，則我們對於牠們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由於經濟鬥爭「自發的」發展，而且是由於工會內社會民主黨人對同志施行覺悟的感動而引起的）也越廣大。但是，組織裏的成份，既然很廣泛，那末，嚴格的祕密性就不可能（這種嚴格的祕密性所需要的準備，要比參加經濟鬥爭所需要的多得多）。需要廣泛的成份和需要嚴格的祕密性，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怎樣調和呢？怎樣來使行業組織盡量地少帶祕密性呢？要做到這點，一般地講來，只有兩種方法：或者使行業工會合法化（在某些國家內，行業底合法化先於社會主義團體和政治團體底合法化），或者是保持祕密組織，但是這些組織是非常「自由」而形式無定的，如德國

人所說的那樣，是「的，致使祕密性在會員羣衆看來，差不多是等於沒有。（註釋四三）

非社會主義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團體的合法化，在俄國已經開始了，而且毫無疑義的，我們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底每個步驟，都會增加和鼓勵這種合法化的企圖，——這頂企圖主要的是由擁護現制度的人創始的，但是一部分也是由工人自己和自由派智識份子創始的。合法化這個旗幟，已由瓦西立夫派（Vassiljovs）和蘇巴託夫派（Zubajovs）舉出來了，奧才洛夫派（Obozovs）和伏爾姆斯派（Worms）也已經答應贊助合法化，而且已經給以贊助了，在工人中間已有了新潮流底信徒。我們此後也不能不顧到這個思潮。怎樣來顧到——關於這點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恐怕不會有兩種意見。我們應當努力揭露蘇巴託夫派和瓦西立夫派，憲兵和教士之任何參加這派新潮流的企圖，把這些參加者真正的用意解釋給工人聽。我們同時應當揭穿任何調和的、「和諧的」腔調，這些腔調定會由自由派活動家在工人大會上的講演中表現出來，——這些腔調是否是由於真心願意階級和平合作，還是由於想巴結上司，或者只是因為自己的蠢拙——這都是一樣的。最後，我們還應警告工人，使他們不要陷入警察所常常安設的羅網中去，因為警察常在這些公開大會上和自由團體內尋找「相貌非凡的人」，想經過合法的組織把奸細引進非法的組織裏來。

但是做這一切工作，並不就是忘記這一點：歸根到底，工人運動底合法化，祇能給我們以利

益，而絕不能給蘇巴託夫派以利益。恰恰相反，我們正是要以自己的揭露工作來分清稗子和麥子

• 關於稗子我們已經說過了。所謂麥子，這就是使更廣泛的最落後的工人階層注意到社會政治問題，這就是使我們這些革命者卸脫這樣的職務——這些職務實際上是合法的（如散發合法書籍，組織互助社等等），而且牠們的發展必然會給我們不斷加多的鼓動材料。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可

以而且應當對蘇巴託夫派和奧才洛夫派說：你們努力罷！先生們，你們努力罷！假使你們想設置羅網來籠絡工人（或是公開做奸細的工作，或是以『司特魯威主義』來『誠懇地』誘惑工人），那末我們已經注意到揭穿你們。假使你們真能夠前進一步（雖然前進的形式是極『長縮曲折』的，但究竟是前進了一步），那末我們就說：請你們做吧！祇有真正地（雖然是很小地）替工人擴大活動範圍，才能真正的前進一步。而一切這樣的擴大，對我們是有利益的，而且可以加速這些合法團體底出現——在這些團體中，不是奸細搜拿社會黨人，而是社會黨人找到信徒。總而言之，現在，與稗子鬥爭是我們的事情。在空盆之內培植麥子則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把稗子摘去之後，我們也就是掃清了地皮來使麥芽大大發育起來。假使阿芳拿西·依萬里奇和普立海里·依萬諾夫

⊙ 在室內栽種花草，那我們就要準備收穫人，他們要既會刈去今天的稗子，又會收穫明天的麥子。

所以，想用合法化來解決。建立一個盡可能不秘密盡可能廣泛的工會組織的問題，我們是不可能的（假使蘇巴託夫派和奧才洛夫派，那怕給我們部份的可能來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們也會是很高興的，——爲爭得這一點，我們要盡量堅決地同他們鬥爭！）。因此祇有秘密工會組織這條路，而且我們對於已經走上（這是我們所確切知道的）這條路的工人，應當給以各方面的幫助。工會組織不僅對於經濟鬥爭底發展和鞏固，可以給與很大的利益，而且是政治鼓動和革命組織底極重要的助手。要造成這個結果，要使正在開始的職工運動走上社會民主黨所願意的軌道，首先必需明白彼得堡經濟主義者堅持差不多已及五年的那種組織計劃底荒謬性。這種計劃，載在一八九七年七月的『工人儲蓄處章程』上（『工人小報』第九至十期，第四十六頁——見『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以及一九〇〇年十月的『工人聯合會章程』上（在彼得堡印行的專號，在『火星報』第一期內曾經講過牠）。這兩個章程底主要缺點，就是詳細規劃廣泛的工人組織，把這一種組織與革命家組織混合起來。我們就拿比較完滿一些的第二個章程來看吧。這個章程共分五十二節

○阿芳拿西·依萬里奇和普立海里·依萬諾夫是果戈理底長篇小說『舊時代的地主』中的兩個主角。（編者註）

：其中二十三節是說明辦事細則，規定『工人小組』底權限，這些小組（『每組不得過十人』）設在每工廠內並選出『工廠中央團』。章程第二節上說：『中央團底任務，是留心考察本工廠內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並記錄這些事件』。『中央團每月應當向存款人報告儲蓄處底情況』（第十七節）等等。有十節專講『區的組織』，有十九節專講『工人組織委員會』和『聖彼得堡鬥爭委員會』（牠們是由各區和各『執行團』——宣傳團，國內外外交際團，貯藏團，出版團，儲蓄團——選舉出來的）的非常複雜的相互關係的。

社會民主黨等於工人經濟鬥爭底『執行團』！經濟主義者思想之從社會民主主義墮落到工聯主義，在這裏表現得最清楚不過了；社會民主黨首先應當想到革命家底組織——能够領導無產階級整個解放鬥爭的革命家底組織，——經濟主義者是多麼不了解這一點呵！口裏談『無產階級政治解放』，反對『沙皇的專橫』——筆下寫出這樣工人組織底章程來，這等於絲毫不懂社會民主黨底真正的政治任務。五十條章程中間沒有一條可以表示他們稍微懂得必需要在羣衆中作最普遍的政治鼓動，來說明俄國專制政體底各方面，來描寫俄國各社會階級底全部真相。而且在這個章程之下，不懂政治目的無從實現，就是工聯主義底目的也不能達到；因爲工聯主義底目的要求按照職業而成的組織，但這點在這個章程裏則完全沒有提起。

這個「系統」想把每個工廠同「委員會」，在三重選舉制之下，用一式的瑣屑得可笑的規則底經常綫索聯繫起來——這個「系統」底顯著的笨重性，真是再特別不過的了。為經濟主義底狹小眼界所限止的思想在此地沉溺於瑣屑條文中，這些條文，充滿着官樣文章和官場習氣的臭味。實際上，當然這些條文底四分之三永遠是不應用的；這種在每個工廠內設有中央團的「秘密」組織，倒是使憲兵易於進行極其廣泛的破獲。波蘭的同志已經經過這種運動階段——當時他們大家都傾心於廣泛地創辦工人儲蓄處，但是當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祇是給憲兵們以豐富的收獲時，他們就很快地放棄了這種思想。假使我們想有廣泛的工人組織，同時又不願意被人普遍地破獲，不願意滿足憲兵底慾望，那末我們就應當設法使這些組織完全不具固定形式。那時候這些組織不能執行職務呢？你們來看看這些職務吧！……留心考察本工廠內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並記錄這些事件』（章程第二條）。難道這一定要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不要組織特別團體來做這工作，而用秘密報紙上的通信方法來做到這點，難道不更好些麼？「領導工人鬥爭以改善他們在工廠內的狀況」（章程第三條），這也用不到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工人想提出那些要求，一個稍知事理的鼓動員只從簡單的談話中就可以確切知道，知道之後……們他就可以把這點傳達給狹小的而不是廣泛的革命家組織，以便得到相當的宣傳品。……組織工人儲蓄會……以百分之二的工資（一

個盧布繳納兩個哥比）爲會費」（章程第九條）——再則，每月應該向全體會員報告儲蓄會底情況（章程第十七條），把不繳會費的會員開除出去（章程第十條）等等。這對於警察，真是如登天堂了，因爲要洞悉這些「工廠中央儲蓄會」底一切秘密，沒收他們的經費和拘捕一切優秀份子，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了。發行價值一二個哥比的有某個（很狹小的很秘密的）組織底圖章的印花票，或者不用印花票而實行募捐，在秘密報紙上用某種暗號把募捐情形報告出來，這難道不比較好些麼？所欲達到目的完全相同，但憲兵要找尋綫索，就困難百倍了。

我本來可以把這個章程繼續分析下去，但是我想我所已講的已很够了。最可靠，最有經驗，最有鍛鍊的工人底小的而團結堅固的中堅（牠在各大區域都有自己可靠的人，牠按照嚴守秘密底一切規則同革命家組織發生聯繫），在羣衆極廣大的幫助之下，就是並不具有任何固定形式，他們也完全能够執行工會組織底一切職務，而且執行得正是如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那樣。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違反一切憲兵底意旨而達到社會民主黨的職工運動底鞏固和發展。

有人會反對我說：一個組織，這樣鬆懈，至於完全未具固定形式，甚至連明知的和登記過的會員都沒有，這就不能稱爲組織。不稱牠爲組織，這是可以的。我並不重視名稱。但是這一種「無會員的組織」，可以做我們所要做的一切，而且一開始就保證着我們將來的工會與社會主義底

堅固聯繫。誰要是想在專制政體之下，有廣泛的工人組織，採用選舉制，報告工作和全體表決制等等，誰簡直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空想家。

因此道理是很簡單的：假使我們從堅決進行革命家底強固組織來開始，那末我們就能够保障整個運動底穩固性，我們能够同時也實現社會民主黨的目標以及工聯主義的目標。假使我們從好像對於羣衆最易「達到」的（實際上只是對於憲兵最易達到的，使革命家最易被警察所達到的）廣大的工人組織來開始，那末，我們這兩個目標都不能實現，我們擺脫不了手藝主義，我們自己這種渙散性，自己這種永遠被破獲的現象，也祇能使蘇巴託夫式的奧才洛夫式的工會對於羣衆最易達到了。

這種革命家組織底職務究竟應該是那些呢？——我們現在就來詳細討論這點。在未講到這點以前，我們首先要來考察我們那個恐怖主義者底一段極標本式的議論，他這裏又與（他的命運是何等可憐呵！）一個經濟主義者做了親近的朋友。在工人雜誌『自由』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題名爲『組織』，這篇文章底作者想擁護自己所認識的，依萬諾伏·瓦士涅新斯基地方的工人經濟主義者。

他這樣寫着：

「羣衆一聲不響，沒有覺悟，運動不從下層發動起來——這是很壞的事。你們看吧，學生們離大學的城市四散回家去過節或過暑假，——工人運動也就停頓起來……。難道這種從旁推動的工人運動，能够成爲一種真正的力量麼？那裏能够呢……。牠還沒有學會用自己的脚走路，而專要人家牽着走……。一切的事情都是這樣：學生四散回家，工人運動也就停止；牛奶失去精華，立刻就變酸味；「委員會」被破獲了，在新的委員會正在建立的時期中，於是又平靜下去了；是的，正在建立的是怎樣的委員會，還不得而知，——也許完全不像過去的那樣：這個人說這樣，那個人說那樣……。過去和將來底聯繫消失着；過去的經驗不能傳給將來。這一切情形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在深處，在羣衆中沒有根基，做工作的不是幾百個傻子，而是幾十個聰明人……。幾十個人常常可以被一人一把抓住，但是如果組織能够包含大批羣衆，一切事情便都由大家來幹——無論怎樣費心費力，都不能損害我們的事業」（第六三頁）。

事實倒寫得很對。我們的手藝主義底圖畫倒還不差。可是這些結論，按其不合理性及按其政治的笨拙性講來，正像「工人思想報」上底論調一樣。這是絕頂的不合理性，因爲作者把「深處」的運動「根基」這個哲學的和社會歷史的問題，同較好地與憲兵鬥爭的技術組織問題混淆起來

了。這是政治上的絕頂笨拙性，因為作者不去抱怨壞的指導者而提出好的指導者來，反而想拒絕一般的指導者而代之以『羣衆』。這種想在組織關係上把我們拉向後退的企圖，正如在政治關係上，想用激動人心的恐怖政策代替政治鼓動的思想來拉我們後退一樣。我真是感受麻煩：『自由雜誌給我們這樣一大堆糊塗觀點，叫我從何說起呢！爲明瞭起見，我開始來舉一個例子。就拿德國人來講吧。他們的組織是包容了大批羣衆，一切事情都由羣衆來幹，工人運動已學會了用自己的腳來走路——我想，你們一定不會否認這些吧？可是這百萬羣衆是怎樣地善於重視自己的「幾十個」有鍛鍊的政治領袖，他們是怎樣堅決地擁護這些領袖呵！在國會中常常發生這種事情：就是敵黨議員這樣咒罵社會黨人：『漂亮的民主黨人！你們祇在口頭上空講工人階級運動，實際上上台說話的總是這一班頭領。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還是這個培培爾，還是這個李卜克內西。真的，你們那種好像是從工人中選舉出來的議員，比皇帝任命的官吏還難得調換些！』。這是企圖把『羣衆』與『頭領』對立起來，想激發羣衆底不良本性，想用破壞羣衆對「幾十個聰明人」之信仰的方法來奪去運動底穩固性和堅強性——而德國人對於這種造謠惑衆的企圖，只是給以冷笑而已。德國人底政治思想已很發展，政治經驗已很豐富，已能懂得：如果沒有「幾十個」有天才的（但是有天才的人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有鍛鍊的有專門準備而受過長期教育

的，彼此聲調一致的領袖，則在現代社會內，無論那個階級底堅強的鬥爭，都是沒有進行之可能的。德國人即在自己的隊伍中從前也看見過這樣造謠惑衆的人：這些人誇張「幾百個傻子」，把「傻子」捧在「幾十個聰明人」之上，誇張羣衆底「筋肉發展的拳頭」，激起他們（像莫斯特和哈雪爾曼那樣）來幹沒有考慮過的「革命」行動，散播不信任堅定的剛毅的領袖的言論。祇因爲與社會主義內部一切造謠惑衆的份子作了不斷的調和的鬥爭，德國的社會主義才這樣發展和鞏固了。可是當俄國社會民主黨一切恐慌底原因，正是因爲自發激起的羣衆還未具有充分有準備的、發展的、有經驗的指導者的時候，我們的高見者却抱着依萬奴斯克底深意而講道：「運動不從下層起來，這是很壞的事」！

『由學生組成的委員會是要不得的，牠是不穩固的——這講得完全公正，可是這裏的結論應當是：需要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委員會，不管他學生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能把自己造成爲職業革命家。但是你們做的結論却是：不要從旁邊去推動工人運動！因爲你們自己政治上幼稚，所以你們並不知道：你們這樣也就是幫助了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和我們的手藝主義。我們倒要問問你們：我們的學生「推動」我們的工人運動，到底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唯一的表現，是學生把他們所有的一些政治智識和他們學來的一些社會主義觀念底碎片（因爲現代學生底主要的知識資料

是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們除掉能給一些初步，碎片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傳給工人。在我們的運動中，像這樣的『從旁推動』並不太多，反是太少，少得不得了，因為我們會過於熱心地自恃己力，太崇拜那初步的『與業主及政府的經濟鬥爭』。像這樣的『推動』，我們這些革命職業家應當加強百倍來幹。但正因為你們用出『從旁推動』這樣惡劣的字眼來，在工人中（至少在像你們一樣落後的落後工人中）必然要引起他不信任一切。從旁給他政治智識和革命經驗的人，必然會引起他反對一切。這樣人們的本能上的慾念，——這樣你們就做了造謠惑衆的人，而造謠惑衆的人也就是工人階級底最壞的敵人。

是的，是的，請你們不要立刻叫喊起來，說我的爭辯採取了『非同志的方法』！我也不想懷疑你們用意底純潔，我已經說過：一個人僅因政治上的幼稚，也可以成爲造謠惑衆的人。但是我指明過：你們已降到了造謠惑衆的地步。我並要常常重複說：造謠惑衆的人是工人階級底最壞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他們可以激發羣衆底不良本能，因爲幼稚的工人不能認識這些敵人！——這些敵人以工人的朋友底資格出來講話，而且有時候很誠懇地這樣出來講話。其所以最壞，是因為在渙散與動搖的時期，在我們運動底面目剛形成的時期，最容易誘惑羣衆的莫過於造謠惑衆，祇有後來最苦痛的經歷，才能使羣衆覺悟到自己的錯誤。因此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目前的口

就應當是堅決的反對已到造謠惑衆地步的『自由』雜誌，反對已到造謠惑衆地步的『工人事務報』（這點以後還要詳細地講①）。

「捉拿幾十個聰明人，要比捉拿幾百個傻子容易些」。這一個很漂亮的真理（你們發現這個真理，幾百個傻子會拍手贊成你們），只因你們在推論過程中從這個問題跳到別個問題上去了，所以才好像是不成問題的。你們開始是講而且現在還繼續在講「委員會」被破獲問題，「組織」被破獲問題，但是你們現在却已跳到運動在「深處」的「根基」底破獲問題上去了。當然，我們運動之所以不可捉捕，祇是因為牠在深處有成千成萬個根基，但是問題却完全不在這裏。在「深處的根基」這一點上講，就在現在也不能「破獲」我們（雖然存在有我們的一切手藝主義）；然而我們大家都在抱怨，而且我們不能不抱怨「組織」底破獲，這種破獲，破壞運動底任何繼承性。你們既然提出組織底被破獲的問題，而且不離開這個問題，那末我告訴你們吧：捉拿幾十個聰明

①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上面我們關於「從旁推動」與「自由」雜誌對組織問題往後一切推論所說的話，完全有關於所有的經濟主義者（工人事務派也在其內），因為他們中間一部份人已積極地宣傳和擁護這一種對組織問題的觀點，另一部份人則已跑到這種觀點上面去了。

人，要比捉拿幾百個傻子困難得多。無論你們怎樣鼓動羣衆起來反對我，說我是「反對民主主義」等等，我終要擁護我這個觀點。在組織關係上的所謂「聰明人」，正如我已經屢次講過的，祇應了解爲職業革命家，這些職業革命家是從學生造就出來的，還是從工人造就出來的，都是一樣。所以我認定：（一）無論那個革命運動，如果沒有穩定的能够保存組織底繼承性的指導者底組織，是不能鞏固起來的；（二）自發地捲入鬥爭和組成運動底基礎並參加運動的羣衆愈是廣泛，則這樣的組織愈是迫切需要，這種組織應當愈爲鞏固（因爲一切造謠惑衆的人之誘惑落後份子也愈容易）；（三）這樣的組織，主要的應當由專門幹革命活動的人組成；（四）在專制國內，我們愈能縮小這種組織底會員成份，直到加入這種組織的只有以革命活動爲職業而在反對政治警察的藝術上有專門準備的人，則這種組織也愈難破獲，——（五）——則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中能够參加這個運動，能夠在運動中積極工作的人數也愈廣大。

我要我們的經濟主義者、恐怖主義者、「經濟主義者恐怖主義者」[⊖]，來駁覆這些觀點，我現在祇想把最後這兩點來講一講。捉拿「幾十個聰明人」和捉拿「幾百個傻子」的難易問題，歸給到我們上面已討論過的一個問題：在必須具有最嚴格的秘密性的條件之下，羣衆的組織是否可能。我們永遠不能使廣泛的組織極端秘密起來，但是沒有這一種秘密性，就談不到穩固的和保存

着與政府鬥爭底繼承性的組織。而把所有祕密的職能集中在數量儘量少的職業革命家手裏，這完全不是說：這些人將『代替一切人思想』，羣衆不必積極參加運動。正是相反，這些職業革命家將由羣衆不斷增多地提拔出來，因爲那時羣衆會知道：集合幾個學生和幾個幹經濟鬥爭的工人來成立『委員會』是不够的，而需要費幾年的工夫將自己造成爲職業革命家，那時羣衆『所思想的』

○這名詞也許比以前那個名詞更適用於形容『自由』雜誌，因爲在『革命主義復活』一本小冊子上所擁護的是恐怖主義，而在我們所講的這篇文章內所擁護的是經濟主義。事與心違！——這句俗話，一般地可以用來形容『自由』雜誌。極好的志向和極好的用意——結果還是糊塗不清，其所以糊塗不清，主要是因爲『自由』雜誌擁護組織的繼承性，却不願意知道革命思想與社會民主黨理論底繼承性。極力希望職業革命家復活（『革命主義復活』一本小冊子），並因此而提議：第一，採取激動人心的恐怖行動，第二『組織中等工人』（『自由』雜誌第一期第六頁和第六六頁後各頁），儘量使其不要受『從旁推動』，——實際上這真是：爲了要溫暖自己的房子，而把房子本身劈做木柴燒。

不只是手藝主義，而正是這一種造就的工作了。組織底秘密職能底集中，絕不是運動底一切職能底集中。最廣大的羣衆之積極參加秘密文字工作，並不因爲『幾十個』職業革命家集中這事底秘密職能，就會減少下去，倒會因此而十倍地加強起來。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使閱讀秘密刊物，參加秘密刊物底工作，局部地甚至散發秘密刊物，差不多不成爲一種秘密的事情因爲那時候警察就會懂得：對刊行到幾千幾萬份的刊物中的每一份，使用司法上和行政上的麻煩手續，是很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事。這不僅刊物如此，就是各種運動底職能，直到示威爲止，也莫不如此。羣衆最積極最廣泛地參加運動，這不僅不因『幾十個』有銀鍊的（其所受專門訓練並不少於俄國的警察）革命家集中各種秘密事情（準備傳單，規定大綱，指定指導隊來指導各城區，各工廠，各學校等等），會受到損失，反之，這樣一來倒可以得到許多的利益（我知道有人要反對我，說我的觀點『不合民主性』，可是我在下面要詳細來答覆這個極不聰明的反駁）。革命家底組織把最秘密的職能集中起來，這並不會削弱，而只會充實大批其他的組織底活動範圍與內容，這些組織是打算包容廣大的羣衆的，所以是盡可能少具形式的，並且是盡可能少帶秘密性的：如工人職工會，工人自修的小組和閱讀秘密書報的小組，社會主義的小組以及其他一切人民階中層的民主主義的小組等等。這樣小組、工會和團體，必需要在各地極普遍地組織起來，而且要使牠

具有各種各樣的職能，但是如果把這些組織同革命家底組織混淆起來，把牠們中間的界線擦去，把羣衆對於下面這件事情的本來已經模糊的意識，消滅下去，這是很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這件事情就是：要『幫助』羣衆運動，須要有一些專門做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人，這樣的人應當很有耐性地不屈不撓地把自己鍛鍊成爲職業革命家。

真的，這種意識的確已經模糊不堪了。我們在組織關係上的基本過失，就在於我們由於我們的手藝主義而失落了俄國革命家底名望。理論問題上動搖無定，眼界狹小，藉口羣衆底自發性來辯護自己的萎靡性，多像工聯會書記而少像人民代表，不會提出廣泛而勇敢的計劃來使敵人也生敬仰之心，對於自己的專門技能（與政治警察鬥爭）沒有經驗，沒有敏捷手腕，——對不起！這樣的人決不是革命家，而只是一種可憐的手藝人。

請每個實行家都不要見怪我這種苛刻的詞句，因爲這裏所講的是沒有準備的問題，而這一點首先就是對我自己講的。我曾經在一個小組內做過工作，這個小組給自己提出了極廣泛而包羅盡致的任務，我們大家——這個小組中的組員——都感覺到：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此時我們正是可以把著名的格言稍微修改一下而說道：給我們以革命家的組織，——我們就會把俄國翻轉過來

①，在這種時候，我們却做了手藝人；我們一想到這裏，就覺得傷心痛苦。從那時候起，我愈是

常常想到我當時所受的那種灼膚的羞恥感覺，我就愈是熱烈地反對這些假社會民主黨人，他們以自己的宣傳來污辱革命家底名聲，他們不懂得我們的任務不在擁護降低革命家爲手藝人，而在提高手藝人爲革命家。

D · 組織工作底規模

我們從伯……夫那裏已經聽見這樣的話：『不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都能感覺到適於行動的革命力量底不夠』^①關於這件事實大概是沒有人來爭論的。可是問題就在怎樣來解釋這件事實？

伯……夫寫着：

『我們不來說明這種現象底歷史原因；我們只講一講：被長期的政治反動所敗壞，被已完成和正在完成的經濟變化所分離的社會，從自己的隊伍中所提拔出的適於幹革命工作的人』

①著名數學家亞幾默德底格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把全世界翻轉過來』。（編者註）

②見本卷一六一頁。（編者註）

數，極其寡少；工人階級提拔着一些工人革命家，牠局部地充實着秘密組織的隊伍；但這樣的革命家底數量還不能滿足時代底需要。何況在工廠內作工十一點半鐘的工人，按其地位多半祇能履行鼓動家底職能；至於宣傳和組織，輸送與翻印秘密書籍，發印宣言傳單等等，其重擔不得不落在極少數的智識份子身上」（『工人事務報』第六期第三八至三九頁）。

我們在許多地方不能同意伯……夫底意見，尤其是不能同意被我們加上了着重點的這些話！

——這些話特別透澈地指明：伯……夫雖因我們的手藝制而煩惱（正如一切有些頭腦的實行家一樣），但因受了經濟主義之束縛，他終究不能找得出路來解脫這種不堪忍受的情況。不，社會提拔出極多的能够「幹事」的人，但是我們却不會全部利用他們。在這一點上，我們運動底緊要的過渡狀態，可以用下面這幾個字來表示：沒有人和人很多。人很多，是因為工人階級和漸趨複雜的各社會階層，一年一年地提拔出不斷加多的心懷不滿的、願意反抗的、決意盡力幫助反專制政體的鬥爭的人們，專制政體底不堪忍受，雖還沒有被一切人所意識到，但已為日益廣大的羣衆所日益厲害地感覺到。可是同時又沒有人，因為沒有領導者，沒有政治領袖，沒有組織上的能幹人，以進行廣泛的同時又是統一的有條理的工作，來利用每種力量（甚至是極小的力量）。「革命組織底增長和發展」，不僅落在工人運動底增長之後，（這點伯……夫也是承認的），而且還落在

人民各階層一般民主運動底增長之後（現在大概伯……夫也會承認這是他的結論底補充）。革命工作底規模，與運動底廣大的自發的基礎比較起來，太狹隘了，所受「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種可憐理論底束縛，太厲害了。但在現在，不僅政治鼓動員，而且社會民主黨人組織員，都應該「到人民各階級中去」○。幾乎沒有一個實行家敢懷疑這點：社會民主黨人本來能够在各階級單個代表之間分配其組織工作上千百種零星職能。缺少專門化——這是我們技術上最大的缺點之一，伯……夫很悲痛地很公道地抱怨這一點。整個事情底單個「動作」愈瑣細，則能够履行這些動作的人（這些人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完全不能成爲職業革命家），愈易尋找，則警察之「捕獲」這一切「零星工作人員」愈感困難，則警察愈難根據某個被捕者根據某種瑣事而構成「案件」，以抵償國庫花費在「偵防局」上的費用。至於講到願意幫助我們的人底數量，那我們已經在上章指出過：五年來在這一方面已起了很大的變更。但是另一方面，爲要使這一切零星工作能够聯貫起

○例如在軍界中，最近以來也可看到民主精神底無變的活躍，這一部分是由於日益增多的反對工人和學生這些「敵人」的巷戰而引起的。祇要實力允許我們的話，我們一定要極嚴重地注意兵士和軍官中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及建立加入我們黨的「軍事組織」。

來，爲要使運動本身不因運動職能底劃分而分散，爲要激發執行小工作的人們對於自己工作底必要性和意義的一種信心（如無此種信心，他就永遠不能工作）——爲要做到這些，就必需要有鍛鍊的革命家庭堅固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下，這個組織愈秘密，則對黨底力量的信心，也愈加鞏固，愈加廣佈，——大家知道，在戰爭時，最重要的就是不僅要使自己的軍隊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且要使敵人和一切中立份子相信我們的力量；友誼的中立有時可以解決大局。在具有這樣一種站在穩固的理論基礎上且擁有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的組織的情形之下，用不到懼怕許多捲入運動中的「局外」人引導運動走上不正確的道路（恰恰相反，正是現在，在手藝主義盛行一時的時侯，

○我記得有一個同志轉告我：一個願意幫助而且幫助過社會民主黨的工廠檢查員，怎樣很悲傷地申訴：他不知道真正的革命中心是否收到了他的「報告」，是否需要他的幫助，是否有可能利用他的小小的幫忙。每個實際行動家都知道：我們的手藝主義剝奪了我們的同盟者的這種情形是常有的。而且這一些集少成多的幫忙，不僅工廠底職員和官吏可以給予我們，而且郵電方面的、鐵路方面的、關稅方面的、貴族方面的、僧侶方面的以及其他任何的職員和官吏，直到警署方面的和宮庭方面的職員和官吏爲止，都可以給予我們！假使我們已經有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趨向「信仰」底道路，只是自命爲社會民主黨人。總而言之，專門化必需以集中化爲前提，同時又無條件地需要集中化。

可是，伯……夫自己雖是對於專門化底全部必要性寫得這樣漂亮，但是據我們的意見，他在上述的推論底第二部份內就沒有充分地估計牠。他說工人革命家底人數不足。這是非常公道的，而且我們還要特別鄭重地指出：「近觀者底有價值的報告」，完全證實了我們對於社會民主黨目前危機底原因以及消滅這種危機的方法的觀點。不僅革命者一般地落在羣衆自發高漲之後，而且甚至工人的革命者也落在工人羣衆自發高漲之後。這一件事實不但明顯地證實了（甚至從「實際

了真正的黨，真正鬥爭的革命家組織，那我們就不會這樣直捷了當地對付這樣的「輔助者」，就不會這樣着急於時時和絕對吸引他們到「秘密組織」底中心中來，恰恰相反，那時我們就要特別地來防避他們，而且甚至會特地準備一批人來担任這樣的職能，因爲我們認爲：很多的學生以「輔助者」官吏底資格所給予黨的利益，要比他們以「短期的」革命家底資格所給予的多些。但是，我再重複說一遍——祇有業已十分鞏固，並不感覺缺乏積極力量的組織，才可以應用這個策略。

方面的「觀點上說來」這種「教授工作」底荒謬性，而且還證實了他的政治反動性——在討論到我們對工人的義務這個問題時，人們總是拿這種教授工作來款待我們。這一事實證明：我們最首要最迫切的義務，是幫助造就工人革命家——在黨的活動方面，其水平線與智識份子革命家相同的工人革命家（我們所以要着重黨的活動方面這幾個字，是因為在別的方面，要工人達到同樣的水平線，雖然也很必要，但是遠不這樣容易、這樣迫切）。因此主要的注意力，應當用到人提高到革命家的程度，而絕不應當用到自己定要降低到「工人羣衆」的程度（如經濟主義者所想的），把革命家定要降低到「中等工人」的程度（如「自由」雜誌所想的——在這一點上「自由」雜誌已墮到了經濟主義「教授工作」底第二級）。我並不想否認替工人編製通俗書籍底必要——尤其是替特別落後的工人編製特別通俗的書籍（自然，祇不應該是庸俗的書籍）底必要。但使我憤懣的，就是常常把教授法問題牽聯到政治問題與組織問題。你們這些關心「中等工人」的先生們，你們在未講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組織以前，你們預先就想一定要把腰兒躬起來，這實際上倒是侮辱工人了。你們把腰兒直起來講正經的東西吧，你們把教授工作交給教書先生，而不要交給政治家 and 組織家吧！難道在智識階層中間，就沒有先進者，「中等者」和「羣衆」麼？難道大家不是認爲對於智識界也需要這種書籍嗎？難道這種書籍不是正在寫着麼？你們祇要自己想一想：一

個作者寫了一篇關於組織學生的文章，在文章中彷彿作了一個新發明，鼓起氣力地說：需要組織「中等學生」。像這樣的作者一定會被人嬉笑，——而且是應當的。人們會告訴他：假如你有組織觀念就請你給我們組織觀念，至於我們中間誰是「中等人」，誰是中上，誰是中下，我們自己以後再來考究清楚。假使你沒有自己的組織觀念，那末你關於「羣衆」和「中等人」的議論，簡直是枯燥無味的話。你要懂得：「政治」，「組織」這些問題的本身已這樣嚴重，關於這些問題已不能不以非常嚴重的態度來講了：能够而且應當準備工人（及大學生和中學生），以便能够同他們開始談這些問題，但你既然談到了這些問題，那你就應當拿出真正的回答來，你不應退後，退到「中等人」或退到「羣衆」中去，你不應以花言巧語來敷衍塞責①。

爲要對自己的事業有完全的準備，工人革命家也應成爲職業革命家。因此伯……夫說：既然工人在工廠中要做十一點半鐘工，所以其餘的革命職能（除鼓動之外），「其主要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極少數的智識份子身上」——這是不正確的。我們這樣做，完全不是由於「不得不」，而是由於我們的落後，因爲我們沒有明瞭：我們的義務是幫助一切才能特出的工人變爲專門的鼓動者、組織者、宣傳者、交通者等等。在這一方面，我們簡直是很羞恥地濫費着自己的力量，我們不會愛惜那種特別應當加以培養的東西。你們看看德國人吧：他們的力量要比我們大一百倍，但是

他們知道的很好：由「中等人」中提拔出真正能幹的鼓動員等等，並不是常有的事。所以他們立刻努力使每個能幹的工人所處的條件，能够充分發展和充份應用他的才能：使他成爲專門鼓動員，激勵他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從一工廠擴大到整個行業，從一地擴大到全國。他在自己的職業中，獲得經驗和敏捷的手腕，他擴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識，他親近地看到別地和別黨底著名的政治領袖，他努力將自己也提到同樣的高度，他擁有工人羣衆底知識，社會主義的新信仰和一種專門的技能，沒有這種技能，則無產階級即不能同他訓練有素的敵人隊伍作堅強的鬥爭。

○「自由」雜誌第一期上論「組織」的那篇論文第六頁上說：「工人羣衆，用他們的困苦艱難的脚步，來鞏固我國勞動界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勞動界這三個字，個個都用大號字寫成的！該論文底作者又高喊道：「我並不是仇視智識份子呀，但是……」（這一個「但是」，正是當謝德林說「耳朵不會生長在額角以上」這句話時所用的「但是」一樣的！）……「但是當一個人跑來講一些很漂亮的和美妙的東西而要求別人因其（他的？）漂亮和其他的美質而加以接受的時候，我看見這種人就往往異常生氣」（第六二頁）。是的，當我看見這樣的人，我也「往往異常生氣」……

增培爾和阿宛爾（Auer），就是這樣（而且也只有這樣）從工人羣衆中提拔出來的。不過在政治上自由的國家內，在很大的程度內是自然而然地做得到的，而在我們俄國，却應由我們的各組織來有系統地進行。有些天才的『有希望的』工人鼓動員，不應當在工廠內做十一點鐘的工。我們應當設法使他靠黨底經費維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時過渡到祕密狀態，使他能够調換自己的活動地點，因為不是這樣，他就不能獲得很大的經驗，不能擴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够至少與憲兵作幾年的鬥爭。工人羣衆自發高潮愈深愈廣，則不僅是天才的鼓動者，而且是天才的組織者宣傳者和『實行家』（好的意義上的實行家——這些人在我們智識階層中間是這樣稀少，他們大部份都帶着一些俄國式的怠慢性和板滯性）也由他們提拔得愈多。在我們一經具有經過特別準備經過長期訓練的工人革命家（當然是『各種職務的』革命家）之隊伍的時候，那麼世界上任何的政治警察都不能勝過這些隊伍，因為這些絕對忠於革命的隊伍，也能得到最廣大的工人羣衆底最高信仰。可是我們太少把工人『推動』到他們與『智識份子』所共有的革命的專門技術的道路上去，我們太時常用自己的愚蠢言論，專講工人羣衆，『中等工人』所能『了解』的東西，將他們往後拉，——這是我們的直接的罪過。

在這些方面同別些方面一樣，組織工作底狹小範圍，與我們的理論及我們的政治任務底縮小

，有無疑的不可分離的聯繫（雖然極大多數『經濟主義者』和開始作事的實行家還沒有感覺到這種聯繫）。一心崇拜自發性，因而寸步不敢離開羣衆所能『了解的』東西，生怕把自己提得太高以致於不能簡單地效勞於羣衆最切身的直接的要求。先生們，你們不要害怕吧！你們要記着：在組織關係上我們所站的地位是這樣低下，甚至於連以爲我們能够把自己提得太高的念頭，都是荒謬的！

E · 「密謀」組織與「民主主義」

而在我們中間還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對『生活要求』這樣機警，以至於他們所最怕的正是這點，他們罵堅持這裏所講的這種觀點的人爲『民意主義』，爲不懂『民主主義』和其他等等。我們現在就來講這些罪名吧（當然，『工人事務報』也是咬定這些罪名的）。

本書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經濟主義者會罵過『工人報』爲民意主義（假使把『工人報』與『工人思想報』比較一下，這也是很明顯的事）。因此，在『火星報』一成立以後，馬上就有一個同志告訴我們，說X城底社會民主黨人稱『火星報』爲『民意派的』機關報，——這對於我們是毫不奇怪的。當然，在我們看來，這種罪名我們倒樂於容受，因爲有哪一個正經的社會

民主黨人不被經濟派罵爲民意派呢？

這一些罪名，是由兩種誤解引起的。第一，有些人太不懂得革命運動底歷史，凡是主張建立鬥爭的、集中的、與沙皇制度宣佈堅決鬥爭的組織的意見，他們就稱之爲『民意主義』。可是七十年代革命家所有的而我們大家應當奉爲模範的那種很好的組織，完全不是由民意派所建立的，而是由分成土地平分派和民意派的那個土地自由派所建立的。因此，把鬥爭的革命組織看作是一種民意派所特有的東西，這在歷史上邏輯上都是荒謬絕倫的，因爲一切的革命派別，只要牠真想做嚴格的鬥爭的話，沒有這樣的組織是不行的。民意派極力想把一切心懷不滿的份子吸收到自己的組織中來，引導這個組織來與專制制度作堅決鬥爭，這並不是民意派底錯誤，這反而是他們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民意派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所依靠的理論，實質上完全不是革命的理論，他們不會或是不能把自己的運動與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密切地聯絡起來。祇有毫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或者是根據『司特魯威主義』精神來『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認爲：羣衆的、自發的、工人運動底發生，就卸脫我們的下面這個責任：建立土地自由派人那樣好的組織——建立更好得不可比較的革命家組織。反之，這種運動，正是將這個責任放在我們身上，因爲無產階級底自發鬥爭，當牠還不是由強固的革命家組織來領導的時候，是不能成爲無

產階級底真正的「階級鬥爭」的。

第二，有許多人——克里却夫斯基大概也在其內（「工人事務報」第十期第十八頁），不正確地解社會民主黨人會常常進行的反對「密謀」派對於政治鬥爭的觀點的那種論戰。當然，我們始終是要起來反對將政治鬥爭縮小。密謀的企圖^①，自然這絕不是否認堅固的革命組織底必要。例如在腳註中所指出的這本小冊子上，除掉反對將政治鬥爭弄成密謀的企圖之外，還設想（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理想）一個這樣堅固的組織：「爲要給專制政體以嚴重打擊」，牠可以進行「暴動」和一切「別的進攻方法」^②。在專制國內，這樣一種堅固的革命組織，按其形式可以稱爲「密謀的」組織，因爲法文中「Conspiration」（秘密）這個字與俄文中「Zagovor」（密謀）這個字，其意義是相等的，而秘密性對於這樣的組織是極其必需的。秘密性是這種組織底非常需要的條件；其他一切條件（黨員底數量，黨員底選擇，職務等等）都要與牠相適應。他們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想建立密謀組織——我們如果害怕這種罪名，那真是幼稚之至了。這種罪名，對於每個

①請參看本版「列寧選集第二卷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與拉福羅夫的論戰」。（編者

註）

經濟主義者底敵人，正如「民意派」這種罪名一樣，是很可以接受的。

有人會這樣反駁我們：這一種强有力的嚴守秘密的組織，將一切秘密活動底線索都集中在自己手內的組織，必需實行集中制的組織，可以過於容易起來作時機未至的進攻，可以在政治不滿情緒底增長，工人階級中騷擾和憤恨底發展還沒有使此可能和必要的時候，就輕浮地把運動加緊起來。我們對於這一點是這樣答覆：抽象地說來，當然不能否認，鬥爭組織可以做出事前未加思索的鬥爭來，這種鬥爭可以遭受在另種條件之下不必遭受的失敗。但是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只限

①「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這裏我們還要舉一個例子來證明：「工人事務報」或是不懂得他自己所講的話，或是「隨風飄蕩地」改變自己的觀點。在「工人事務報」第一期上，有下面一段加着重點的話：『小冊子內所闡述的實質與「工人事務報」底編輯部的綱領完全相符合』（一四二頁）。真的嗎？說工人運動底第一個任務不能是推翻專制政體，這樣的觀點，「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這種理論和階段論，——所有這些，都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相符合嗎？請讀者判斷一下：像這樣奇特了解「符合」這兩個字的機關報，能不能說他有原則上的固定性呢？

於抽象的設想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的戰鬥都含有引起失敗的抽象可能性，除掉有組織地準備戰鬥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減少。這一種可能性。假使我們根據現代俄國具體條件來提出這個問題，那我們可以做出一個肯定的結論：正是爲要使運動能够穩固，預防牠不要去作事前未加思索的進攻，所以堅固的革命組織是無條件地必要的。正是在現在，在沒有這種組織的條件之下，在革命運動迅速的自發增長的條件之下，我們已可看到兩個相反的極端（這兩個極端理應「匯合起來」）：一個是荒謬的經濟主義和穩健主義的宣傳，另一個是同樣荒謬的「醒世的恐怖」——想在「正在發展着鞏固着的還近於開始而不近於結束的運動中，用人工來引起運動結束底徵兆」（查蘇利奇底文章，「曙光」雜誌第二三期合刊第三五三頁）。「工人事務報」底例子指明：現在已經有了在兩個極端面前拜倒的社會民主黨人。這樣的現象是毫不奇怪的。牠之所以毫不奇怪，除掉其他原因之外，還因「與業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永遠不能滿足革命家底要求，而兩個相反的極端是會時在此地時在彼地發生的。祇有集中的戰鬥的組織——堅定地實施社會民主黨政策和滿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組織，才能預防運動不致作事前未加思索的進攻和準備能有成效的進攻。

其次，有人還會這樣反駁我們：上述的對於組織的觀點，與「民主主義的原則」相抵觸。如

果前面那個罪名是特別地出自俄國的，那末這一個罪名，却具有特別的國外性質。祇有國外的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才能在其他的指示中，還給自己的編輯部以下述的指示：

「組織原則。爲順利發展和統一社會民主黨起見，務必鄭重注意，發展和爭取社會民主黨部底廣泛的民主原則，因爲在我們黨內發現了反民主的傾向，所以這一點特別必要」。（見「兩個代表大會」，第十八頁）。

「工人事務報」怎樣與「火星報」底「反民主傾向」鬥爭，這我們在下章中可以看到。現在我們仔細地看看經濟主義者所提出的這個「原則」吧。大極誰都同意：「廣泛的民主原則」，其本身含有下面兩個必要的條件：第一，完全的公佈性；第二，選舉一切職位。沒有這種公佈性（而且這種公佈性還不限於黨員）而談民主主義，這是很滑稽的。我們稱德國社會民主黨爲民主的組織，因爲在德國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連黨的代表大會都是公開的；但是一個組織對一切非組織以內的人保守秘密，便誰也不會稱牠爲民主的組織。試問：當秘密組織不能執行這種「廣泛民主原則」底基本條件的時候，提出這種原則，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廣泛的原則」，講起來很響亮，可是牠祇是一句空話而已。這還不够。這一種空話還證明他們完全不了解目前組織方面的迫切任務。大家都知道：我們俄國革命者底「廣大」羣衆中間所盛行的不秘密性有多麼大。我們已

看見過：伯……夫怎樣悲痛地抱怨這點，他完全公道地要求「嚴格選擇黨員」（「工人事務報」第六期第四二頁）。那裏知道這裏竟有這樣的人：他們以自己「對於生活的感覺靈敏」自誇，而在這樣的局面之下，他們所特別指出的，原來不是最嚴格保守秘密和最嚴格（因之比較狹隘地）選擇黨員之必要，而是「廣泛的民主原則」！這就叫做文不對題！

至於民主主義第二個標誌——選舉制，其情形也並不勝於前者。在政治自由的國家內，這一個條件是顯而易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章程底第一條這樣寫着：「凡承認黨綱底原則而盡力幫助黨者，皆得爲本黨黨員」。因爲整個政治舞台都公開擺在大家面前，正如戲台搭在看客面前一樣，所以承認不承認黨綱，幫助黨還是反對黨，大家都可以從報紙上從國民大會上看得出來。大家都知道：某一個政治人物，開始做過什麼工作，後來受過什麼經歷，他在困難時候表現得怎樣，他的一般的特點是什麼——因此，全體黨員自然可以很熟悉地選舉或不選舉他來擔任黨底某種職位。對於黨員在政治舞台上的一舉一動作普遍的（真正是普遍的）監督，可以造成一副自動機器，這個機器能發生生物學上的所謂「適者生存」的作用。完全公佈性，選舉制和普遍監督底「自然淘汰」，可以保障每個活動人物，結果「各得其所」，各人擔負適應自己才力的事情，親身經受自己錯誤底一切影響，並在大家面前證明自己能够了解錯誤和避免錯誤。

請你們把這一種情形應用到我們的專制國內來吧！『凡是承認黨綱底原則而盡力幫助黨者，』大家都來監督革命家秘密工作者底一舉一動——這種情形在俄國是否可能呢？當革命家爲工作起見，必須使這些『大家』底百分之九十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的時候，而要大家來選舉某一個革命家秘密工作者——這在俄國是否可能呢？你們只要想一想『工人事務報』所發表的這些響亮話底真切意義，你們就可以看到：在專制制度底黑暗局面下，在憲兵佈置的暗探行動佔統治的情形下，黨的組織底『廣泛民主主義』，祇是一種空洞而有害的兒戲。其所以是空洞的兒戲，因爲任何的革命組織，實際上從來沒有，而且甚至它自己極其希望，它也不能採用廣泛民主主義。其所以是有害的兒戲，因爲實現『廣泛民主主義原則』的企圖，祇能幫助警察普遍地破獲組織，永遠保持現時盛行的手藝主義，轉移實行家底思想，使其放棄鍛鍊自己成爲職業革命家這種嚴重迫切的任務，而來擬就關於選舉制度的詳細的『紙上』章程。這種『民主主義的兒戲』，祇有在外國（此地常常集合着一些沒有可能找得正經有生氣的事體來幹的人們），才能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各種小團體內，發展起來。

『工人事務報』專門喜歡提出這樣醜陋的原則——革命事業中的民主主義；爲要證明它的醜陋，我們還要來引一個見證人。這個見證人就是雪立普略可夫（Saryalov）——倫敦『前夜』

雜誌底編者。他極寬待「工人事務報」而極仇恨普列漢諾夫和「普列漢諾夫派」。「前夜」雜誌在談到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分裂的文章內很堅決地站在「工人事務報」方面，用各種無聊話來攻擊普列漢諾夫。在這一問題上，這一個見證人對於我們更有價值。在「前夜」雜誌第七期上（一八九九年七月）「論工人自我解放社底宣言」這篇文章中，雪立普略可夫曾指出：把「在嚴重的革命運動中的妄自尊大，領袖思想以及所謂元老院的問題」提出來，這是「不雅觀的」；同時他曾寫道：

「梅實金，洛加却夫（Лосацкий），謝略波夫，米哈伊洛夫，貝洛夫斯加雅（Берофская），斐格奈爾（Фигнер）和其他的人，他們從來不自稱為領袖，而且誰也沒有選舉過和委任過他們——雖然實際上他們就是領袖，因為無論在宣傳時期或在與政府鬥爭時期，他們都担負了最勞苦的工作，他們都走到了最危險的地方，而且牠們的活動也最有成效。領袖地位，並不是他們的希望底結果，而是由於四圍同志對於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毅力和忠心有信仰。害怕什麼元老院（如果不害怕，為什麼要寫出這點來），以為他可以獨斷獨行地指揮運動，那太幼稚了。到底誰會聽他呢？」

我們要問讀者：「元老院」與「反民主傾向」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工人事務報」底「漂

亮的一組織原則同樣是又幼稚又不雅觀，——牠之所以幼稚，是因為『元老院』或帶有『反民主傾向』的人物，假使四周圍的同志不對『他們的智慧，毅力和忠心有信仰』，便簡直誰也不會聽從他們了。它之所以不雅觀，是因為它是一種造謠惑衆的攻擊，利用一部份人底驕傲態度，第二部份人之不了解我們運動底實況，第三部份人之無準備與不明瞭革命運動歷史——利用這些東西來投機。對於我們運動底活動人物，唯一鄭重的組織原則應當是：嚴守祕密，嚴收黨員，造就職業革命家。如果這些條件都具備了，那末也就保障了較勝於民主主義的東西：革命者間的完滿的同志信任。而這一點對於我們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要以民主的普遍的監督來代替這一點，在我們俄國還談不到。如果有人以為真正『民主的』監督之不可能，可使革命黨底黨員成爲不受監督的人，那是一個大錯誤：他們沒有餘暇想到民主主義（在由享有完滿的相互信任的同志所組成的中堅幹部中的民主主義）底兒戲的形式，但是他們非常親切地感覺自己的責任，同時他們從經驗中知道：真正革命家底組織爲要剷除其中無用的黨員，是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的。而且我們有俄國的（以及國際的）革命界底非常發展的，有其全部歷史的輿論，這種輿論無情地懲罰一切放棄同志關係底義務的現象（而真正的不是兒戲的民主主義，就正是同志關係這個總概念中的一部份！），如果你們注意到了這些東西，那你們就可以懂得：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底這些關於『反民主傾向

」的論調和決議是發出何等鬧領袖把戲的臭氣！

這裏還須指出：這樣的論調底另一種來源，幼稚性，還由於關於什麼是民主制這一觀念的模糊。在韋伯夫討論英國工聯會的書上，有很新奇的一章：『原始的民主制』①。作者在那裏指出，英國的工人，在其工會存在底第一時期，會認為民主制底必要的特徵就是要在工會管理方面，大家來共同料理一切；不僅一切問題應由全體來表決，而且工會職位也應由全體會員輪流担任。只有經過長期歷史底經驗以後，工人才懂得這樣的民主制底觀念是荒謬的，而組織代表機關和設置負責的人員是必要的。只有當工會底財庫發生幾次財政破產以後，工人才懂得：所繳會費和所得津貼之間的比例，不能單由民主表決來解決，同時還要取決於保險事業專門家。你們讀一讀考茨基『論代議制度與國民立法』這本書，你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者理論家底結論，是與『自發』聯合的工人底多年的實際行動底教訓相符合的。考茨基堅決地起來反對里亭豪生（Rittmanson）關於民主制的原始觀念；他嘲笑那些爲要擁護民主制而要求『國民直接編輯國

①參看韋伯夫婦著：『英國工聯主義底理論與實際』一書第一卷第一章，第一頁——二九

頁。（編者註）

民報紙』的人們；他證明專門的記者和專門的國會議員等對於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無產階級鬥爭之必要；他攻擊『無政府派和著作家底社會主義』，這些人爲着『急求效應』而譁揚直接的國民立法，並不懂得它在現社會中的可應用性是極有條件的。

誰要是在我們運動中實際做過工作的，誰就知道，對於民主制的『原始的』觀念，在青年學生和工人羣衆中間是多麼廣泛地流行。這種觀念之浸入章程和作品，是毫不奇怪的。伯因斯坦派的經濟主義者，在自己的章程上寫着：『第十條：凡與整個工會組織底利害有關係的一切事宜，由全體會員底大多數表決』。恐怖主義派的經濟主義者也重複地這樣說：『委員會的決議必需經過各小組，並只有那時候才算得是真正的決議』（『自由』雜誌第一期第六七頁）。請你們注意，這種廣泛應用全體表決制的要求，還是除提出根據選舉原則來建立整個組織的要求以外提出的哩！當然，我們並不想因此而責備實行家，因爲他們太少可能來明瞭真正民主組織底理論和實際。但是自命應負領導作用的『工人事務報』，在這種條件之下而僅限於關於廣泛民主原則的決議，那末，如何能够不稱這一點爲簡單的『急求效應』呢？

F·地方工作和全國工作

反對這裏所提出的組織計劃，說它是非民主主義和帶有密謀性，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現在還有一個爲人家常常提出而值得詳細考究的一個問題。這就是地方工作與全國工作的相互關係問題。有些人這樣害怕：建立集中制的組織不會使重心從地方工作移到全國工作去嗎？這樣做法不會削弱我們與工人羣衆的聯繫底堅固性和一般的地方鼓動工作底穩固性，豈不會損害運動嗎？我們對於這一點的答覆是：近年來我們的運動，恰恰因爲地方工作人員太拘於地方工作而吃虧；因此將重心稍稍移到全國工作上去，這是絕對必要的；這種移動，不會減弱，而會加強我們聯繫底堅固性和我們地方鼓動工作底穩固性。我們就拿中央的和地方的機關報這個問題來說吧。我們要求讀者不要忘記：我們不過把辦報的事業作個例子，用以形容更廣泛得和複雜得不可度量的一般革命事業而已。

在羣衆運動第一個時期（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地方活動人物會想建立全俄的機關報——『工人報』；在下一個時期（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運動有了一大進步，但指導者底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到地方機關報上去了。假使把一切地方機關報都合計起來，那末，平均每月只有一

期①。難道這不是我們的手藝主義底明白表現麼？難道這不是明白地指明我們的革命組織落後於運動底自發高潮麼？假使同樣數量的報紙，不是由散漫的各地方團體來出版，而由統一的組織來出版，那末我們不僅能夠節省大批的人力，而且還無可測度地保障我們工作底偉大的穩固性和繼承性。這一種簡單的道理，無論那些差不多專門在地方機關報上積極工作的實行家（很可惜的，在最大多數情形之下，現在的情形，仍是如此），無論那些在這個問題上表示驚人的吉訶德先生的癡想（註釋四五）的政論家，都太時常沒有看到了。實行家通常僅以這一種道理來自慰：地方工作人員要辦全國的報紙是很『困難』的②，地方報紙比沒有報紙總要好些。後一種說法當然是很公平，我們之一般地承認地方報紙有很大的意義和很大的益處，並不遜於任何的實行家。但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我們是否可以擺脫在兩年半中全俄三十期地方報上表現得很明顯的那

①『向巴黎國際大會的報告』（註釋四四）。第一四頁：『從那時候（一八九七年）到一九〇〇年春，各地出版了三十期不同的報紙……平均每月在一期以上』。

②這種困難祇是表面上的。實際上沒有一個地方小組不能積極担負全國事業底某種職責的。『請你不要說：我不能；祇說：我不願意』。

種渙散性和手藝主義？請你們不要只講這一種無容爭論的，但又太籠統的議論，說地方報紙一般地是有益處的，你們也應當有勇氣公開承認兩年半底經驗所指示出來的地方報紙底壞處。這一種經驗證明：在現時的條件之下，地方報紙大多數都是在原則上不堅定的，在政治上是沒有意義的，在耗費革命力量上講是非常不經濟的，在技術方面講，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我這裏所說的，自然不是指印刷底技術，而是指出版底次數和經常性）。而上面所指出的一切缺點，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這種渙散性底必然的結果，這種渙散性，一方面可以解釋在這時期裏地方報紙爲甚麼佔得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她又由這種統治地位維持着。單個的地方組織，簡直無力保障自己報紙底原則上的堅定性和把牠提到政治機關報的程度，無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來說明我們全部的政治生活。許多人通常都用下述一個理由，來擁護在自由國內必需有許多地方報紙的主張，這個理由就是：由地方工人印刷，報紙價格低廉，而地方居民傳達消息既完備又迅速，——而在我們俄國內（正和經驗所證明的一樣），它却變成了反對地方報紙的理由。這種地方報紙，在革命力量底經費上是貴得不堪，他們的出版次數特別稀少，其原因是很簡單的：對於秘密報紙（無論地怎樣小），必需要有大工廠工業所製造的那種大的秘密機關，因爲在手藝作坊中，是產生不出這種機關的。秘密機關底原始性，常常可以使警察利用一兩期報紙底出版和推銷，來作大批的破獲

（每個實行家都知道大批的這種實例，把一切機關剷除得乾乾淨淨，使我們不得不從新來創辦牠。很好的秘密機關，須要革命家底很好的專門準備和極澈底的實行分工，而這兩種條件，對於單個的地方組織（無論牠現在怎樣強固）是力不勝任的。且不說我們整個運動底共同利益（給工人原則上堅定的社會主義的和政治的教育），就是特殊的地方利益，最好也不由地方機關報來應付。這一點初看起來好像是怪僻言論，但實際上我們所指出的兩年來的經驗，無容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大家都會同意：假使用那出版了三十期報紙的全副地方力量來辦一種報紙，那末這一種報紙一定很容易地出六十期（假使不出一百期的話），而且一定能够更充分地反映純粹地方性質的一切運動特徵。無疑的，這樣共同組織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要了解它的必要性，要每個地方小組能够想到這點而積極地來做這項工作，不必等外界的推動，不要迷信地方機關報容易辦理和接近地情，因為根據我們革命經驗底材料看來，地方機關報底這些優點，大部分都是虛幻的。

妨害實際工作的，還有那些自以為特別與實行家接近的政論家，他們看不見這種虛幻性，一味作這樣極其輕易而空洞的議論：需要地方報紙，需要省區報紙，需要全國報紙。當然，一般地講來，這都是需要的，但你既然決心要解決具體的組織問題，那你也需要想一想空間和時間底條件。當「自由」雜誌（第一期六八頁）專門『講到報紙問題』的時候，而這樣寫着：「我們以為

凡是稍大的工人集居的地方，都應有自己的工人報——不是從別地運來的，而是自己的工人報——這實際上難道不是吉訶德先生（註釋四五）的癡想嗎？假使這一位政論家不願思索自己這些話底意義，那就請讀者來替代他想一想吧：俄國到底有幾十個（如果不是幾百個的話）『稍大的工人集居的地方』，如果每個地方組織的確都建立自己的報紙，這將使我們的手藝主義如何繼續延長下去！這種渙散現象將如何使我們的憲兵容易拿獲——不費『稍大的』力量來拿獲——地方工作人員（在他們剛剛開始活動的時候），而不使他們發展成爲真正革命家！作者又繼續寫道：在全俄的報紙上，敘述廠主底陰謀和『各地的（不是本城的）工廠生活底瑣事』，是沒有興味的，而『阿爾洛夫人讀阿爾洛夫本地的事情，倒是不會枯燥無味的。他每逢看到了，誰受「叱責」，誰被「攻擊」，精神便爲之一振』（第六九頁）。不錯，阿爾洛夫人底精神爲之一振，可是我們的政論家底思想未免也太『爲之一振』了。像這樣袒護見小利的思想是否恰當？——這便是他所應當思索的問題。在承認揭露工廠黑幕底必要和重要這一點上，我們並不遜於任何人，可是我們要記着：我們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連彼得堡人讀彼得堡的『工人思想報』上『彼得堡通訊』的時候都感覺到枯燥無味了。對於各地揭露工廠黑幕的工作，我們過去向來是印發傳單的，將來也還是應當印發傳單，但是報紙底形式，我們應當把牠提高，而不應把牠降低到工廠傳單的形式。對於

『報紙』，我們主要的不在於要揭露『瑣事』，而在於要揭露工廠生活底巨大的、標本式的缺點，這種揭露要根據特別明顯的例子，要能够引起全體工人與運動底一切領導者底興味，能够真正予實他們的知識，擴大他們的眼界，開始激動新的區域，新的產業工人階層。

『其次，有地方報紙，則工廠當局或別種當局底一切惡行，立刻可以就地抓住。而在一個消息達到遠在異地的全國報紙的時候，地方上早已把他忘記了。』「什麼時候，唉，記不起來了！」（同頁）。

是呵，正是記不起來了！我們從這一位政論家口中知道：兩年半所出版的三十期報紙，是由六個城市裏辦理的。這就是說一個城市平均半年出版一期報紙！假使我們的輕浮的政論家，甚至在自己的設想中，把地方工作底生產率提高兩倍（對於中等城市，這一種設想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為在手藝主義底範圍內，不能大大地提高生產率），——那末我們所得到的也不過是兩個月出版一期，這完全不像什麼『就地抓住』。但如果十個地方組織聯合起來，挑選自己的代表來積極辦理一個全國報紙，那就足够了；——那時候在全俄國，兩星期一次，並且，所『抓住』的，不是瑣屑小事，而是真正顯著的標本式的胡行。這一點凡是了解我們組織中實況的人，都是不會懷疑的。至於就地拿獲敵人，假使我們是正經講話，而不是空口說漂亮話，那末絕對不能想秘密報

紙是可以達到這點的。這一點祇有祕密小傳單才能做到，因為這樣拿獲的最大期限，大部分不過一兩天（例如普通的短期的罷工，工廠中的爭執或示威遊行等等）。

『工人不僅住在工廠內，而且也住在城市內』——我們的作者繼續這樣寫道，這樣從局部問題談到一般問題，而且具有這種嚴格澈底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克里却夫斯基底特色。他指出了市議會，城市醫院，城市學校這些問題，並要求工人報對於一般城市事業，不要置之不問。這一要求的本身是很漂亮的，可是牠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討論地方報紙的問題時人們太時常用以自限的那種全無內容的抽象性。第一，假使的確『在一切稍大的工人集居地方』，出版幾種報紙，設有如『自由』雜誌所想的那樣詳細的本城消息欄，那末在我們俄國的條件之下，這必然要變成一種真正見小利的報紙，要削弱對沙皇專制作全俄的革命的進攻之重要性的那種覺悟，要加強這樣一個派別底萌芽，這個派別，因曾經講過關於某些革命家的著名言論，說這些革命家太多談到並不存在的國會而太少談到確已存在的市議會，而已著名起來了，這個派別底萌芽，還非常有生氣，牠祇是受過挫折或受過蹂躪，而沒有被連根拔除。我們所以說『必然』的，是要藉以着重地指出：『自由』雜誌，本顯然不願意有這種結果，而是願意有相反的結果。可是單是一種很好的希望是不够的。——要使對於全城事務的解釋放在走向我們全部工作的相當的方向上，開始就須要不

僅用一種推論，而且要用許多例子作爲根據，以便把這種方向完全地整理出來，堅定地規定下來，使這種方向已獲得傳統底穩固性。我們現在還遠遠地沒有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開始。就要具有，然後才能想到和談到廣泛的地方報紙問題。

第二，要真正很好地有趣地來描寫城市的事情，就必須熟悉這些事情而不是僅僅從書本上去知道這些事情。但是具有這些知識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全俄差不多完全沒有。要在報紙上（不是在通俗的小冊子上）敘述城市的和國家的事務，就需要新鮮的、各方面的、由能幹人收集而整理過的材料。但要收集和整理這樣的材料，這種原始小組（在這種小組內，大家共同料理一切，並愛以全體表決爲兒戲）底『原始民主主義』是不够的。要做到這點，就需要社會主義者的作家，社會主義者的記者底大本營，社會民主黨人探訪員的隊伍——他們能與各地發生聯繫，能够探悉一切『國家的祕密』（俄國的官吏常以此自傲，但他們很容易將牠們洩露出來），能够混進一切『祕密場所』，——就需要『在職務上』應該有處到和通曉一切的人物底隊伍。我們的黨是反對任何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民族的壓迫的，我們的黨，能够而且應當去尋找、集合、動員和調動這種通曉一切的人物的軍隊向前去作戰，——但這一點還需要我們來做哩！我們在大多數地方不僅在這方面沒有實現任何步驟，而且甚至還常常沒有感覺到實現這點底必要。請你們在我

們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上，去尋找一些有生氣有興味的文章，通訊以及揭露外交的、軍事的、宗教的、城市的、財政的以及其他事情的作品吧，你們差不多找不到什麼東西，或是找到的也是極少。所以「當一個人跑來講一些很漂亮的和美妙的東西」，講必需「在一切稍大的工人集居的地方」，出版報紙來揭露工廠的城市的和國家的醜事的時候，「我往往異常生氣」！

地方報比中央報佔優勢，這不是貧困底表現，便是奢侈底表現。當運動還沒有創造出力量來從事大生產，當運動還拘泥於手藝主義，牠差不多還淹沒在「工廠生活底瑣事」當中的時候，這

⊖ 因此，甚至最好的地方機關報底例子，也是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觀點。例如：「南方工人」(『Yutiny Rabochiy』)——是一個很好的機關報，牠在原則的堅定性上是完全無可指摘的。但是牠所願意給予運動的東西，則因為該報期數甚少，且又遭受普遍的破獲，而沒有做到。現時對於黨比什麼都迫切的東西——原則上提出運動底根本問題和各方面的政治鼓動，地方機關報便無力執行。而牠做得特別好的東西，如關於礦業主代表大會，失業現象等等文章，這並不是一種嚴格的地方材料，而是爲全俄所需要的，並不是只爲南俄一個地方所需要的。這樣的文章，在我們各種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上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就是貧困。當運動已完全克服了各方揭露和各方鼓動的任務，因而除掉中央機關報之外，需要許多的地方機關報，在此時，這就是奢侈。現時我們地方報佔優勝，這證明什麼，讓每個人自己去想一想吧。我只要說清自己的結論，使不致引起誤解。我們大多數的地方組織，至今差不多還純粹祇想到地方機關報，差不多專替地方機關報積極工作。這是一種不經常的現象。事情應當相反：要大多數的地方組織，主要的想到全國的報紙，主要的替全國的報紙積極工作。在這一點未做到以前，真正能够在報上作各方面的鼓動來幫助運動的報紙，我們一種都不能辦創。如果這一點能够做到的話，那時候，必需的中央機關報與必需的地方機關報之間的正常關係，自然而然會建立起來。

★

★

★

初看起來也許覺得：必需把重心從地方工作移到全國工作上這一個結論，對於專門的經濟鬥爭是不適用的。這裏工人底直接敵人，是各單個的廠主或各集團的廠主。這些廠主集團，並沒有用這樣一種組織，——即稍許像俄國政府（我們政治鬥爭中的直接敵人）底純粹軍事的、嚴格集中的、連碎瑣的事都山統一意志作指導的組織那樣的組織聯繫起來。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們已經多次指出過：經濟鬥爭是一種職業鬥爭，因此牠（當具有按

工人底職業而造成的聯合，而不僅需要具有按工人工作地點而造成的聯合。我們的廠主愈快地聯合爲各種公司和新迪加，則這種職業的聯合也就愈是更其迫切地需要。我們的分散現象和手藝主義，直接妨礙了這種聯合。要造成這種聯合，就必須要有能够領導全俄工人職工會的統一的全俄的革命家組織。我們上面已經講過：要達到這個目的，這種組織底形式應當怎樣。現在我們只想在講到報紙問題的時候再來補充幾句。

在每種社會民主黨報紙上，都應當有職業鬥爭（經濟鬥爭）一欄，——這是誰也不會懷疑的。但是職工運動底增長，也使人不得想不到工會報紙的問題。可是，我們以爲現在俄國，還談不到工會報紙的問題（除了極少的例外），這是一種奢侈品，而我們連糊口的麵包都常常沒有呢。工會刊物底適合於秘密工作條件而且現在已成必要的形式，在俄國應當是工。會。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應當把一切關於某工業部門中的勞動條件，俄國各地勞動條件底區別，該項職業的工人底要求，關於他們的立法底缺點，某一部門工人底出色的經濟鬥爭，他們工會組織底萌芽，現狀及需要和其他等問題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來，並加以有系統的整理。這樣的小冊子，第一，可以使我們的社會民主黨報紙不必注意許多祇能使某行工業中工人發生興趣的詳細消息；第二，牠們可以把我們在工會鬥爭中的經驗底結果固定起來，把現在散在許多傳單和片斷通訊

中所已經收集的材料保存起來，並歸納起來；第三，牠們可以成爲鼓動者底指南，因爲勞動條件底變更比較緩慢，某部門工人底基本要求非常固定（一八八五年莫斯科區紡織工人底要求和一八九六年彼得堡紡織工人底要求，即是明證），這些要求與需要匯集起來，對於落後地方或落後工人階層中的經濟鼓動，幾年內都可以作爲很好的參考材料；一地罷工勝利底例子，關於一地生活水平線較高，勞動條件較好的材料，都可以鼓勵別地工人逐次來幹新的鬥爭；第四，社會民主黨既然把職業鬥爭歸納起來並這樣地把俄國工會運動與社會主義的聯繫鞏固起來，那末牠就會注意使我們的工會工作，在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總和中所佔的部分，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地方的組織，如果他已與別城市的組織脫離，那麼牠要遵守一種正確的比例是很困難的，有時甚至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工人思想報』底例子證明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把工聯主義誇大到怎樣不堪設想的地步）。但是全俄的革命家組織——始終站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領導一切政治鬥爭，指揮職業鼓動家大本營的組織，——在決定這種正確比例的時候，是永遠不會感覺困難的。

○在這一點上，公開的材料特別重要。而我們在有系統的收集和利用這些材料方面也特別落後。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單是根據公開材料，我們還勉強可以寫一本關於職工的小冊

子，而單是根據秘密材料，則完全不能。我們從工人那裏來收集像『工人思想報』所發表的那些問題的秘密材料，這便空費革命家底大批力量（在這種情形之下，公開活動的人物很可以代替革命家的），而始終不能得到好材料，因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廠底一個部分，差不多常常只知道自己工作底經濟結果，而不知道自己工作底一般條件和標準，這樣的工人要獲得工廠職員、檢查員、醫生等所有的那些知識，以及小報通訊，和工廠、病院、自治局及其他機關出版物中所散佈着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我現在記起了自己的『第一次嘗試』。這種嘗試，我以後再不會重複了。我費幾個星期的工夫，『很熱心地』向一個工人詢問他做工的那個大工廠內的一切情形。不錯，雖然費了很大的力量，終究寫了一點描寫工廠（僅僅關於一個工廠）的作品，可是這個工人在回答了我的問題以後，却一面擦汗，一面對我微笑地說：『我易幹額外工，難答你的問題！』

我們愈加發奮進行革命鬥爭，便愈會迫得政府把一部分『工會』工作公開起來，而卸去我們身上的一部分負擔。

(五) 全俄政治報底『計劃』

克里却夫斯基罵我們犯了一種傾向：想「用使理論脫離實際的方法，將理論變為死的信條」；他在『工人事務報』第十期第三十頁上寫道：「在這一點上，『火星報』底最大錯誤，就是牠的全黨組織底『計劃』（即指『從何着手？』一文）。而馬丁諾夫也重複他的話：他說：『『火星報』輕視普通的日常鬥爭進程底意義而重視高明與完備的觀念底宣傳，……這種傾向底完成，就是該報在第四期上『從何着手？』一文中所指出的組織滅的計劃』（『工人事務報』第十期六一頁）。最後，拿齊金近來也同意了因這一個『計劃』（括弧的意義是表示他們對這個計劃的嘲笑態度）而惱怒的人們。他在我們剛收到的『革命底前夜』這本小冊子上（這本書是由我們所已相識的『革命社會主義社』（『自由』雜誌社）所出版的），曾宣佈說：『現在來說由全俄報底引綫所牽成的組織，這祇能培植研究室的思想和研究室的工作』（第一二六頁），這祇是『文

學派」底表現……。

我們的恐怖主義者與『普通的日常鬥爭底過程』底擁護者之志同道合，這在我們關於政治與組織的那幾章內已考察過這種接近性底根源以後，已經不能使我們驚奇了。但這裏我們應當指出：拿齊金，而且祇有他一個人，會想誠意地來考察他所不喜歡的這篇文章底內容，會想切實來答覆他。……而『工人事務報』則沒有講一句切實話，而祇想用一些無聊的騙人攻擊的方法，把問題弄糊塗。無論這怎樣不滿意，還得費些時間，開始來清洗這間齷齪的馬房！

B · 報紙能否成爲集體的組織者？①

『從何着手？』這篇文章底全部實質，正在於提出這個問題而給以肯定式的解決。我們已經

①第一節A：『誰因「從何着手？」這篇文章而生氣』——這一節在本卷內刪去了：因爲他的內容完全是列寧與『工人事務報』和『猶太工人同盟』關於『火星報』企圖『命令』等問題的論戰。在這一節內除其他議論外曾說到：『猶太工人同盟』自己在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曾請求『火星報』社社員恢復黨底中央機關報和組織『文藝研究室』。（編者註）

知道，想切實分析這個問題而證明必須用否定式解決牠的，祇有拿濟金。我們現在把他的理由完全摘引如下：

『……我們很喜歡「火星報」（第四期）提出全俄報紙底必要問題，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種提法相當於「從何着手？」這篇文章底題目。這當然是一種極重要的事情，但是開闢革命時期所需要之鬥爭組織底初基的，並不是這事情；並不是大批的通俗傳單，並不是連篇累牘的宣言。我們必需要在地方上着手建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這種組織我們還沒有，我們過去主要的還是在有智識的工人中間做工作，而羣衆差不多祇是做了經濟鬥爭。如果不在地方上培養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就是有辦得很好的全俄報紙，又有什麼意思呢？自焚樹本身燒着而不起火，也不會點燃別人！「火星報」以爲，民衆會在全俄報周圍和在爲全俄報而幹的事業上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那知在更具體的事業底周圍，民衆還是更親切地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普遍地創辦地方報，現在立刻準備工人力量來作示威，地方組織在失業工人中間所進行的經常工作（堅定不移地在他們中間散發傳單小報，召集他們來開會，反抗政府等等）——這些工作可以作爲而且應當作爲上述的那種更具體的事業。我們要在地方上擴大靈活的政治工作，那時，這個實際的基礎上的統一就會成爲必要——這種統一將不

工人的，不是紙上的——地方工作之統一成爲全俄事業，這不是用一些報紙就可以達到的！

』（『革命底前夜』，第五四頁）。

在這一段寫得很漂亮的文章裏面，我們所加上着重點的地方，最顯明地表現該文作者對我們計劃的估計底不正確以及他在此地拿來與『火星報』對立的一般觀點底不正確。假使不培養地方上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就是有很好的全俄報紙也沒有意思——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問題就在：除了創辦全俄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來培養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作者忽略了『火星報』在未說明其計劃之前的極重要的申明：必需要『號召建立革命組織，使之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能够統一一力量 and 領導運動，就是說，時刻準備着幫助一切的抗議和一切的發動，利用牠們來增加和鞏固可供決戰之用的軍事力量』。『火星報』繼續寫道：二月和三月之後，原則上大家都是同意這一點的，但是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原則上的解決問題，而是實際上的解決問題，我們須要立刻提出這樣一種確定的建設計劃，使得從各方面大家都能立刻從事這種建設。但人們又要把我們向後拉，使我們不來實際解決問題，而趨向於原則上正確的、無疑的、偉大的，但對於廣大的工作人員是完全不足的，完全不可了解的真理：『培養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高貴的作者呵，問題不在這裏，而在究竟要怎樣來培養這種組織和必須培養！

說『我們過去主要的還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做工作，而羣衆差不多祇是做了經濟鬥爭』，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正類似『自由』雜誌所常用而根本錯誤的把有知識的工人與『羣衆』相對立起來的說法。近幾年來就是我們的有知識的工人也『差不多祇做了經濟鬥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是我們不幫助有知識的工人和知識份子培養成爲這種政治鬥爭底領導人們，那末羣衆也永遠學不會進行政治鬥爭；而祇有根據有系統地、經常地估計我們政治生活底各方面和估計各階級因各種緣由而進行反抗和鬥爭底一切企圖，這樣的領導者才能培養出來。所以一方面說『培養政治組織』，同時又把政治報底『紙上事業』與『地方上靈活的政治工作』對立起來，這簡直是可笑之至！而『火星報』正是要把自己的辦報『計劃』引伸爲養成這種『鬥爭準備性』的『計劃』，以幫助失業工人運動，農民騷動，地方自治派底不滿情緒和『民衆反對猖狂的沙皇官吏的風潮』等等。熟悉運動實況的人都知道：最大多數的地方組織，對於這一點連想都沒有想到；這裏擬定出的『靈活的政治工作』底方案，其中許多，還沒有一個組織曾實行過一次；而且，譬如那個想來注意地方自治派智識份子中底不滿意和抗議的增長的企圖，又引起拿齊金（他說：『先生們，這種機關報是不是爲着地方自治派而辦的呢？』（見『前夜』，第一二九頁），經濟主義者（『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的一封信）以及許多實行家底驚惶失措。在這些條件之

下，祇能這樣來『開始』工作，即喚起人們想到這一點，喚起人們來歸納和總合一切風潮和積極鬥爭底各種表現。在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被人降低的時候，『靈活的政治鬥爭』，祇能從靈活的政治鼓動開始，但靈活的政治鼓動，沒有經常出版的銷行得法的全俄報紙是不可能的。

把『火星報』底『計劃』看作『文學主義』底表現的人們，完全沒有懂得計劃底實質，他們把目前最適當的手段作爲目的。這些人們沒有費力想一想兩個明顯地說明這個計劃的比喻。『火星報』上曾說：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成爲我們的基。本。引。線；我們握着了這一條基本引線，一定能够發展、加深和擴大這一個組織（即是時刻準備能幫助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的革命組織）。請你們回答一下吧：當泥水匠在各個地方放置石頭，以建造一座非常巨大而前所未見的建築物的時候，使用這樣的『引綫』來指出放置底正常地點，來指明全盤工作底最終目的，不僅使每一塊石頭，而且使每一塊碎石片都能一一使用，每塊接連放置，結果成爲完滿的路綫——這是不是『紙上』事業呢？我們黨的生活現在所處的時期，不正是處於有石頭、有泥水匠，但缺少大家都能看到大家都可振作的『引綫』的時期嗎？讓人家去高喊，我們牽着引綫是想發號施令吧！先生們，假使我們真想發號施令，那我們就會不出版『火星報』第一期而出版『工人報』第三期了，——有幾個同志就向我們這樣提議過，而且我們本來有全權這樣做（註釋四六），可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人們是想留一雙自由手來與一切假社會民主黨人作不可調和的鬥爭；我們希望人們因我們的引綫底正確（假使牠佈置得正確的話）而來尊敬牠而不是因為牠由正式機關報所佈置的緣故。

拿齊金教訓我們說：『將地方活動統一到中央機關報內的工作這個問題，在一個迷人圈裏轉來轉去。要統一就需要成分底一致。但是這種一致，本身祇能為某種有統一力量的東西所造成，而這種有統一力量的東西，又祇能是目前性質絕不一致的強有力的地方組織底產物』。這個真理之值得尊重和千真萬確也同要培養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一樣；而這個真理之毫無效果也同那回事一樣。一切問題，本來是『在一個迷人圈裏轉來轉去的』，因為全部的政治生活，是無窮的連環所組成的漫無終極的鏈條。政治家底全部藝術，就在於尋找和緊緊地握住這樣的環節：這個環節是最不容易從手中脫去的，在某時期內是最重要的，牠最能保障握住此環節的人去握住整個鏈條。假使我們大批有經驗的石匠，已這樣熟練：沒有引綫，他們也能確當地放置石頭（如果抽象地講，這並不是不可能的），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握住別一個環節了。但是毛病也就在這裏：有經驗的同心協力的石匠，我們現在還沒有；石頭往往放置得全無用處，牠不是按總的引綫來放置的，放置得這樣參差，使敵人推倒牠們的時候，不像石塊，而像沙泥。

第二個比喻：『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也是集體的組織者。在

後面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拿將造的房子的周圍的木架來作比。噯：這木架指出建築底規模，促進各建築工人底聯絡，幫助他們分配工作並考察有組織的勞動所達到的總成績。○這不是像文學家和研究室工作人員誇大自己的作用嗎？木架對於房屋本身並不需要，牠是由很壞的材料架設起來的，牠的樹立底時期很短，祇要房子輪廓一造成就要把他拿去當柴燒。至於講到革命組織底建立，則經驗證明：即使沒有木架，牠們有時也能建立起來，七十年代的例子，就是一個明證。但在現在，沒有木架，我們已不能設想有我們所需要的建築了。

拿齊金不同意這點，他說：「『火星報』以為，民衆會在全俄報底周圍和在爲牠而幹的事業上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那知在更具體的事業底周圍，民衆還是更親切地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對呀，對呀，「在更具體的事業底周圍，民衆還是更親切地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俄國有句俗話：『不要吐痰於井，井水是可以飲的』。但是也有人不怕飲用吐過痰的井水。爲了這一種很大的具體性，我們的頂括括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合法的『工人思想報』

○馬丁諾夫在『工人事務報』上引證了這個引語底第一句（第十期，第六二頁），而正漏掉了第二句，這正好像藉以着重地表示了他的不願講到問題底實質或不能了解這個實質。

底崇拜者，什麼卑鄙醜惡的話還沒有講出來呢！我們整個的運動，是怎樣被我們的狹隘性、無主動性、和怯懦性所摧殘壓迫呵！而這些劣根性是用『遠是更其親切地圍繞着更具體的事業』的傳理由，來作辯護的。拿齊金自以為特別明瞭『生活』，他特別嚴格地責備『研究室的』人物，他責備（想自作聰明）『火星報』，說牠的弱點就在於牠把什麼都看作經濟主義，他自以為遠是更高站在正統派和批評家這一種區分之上，——但是他沒有看到：他以自己的論據幫助了使他生氣的隘狹性，他飲用吐痰吐得最髒的井水。並且，假使生氣的人全無指南，像七十年代革命家那樣『自發地』專幹『激發人心的恐怖』，『土地恐怖』，『敲警鐘』等等的時候，光是極誠懇地對狹隘性生氣，極熱烈地希望提起崇拜狹隘性的人，這還是不夠的。請你們來看看這種『更具體的事業』吧——他以為在這種更具體的事業底周圍，人民會『遠是更其親切』地集合起來和組織起來，這就是：一，地方報；二，準備示威；三，在失業工人中間工作。我們一看就知道，這一切事情都完全是偶然地隨便地拿來當說話資料的，因為無論我們怎樣來觀察這些事情，我們要把牠們看作什麼特別適於『集合和組織』民衆的東西，都是完全荒謬的。我們知道，就是這位拿齊金，經過兩頁以後又這樣說道：『我們現在只要簡單地指出事實：地方上的工作是極可憐的，委員會沒有做到牠所能够做到的工作底十分之一，現在我們所有的統一中心——這祇是一種虛名，

這祇是一種革命的官場習氣底表現，彼此推舉爲領袖罷了。在沒有產生强有力的地方組織以前，這種情形是不會變的。無疑的，在這些話中間，除了誇張的地方，還有一些沉痛的真理在內。難道拿齊金沒有看到，地方上可憐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的眼底狹隘，他們的活動範圍底狹隘（這些狹隘性，在閉塞於地方組織內的工作人员底無準備的條件之下，是不可避免的）之間的聯繫麼？難道他像『自由』雜誌上論組織的文章底作者一樣，忘記了：過渡到出版普遍的地方報（從一八九八年起）的時候，經濟主義和『手藝主義』如何跟着而特別加強麼？並且，即使多少能够令人滿意地辦理『廣泛的地方報』這種事業是可能的（但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除掉特別的情形之外，牠是不可能的），那末那時候地方機關報也不能『集合和組織』革命家底一切力量，來向專制制度作總進攻，來領導統一的鬥爭。你們不要忘記：這裏問題祇是講到報紙底『集合的』和組織的意義，而且我們可以向擁護渙散性的拿齊金發一個爲他自己所提出的諷刺問題：『我們有沒有從什麼別的地方得到二十萬革命組織家的遺產呢？』其次，決不能把『準備示威』與『火星報』底計劃相對立，因爲這一個計劃，正是將最廣大的示威看作爲目的之一；這裏問題只是關於實際方法底選擇。這裏拿齊金又陷入迷途，他忽略了：『準備』示威（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這種示威至今還是自發地進行的），只有已經『集合而組織了的』軍隊才能做到，而我們恰恰是不會『集合』

和組織」。在失業工人中間工作。這又是一樣的糊塗觀點，因為這也是已被動員的軍隊底一種軍事行動，而不是一個動員軍隊的計劃。這裏拿齊金如何忽視了我們的渙散性底害處，如何忽視了我們缺乏「二十萬革命組織家」這一個事實——這可從下面這一點中看得出來。許多人（拿齊金也在其內）會責備「火星報」，說牠關於失業工人的消息登載得太少，說牠祇是偶然地有時登載關於鄉村生活中極平常的現象的通訊。這種責備是很公道的，但是「火星報」這裏犯了「無辜之罪」。我們也極力想「佈置引綫」穿過鄉村，但是那裏差不多完全沒有石匠，於是我們就不得不鼓勵那些甚至以平常事情告訴我們的一切人們——我們以為這可以增加這一方面的同事，可以使我們大家學習選擇真正特出的事實。但是學習的材料竟這樣少：不將全俄的材料匯合起來，我們竟完全沒有學習的材料。無疑的，假使有差不多具有像拿齊金那樣的鼓動力和像他那樣知道窮人生活的人，那末，他在失業工人中作鼓動工作，一定能夠給運動以價值無量的幫助——但是這樣的人，如果他打算將自己工作底每一步驟告訴全體俄國同志，來教訓和表率那些大部份還不會幹新事業的人們，那末，他的天才也就埋沒了。

現在大家都在講統一底重要，「集合和組織」底必要。但是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大家都沒有明確了解這種統一事業從何着手和怎樣進行。我想大家都同意這點：使我們想把一個城市中的單

個的（假定是區的）小組「統一起來」，那末，就須要總的機關、即是說不僅要有「聯合會」底共同名稱，而且要實際共同的工作，互相交換材料，經驗和人力，不僅按區來分配職務，而要按全城工作底專門化來分配職務。大家都同意：堅強的祕密機關，用一區的「力量」（當然是人力和財力兩方面）是不能買到的（假使可以用商業上的說法來形容的話），在這一種狹小的場所內是不能發展專門家底天才的。各城底聯合，也是如此。因為如單個地方那樣的場所，現在以及過去在我們社會民主黨運動史上都已表現為非常狹隘的。關於這點，我們上面在政治鼓動和組織工作的例子上已經詳細證明過。我們須要、絕對須要而且首先須要擴大這一個場所，在經常共同的工作上，建立各城之間的實際聯繫，因為渙散性壓制着這些人們：他們好像「坐井觀天」（給「火星報」的一封信底作者底說法），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從什麼人那裏可以受到教訓，怎樣替自己獲得經驗，怎樣滿足廣泛活動底願望。我還是要繼續堅持我的主張：祇有共同的報紙——唯一的經常的全俄的報紙，綜合各種行動，推動人們一往直前地走上歸向革命的一切很多的道路（好像一切道路歸羅馬一樣）的報紙——才能開始建立這種實際聯繫（假使我們不是在口頭上願意統一，那末，我們就應當使每個地方小組立刻分出四分之一的（假定說）力量來担任進行共同事業的積極工作，那時報紙可以向牠們指明這種事業底概況、範圍和性質，

牠可以指明，在整個全俄的活動中，那些缺點表顯得最厲害：什麼地方沒有鼓動工作，什麼地方聯繫薄弱，總的大機器中那些小輪盤，可以由這小組來修補或拿好的去調換。現在還沒有工作而祇在找尋工作的小組，牠之開始工作便能够不像一個不知道牠以前的『工業』發展和該工業生產方法底狀況的小作坊底手藝家的樣子，而像一個反映出向專制制度作總的。革命進攻的大企業中的參加者了。每個小輪盤底細作愈完善，共同事業中做細小工作的人數愈多，則我們的羅網愈廣，而不可避免的破綻，將少引起些我們整個隊伍中的擾亂失措。

單靠推銷報紙這一種職務，就會能開始建立實際的聯繫了（假使這個報紙是名符其實的話；就是說：牠能够經常出版——每月出版四期，而不像很厚的雜誌那樣每月只出一期）。現在，各城市間因革命事業底需要而發生聯繫，是極少的事情而至少是例外的事情；但到那時候，這些聯繫可以成爲一種通例，牠自然不僅可以保障報紙底推銷，而且還可以保障（這更重要得多）經驗、材料、人材和經費底交換。那時候組織工作底範圍要擴大多倍，一地方底成功可以鼓勵別地方活動的同志，不斷地更求進步，願意利用現成的經驗。那時候的地方工作，要比現在豐富而複雜得多：由全俄收集得來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揭露，可以給各項職業和各種發展程度的工人以智識，可以給材料和事端來討論各種問題和閱讀關於各種問題——爲合法刊物底暗示，社會的輿論，

政府底『含羞的』通訊所提到的問題——的材料。那時候，每一個發動，每一個示威，全俄四處都將加以各方面的評斷和討論；牠們可以使大家都不想落後於別人而只想超勝於別人——（我們社會主義者並不是籠統地反對任何的競賽，任何的『競爭』！），——自覺地準備那種初次是如何自發產生的事件，利用當地當時底順利條件來改變進攻計劃底形式等等。同時，地方工作底這種活躍，那時就不致使一切力量達於拚命的『最後掙扎的』緊張狀況，不致把所有的人都置於危險之境——現時一切示威運動及每期地方報常是這樣。這樣，一方面，警察遠較困難些察出『根底』，因為他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去尋找牠們；另一方面，經常共同的工作，可教導人們把某種進攻力量與整個軍隊中某一隊伍底實力互相策應（在現在，差不多誰也從來沒有想到這樣互相策應，因為進攻十之八九都是自發的），牠使得不僅書報，就是連革命力量都容易從別地『搬運過來』。

現在，這些革命力量，在許多情形下都是犧牲在狹隘的地方工作上面；而在那時候就可以而且常有機會，把有些能力的鼓動家或組織家從這個地方調到那個地方。人們開始拿着黨的錢爲了黨的事情跑路，後來他們就完全習慣於由黨供養，變成職業革命家，造就成爲真正的政治領袖。

假使我們真正能够做到這一點，使所有的或者絕大多數的地方委員會，地方團體和小組，都

導積極進行共同的事業，那末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創辦週報，每期數萬份，經常銷行於全國。這一種報紙，那時候可以成爲大風箱底一部份，把階級鬥爭和民衆風潮底火星吹成大火。那時在他的周圍，在這一種本身還很幼稚和很小的，但經常的真正的共同的事業底周圍，就會有系統地挑選和訓練出有鍛鍊的戰士底常備軍。按着這一座大有組織的建築底木架，馬上就可以從我們革命者中間提拔出社會民主黨的謝略波夫，從我們工人中間提拔出俄國的培培爾，他們會指揮已被動員的軍隊，推動全體人民去與俄羅斯底可恥可咒的現象相肉搏。

這便是我們所應當幻想的東西！

★

★

★

我寫了『應當幻想』這幾個字之後，不覺驚惶起來。我好像坐在『聯合代表大會上』，我對面坐的是『工人事務報』底編者和同事。於是馬丁諾夫同志站起來，威風凜凜地問我：『請問你：如事前不向黨委訊問，自主的編輯部是否有權去幻想？』而克里却夫斯基同志也繼他而起（他在哲學上加深馬丁諾夫同志底意思，而馬丁諾夫同志則早已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同志底意思），更威風凜凜地繼續說道：『我還要進一層來問你：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忘記，照馬克思底意見，人類始終祇能提出能够實現的任務，沒有忘記策略就是一種與黨共同增長的任務底增長過』

程，那末，他是否有權幻想？」

一想到這種威風凜凜的問題，使我毛骨悚然。我暗自思量：到底躲到何處去呢？好吧，讓我姑且躲在比沙勒夫（Pisarev）①底背後吧。

比沙勒夫在論到幻想與實際間的差異這個問題時，曾寫過：

「有各種各樣的差異。我的幻想可以追過事變底自然進程，或是牠可以完全跑到另一方面——跑到什麼事變底自然進程都始終跑不到的地方。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幻想是沒有什麼害處的；而且可以幫助和加強勞動者底毅力……在這種幻想中，沒有什麼可以破壞和麻痺工人力量的東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個人完全不能這樣幻想，如果他有時不能跑上前去，用自己的想像力，完滿澈底地來推想那種在他面前正在開始形成的創造——那時候我真不能想像：推動人們在藝術、科學和實際生活方面舉行和澈底進行廣大而勞苦的工作的，到底是何種刺激力……假使幻想的人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細地考察生活，把自己的閱歷與自己的空中樓閣相比較，努力實現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與實際之間的差異，是沒有什麼

①比沙勒夫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著名的文藝批評家。（校者註）

害處的。到了幻想與生活之間有了多少接觸，那時一切事情都很順利了」。

不幸得很，像這樣的幻想，在我們的運動中真是太多了。在這一方面最大的罪魁，便是那些自持有警惕性和對具體東西的「切近性」的合法的批評底和不合法的「尾巴主義」底代表。

C. 我們需要何種樣式的組織？

從上文裏面，讀者可以看到：我們的「計劃策略」就在於否認立刻號召總攻擊，就在於要求組織「正確地包圍敵人的砲台」，或者說就在於要求用全力來集合、組織和動員常備軍。當我們嘲笑「工人事務報」，說牠從經濟主義跳到下總攻擊令（這種口令是在一九〇一年四月「工人事務報」第六期上發出來的）的時候，「工人事務報」當然要攻擊我們，罵我們為「信條主義」，罵我們不懂革命義務，罵我們號召人們小心謹慎等等。當然，沒有絲毫堅定主張，只以深奧的「過程策略」來敷衍的人底這樣謾罵，對於我們是毫不足奇的；同樣，最輕視堅固的綱領的和策略的基礎的拿齊金，重複了這些謾罵，這對於我們也是毫不奇怪的。

有人說歷史不會重複的。但是拿齊金則用盡一切力量想來重複歷史，很熱心地摹倣特卡却夫（Tchavov）^①。他叱責「革命的文化主義」，高喊「撞警鐘」，「革命前夜底特別觀點」等等

的話。他大概忘記了一句著名的格言：假使歷史事件底原本是一齣悲劇，那末牠的抄本只是一齣笑劇。別特卡却夫底宣傳來準備奪取政權，用『嚇人的』、而且真正嚇過人的恐怖手段來實行奪取政權，這種企圖是偉大的^①。而一個小特卡却夫底『醒世』的恐怖，簡直令人可笑；尤其是還補上一個組織中等人材的理想，越發令人可笑了。

拿齊金寫道：

「假使『火星報』能够跳出自己的文學主義底圈子，那牠就會看到這種現象（即是『火星報』第七期上工人底一封信和其他等等現象），便是很快很快就要開始的「總攻擊」底徵兆，而此刻（是呵！）來談由全國報紙底引綫來牽聯的組織，這就是培養一種學院式的思想和學院式的工作」。

你們看吧，這是一種多麼難以設想的糊塗觀點：一方面，說在『更具體的東西』——如地方報——底周圍『更親切地』集合起來，同時還說醒世的恐怖與『中等人材底組織』；另一方面，

① 特卡却夫是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俄國革命作家。（校者註）

② 列寧是指民意派奪取政權底企圖。（編者註）

又說『此刻』來談全俄的組織就是培養學院式的思想——說得公開直爽些：就是說『此刻』已經太遲了！然而最高貴的拿齊金呵，『普遍地創辦地方報』，這倒不遲麼？請你們把這一點和『火星報』底觀點和策略比較一下，『火星報』說：醒世的恐怖是句空話，說正要組織中等人材和好好地創辦地方報，這等於替經濟主義開放門戶。我們要談全俄統一的革命家組織，就一直到底正的不是紙上的總攻擊開始時候的，我們來談這點都還不算遲。

拿齊金繼續說道：

『的確，關於組織方面我們的情形十分不好。『火星報』說我們軍事力量底主要羣衆是自願軍和暴動者……這是完全正確的。你們很嚴格地估量我們的實力，這是很好的；但同時你們爲什麼忘記：羣衆並不是我們的，因此他們不來問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軍事行動，而跑去『騷動起來』……須知當羣衆自己帶着自發的破壞力起來的時候，他們可以擾亂和轉移『常備軍』——在這一種常備軍中間，人們往往預備過灌輸，但始終還未曾來得及灌輸非常有條理的組織』（着重點是我們加的）。

真是奇怪的邏輯！正是因爲『羣衆不是我們的』，所以此刻高喊『總攻擊』是不聰明的，是不好聽的——因爲總攻擊是常備軍底進攻，而不是羣衆底自發騷動。正是因爲羣衆可以擾亂和轉

移常備軍，所以我們定要進行『灌輸非常有條理的組織』到軍隊中去來『趕上』自發的高潮！——因爲我們愈能『趕上』灌輸這樣的組織性，則常備軍愈可以不被羣衆所擾亂，而能跑在羣衆前面領導羣衆。拿齊金之所以糊塗，是因爲他以爲這種有條理的組織起來的軍隊，是幹一種什麼要脫離羣衆的工作，而不知道實際上他是專幹各方面的包羅盡致的政治鼓動，就是說，正是把羣衆自發的破壞力與革命家組織底自覺破壞力接近起來而聯成一貫的工作。先生們，你們以己之罪加於他人；因爲正是『自由』雜誌派人，他們把恐怖載在『綱領』上，即此來號召組織恐怖主義者，而這樣的組織，的確可使我們的軍隊不能同羣衆接近起來，這種羣衆可惜還不是我們的，他們可惜還不問我們或是很少問我們：何時和如何開始軍事行動。

拿齊金繼續恐嚇『火星報』說：『我們會要錯過革命本身，正如我們錯過了目前突然而來的事變①一樣』。和我們上面所引的這一些話聯繫起來，這句話很明白地告訴我們：『自由』雜誌所想出來特殊的『革命前夜底觀點』是很愚蠢的②。直接地講，所謂特殊的『觀點』，就是說：『

①指一九〇一年春天的事變。（編者註）

②『革命前夜』第六二頁。

此刻』來議論和準備已經遲了。「文學主義」底最高貴的敵人呵，假使是這樣，那末你爲什麼關於『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寫了一百三十二頁的文章呢？你們是不是以爲出版十三萬二千份簡單號召『打他們呵！』的傳單，對於『革命前夜底觀點』還更適當些呢？

正是像『火星報』那樣把全民政治鼓動放在自己全部綱領、策略和組織工作底首位的人，才

○此外，關於理論問題，拿齊金在其『理論問題評論』上，差不多沒有說什麼，除了下面這件從『革命前夜底觀點』看來是十分奇怪的變調以外：『整個伯因斯坦主義，對於我們所處的時期，已經失去了他的尖銳性了；同樣，不管是阿答謨維奇（Adanovich）（即伏洛夫斯基——編者）證明司特魯威應當告老回鄉也好，或是反過來司特魯威反駁阿答謨維奇而不同意辭職也好——這都完全無關重要，因爲革命底時辰快到了』（第一一〇頁）。拿齊金之無限的忽略理論，要比這裏表現得再明顯是很困難的了，我們宣告了『革命的前夜』——因此，正統派是否能夠澈底使批評派失去立場，這是『完全無關重要』的！！而我們的聰明智士沒有看到：正是在革命時期中，我們須要有與批評派作理論鬥爭底結果，以便與他們的實際立場作堅決的爭鬥！

最不致於錯過革命。在全俄引伸由全國報紙所牽聯的組織線索的人們，不僅沒有錯過春季事變，而且正是相反，他們還使我們能預料這些事變。『火星報』第十三，十四兩期上所記載的示威運動[⊖]，他們也沒有錯過；正是相反，他們參加了示威，他們切實感覺到自己必須去幫助羣衆底自發高潮，同時以報紙來幫助一切俄國同志去認識這些示威和利用牠們的經驗。假使他們活潑的話，他們也不會錯過革命——這種革命所要求我們的，最先和最主要的就是鼓動底經驗，善於幫助（社會民主黨式的幫助）一切抗議，善於指揮自發運動，使牠既不爲朋友底錯誤所牽累，又不爲敵人底羅網所陷害。

這樣我們就講到了最後一個理由：這個理由使我們不得不特別堅持，用共同辦理公共報紙的方法來實現環繞於全國報紙周圍的組織計劃。祇有這樣的組織才能保障社會民主黨鬥爭組織所必需的隨機應變性，即是說：能够立刻適應各種複雜的變更得很快的鬥爭條件，善於「當敵人將全力集中在一個地方的時候，避免與力量佔優勢的敵人作公開的鬥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利用這個敵人底遲鈍性，當敵人最不會料到人家進攻的地方而突然攻其不備」[⊙]。如果只靠望爆發和

[⊙]是指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與十二月的學生示威運動。（編者註）

巷戰，或只靠『普通的日常鬥爭底前進行程』而建立黨的組織，那便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我們應當常常進行日常迫切的工作，應當常常準備應付一切；因為爆發時期之轉變為平靜時期，差不多常常是不可預料的；而且即使在可以預料，也不能利用這些先見來改造組織；因為在專制國內，這種轉變之發生，非常迅速，有時竟可因沙皇禁衛兵一晚上的襲擊而引發起來。革命底本身，我們絕不要把牠看作是單一的動作（拿齊金大概就是這樣看法的），而應把牠看作多少厲害的爆

（見第四期『火星報』『從何着手』一文、——拿齊金寫道：『對於不站在「革命前夜」觀點上的革命的文化家，長久的工作是絲毫不足以麻煩他們的』（第六二頁）。關於這點我們要說：假使我們不能規定出這樣的一種政治策略，這樣的一種組織計劃，以便不斷應用到極長期的工作上去而同時又藉這種工作過程本身而保證我黨準備在任何突變的情境之下，在事變進程無論如何加速的情境之下，站在自己的職位而履行自己的職務——假使我們不能規定這樣一個策略和計劃的話，那末這僅表示我們是可憐的政治的冒險主義者罷了。祇有那從昨天起方才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的拿齊金，會忘記這點：社會民主黨底目的是根本改造全人類底生活條件，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是不許為長期工作問題而『麻煩』的。

發和多少厲害的平靜底幾個迅速的更換。因此，我黨底組織活動底基本內容，這種活動底焦點，應當是在極厲害的爆發時期與在極完全的平靜時期都可以進行且必須進行的工作：這就是全國統一的，說明各方面生活的，能深入廣大羣衆的政治鼓動工作。但在現代的俄國，如無全國的、經常出版的報紙，則這種工作是不可能的。在這種報紙底周圍自然團結起來的組織，這種報紙底同事（在這一個字底廣義上講，也就是辦報底全體勞動者）底組織，正是將準備應付一切：從在最大的革命『壓迫』時期拯救黨底名譽、威望和傳統起，以至於準備、確定和實行全民武裝暴動爲止。

實際上，就看我們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所常遇到的全部破獲的事情吧。在每個地方組織缺乏一種共同的經常工作的條件之下，這樣的破獲常常可以引起工作底許多月的停頓。要是大家有了共同事業，那末雖遭極厲害的破獲，祇要幾星期內兩三個熱心的人底工作，就足以使新的青年小組與總的中央聯繫起來（大家知道：這一些青年小組就在現在也產生得很迅速）。當大家都關心那因破獲而吃虧的這種共同工作時，則新小組底產生以及與中央的聯繫還更迅速些。

另一方面，就拿民衆暴動來講吧。我們應當想到暴動和準備暴動——這一點大概現在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怎樣準備呢？當然不是由中央指定代表到各地去準備暴動呵！假使我們有中央的

話，那在現代俄國的條件之下，牠這種指定的辦法也絲毫不能達到目的。正是相反，在辦理和發行共同報紙的工作上自然形成起來的各代辦機關，不應當『坐着等候』號召暴動的口號，而正是應當進行這種經常工作，以保證這種代辦機關在暴動時有極大的勝利可能性。正是這種工作可以鞏固與最廣大的工人羣衆及不滿意專制政體的各階層的聯繫，這一點對於暴動是很重要的；正是在這種工作上，方能鍛鍊出正確估計一般政治形勢的能力，因而也是選擇暴動底適當時機的能力；正是這種工作，才能教導各個地方組織同時起來響應同樣的驚動全俄的政治問題和政治事件；盡可能積極地，盡可能一致地和有目的地起來答覆這些事件。須知暴動實際上也就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最積極最一致和最有效的『答覆』。最後，正是這種工作，才能教導俄國各地各種革命組織建立使黨實際統一的最經常同時又是最秘密的聯繫——沒有這樣的聯繫，則不能集體地討論暴動計劃和採取應當嚴守秘密的那種暴動前夜所必需的準備步驟。

總而言之，『全國政治計劃』，不但不是沾染了理想主義和文藝主義的人在研究室內想出來的結果（如那些沒有仔細思索牠的人所感覺的那樣），而正是相反，牠是最切實的計劃——從各方面並立刻開始準備暴動，同時一刻不忘記日常的迫切工作的一個計劃。

結 論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歷史，顯然是分成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約有十年：大概從一八八四年起到一八九四年止。這是社會民主黨理論和綱領產生和鞏固的時期。新思潮方面的人，在俄國會寥寥無幾。那時，社會民主黨沒有工人運動而存在；社會民主黨這個政黨還處在胎形發展底過程中。

第二個時期約有三、四年：從一八九四年起到一八九八年止。社會民主黨，成爲一種社會運動，成爲一種民衆底高潮，成爲一個政黨而出現於人世。這是黨底童年時期和半成年時期。那時智識階層會風行一時地傾心於與民粹主義鬥爭，傾心於到工人中間去；而工人則風行一時地傾心於罷工。運動有了極大的成效。大多數的領導者，都是還未滿「三十五歲」的極年輕的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爲三十五歲是一種什麼天然界限。這些領導者因爲年紀很輕，他們對於實際工

作沒有準備；所以他們很快就下了舞台。但是他們中間的工作規模，大部份都是很廣泛的。他們中間有許多，開始具有民意派的革命思想了。他們在青年時期，差不多都很高興崇拜社會主義的英雄。要放棄這種英雄傳統感動人的印象，曾經須要鬥爭，同時並與無論如何想始終忠於「民意黨」而為年輕社會民主黨人所非常敬重的人們斷絕關係。鬥爭使他們不得不來研究和閱讀各派黨秘密著作；來極力研究合法民粹主義的問題。在這種鬥爭中訓練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跑到工人運動中去了，同時「一分鐘」都沒有忘記以光明開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沒有忘記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一八九八年春天黨底成立[⊖]，是這一時期社會民主黨人最出色的、同時又是最後的工作。

第三個時期，我們已經知道，是在一八九七年開始準備，於一八九八年完全起來代替第二個時期（這時期從一八九八年起，但不知到那一年止）。這是零亂、分散和動搖的時期。在牛成年時代，人底樣子可以變壞。這時期底俄國社會民主黨，牠的樣子也變壞了：一方面在司特魯威和普羅科波維奇，布爾加可夫（Bulgarov）和伯爾加也夫（Bardzayev）等先生底作品中，另一方面

⊖ 這一年底三月，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編者註）

在依萬新和R·M·，克里却夫斯基及馬丁諾夫底著作中，都唱起不合腔調的歌來了。但是結果各走各的路；祇有領導者退向後去：運動本身還是繼續增長而大步前進。無產階級鬥爭，傳佈到了新的工人階層，伸張到了全俄；同時間接地影響了學生階層和其他人民階層間的民主精神底興奮。領導者底覺悟性，在自發高潮底廣度與強度之前表示無力；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另外一等人物已佔到了優勢，——這些人物，差不多祇是在「合法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訓練出來的，但是羣衆底自發性越要求他們的覺悟性，這些著作就越是不够。領導者不僅在理論上（「批評自由」）和實際行動上（「手藝主義」）落在運動之後，而且還想用各種誇大的論據來擁護自己的落後性。合法著作的勃連唐諾派和非法著作的尾巴主義者，都把社會民主主義降到了工聯主義。「信仰」底綱領已開始在實現了——尤其是當社會民主黨人底「手藝主義」引起了非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思潮底興旺的時候。

因此，假使讀者責備我，說我關於什麼「工人事務」講得太多了，那我就這樣答覆：「工人事務」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牠最露骨地反映了這第三時期底「精神」①。真正表現零亂和動搖，真正表現準備向評「宗」，向「經濟主義」，向恐怖主義讓步的，乃是蘇漢底底R·M·，而是隨風飄流的克里却夫斯基和馬丁諾夫之流。這時期底特點不是什麼崇拜「絕對」的人之

輕視實際行動，而正是渺小的實際主義與完全疏忽理論這種現象之結合。這時期底英雄所做的事業，與其說是直接否認「偉大的話」，不如說是把牠庸俗化：科學的社會主義已不成爲整個的革命理論，而變成了混合物，而「自由地」把一切新的德文教本內的液體滲進去；「階級鬥爭」的口號未曾推動向前去作更廣泛更積極的活動，却曾用做平服人心底工具，因爲「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有不可分離的聯繫」；黨底觀念未曾用來號召去建立革命家庭鬥爭組織，却會袒護什麼「革命的官場習氣」和「民主」形式的兒戲。

第三個時期什麼時候結束，第四個時期（現在至少已有許多標誌證明第四個時期之快要到來了）什麼時候開始；這我們還不知道。這裏我們從過去歷史底領域進到現在的，一部份是將來的領域。但是我們深信第四個時期將使戰鬥的馬克思主義鞏固起來，深信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擺脫危機時，更將強固而勃發起來，深信最革命的階級底真正先鋒隊，將起來「代替」機會主義者底後

⊙德國俗話說得好：「打貓嚇媳婦」。不僅「工人事務派」，而且是大批的實際家。理論家都傾心於時髦的「批評」；在自發性問題上弄糊塗了，由我們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底社會民主黨的見解落入工聯主義的見解。

術隊。

在號召實現這種「代替」的意義上並歸納以上所說的一切，我們對於「做什麼？」這個問題可作一簡單的回答：消滅第三個時期。

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二年

爲什麼社會民主黨應向社會革命黨人宣佈

堅決無情的戰爭

爲什麼社會民主黨應向社會革命黨人宣佈

堅決無情的戰爭（註釋四七）

（一）因爲在我們的社會思想中那個以「社會革命派」著名的思潮，實際上正在而且已經離開了現時唯一的國際的革命社會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在國際社會民主黨分爲機會主義派（伯因斯坦派也在其內）與革命派這個偉大的破裂中，這一思潮採取了極不明確極不澈底的騎牆態度，它只根據一種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批評而承認馬克思主義是「被搖動了的」（『俄國革命導報』第二期第六二頁）；它約許按照自己的意見來重新「審查」馬克思主義，但絲毫沒有做過一些工作來實行這句嚇人的約言。

（二）因爲社會革命派很可憐地跪拜於俄國社會政治思想上的統治派別之前，這一派別應當稱爲自由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重複「民意黨」和所有一般舊的俄國社會主義底錯誤，同時沒有

看見這一派既完全零落和內部的矛盾，而僅以革命詞句附加于自由民粹派先哲歐古調上來算作自己在俄國革命思想方面的獨立創作。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破天荒地破壞了自由民粹派底理論基礎，暴露了它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內容，過去現在都在向它宣戰，不因許多批評派的（非機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轉入敵人營壘而慌張。可是在這次戰爭整個過程中，社會革命黨至多只佔了敵視的中立地位，他們又是在俄國馬克思主義（從俄國馬克思主義那裏他們祇抄襲了很少的語言）與似乎是社會主義的自由民粹派之間採取騎牆態度。

（三）因為社會革命黨人，由於他們在國際和俄國社會主義問題上全無原則（這是上面所指出的），不懂得或不承認階級鬥爭這個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則。他們不懂得：在現代的俄國，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會主義的黨，只有是將社會主義與俄國工人運動結合為一的黨；俄國工人運動由於正在發展的俄國資本主義而逐漸有力地和逐漸廣大地方產生出來。社會革命黨人對俄國工人運動始終是採取旁觀鑒賞的態度。譬如，當這個運動患了經濟主義毛病（由於發展得很快的緣故）的時候，社會革命黨人一方面看見從事喚醒工人羣衆的這種新穎而困難的事業的人們犯了錯誤，就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另一方面則阻撓那個向這種經濟主義作了、而且有勝利地作了鬥爭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運動的騎牆態度，結果必然弄到實際上脫離工人運動；因為脫離了工人運

動，社會革命黨就失去了任何的社會基礎。它沒有依靠任何社會階級，因為這些稱自己的散漫性與無原則性爲『廣大性』的動搖的智識份子集團，不配叫作一個階級。

(四) 因爲社會革命黨人輕視社會主義思想系統而想同等地依靠智識階層、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這樣，結果必然會(不管他們的意志如何)使俄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受資產階級民主派去束縛。對理論的蔑視態度，對社會主義思想系統表示躲避和動搖，這必然成爲資產階級思想系統的玩具。如果把俄國智識份子和俄國農民這些階層拿去與無產階級對。比。起。來，那這些社會階層就祇能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底支柱。這不僅是一種從我們全部學說中所必然得出的意見(例如，根據這種學說，祇有當小生產者在某種限度內與商品經濟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斷絕一切關係而轉到無產階級觀點上來，他才在某種限度內是革命的)，不，這並且還是一件現在已在開始起作用的直接事實。而在政治變革底時期和政治變革底後一天，這件事實必然會更加厲害地起作用。社會革命派的思想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底動搖性和小資產階級使社會主義庸俗化的表現之一，社會民主黨應當始終、而且將向這些表現作堅決的戰爭。

(五) 因爲社會革命黨人所已經指出——我不說提出而說指出——的那些實際綱領的要求，已非常顯明地暴露出，這一派底無原則性在實際行動上有何等大的害處。比如，載在『革命的俄

國」第八期上的（正確些說：散在我們的民粹主義底陳腐老調內的）最低土地綱領，第一，牠既約許農民實行『最低限度』綱領——土地社會化而使農民走入迷途，又在工人中間散播關於農民運動真實性的完全錯誤的觀念又使工人走入迷途。這種輕浮的允諾祇是一般地破壞革命黨底聲望，局部地使科學社會主義之主張一切生產資料社會化作爲我們的最終目的的學說失去信仰。第二，社會革命黨人在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綱領上主張幫助並發展合作社，這樣就完全離開了革命鬥爭底立場，而把自己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降到最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地步。第三，社會革命黨人會起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關於消滅一切中世紀鍊縛的要求（這些鍊縛縛住了我們的村社，使農民束縛於分地上，剝奪了他們的遷徙自由，使他們必不可免地處於等級上的卑賤地位），這樣也就是表明，他們甚至還不能擺脫俄國民粹主義底反動學說。

（六）因爲社會革命黨人將恐怖列入自己的綱領，鼓吹恐怖，把它作爲政治鬥爭底現代式的手段；他們這樣就給運動以最嚴重的害處，破壞社會主義的工作與革命階級底羣衆之間的不分離的聯繫。無論那種口頭上的担保和宣誓，終究不能推倒這件鐵的事實：社會革命黨人現在所採用與鼓吹的恐怖，同羣衆中的工作以及爲羣衆而作的、與羣衆一起作的工作沒有絲毫的聯繫；恐怖主義行動底黨的組織，使我們的人數極少的組織人材離開他們困難而還遠未執行的組織革命

工黨的任務；社會革命黨人底恐怖，實際上無非就是為歷史經驗所完全排斥的一場單人決鬥而已。現在社會革命黨人之大聲疾呼地宣傳恐怖，連外國的社會黨人聽了也開始憤激起來。至於在俄國工人羣衆中，則這種宣傳簡直是散播許多有害的幻想：以為恐怖『迫令人們甚至違反着自己的意志來作政治思想』（『革命的俄國』第七期第四頁）；以為恐怖『要比數月的口頭宣傳更可靠地能夠改變千百人……對革命者和革命家活動底意思（目）所持的觀點』；以為恐怖能夠『給與被許多示威底悲慘結果所嚇怕了的動搖份子以新的力量』（同頁）以及其他等等的話。這些有害的幻想祇能引起迅速的失望情緒和使準備羣衆襲擊專制制度的工作減弱起來。

一九〇二年作

社會革命黨人所復活起來的庸俗社會主義

和民粹主義

社會革命黨人所復活起來的庸俗社會主義

和民粹主義

嘲笑也有好的影響。在題名『革命的冒險主義』這篇文章上，我們曾表示堅定的確信：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始終不願直率而確當地決定自己的理論立場。『革命的俄國』爲着推翻這個惡意的不公平的推測起見，在第一期上開始發表了幾篇文章，題名爲『綱領問題』。恭喜恭喜！遲做比不做總要好些。我們預先歡迎『革命的俄國』底一切討論『綱領問題』的文章，並且答應仔細考察牠們，看看實際上能不能從牠們中間讀出什麼綱領來。

爲了這個目的，我們現在來看第一篇文章：『農村中的階級鬥爭』。但是，開始我們要指出：我們的對頭又是過於『性急』，竟聲言（第十一期第六頁）『我們的綱領已經提出來了』。先生們，要知道是不對的啊！你們還沒有提出什麼綱領來，就是說，你們不僅還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完

滿地，正式用黨的名義敘述出來（狹義的綱領，或至少是綱領草案），而且對這樣基本的「綱領問題」，如馬克思主義和對他的機會主義的批評問題，俄國資本主義問題，由這個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無產階級底地位、意義與任務等問題，都還完全沒有決定自己的態度。關於「你們的綱領」，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你們一方面在革命社會民主黨派與機會主義派之間，另一方面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與俄國自由民粹派之間，採取一個完全不確定的立場。

你們因為想作騎牆派而陷於何等無出路的矛盾狀態，這一點我們現在也要在你們所選擇的問題上來指給你們看。「革命的俄國」（第十一期）寫着：「我們並不是不懂我們不承認現代整個農民是屬於小資產階級」。『在我們看來，農民嚴格地分爲兩個原則上不同的階層：（一）是靠剝奪本身的勞動力（？！）而生活的勞動農民；（二）多少是靠剝削別人的勞動力而生活的農村資產階級——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人底理論家認爲「收入底來源」（享用他的無報酬的勞動）是資產者這個階級底「基本特徵」，於是認爲農村無產階級與「自耕農」，——以自己的勞動應用於生產資料爲生的農民——之間有「很大的原則上的相同」。『農村無產階級與自耕農底生活基礎都是勞動——一定的政治經濟的範疇。這是第一。第二，農村無產階級與自耕農在現時條件下都是受殘酷的剝削。所以應當把他們合併成爲一種勞動農民。』

我們故意這樣詳細地敘述『革命的俄國』底言論，爲的是要使讀者能够好好地把他思索一下，對牠的理論前提作一番估計。這些理論前提之不能成立，是顯而易見的。把收入底來源當作社會各種不同的階級底基本特徵，這就是等於把分配關係放在第一位，而實際上分配關係祇是生產關係底結果而已。這個錯誤，馬克思早已指出過，他把看不見這錯誤的人稱爲庸俗的社會主義者。各階級間的區別底基本標誌，就是牠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因而也就是牠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佔有某部份社會生產資料，把牠們變爲私有經濟，變爲爲出賣生產產品而經營的經濟——這就是現社會中一個階級（資產階級）與沒有生產資料而出賣自己勞動力的無產階級之不同的基本特徵。

再講下去吧。『農村無產階級與自耕農底生活基礎都是勞動——一定的政治經濟的範疇』。一定的政治經濟的範疇，不是勞動，而祇是勞動底社會形式，勞動底社會結構，或者換句話說：是人們在參加社會勞動方面的彼此之間的關係。這裏又在另外一種形式之下，重複了庸俗社會主義底同樣的錯誤，這種錯誤我們上面已經分析過了。『農業主同雇農間的相互關係與自耕農夫同債主及富農間的相互關係其實是完全相同的』——當社會革命黨人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至少是完全重複了德國庸俗社會主義底錯誤。例如以米白爾格（Mühlberg）爲代表的德國庸俗社會

主義會這樣說：業主對工人的關係底實質，與房東對住客的關係底實質一樣。我們的米白爾格之流也同樣不能將剝削底根本形式與枝節形式分別清楚，而只是一般地講到剝削。我們的米白爾格之流也同樣不懂得，正是僱傭勞動底剝削才是現代整個剝削制度底基礎，正是僱傭勞動底剝削才引起社會之分成彼此不可調和而對立的各階級，而且祇有站在這一個階級鬥爭底觀點上，才能澈底估計其他各種剝削底表現而不陷於含糊性與無原則性。因此，我們的米白爾格之流，應當遭受俄國那些尊重自己運動底完整性與自己革命旗幟底「好名望」的社會主義者底堅決無情的抵抗，如德國的米白爾格所遇到的一樣。

爲要更明白地指出我們社會革命黨人「理論」底糊塗起見，我們還從實際方面來考察這個問題，用具體例子來說明牠。第一，絕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隨時隨地都總是從事勞動，被人剝削。假如不然，爲什麼把他們歸在過渡階層和居間階層呢？第二，小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完全與商品經濟社會中的農民一樣，他們也是從事勞動，被人剝削。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是否也想創造「勞動」工商人民的概念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狹隘」概念呢？第三，爲要了解他們所各種不喜歡的「信條」底意義起見，請社會革命黨人拿近城的農民來講吧，這種農民不僱用工人，靠自己的勞動和出賣各種農產品爲生。我們敢相信：即使狂妄的民粹派也不敢否認這個農民是屬於小資產階

級，不敢否認把他與僱傭工人『合併』爲一個階級（注意，這裏所講的正是階級，而不是政黨）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發展着的商品經濟社會內，近城的出賣農產品的農民與其他一切的小農民，其地位有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呢？

現在要問：社會革命黨的先生們爲什麼這樣接近於（就說得輕些吧）庸俗社會主義呢？莫不是由於這位作者底偶然的特性麼？我們只要引用『革命的俄國』第十一期而這一段話，就足以推翻這種設想了。作者說：『這裏似乎問題完全在於同樣一種經濟之大小不同，（大資產者和小資產者），而不在於兩種經濟：勞動經濟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原則上的區別（聽呵！）！』我們曾在『革命的冒險主義』這篇文章上說過：把社會革命黨人底外殼搗開，你們就可以找到伏龍超夫先生，這句話在這裏得到了最完全最明顯的證實。凡是多少知道一些俄國社會政治思想進化的人，就可以從這一句話內看出社會革命黨人底立場。大家知道：會粉飾過（而且現在還正在粉飾）我們智識界上佔統治地位的民粹派思潮的那個灰色的，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其基礎就是認爲農民的『勞動經濟』和資產階級的經濟是絕對相反的這種觀念。這個觀念底各種細微之處，會爲米海洛夫斯基，伏龍超夫，達尼松等等先生們詳細製擬出來，牠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所反對的中堅之一。我們已經說過：要幫助破產的被壓迫的農民，就須放棄幻想而來直接考

察實際，這種實際正在破壞關於勞動經濟（或是「國民生產」？）的模糊的幻想，正在指明農民經濟底小資產階級結構。我們俄國也與其他各地一樣，小的勞動經濟底發展和鞏固，祇有經過牠變為小資產階級經濟的道路才有可能。這種轉變實際上正在發生，而勞動農民之變為小企業主的這種真正實在的傾向，已為實際生活底無可置辯的事實所證明了。我們的農民和一切小生產者一樣，當商品經濟發展着的時候，他們也就屬於小資產者了：他們分裂成為少數的企業主和大批的無產階級，這種無產階級經由半工人半業主底許多過渡階段（這些過渡形式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和各工業部門內都存在着）而與「小業主」發生聯繫。

社會革命黨人對兩派社會主義思想底更迭，對舊的俄國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鬥爭採取過什麼態度呢？他們曾經簡簡單單地企圖——祇要可能的話——躲避分析問題底實質。而當躲避已成爲不可能的時候，當我們向那些想建立特別「政黨」的人們要求一定的解釋的時候，我們強迫他們答覆，用嘲笑和直接責備他們的無原則性來強迫他們的時候，——那時候他們才來重複「勞動經濟」這種民粹派的舊理論和庸俗社會主義底老錯誤。他們再重複一遍：「革命的俄

⊙即七八十年代的革命民粹主義。（編者註）

國」第十一期上這篇文章，想把「勞動經濟」的理論與階級鬥爭的理論「聯合」起來，我們認為最足以證實我們責備社會革命黨人之全無原則性的，莫過於這篇文章了。

★

★

★

我們還要指出一件奇聞：在「革命的俄國」第十一期上，會想「漂亮地」解釋何以決計不作原則上的論戰。據他們說，在「革命的冒險主義」這篇文章上，「火星報」引話引得不對。例子呢？例子就是落掉了「有些地方」這幾個字（有些地方土地從資本流到勞動方面去了）。落掉幾個與事情無關的字眼！「革命的俄國」也許想來斷定，「有些地方」這幾個字對於估計一般土地流動的問題（估計這個流動過程是不是資產階級的過程），多少有點關係。請牠這樣試一試吧。

其次，「火星報」底引證只引到「國家」兩字為止，雖然後面還有這樣的字：「當然不是現時的國家」。「火星報」底行為甚至還更可惡（我們自己來補充吧）：牠會膽敢稱這個國家為階級的國家。我們的「因好意而受侮辱的」對頭，不是要肯定地說：在我們所分析的「最低綱領」中，可以不說到階級的國家嗎？

最後，「火星報」又引了四月十六日（舊歷三日）的宣言。在這宣言中，「革命的俄國」自己也認為對恐怖的估計過於誇大。不錯，我們也引了「革命的俄國」底這個附帶申明，但是我們自

已也補充了一句：我們認爲這個附帶申明是「模稜之辭」，是含糊的暗示。革命的俄國對於這點非常不滿，於是就來解釋和報告詳情（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是證實這裏確有了須要加以解釋的含糊性）。這些解釋到底是什麼呢？在四月十六日（三日）的宣言中，據說是根據黨底要求而作了一些更正。可是這些更正又「被認爲是不充分的」，所以黨底署名已從宣言上刪去了。可是「本黨出版」等字樣仍舊保留着，而同是四月十六日（三日）的另一個宣言（「真正的」宣言），連一個字都沒有提起意見分歧或誇大的問題。「革命的俄國」引了這些解釋以後，覺得這些解釋祇是證實「火星報」之要求解釋（「火星報」稱這是「模稜之辭」和含糊的暗示）是正當的，於是自己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黨怎麼能夠在自己的印刷所內刊印他所不同意的宣言呢？他自己回答道：「這與拿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名義來刊印「工人事務」，「火星」，「工人思想」和「鬥爭」各報是完全一樣的」。說得很好。但是第一，我們各種各樣的出版物，不是在「黨」底印刷所內刊印的，而是在各派別底印刷所內刊印的。第二，當我們的「工人思想」，「工人事務」和「火星」一起出版的時候，我們自己也說過這是零亂的現象。請你們看吧，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社會民主黨自己揭示，並且攻擊自己的零亂現象並努力用鄭重的理論工作來消滅這種現象；而社會革命黨人則祇在人家揭破了他們之後才開始承認自己的零亂現象，他們因爲這件事情而屢次以

寬大自誇，似乎因爲寬大，所以對一件政治事變可以在一天內刊印兩種宣言，而這兩種宣言對這件事變（新的恐怖行動）底政治意義作直接相反的說法。社會民主黨人因爲知道從思想的零亂性中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所以他們寧願『先行分清界限，然後再謀聯合』，這樣來保證將來的聯合底穩固和成效。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則在談論自己的『綱領』時各持一說[⊖]，彷彿如『百鳥之音』，空玩一場『實際』統一底把戲，並高傲地向我們說：你們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只有各種的『派別』，我們却有一個黨！先生們，你們說得完全對，可是歷史告訴我們：『派別』與黨之間的關係，有時也像埃及王的瘦牛與肥牛一樣。要知『黨』有各種各樣的，例如過去有過『俄國政治解放黨』，可是牠兩年來的存在及其消滅都是無聲無臭地過去了。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

⊙只要把以前的社會革命黨人協會底『我們的任務』一文，與以前的『社會革命黨』底宣言（『火星報』第五期會說到這個宣言）比較一下，然後與『俄國革命導報』第一期上編輯部的申明，『革命的俄國』第七期至十一期上的『綱領性的』許多文章，以及所謂『俄國工人政治解放黨』所出版的『自由』這本小冊子（『革命的俄國』不久以前曾傳出『俄國政治解放黨』與『社會革命黨』聯合的消息）等等東西比較一下就夠了。

地方自治運動底追究者和自由主義底

安尼巴

地方自治運動底追究者和自由主義底

安尼巴^①（註釋四八）

第五章

R·N·S·^②先生底序言有很多極有趣味的地方。在這篇序言中曾講到極廣泛的問題：俄國政治革命問題，這種改革底各種方法問題，從事這種改革底某些力量底意義問題。另一方面，

• N·S·先生顯然的與一切的自由派——尤其是地方自治的自由派有密切的關係，他在我們「秘密」作品底合唱中，顯然是唱着一些新鮮的調子。因此，爲着說明地方自治運動底政治意義這個原則問題起見，和爲着認識接近自由派的人們底這些色彩及情緒（我不說思潮）起見，很值得詳細談一談這篇序言，分析這個新調子是好的還是壞的，牠好到什麼程度，壞到什麼程度，並且

壞在什麼地方？

R·N·S·先生底見解，其基本特點如下。從我們下面所引的他的文章上的許多話內可以看到，他是崇拜和平的漸進的和絕對合法的發展的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反對專制制度，渴望政治自由。可是專制制度之所以成爲專制制度，正是因爲他禁止和追究一切向着『自由』的發展。這一個矛盾充滿了R·N·S·先生底整篇文章，使他的議論極不澈底，極不穩固而動搖。祇有推測或者至少是假定，專制政府自己會明白、疲倦、讓步等等，才能把立憲主義與專制俄國非常合法的發展這種觀念互相容納。而R·N·S·先生的確從他的公民義忿的高峯上跌到最落後的自由主義的觀點上去了。舉個例吧，R·N·S·先生關於自己說……「我們認爲俄國現代自覺人物謀政治自由的鬥爭，是他們的安尼巴的宣誓，這種宣誓是與四十年代人物謀農民解放的鬥爭一樣的神聖」，……而且還說……「我們這些發了安尼巴的宣誓要與專制制度奮鬥的人們，無論何等困苦」，

①安尼巴（Hannibal）爲古迦太基（Carthage）名將，曾數度進攻羅馬，並越過阿爾卑斯山（Alps），最後終爲羅馬所敗，仰毒而死。在此地「安尼巴」作義士解。（校者註）

②司特魯威先生底匿名。一九〇八年版上作者底註解。（編者註）

等等的話。說得真好，說得真有力！如果他的整篇文章也充滿着這種不屈不撓的不可調和的鬥爭精神（「安尼巴的宣誓！」），那末，這些有力的話也許可以作為文章底裝飾。這些有力的話，正因為牠們這樣有力，所以如果在說這些話的時候，還滲進一種人工的調和平靜底調子，還企圖不惜一切牽強而發表和平的絕對合法的發展底思想，那末，這些話就成爲假話了。可是在R. N. S. 先生方面，這樣的調子和這樣的企圖，可惜太多了。例如他寫了一頁半的文字來詳細「說明」這樣的思想：「尼古拉二世當朝時的國家政策，比較亞力山大三世時代之完全變更亞力山大二世底改良（註釋四九），從道德和政治觀點上看來，值得受還更（着重點是我們加上的）嚴厲的斥責」。爲什麼要作更嚴厲的斥責呢？原來是因爲亞力山大三世是會與革命作過鬥爭，而尼古拉二世却與「俄國社會底合法要求」作過鬥爭；亞力山大三世與政治上自覺的社會勢力作過鬥爭，而尼古拉二世却與「非常和平的，有時甚至全無明確的政治思想而活動的社會勢力」作過鬥爭（「這些社會勢力甚至不十分懂得，牠們的自覺的文化工作可以消磨國家制度」）。這一點在事實上是很不正確的——這點我們以後再說。但是除了這點之外，我們還不能不指出，作者議論過程的本身很令人奇怪。他批評專制制度，他從兩個專制君主中間更厲害地批評一個，並不根據仍與過去一樣的那種政策底性質，而只是因爲在這個專制君主面前已沒有（好像沒有）「自然而然的」

足以引起劇烈抵抗的「吵架者」，因而也就沒有引起追究的藉口。使用這種論據的本身，是不是顯然遷就那種順民的說法：我們皇帝老爺用不到害怕召集良善人物，因為這些人物甚至從來沒有想到越出和平要求和絕對合法的範圍的事情。假使我們在維特（Vitt）先生那裏讀到這樣的「思想過程」（或稱謠言過程），那不能使我們驚奇。維特先生在自己的報告上寫着：「原來，在既無政黨又無革命的地方，在誰都不反對上層政府底威權的地方，那裏就不能以行政機關與人民或社會相對立……」①，和其他的話。齊吉林先生（Chirkov）底那種議論也不能使我們驚奇，這位先生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一日）②以後給米留庭伯爵（Mikhailov）的呈文上曾說過：「政府首先必須表示自己的毅力，以證明牠未曾在威嚇之下捲起自己的旗幟」，「祇有自由機關是上層政權本身底和平發展與平靜提倡之結果的時候，君主制度才能與牠們相容」。他主張建立「強有

①第二〇五頁。R. N. S. 先生在這一段話底註解中曾指出「這甚至是不聰明的」。說得完全正確。但是難道上面所說的他序言中九頁至十二頁的這段議論不是從同一種論據製成的麼？

②在這一民意黨人刺殺了亞力山大二世。（編者註）

力的和自由派的」政權，在「由選舉成分所加強和革新的立法機關」的幫助之下來活動。若是齊吉林先生這種人認為尼古拉二世底政策更值得斥責，因為他當朝時，上層政權本身底和平發展和平靜提倡，本來能夠產生自由機關；那是完全自然的。可是這發了安尼巴的宣誓要與專制制度鬥爭的人，口裏發出這樣的議論，這是否自然，是否好聽呢？

而且事實上，R. N. S. 先生也是不正確的。當他把現在皇朝和過去皇朝兩相比較的時候，他說：「『民意黨』人過去所崇拜的那種暴力政變，現在誰都不去認真地想到牠」。這句話祇是替他自己講的！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最近皇朝統治期內，俄國革命運動，不僅沒有衰亡和不僅不比過去皇朝時代滅弱，而且正是相反，牠還復興了和發展了許多倍。如果革命運動底參加者中間誰都不去認真地想到暴力政變，那末，這還成什麼「革命」運動呢？人們也許要反駁我們道：在上面所引的這段話中間，R. N. S. 先生所指的不是一般的暴力政變，而是特別的「民意派的」政變；就是說是政治的同時又是社會的政變，不僅是要推翻專制，而且是要奪取政權的政變。這樣的

①維特底『報告』第一二二頁——一二三頁。『羅利司·梅利可夫伯爵底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Count Loris-Melikov)第二四頁。

反駁是沒有根據的，因為第一，在專制政體本身看來（即是從專制政府看來，而不是從「資產階級」或「社會」看來），重要的並不在於爲着什麼要推翻牠，而在於要推翻牠。第二，在亞力山大三世當朝底開始，「民意黨」人向政府所提出的哀的美敦書，正如社會民主黨向尼古拉二世所提出的一個樣子：或者是革命鬥爭，或者是放棄專制政體（參看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十日）「民意黨」執行委員會給亞力山大三世的信。在這封信上曾提出兩個條件：一，大赦一切政治犯；二，在普選制和出版、言論、集會自由底條件下召開俄國全民代表會（註譯五〇））。的確，R·N·S·先生自己也明明知道「認真地想到」暴力政變的，不僅在智識階層中間，而且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間也有許多人。請看他的文章中第三九頁和以下的各頁，那裏說到「革命的社會民主派」，並說這一派人「既有羣衆基礎，又有智力」，他們從事「堅決的政治鬥爭」，從事於「革命俄國與專制官僚統治的流血鬥爭」（第四一頁）。因此，毫無疑義地，R·N·S·先生底「好意言論」，祇是一種特別的方法，特別的企圖，想藉表示自己的（或別人的）謙遜態度來感動政府（或「社會輿論」）而已。

但是，R·N·S·先生以爲鬥爭這個概念可以把牠解釋得很廣。他寫着：「地方自治局底取消可以給革命宣傳以很大的勝利機會——我們十分客觀地（是啊！）來講這句話，我們對於普通的

所謂革命活動沒有什麼厭惡態度，可是我們也並不正要讚美和仰慕這種為謀政治和社會進步的鬥爭形式（是呵！）。這一段話說得真是響亮極了。假使把那個大吹其完全文不對題的「客觀性」的似乎深奧的說法揭開一看（既然作者自己提出他寧願某種活動或某種鬥爭形式，那末，這裏說到他的態度底客觀性真是牛頭不對馬嘴了），那末，這裏得出一個舊的，舊得不堪的論據：當權的老爺們，如果我用革命來威嚇你們的話，你們可以相信我，因為，我對於革命是全無興趣的。援引客觀性無非是掩飾主觀上仇視革命和革命活動的無花菓葉而已。而R·N·S·先生之所以須要掩飾，是因為這種仇視態度與安尼巴的鬥爭宣誓是絕對不相容的。

但是，我們關於這位安尼巴本身的估計，是否錯誤呢？實際上他是否宣誓要與羅馬人鬥爭呢？還是僅僅要為迦太基（Carthage）底進步而鬥爭呢（迦太基底進步，結果當然有損羅馬）？鬥爭這字底了解是否可以不這樣「狹小」？R·N·S·先生認為是可以的。從安尼巴的宣誓與以上所引的一段話對照看來，所謂與專制政體的鬥爭可以有各種「形式」：一種形式是革命的，非法的鬥爭；另一種形式是一般的「謀政治進步和社會進步的鬥爭」，換一句話說就是和平的，合法的活動，在專制制度所許可的範圍內培植文化。我們毫不懷疑：在專制政體之下，足以推動俄國進步的合法活動也是可能的：在有些情形之下，可以很快地推動技術進步，在少數情形之下，可以很

少地推動社會進步，在完全特殊的情形之下，和完全微小的限度之內，也可以推動政治進步。可以爭論的問題就是：這種微小的進步小到什麼程度和可能到什麼程度，這種進步底單個情形，在那種程度內能够使這種專制制度在各處和經常向人民施行的大規模的政治的誘惑失其作用。但是要把它——雖然是間接地——和平合法的活動解作與專制制度的鬥爭，這就是促進這種誘惑，就是削弱俄國庸人腦裏本來已極薄弱的關於公民應對政府底一切行為負責的意識。

可惜，在不合法的作家中間，R·N·S·先生還不是獨一無二的人物哩。這些不合法的作家想把革命鬥爭與和平文化運動間的差別擦去。他有一位前輩人，這就是R·M·先生，著名的『工人思想附刊』上『我們的實際情形』（一八九九年九月份）這文底作者。當他反駁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員時，他寫道：『要知無論是為鄉村的和城市的社會自治而鬥爭，無論是為公共學校而鬥爭，無論是為公共法庭而鬥爭，無論是為社會賑濟饑民而鬥爭以及其他的鬥爭；這都是與專制政體的鬥爭……這種社會的鬥爭，因為某種奇怪的誤會而使許多俄國革命作家沒有加以懇切的注意；我們已見到俄國社會正在進行這種鬥爭，而且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現在的問題就在於：這些社會階層怎樣能够更順利地來進行與專制制度的鬥爭……而對於我們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工人應當怎樣與專制政體作這種社會鬥爭，而我們的革命者是把工人運動看作推翻專制政體的良好手段』

的」（看第八至九頁）。你看：R·N·S·先生竟認爲無須掩飾自己對革命者的仇視態度；他把合法黨的反對派態度與和平的工作公開稱爲與專制政體的鬥爭，甚至還把工人應當怎樣進行「這種鬥爭的問題」看作主要的問題。R·N·S·先生固然決沒有這樣幼稚和這樣公開，可是我們的自由派與極端崇拜純粹工人運動的人彼此間的政治傾向有血統關係，這是一目瞭然的①。

至於講到R·N·S·先生底『客觀主義』，那末，我們應當指出：他有時簡直是拋棄這種客觀主義的。當他談到工人運動，談到工人運動底有機發展，談到革命社會民主黨將來不免要與專制政體作鬥爭，談到自由派組織非法政黨將是地方自治局取消底必然結果——當他談到這些問題的時

① R·N·S·先生在另一個地方說「工人底經濟組織是工人羣衆切實的政治教育底學校」。我們奉勸作者謹慎些來應用這個爲機會主義健將所用壞了的『切實』的字眼；不能否認，在某種條件之下，就是工人底經濟組織也能給他們以許多政治教育的材料（同樣也不能否認，在別種條件之下，這些組織能給他們一些政治誘惑的材料）。但是祇有各方面的參加革命運動直到公開的巷戰，直到與政治上經濟上的奴隸制度底擁護者作國內戰爭，才能給工人羣衆以切實的政治教育。

候，他還是「客觀的」。所有這些他解說得極切實極嚴重——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值得稱慶在自由派中間廣佈對於俄國工人運動的正確的觀念。可是當 R·N·S·先生開始不談到與敵人鬥爭，而談到敵人可以「從順」的時候，他一下子就失去了自己的「客觀主義」，表現自己的感覺，甚至從敘述語氣一變而為命令語氣。

「假使在當權者中間有一種人能有勇氣順從歷史，並使專制君主也順從歷史，只有這樣才能使革命的俄國與官僚制度不至於弄到最後的流血鬥爭……無疑的，在上層官僚界中間是有不同情反動政治的人的……他們這些唯一能够接近御座的人物，從來不敢高聲發表自己的意見……可是，或者必然的歷史結算底巨大的鬼魂，偉大事變底鬼魂，使政府中發生動搖而及時破壞反動政治底鐵的制度。要做到這一點，現在所需要的力量比較不多……或者牠（政府）也將不十分遲緩地了解，用各種方法來保護專制政體，是有定命性的危險。或者牠還沒有遇到革命，自己就因與自然的、歷史上必然的自由底發展作鬥爭而疲憊，對自己「不可調和的」政策動搖起來。他不能自始至終來與自由鬥爭，他就不得不同自由逐漸廣泛地開放鬥戶。或許……不，不僅或許，而且一定會這樣！」（着重點是作者加上的）

阿彌陀佛！我們對於這段善意的高尙的自供詞只要說這四個字就行了。我們的安尼巴竟進步

得這樣快，他已在我們面前扮作第二種形式了：第一種形式——與專制政體鬥爭，第二種形式——培植文化，第三種形式——號召敵人順從而企圖以『鬼魂』來恐嚇敵人。這是何等可怕呵！我們完全同意高尙的R·N·S·先生所說的，俄國政府底偽聖人在塵世間最怕的就是這種『鬼魂』，我們的這位作者在作這種招魂咒符以前，指出革命力量底發展和將來的革命爆發而嘆息道：『這種狂妄的侵掠的保守的政策，既無政治意義，又無絲毫道德根據，將使人才和文物都受到可怕的犧牲，我們一想到這一點就覺得十分沉痛』。關於革命爆發這種議論底結局，是暴露出怎樣漫無止境的教條主義與洗禮觀念！作者絲毫不懂得：如果俄國人民祇要有一次好好地打擊政府，這是有何等偉大的歷史意義呵。你們不指出現在和過去人民使專制政體所遭的『可怕的犧牲』，來激起仇恨與憤怒，激動鬥爭的決心和熱情——你們不這樣做，你們反而援引將來的犧牲，來恐嚇人家使之不敢去鬥爭。唉，先生們！你們與其用這些結尾來損害這種議論，最好索性不要議論什麼『革命爆發』。你們大概不想做『偉大事件』，而祇想空談『偉大事件底鬼魂』，而且只是與『能够接近御座的人』去空談。

大家知道，對鬼魂談論，或空談鬼魂，這一類的論調在我們合法的報紙上也是連篇累牘。有些人爲要給鬼魂以切實的意義，通常都引『大改革』爲例，而替牠作虛偽的吹噓。受檢查的作家

說謊，有時不能不加以原諒，因為不是這樣他就不能說出自己對政治改造的要求。可是R·N·S·先生卻沒有受過檢查。他寫道：『想出大改革，其用意不在使官僚制更加慶祝勝利』。看吧，這句辯護的話是如何避開了問題底實質！由誰『想出』來的呢？由蓋爾真，齊內雪夫斯基，翁可夫斯基以及他們的同道者呢？可是這些人所要求的比改革所實現的要大得無可比擬哩。他們因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受了政府——實行『大』改革的政府——底追究。還是由政府以及盲從政府而痛恨『吵架者』的人想出來的呢？但是政府採取各種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方法，以便儘量地少作讓步，以便裁減民主要求，而且正是爲『官僚制更加慶祝勝利』而裁減民主要求，R·N·S·先生明知道這一切歷史事實，他所以要抹殺這些歷史事實，是因為牠們完全可以推翻他所謂專制君主能夠『順從』的這種寬宏大量的理論。政治上沒有順從的餘地，祇有絕頂的蠢漢（神聖的和狡猾的蠢漢）才會把警察的古老方法當作順從，這個方法就是：先來離間，後來駕馭，讓出輕的，保持重的；左手交去，右手奪回……。『亞力山大二世底政府想出和實行「大改革」的時候，當時並沒有這種自覺的目標：無論如何要截斷俄國人民到政治自由的一切合法道路，並沒有從這個觀點上去衡量自己的一切步驟，一切法律條文』。這是胡說。亞力山大二世底政府，『想出』改良並實行改良的時候，開始就具有完全自覺的目標：不向當時已由人提出的政治自由底要求讓步。亞力山大二

世底政府自始至終都會截斷到自由去的一切合法道路，因為牠甚至對簡單的請願都採取了高壓政策，因為牠甚至從來不許人家自由地談論自由。爲要推倒 R·N·S·先生底頌揚論調，我們只須援引我們上面舉過的維特底報告中所說的許多事實就够了。例如：關於亞力山大二世政府裏面的人物，維特白己就這樣說：『我們必需指出：六十年代著名的國家要人，他們的芳名即在感謝前代恩德的後裔中也還保存着，他們當時所做的很多的偉大事業，爲他們的後代所難能做到；他們本自己的忠實信仰，十分盡忠於自己的國君，不違背他的意志而革新國家和社會制度』（『報告』第六七頁）。本忠實的信仰，十分忠於領導警察匪夥的國君……——實話到底是實話。

讀了上面這些話之後，我們就無須奇怪 R·N·S·先生對於地方自治局在爭取政治自由鬥爭中的作用這個問題，所給的非常之少。除了通常地援引地方自治局『實際的』和『文化的』事實之外，他還潦草地指出了地方自治底『教育政治意義』，他說：『地方自治有政治的意義』，說維特先生顯然看到，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危險（對現制度有危險），只因牠發展底歷史傾向是立憲底萌芽』。講了這些似乎偶然失言的話以後，結尾便來攻擊革命家：『我們所以重視維特底作品，不僅因為牠關於專制制度說了實話，而且也因為牠是官僚自己發給地方自治的寶貴的政治證書。這一個證書，對於因缺乏政治智識或因醉心於革命空話（是呵！）而始終不願了解

俄國地方自治局及其合法的文化工作底偉大意義的政治一切人們，可以作為絕妙的答覆」。到底誰缺乏智識或醉心於空話呢？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呢？R·N·S·先生與誰不同意而且為什麼不同意呢？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答覆，而作者底攻擊，除了申明他仇視革命家——這一點我們在前文其他各段也早已看見過了——之外沒有一點別的意思。下面這一段更奇怪的話也絕對沒有說明什麼：「我們所以講這些話並不是想（？）觸犯革命人物，這些人物與專制作鬥爭時的那種勇敢精神是首先不能不加以重視的」。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講這些話的目的何在呢？勇敢精神與不會估計地方自治局之間有什麼關係呢？R·N·S·先生的確是弄巧反拙：開始他「觸犯」革命家是無憑的「匿名的」（不知反對什麼人的）話，責備別人無知識，尙空談；現在他却這樣來「觸犯」他們：以為只要一承認他們的勇敢精神，把他以前責備他們為無知識的這粒丸藥鏝一下金，就可以使人家把他吞下去。R·N·S·先生想索性把問題弄得絕頂糊塗，於是就這樣自相矛盾起來；他說（好像與「醉心」於革命空話的人同聲一氣）：「現代的俄國地方自治局並不是一種能够用自己的直接力量來使什麼人重視，來使什麼人恐怖的政治勢力……他勉勉強強保持着自己微小的地位」……「這樣的機關（地方自治局）本身祇有在遙遠的將來，而且祇有隨着國內全部文化底發展，才能感嚇這個制度（專制制度）」。

第六章

我們想來分析 R·N·S·先生講得這樣發憤這樣空洞的問題。我們上面舉過的許多事實証明：地方自治局底「政治意義」，即是說地方自治局這種爭取政治自由的因素之意義，主要的就在於：第一，俄國有產階級（尤其是土地貴族）代表底這個組織常以選舉機關與官僚機關相對立，在牠們之間引起經常的衝突，處處都指出專橫的沙皇官吏底反動性，助長不滿情緒和養成對專制政府的反對態度⊖。第二，地方自治局正如加入官僚四輪車裏的第五個輪子，想鞏固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意義，圖謀——甚至如維特所說的，「不自覺地走到」——立憲，請求頒布憲法。因此他們是政府在和革命者鬥爭中的無用的同盟者，他們對革命者保持友誼的中立態度而給他們以——雖然是間接的，但終究是無疑的——幫助，在緊急關頭使政府底高壓手段發生動搖。從來

⊖ 請參看阿克雪洛德底「俄國自由民主派與社會民主派底歷史地位及其相互關係」一書，尤其是五至八，十一至十二，十七至十九各頁對這個問題作了非常精密的解釋。該書於一八

九八年出版於日內瓦。

至多祇能作自由派的請願和友誼的中立的機關，自然算不得是政治鬥爭上一個『巨大的』或多少獨立的因素，可是要否認地方自治局是一個輔助的因素也是不行的。在這一意思上講，我們可以承認：地方自治局是立憲制底一小塊。讀者也許要說：這樣看來，你就同意R·N·S·先生了，因為R·N·S·先生所說的也只是這一點。絕對不是，這裏僅僅是我們的意見分歧之開始。

地方自治局是立憲制底一小塊。就算這樣吧。但是有了這立憲制底一小塊，正足以引誘俄國『社會』放棄真正的立憲制。這正是比較極不重要的一塊陣地，專制制度把牠讓給勃興的民主主義，以便保持自己的主要陣地，以便分散與離開要求政治改造的人們底力量。我們已看到過：在六十年代，及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一年代（註釋五一）怎樣在『信任』地方自治局（『立憲底萌芽』）的基礎上實現了這一種離開企圖。地方自治局對政治自由的關係問題是改良對革命的關係這一個總問題中的一個局部問題。我們在這局部問題上可以看到風行一時的伯因斯坦派理論底全部的狹隘性和荒謬性。伯因斯坦派的理論以改良鬥爭代替革命鬥爭，牠宣佈（例如借着伯爾加也夫先生底嘴來宣佈）：『進歩底原則——越好則越好』。這個原則底一般形式，與其相反的原則（越壞則越好）同樣的不對。當然，革命者從來不拒絕為改良而鬥爭，不拒絕奪取不重要的、局部的敵人陣地，如果這塊陣地能够加強他們的打擊力和促進他們的完全勝利的話。可是，他們也從來

不會忘記：有時候敵人自己讓出某塊陣地，爲的是要離開進攻者底力量而易於擊破他們。他們從來不會忘記：祇有常常注意『最後的目的』，祇有從一般革命鬥爭的觀點上來估計每步『運動』和每個改良，才能保證運動不作荒謬的步驟和可恥的錯誤。

正是問題底這一方面——地方自治局是用半途的讓步方法來鞏固專制制度的工具，是專制制度吸引一部份自由派的工具——正是這一方面，R·N·S·先生完全沒有了解。他寧願替自己想出一種信條式的圖表來，按越好則越好的『公式』把地方自治局和立憲一直聯貫起來。他向維特說：『假使你想先取消俄國的地方自治局，然後擴大個人底權限；那你就會失去給國家以溫和憲法的良好機會。這個溫和憲法在歷史上是在帶有等級色彩的地方自治局底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無論如何，你會給保守主義以很壞的貢獻』。何等週到而漂亮的觀念呵！帶有等級色彩的地方自治局——能够接近御座的聰明的保守派——溫和的憲法。只可惜在實際上，聰明的保守派已屢次因爲地方自治局的緣故而找到了不『給』國家以憲法的『良好機會』。

R·N·S·先生底和平的『觀念』，也曾表現在他文章結尾的口號底措辭上——這個口號會另列一行而用大號字印刷出來：『法權與執政的全俄地方自治局萬歲！』。我們必須公開承認：我們會看見『工人思想報』向廣大工人羣衆底政治成見吊膀子（註釋五二），現在又看到這位先

生也同樣一文不值地同俄國自由派廣大羣衆底政治成見吊膀子。這兩種吊膀子的企圖我們都要起來反對。這種成見認爲亞力山大二世政府沒有斷絕到自由去的道路，認爲地方自治局底存在是給國家以溫和憲法的良好機會，認爲「法權與執政的地方自治局萬歲」這個口號可以成爲憲法運動——不說革命運動，就說憲法運動吧——底旗幟。這不是幫助分清敵人與同盟者，指揮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旗幟；這是一條破巾，祇能幫助最不可靠的人混入運動，幫助政府再度以響亮的約言和半途的改良來敷衍塞責。的確，即使不是預言家也可以預料：祇要我們的革命運動登峯造極——社會上自由派的醞釀就會加強十倍——政府內就會出現新的羅利司·梅利可夫和依格拿級夫（Ignatyevs），他們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法權與執政的地方自治局萬歲！」。至少，這對於俄國是最不利，而對於政府是最有利的結局。假使比較衆多的一部份自由派相信這個旗幟，傾心於牠而從後方來襲擊「吵架者」的革命家；那末，革命家就會陷於孤立地位，而政府就會企圖用最微小的，只限於某種商權性的和地主貴族的憲法的讓步來救全自己。這個企圖能否實現，——這要看革命無產階級與政府堅決鬥爭底結局如何，可是自由派將受人欺騙，却是完全可以擔保的。政府將用 R·N·S·先生所提出的那種口號（「執政的地方自治局」或「地方自治局政權」等等）拉着自由派脫離革命者，一把抓住他的衣襟而使他嘗受所謂反動底鞭笞。先生們，那時候

我們一定要說：你們正該如此！

不提出消滅專制政體的要求而提出這些溫和的願望來作為結束的口號，這到底爲的什麼呢？第一，是爲的庸人的信條主義，庸人的信條主義想『幫忙保守主義』，並且相信這樣的溫和性可以感動政府，使政府『順服』牠。第二，是爲的要『統一自由派』。實際上，『法權與執政的地方自治局萬歲』這個口號，的確可以統一一切自由派，——這正如『一個盧布上添一個哥比』這個口號可以統一（據『經濟派』底意見）一切工人一樣。不過這樣的統一不會無益而有損嗎？如果統一能夠將被統一者提高到統一者自覺澈底的綱領底程度上，那統一就是好的東西。如果統一把統一者降低到羣衆底成見底程度上，那統一便是壞的東西。而在俄國自由派羣衆中間，下面這種成見一定傳佈得很廣：認爲地方自治局確是『立憲底萌芽』[⊖]，不過是某些傷風敗俗的奸臣底陰謀偶然妨礙着牠的『自然』的、和平的及漸進的發展；認爲幾個請願就可以使專制君主『和緩』下去；認爲一般的合法的文化工作，尤其是地方自治局的工作，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牠使那些口頭上反對專制政體的人不必積極幫助——在某種形式之下——反專制政體的革命鬥爭，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自由派底統一，這無條件地是有益的且是所希望的，不過這種統一要以反對陳舊成見爲目的，而不是向陳舊成見獻殷勤；是要提高我們政治發展性（正確些說：不

發展性)底平均程度，而不是贊成牠；總而言之，統一底目的是在幫助非法鬥爭，而不在高談合

⊙關於從地方自治局能够希望得到什麼這個問題，多爾哥露可夫(Dolskiy)侯爵在他六十年代所出版的『小報』(布爾采夫(Mitcov))，上述一書第六三至六六頁)中的下面這段批評是很有趣味的：「我們考察地方自治機關底基本原則時，我們仍舊看到政府底同樣祕密的，但常常露出馬腳來的思想：用寬洪大量的話來淆亂耳目，當衆揚言道：「看罷，我賞賜了你們多少東西！」，可是實際上想儘可能的少給；少給他們之後，他還設法阻撓，使他們甚至不能完全享用這些賞賜……在現時專制制度之下，地方自治機關不會而且也不能有所裨益，不會而且也不能有很大的意義；可是，他們是充滿着將來大有結果的發展底萌芽……新的地方自治機關大概命中註定了是俄國未來立憲制度底基礎……可是在俄國未實行立憲政體以前，在專制政體存在的時候，在出版言論全無自由的時候，地方自治機關終究還是政治上的幻影，還是地方自治局員底無權發言的會議」。這樣看來，多爾哥露可夫，甚至在六十年代中葉的時候，也並不過於樂觀。而從那時候起，四十年中，許多經驗教訓了我們而且指示了給我們看：地方自治局被『命運』註定(一部份是被政府註定)是使立憲派耳目淆亂的許多辦法底基礎。

法行動有很大政治意義這種機會主義的空話。如果向工人提出「罷工自由」等等這些政治口號是沒有根據，那末向自由派提出「執政的地方自治局」這個口號也是沒有根據的。在專制制度之下，一切的地方自治局，即使是極其「執政」的地方自治局，也必然會成爲一種不能發展的畸形怪物；而在立憲政體之下，地方自治局立刻就要失去自己現時的「政治」意義。

自由派底統一可以表現於兩種形式：一、建立獨立的自由派的（當然是秘密的）政黨；二、自由派贊助革命者的組織。R. N. S. 先生自己也曾指示出第一種的可能性，可是……假使把這些指示認作自由主義前途和希望底實際表現，那末，他們也不能使人特別樂觀。他寫着：「如果沒有地方自治局，則地方自治的自由派或者應當組織自由派的黨，或者她就要退出歷史舞台，而不再成爲有組織的力量。我們深信：自由派組織不合法的，雖然按其綱領與策略是很溫和的黨，將是地方自治局取消後的必然結果」。假使單單是「取消」，那末這還須久待，因爲就是維特也不願意取消地方自治局，而俄國政府一般地甚至在內容已完全剝去的時候也想保存外表。自由黨將很溫和——這是極自然的；對於資產階級的運動（祇有在這種運動上自由黨才能站得住）再不能有的希望了。可是這個黨底活動，牠的「策略」到底應當是怎樣的呢。R. N. S. 先生沒有說明這點。他說：「非法的自由黨本身是一種由最溫和和最不活動的在野份子組成的組織，他不能發

展特別廣泛和特別緊張的活動……我們以為在某種範圍內，甚至在以地方的尤其是地方自治局的利益爲界限的範圍內，自由黨很能够發展特別廣泛和特別緊張的活動——譬如進行政治的揭露……『可是在別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從事這種活動的條件之下，自由黨就是不與社會民主黨締結直接協定也能成爲極嚴重的因素』……說得非常公道，讀者自然會希望作者至少略略地指出這個『因素』底工作。可是R·N·S·先生不這樣做而描寫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發展，並用這樣的話收場：『在顯明的政治運動存在時，就連多少有些組織性的自由派在野派也能盡很大的政治作用：溫和的黨，如果有靈敏的策略，總是在社會的極端份子鬥爭劇烈時從中得利的』……如此而已！這個『因素』（牠已由黨變成了在野派）底『作用』，原來就在於鬥烈時『從中得利』。關於自由派參加鬥爭——一字不講，而關於自由派底得利却提到了。這種失言可說是命裏註定的……。

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不否認：他們所首先爭取的政治自由，首先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祇有沈溺於空想主義或反動民粹主義的壞偏見中的社會主義者，才會根據這一點而起來反對與專制政體作鬥爭。資產階級享用自由，以便心滿意足，而無產階級却需要自由來儘量擴大自己爲社會主義的鬥爭。不管某部份資產階級對解放鬥爭的態度如何，社會民主黨將不斷地進行這種鬥爭。

。爲政治鬥爭底利益計，我們應當幫助一切反對專制壓迫的在野運動，不管這種運動是爲何而起的，是在何種社會階層中表現的。因此，俄國一般的自由資產階級底反政府態度，尤其是地方自治派底反政府態度，對於我們並不是不關痛癢的。如果自由派能够組織非法的黨——那就更好，我們將歡迎有產階級政治自覺性底發展，我們將幫助他們的要求，我們將盡力設法使自由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彼此互相補充[⊖]。要是不能夠的話，在這種（這是更有可能的）情形之下，我們也並不向自由派「撒手」，我們將設法與個別的人物鞏固關係，使他們認識我們的運動，在工人報紙上揭破政府一切醜態和地方當局一切詭計，這樣來幫助他們，吸引他們來幫助革命家。自由派與社會民主黨人間這種互相的幫忙，現在也在進行，不過牠應當更加擴大而鞏固起來。可是，我們始終準備着作這種相互的幫助，但我們從來不而且絕對不放棄與政治落後的一般俄國社會

⊖ 作者在四年前說到「民權黨」時曾指出自由黨的益處。參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書（一八九八年出版於日內瓦）。「……但如在這個黨（「民權黨」）內也有不是假冒的，而是真正的非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家，非社會主義者的民主派，——那時候這個黨如能設法與資產階級中政治上反對政府的份子接近，那牠就可給不少的益處……」（二六頁）

——尤其是俄國自由派社會裏非常廣佈的幻想——作堅決鬥爭。實際上，我們把馬克思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著名格言在形式上改變一下，我們關於俄國革命運動可以這樣說：俄國革命運動底進步不在於取得某種具體的成績，而在於解脫有害的幻想（註釋五三）。我們已解脫了無政府主義和民粹派社會主義底幻想，解脫了蔑視政治的觀點，解脫了相信俄國之自在發展的觀點，解脫了那種認為人民已準備妥當來舉行革命的見解，解脫了英雄的智識份子奪取政權和與沙皇作單獨決鬥的這種理論。

我們的自由派現在也應當解脫這樣一個在理論上最無根據，而在實際上最盛行的幻想了：這個幻想以為俄國專制政體還可以與國會制度同時並存，以為地方自治局是憲法底萌芽，以為憲法底誠實同情者，可以用堅忍的合法工作和堅忍的號召敵人順從這種方法來執行自己的安尼巴的誓言。

一九〇一年六月至七月。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綱領草案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綱領草案

(註釋五四)

(A)

(1) 在俄國，商品生產日益迅速地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取得日益完全的統治地位。

(2) 因為技術不斷的進步，結果使大生產日益排擠小生產。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和工廠，工具和機器，鐵路和其他交通資料）集中於比較少數的資本家和大地主手裏，成為他們私有的財產。獨立小生產者（農民，家庭手藝業者，手工業者）日益趨於破產，失掉生產資料而變成無產者，或者變成資本底傭僕和進貢者。一批一批的工作者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變成依靠

私有者的僱傭工人，以自己的勞動來爲私有者創造財富。

(3) 技術愈進步，則對於勞動力的需要底增加就愈趕不上勞動力供給底增加，資本家就愈有可能來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程度。生活底無保障和失業現象，剝削底痛苦和各種的卑賤地位日益成爲日益廣大的勞動羣衆底厄運。

(4) 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所必然引起的工業危機，使這一個過程更爲加緊。一方面是羣衆底窮乏和貧困，另一方面却因爲出產的商品找不到銷路而形成社會財富底浪費。

(5) 因此，社會的，而且日益社會化的勞動底生產力有巨大的發展，同時這種發展底一切主要利益都壟斷在極少數人手裏。社會財富增加，同時社會的不平等也增加，私有者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鴻溝也加深而擴大起來。

(B)

(6) 可是，資本主義這一切不可避免的矛盾滋長和發展起來，同時無產者底數量和團結性，不滿情緒和憤怒情緒也增長起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間的鬥爭也加劇起來，無產者想解脫不增忍受的資本主義壓迫的那種志願也增長起來。

(7) 工人階級底解放祇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情。現社會底其他一切階級都是主張保存現有經濟制度的基礎的。要真正解放工人階級，就必需有爲資本主義整個發展過程所準備的社會革命，即是消滅生產資料底私有制，將牠們變爲社會財產，取消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而代以由全社會担任的生產產品的社會主義組織，以保障全社會人員底完全幸福和各方面的自由發展。

(8) 這個無產階級底革命將完全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因而也將完全消滅階級劃分所產生的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9) 要實行這個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就應當奪取政權；這政權使他成爲社會底主人翁，使他可以剷除阻擋他達到偉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個意思上講，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革命底必需的政治條件。

(10) 俄國社會民主黨所提出的自己的任務是：在工人面前暴露他們的利益和資本家底利益之不可調和的對立性；向無產階級說明牠將要實行的這個社會革命底歷史意義、性質和條件；組織能够領導無產階級各種鬥爭的革命的階級的政黨。

(11) 可是國際交換底發展和供給世界市場的生產底發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間造成了這樣密切的聯繫，使現代工人運動應當成爲而且早已成爲國際的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將自己看作全世界

界無產階級軍隊底一支隊，國際社會民主黨底一部份。

(13) 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最近目的，因下面這種情形而大有改變：在俄國，資本主義以前的，農奴制的社會制度底許多殘餘，最厲害地阻礙生產力底發展，使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不能有充分的和各方面的發展，降低勞動羣衆底生活水平線，造成千百萬農民底亞洲式的野蠻的垂死狀態，使全體人民處於黑暗、無權利、和被蹂躪的狀況之下。

(14) 沙皇專制政體便是這些農奴制殘餘中最大的殘餘，是這整個野蠻制度之最強有力的支柱。牠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和全體人民文化發展底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

(C)

因此⑤，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最近的政治任務是：推翻沙皇專制政體而代以根據於民主憲法的共和國，這種憲法要能够保證：

(一) 人民專權，即是將全部上層國家政權集中於人民代表組成的立法會議手裏；

⑤從這裏起，是由委員會（『火星報』編輯部綱領起草委員會）全體通過的。

(二) 無論在選舉立法會議時，或在選舉各地方自治機關時，凡二十一歲以上的公民都有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權；在各種選舉中實行不記名投票；代表會議中去；人民代表應得薪金；

(三) 不得侵犯公民底人格和住宅；

(四) 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罷工和結社底絕對自由；

(五) 移居自由和職業自由；

(六) 取消等級制，不分性別、宗教和種族，一切公民完全平等；

(七) 承認國內各民族底自決權；

(八) 每個公民有權直接向法庭追究任何官吏，而不必向其上司告發；

(九) 以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

(十) 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會分離；

(十一) 未滿十六歲的兒童須受普遍的免費的義務教育，國家應供給貧窮子弟以衣食和教材。

(D)

爲着保護工人階級和提高牠的戰鬥力起見：俄國社會民主黨要求：

(一) 對於一切僱傭工人限定八小時工作日；

(二) 對於國民經濟各部門內一切男女傭傭工人，應由法律規定每星期至少要有三十六小時繼續不斷的休息；

(三) 完全禁止額外工作；

(四) 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除技術上絕對要求夜工的那些部門而外，一律禁止夜工（從晚上九時到早上五時止）；

(五) 禁止企業主僱用未滿十五歲的童工；

(六) 對於女子身體特別有害的部門中，禁止使用女工；

(七) 由法律規定，工人喪失全部或局部工作能力——因不幸事件或有害的生產條件而發生的喪失——應由僱主受民事處分；工人不必證明這種喪失之發生罪在僱主；

(八) 禁止以商品代付工資^②；

②弗立(Fly)，即列寧。編者註）底提議：這一段底開首應改為這樣：「為保護工人不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頹廢起見，以及為着提高他們謀自己解放的鬥爭能力起見」……

(九) 失去勞動能力的年老工人由國家發給撫恤金；

(十) 增加工廠檢查員底人數；在女工佔多數的部門內任命女檢查員；由工人選舉的及由國家付薪的代表來監督工廠法底履行，由工人選舉的代表來監督工資表底編製及廢貨底評定；

(十一) 由地方自治機關連同工人選舉的代表來監督廠主租與工人的住房底衛生狀況，以及監督這些住房底內部規則和出租條件，以保護僱傭工人，不使廠主干涉他們這種私人及公民底生活 and 行動；

(十二) 在凡有僱傭工人的各企業內，對於勞動條件實行組織得正當周到的衛生監督；

(十三) 工廠檢察局底監督應推行到手工業、家庭工業和手藝工業以及官辦企業中去；

(十四) 違犯勞動保護法者應受刑事處分；

(十五) 禁止廠主從工資中剋扣金錢，不管其剋扣底緣由和目的為何（罰金，廢貨扣金及其他）；

◎弗立底提議：這裏（就在同一項上）應當插入：「由法律規定，按一切僱傭條約，每星期發給工資一次」。

(十六) 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設立職業法庭，由工人代表與廠主代表各半參加。

(E)

此外，爲着俄國國家經濟底民主化起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求取消一切間接稅，規定累進所得稅。

爲着消滅舊農奴制度殘餘起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爭得⊖：

- (一) 取消贖金和農奴租金，以及取消現時農民這個納稅等級所負擔的一切義務；
- (二) 取消連環保制和一切妨礙農民處理其土地的法律；
- (三) 將過去以贖金和農奴租金的形式由民間取去的款子歸還人民；爲此必須沒收廟宇的和封主的地產，同時對於曾經享用贖金借貸的大貴族地主應課以特別稅；用這些方法獲得的款子應

⊖ 弗立底提議：這裏應當插入下列的字句：『並爲着鄉村階級鬥爭自由發展起見』；使全段成爲這樣：『爲着消滅舊農奴制度殘餘起見，並爲着鄉村階級鬥爭自由發展起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爭得』：

變為特殊國民基金，以供村社文化和慈善事業上的需要；

(四) 設立農民委員會，以便：

(a) 將在農奴制取消時從農民土地上割去而成為地主束縛農民的武器的那些土地，歸還村社（用剝奪的方法或是——在土地已從一種人手裏轉到別種人手裏的時候——用贖買和其他的方法）；

(b) 消滅在烏拉爾、阿爾泰、西都邊疆和國內其他地方還保全着的農奴制殘餘；

(五) 法庭有權減低過高的地租，將帶有束縛性的契約宣佈無效。

(F)

為要達到自己最近的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起見^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贊助一切反對俄國現存社會政治制度的反政府的和革命的運動，並堅決反對一切改良計劃，這些計劃認為警察對勞動羣

① 弗立底提議：將這段的開始改為這樣：「為要爭取上述的要求起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等等。

家的監視底每次擴大都是走向解決社會問題的步驟①。

同時，俄國社會民主黨深信：上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底完滿的澈底的和穩固的實現，祇有推翻專制制度和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達到。

一九〇年正月至二月。

①弗立底提議：將這一段末尾改爲這樣：「這個計劃是與警察官僚對勞動羣衆監視底任

對於普列漢諾夫第二個草案的批評

對於普列漢諾夫第二個草案的批評

整個草案充滿着四個基本缺點，我以為這四個缺點使這個草案完全不能採用：

(一) 就其最重要的關於估計資本主義的部份底措詞方法講來，這一個草案所給予我們的，不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正在反對極確定的資本主義底極切實的表現）底綱領，而是關於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教科書底綱領。

(二) 這個綱領對於俄國無產階級底黨特別不適用，因為俄國資本主義底進化，俄國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矛盾和社會災難，差不多完全由於這樣估計一般的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略去和含糊了。俄國無產階級底黨，在自己的綱領上，應當最確切地說明俄國資本主義底罪惡，對俄國資本主義宣戰。尤其是因為俄國的綱領在這一點上不能與歐洲各國的綱領相同，所以這一點更屬必要。歐洲各國的綱領說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時，並不指出，這些概念對於奧國和德國以及其他國

家一律適用，因為這是自然明白的。可是對於俄國就不能這樣說了。

光是說『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一般地具有某些特點，——而在俄國，資本主義『日益佔着統治地位』，這就是離開在實際作戰的黨看來最關重要的那種具體的問罪和宣戰。

因此，這個草案不能達到綱領底主要目的之一：給黨一個指示，使之能够關於俄國資本主義各種各樣的表現作日常的宣傳與鼓動。

(三) 草案內有幾個最重要的問題有這樣的不妥當的措詞，以致必然會產生許多最危險的誤會，使我們的理論鬥爭和宣傳發生困難。例如：大生產底增長僅僅只限於『工業的』企業。農業資本主義底進化，不是弄含糊了，便是完全略過了。其次，不說『無產階級專政』，而說『無產階級受到那些善於資本主義剝削的其他人民階層底幫助而將要完成的革命』；甚至不說『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而說『勞動羣衆底和被剝削羣衆底鬥爭』。這樣的措詞是與國際底基本原则相矛盾的，這個基本原则就是：『工人階級底解放祇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情』。除了無產階級之外，別部份的『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主要的是小生產者），在自己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祇帶有局部的革命性。祇有當他們感覺到他們會變爲無產階級，而『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他們才是革命的。可是，小生產者底反動性在草案內却完全沒有提到，因

此，無產階級對「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關係，一般地和整個地說得不正確。例如，草案中說：「他們（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鬥爭——首先是他們的先進代表——無產階級——底鬥門，正在緊張起來」。小生產者「鬥爭之緊張」，在反猶太主義上，在凱撒主義（*Caesarism*）上，在農民協會反對雇農的鬥爭上，甚至在社會的「基郎特黨」與「山獄黨」鬥爭上，都表現出來。無產階級之代表全體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在綱領上的表現應當是：我們責備資本主義使羣衆趨於貧困（而不僅使工人階級趨於貧困），使「日益廣大的勞動人民」（而不是工人階級）趨於失業。

（四）草案時常由真正的綱領變成說明書。綱領應當給我們以簡括的，一字不多的基本原理，而由說明書，小冊子，鼓動等等去作解釋。因此，恩格斯完全正確地責備「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說：牠又冗長、又瑣屑、又重複，簡直成了一個說明書。

在草案上這個缺點表現得更厲害，重複非常之多，企圖在綱領內來解釋過程（而不是去敘述過程），目的還是沒有達到，而把綱領牽長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〇二年二月至三月

工
黨
與
農
民

工 黨 與 農 民（註釋五五）

從農民解放以來已有四十年。我們的社會自然要特別興奮地慶祝三月三日（舊歷二月十九日）——舊的、農奴制的俄國倒台底日子，答應給人民以自由和幸福的日子底開始。但是不要忘記：在慶祝者底頌揚的演說中，除了真正仇視農奴制及其一切表現之外，還夾着許多的虛偽論調。人們把這個「偉大」改良估計爲「在國家贖買底幫助下使農民帶着土地解放出來」，這種在俄國已很流行的估計完全是虛偽的。實際上，這個改良是使農民解脫了土地，因爲數百年來農民所佔有的那些分地，被割去了很大的部分^①；而數十萬的農民完全失去了土地，——使他們以四分之一的或不堪糊口的一塊分地來維持生活。實際上，農民是受了雙重的掠奪：除掉他們的土地被割

①參看本「選集」第一卷註釋三。（編者註）

以外，他們還不得不爲着留給他們的、從來就是歸他們所有的那塊土地繳納「贖金」；同時，土地底贖價規定得比土地底實價要高得多。在農民解放之後十年，地主自己也在調查農業實況的政府官吏面前承認：農民不但被迫贖買自己的土地，而且還要贖買自己的自由。地主雖然拿了農民贖買自由的贖金，但終究還是沒有把農民變成爲自由人；他們還要在二十年中做臨時負有義務者（註釋五六），使他們依然還是（而且至今還是）卑賤的等級，他們被人家打屁股，他們要繳納特別實稅，他們不敢自由退出半農奴式的村社，不敢自由處理自己的土地，不敢自由遷居於國內任何地方。我們的農民改良所證明的並不是政府的寬宏大量，正是相反，牠是莫大的歷史榜樣，證明凡是從專制政府手裏弄出來的事情是何等的污濁。在軍事失敗（註釋五七）、可怕的財政困難和驚人的農民騷動威脅迫之下，政府簡直不得不解放農民（註釋五八）。沙皇自己也承認：趁着自下的解放還未到來時，應作自上的解放。可是，實行改良的時候，政府採取了各種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方法，來滿足『受辱的』農奴主的貪慾；政府甚至不惜採取這種卑鄙辦法：暗中更換一些被請來實現改良的人，——雖然這些人是從貴族中間請來的！第一次召集的鄉村仲裁員早已

解散而由另一批人代替了，這另一批人甚至在劃分地界時也是甘心替農奴主舞弊，欺騙農夫的。如無軍法從事和鎗斃不肯接受約章（註釋五九）的農民，則大改良本來是不能執行的。無怪當時優秀的人物，因在嘴上被檢查局套上了一個口套，所以用沈默態度表示來咒詛這個大改良……。

『解脫了』工役制的農民，從改良者手裏跑出來後，就成了這樣被蹂躪的、被抽剝的、被賤視的、被束縛於自己分地上的人，他們除了『自願』去作工役之外，絲毫沒有辦法。農夫還是耕種自己過去的老爺底土地，從老爺手裏『租得』自己的被制去了的土地，因為要替挨餓的家庭借點糧食吃，在冬天就被人雇定了做夏天的工作。工租與奴役——這便是實際上神父所擬就的宣言邀請農民去祈禱的『自由勞動』（註釋六〇）。

而除了這種地主的壓迫——由於創造和實現改良的官吏之寬宏大量而得以保存的壓迫——以外，還有資本底壓迫。貨幣底權力，這種權力甚至還壓迫了法國的農民——不用可憐的半途的改良方法，而是以強有力的民衆革命方法來解脫了地主政權的法國農民；這種貨幣底權力，其全部重擔都壓在我們半農奴式的農夫身上。無論如何須要我錢；繳納為慈善的改良所增加了的賦稅要錢，租土地要錢，稍許購買一點已在排擠農民家庭工業的工廠工業品也要錢，買糧食又要錢，其他處處地方都需要錢。貨幣底權力不但壓迫了農民，而且分裂了農民；絕大部份的農民不斷地

破產，變成了無產者；少數的農民中間分出了一些數量不多而貪慾無厭的富農和善於經營的農夫，他們吞併農民經濟和農民土地，他們是正在生長着的鄉村資產階級底幹部。改良後整個四十年內，完全是這種非農民化底過程，慢慢的痛苦的死亡底過程。農民陷於極貧的生活程度：他們與牲畜同居一屋，穿着破爛衣服，吃着青草飯，他祇要找到逃身之處就要放棄自己的分地，他甚至倒贖分地，倒貼錢給領主，分地倒贖的價金超過了牠的收入。農民歷年受餓，荒年漸漸循環不已，農民死於饑餓和瘟疫的，往往成千成萬。

我們鄉村中的情形現在也是如此。試問，出路在什麼地方呢？農民底命運用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呢？小農祇有與工人運動聯合，幫助工人爲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爲變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工廠，機器等等）爲公有財產而鬥爭，他才能解脫資本主義底壓迫。想用保護小經濟和小私產不受資本主義衝擊這種方法來拯救農民，就是徒勞無功地阻礙社會發展，就是以資本主義時代也可享福的幻想來欺騙農民，就是分散勞動階級底力量，就是犧牲多數人底利益來替少數人造成特權地位。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將永遠反對下面這些無意思而且有害的辦法：農民分地不准讓渡，實行連保制，禁止自由退出農民村社和禁止自由收納任何等級的人！可是，我們已看到，我們的農民不僅受資本壓迫底痛苦，而且還受地主壓迫和農奴制殘餘底痛苦，甚至可以說，受後者的痛

苦，要比受前者多。這些鎖鍊使農民地位異常惡化，束縛農民底手足；與這些鎖鍊作鬥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爲着我國社會發展底利益起見是必需的；因爲農夫之貧困、黑暗、無權和卑賤，使我國一切制度上都留下了亞洲制度底痕跡。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給這種鬥爭以儘量的幫助，她就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簡括地說，這種幫助底表現應當是：把階級鬥爭灌輸到農村中去。

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俄國鄉村內同時並存着兩種階級的對立形勢：第一，鄉村工人和鄉村企業主間的對立；第二，整個農民階級和整個地主階級間的對立。第一種對立形勢正在發展和增長起來，第二種對立形勢正在逐漸減弱。第一種對立，都還在將來；而第二種對立，則大部份已經過去了。雖然如此，在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正是第二種階級對立形勢帶有實際上最重要的意義。至於說到我們應當利用我們所有的機會來發展鄉村僱傭工人底階級自覺性；說到我們因此應當注意城市工人（例如：管理蒸氣打穀機的機器工人和其他工人）移居鄉村的問題和鄉村工人底僱傭市場的問題——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這是爲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所應知的公理。

可是，我們的鄉村工人與農民還有過於密切的聯繫，他們還過於受着一般農民所受的災難底苦痛；因此鄉村工人底運動，無論在現在或在最近的將來總不能帶有全國的意義。正是相反，掃除農奴制的殘餘，消滅俄國一切國家制度中等級的不平等和數千萬「平民」的卑賤地位之精神，

——這個問題在現在已有全國的意義，一個黨要想做爭自由的先進戰士，牠就不能離開個這問題。

承認農民的困苦，現在已成爲（在多少範疇的論調中）幾乎普遍的意見了；關於一八六一年改良之「不够」和國家救濟之必要的話，已成爲盛行一時的真理了。我們的責任就在指出：這些困苦正是因農民受階級壓迫而產生的，政府是壓迫者階級底忠實的擁護者；真正願意根本改善農民地位的人所應當力爭的，不是政府的幫助，而是解脫政府的壓迫，而是政治上的自由。人們說，贖金過高，政府應採取減低贖金和延緩價期的慈善辦法。我們則說：這一切贖金無非是以法律形式和官場空調來掩飾地主與政府之搶劫農民，無非是農奴主因解放其奴隸而坐領賦稅。我們要求立刻和完全取消贖金與農奴賦稅，要求把多年來沙皇政府拿去滿足農奴主的貪慾的百千萬金錢歸還人民。人們說，農民缺少土地，國家必須幫助擴大農民地產。我們則說：正因爲國家的幫助——自然是幫助地主——，農民才這樣大批地失去了他們所最需要的土地。我們要求將割地歸還農民，因爲地主經過這塊割地來繼續維持不自由的、奴役的、工役的勞動，就是說，實際上的原來的農奴勞動。我們要求建立農民委員會來糾正極不公道的事情，即沙皇政權所設立的貴族委員會對被解放的農奴所做過的許多不公道的事情。我們要求建立這樣的法庭：牠有權減低地主因農

民無路可走而勒索的過高的地租，農民有權向牠控告利用別人急需而締結賣身契約的人底高利貸行爲。我們將始終並利用各種機會來向農民解釋：誰要是向農民說什麼從現代國家方面可以得到保護或幫助，這種人不是傻子，便是騙子和農民底死敵；農民所需要的首先就是解脫官吏政權底專橫和壓迫，農民所需要的首先就是承認他們在各方面與其他各等級完全絕對平等，行止和移居底完全自由，處理土地的自由，處理一切鄉村事務和鄉村收入的自由。任何德國鄉村生活中最平常的事實，常常可以給我們千百種機會來爲着上述要求而進行鼓動。這種鼓動應當以當地的、具體的、最迫切的農民需求爲出發點，但是不應當僅限於這些農民需求，而應當不斷地擴大農民底眼界，不斷地發展他們的政治意識，指出地主和農民在國內所佔的特殊地位，指出如果鄉紳要想解除那些加在牠頭上的專橫和壓迫，其唯一方法就是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推翻官吏底專權。有人說，政治自由這個要求不能爲工人底意識所了解，這真是荒謬無稽；工人歷年經過了與廠主警察的直接鬥爭，經常看見了任意拘捕和追究他們隊伍中的優秀份子，——不僅這些已染着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人，就是一切明理的農民，祇要稍微想一想自己的境遇，也會了解和領會工人鬥爭底目標，領會能使全國解脫貪官污吏之專權的『國事大會』觀念。基於農民直接迫切的要求的鼓動，祇有當牠能够把一定的政治要求與某種『經濟』弊端底每次揭破聯繫起來的時候，牠才能履行自

己的任務：灌輸階級鬥爭到鄉村中去。

但是，試問社會民主黨能否將上述這些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內呢？牠能否在農民中間担任鼓動工作呢？這結果不會分散我們的力量而使本來很少的革命力量離開主要的唯一可靠的運動軌道嗎？

這樣的反駁是由誤會產生的。是的，我們定要將我國鄉村解脫農奴制一切殘餘的要求，能引起優秀部份的農民來自覺幫助（如果不作獨立的政治鬥爭）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要求，列入自己的政綱。假使我們所堅持的辦法，能够阻礙社會的發展，或用人工法來防止小農向着資本主義發展，向着大生產發展，那末，我們就犯了錯誤；但是，假使我們不會利用工人運動，以便在農民中間來宣傳因地主與官吏底曲解以致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舊曆二月十九）的改良沒有實行的那些民主要求，那末，這種錯誤更有致命的危險。如果我們的黨想領導全民來與專制政體鬥爭，那牠必需要包括這樣的要求①。可是，包括這樣的要求，並不是要我們把城市中的積極的革命力量調

①包括上述要求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我們已經草就了。我們希望在「勞動解放」社幫助之下，來把這個草案討論和修改之後，能在本報最近一期上公佈。

到鄉村中去。這是談不到的。毫無疑義的，黨底一切鬥爭力量應當趨向於城市和工業中心，祇有工業無產階級才能作一往直前的和羣衆的反對專制的鬥爭，祇有這個無產階級才能在自己的肩膀上負起這樣的鬥爭手段：組織公開的示威或創辦定期出版和普遍發行的國民政治報。我們所以應將農民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不是爲的要把信仰堅固的社會民主黨人從城市調到鄉村，把他們關在鄉下，——不，而爲的是要給那些不能不在鄉村中活動的力量以行動指南，爲的是要利用與鄉村的聯繫來作民主事業和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這種聯繫，許多忠於社會民主黨的智識分子及工人因爲某種情形而保持着，而且不得不隨着運動底增長而擴大和發展起來。我們過去是很小的

一支志願軍，當時社會民主黨底全部力量僅是人人『到工人中間去』過的青年的小組，這個階段我們早已走過了。我們的運動現在有了整批的軍隊：爲社會主義爲自由而鬥爭的工人軍隊，過去和現在參加運動而現已分佈於全國各地的智識份子軍隊，對工人運動抱有信仰和希望而準備給她許多幫助的同情份子底軍隊。在我們前面有一個偉大的任務：把這一切軍隊組織起來，而且要組織得這樣，使我們不僅能夠組織一時的爆發，不僅能夠給敵人以偶然的和零散的（因此是不危險的）打擊，而是要能夠各方面作不屈不撓的和堅定的鬥爭來追擊敵人，凡是專制政府散播壓迫種子和收穫仇恨果實的地方，就要向牠攻擊。但如果不將階級鬥爭和政治覺悟底種子散播到千百萬

農民羣衆中去，難道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麼？請不要說散播這些種子是不可能的：牠不僅是有可能，而且正在進行，按着那些離開我們的注意和影響的千條道路而進行。如果我們能給這樣的影響以口號，樹起使俄國農民解脫可恥的農奴制底一切殘餘的旗幟，那末這種散播，就廣泛和迅速得無可限量了。跑到城市來的鄉下人，現在已經好奇地和有趣地在考察他所不了解的工人鬥爭，而且把工人鬥爭的消息傳到各窮鄉僻壤中去。我們可以而且應當使旁觀者底這種好奇心，轉而了解（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要模糊地了解）工人是爲全民底利益而鬥爭，轉而日益同情於工人的鬥爭。那時候，革命工黨之戰勝警察政府，其時日之快，將出乎我們自己所預料的以外。

一九〇一年四月

告鄉村貧民書

(爲農民解釋社會民主黨底要求)

告鄉村貧民書（註釋六一）

（爲農民解釋社會民主黨底要求）

一 城市工人底鬥爭

許多農民大概已聽到了城市工人鬧風潮的消息。有的自己到過都城和工廠，並在那裏看到了被警察叫作造反的事情。有的認識了一些參加了風潮而被官場放逐於鄉下的工人。有的親手接到了關於工人鬥爭的工人傳單和書籍。有的只是聽到曾經到過城市的人關於城市情形的傳說。

從前起來鬧事的只是學生，現在起來鬧事的已是各大城市中成千成萬的工人了。他們最時常和自己的老板、廠主和資本家作鬥爭。他們舉行罷工，大家一律停止工廠工作，要求增加工資，要求不許強迫他們做十小時或十一小時的工作，而祇做八小時工作。工人還要求工人生活方面其

他一切改善。他們要工廠設備得週到些，要機器能有防止危險的特殊設備而不致損害工人。要他們的子弟能够進學校，要病人在病院中得到應有的醫治，要工人底住宅是人住的房子而不是狗窠。

警察干涉工人的鬥爭，警察拘捕工人，把工人拋到牢獄裏，不經法庭而把他們放逐到家鄉裏去，甚至到西伯利亞那裏去。政府用法律禁止工人底罷工與集會。但是工人則進行鬥爭來對警察和政府。工人說：我們數百萬工人，再不能彎腰折背了！我們再不能替富人作工，而自己還是一貧如洗了！我們再不能讓人家掠奪了！我們要組織工會，把一切工人都組織到一個大的工人聯盟（工黨）中去，共同求得較好的生活。我們要爭得新的優良的社會制度：在這個新社會裏不應有貧富之分，大家都應當參加工作。共同工作底結果不應爲一小部份富人所侵吞，而應爲全體勞動者所享用。機器和其他的技術改良應當減輕大家的工作，而不應當犧牲千百萬人民的利益來使少數人致富。這個新的較好的社會叫做社會主義社會。關於這個社會的學說叫做社會主義。爲這較好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的工人階級叫做社會民主黨。這樣的黨差不多在各國（俄國和土耳其除外）都公開存在着，而我們的工人同志份子中的社會主義者也已組織了這樣的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政府追究這個黨，可是黨還是祕密存在着；牠不顧各種禁令，出版了自己的報紙和書籍，組

織了秘密的團體。工人不懂開秘密會議，而且還成羣結隊地遊行，高舉着旗幟，旗幟上寫着：「八小時工作日萬歲，自由萬歲，社會主義萬歲！」。政府因此而凶狠狠地追究工人。牠甚至遣派軍隊來槍殺工人。在亞羅斯拉夫（Ярославль），在彼得堡，在里加（Riga），在頓河流域的羅斯托夫（Rostov-on-Don），在士拉多斯（Zlatoust），俄國兵士都屠殺了俄國工人。

可是工人並不屈服。他們還是繼續鬥爭。他們說：無論追究，監禁，充軍，徒刑或死刑，都嚇不倒我們。我們的事業是正常的。我們爲一切勞動者底自由和幸福而鬥爭。我們爲千百萬人民解除暴力、壓迫和貧困而鬥爭。工人已日甚一日地覺悟起來了。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數量都很快地增加起來了。不管任何的追究，我們都是會要勝利的。

鄉村的貧民要明白：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是些什麼人，他們所要求的是什麼，怎樣在各鄉村裏面進行工作，以便幫助他們來爲人民爭取幸福。

二 社會民主黨人所要求的是什麼？

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爭得的，首先就是政治自由。他們需要自由，是要使俄國全體工人普遍公開地聯合起來爭取新的優良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什麼叫做政治自由呢？

要了解這一點，農民先要把他現在的自由與農奴制度比較一下。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底允許不能娶妻。現在，農民可以不得任何的允許而自由娶妻。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必須按地保①所指定的日子替自己的地主老爺做工。現在，農民可以隨便選擇替那個東家，在那些日子，要多少工資才去做工。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老爺底允許就不能離開鄉村。現在，如果村社允許他，如果他沒有欠賬，如果他能得到護照，如果省長或縣警察長不禁止移居，則農民可以自由出外。這就是說，農民現在也還沒有行動和遷徙底完全自由，農民仍舊還是半農奴式的。往後我們將詳細說到：爲什麼俄國的農民還是半農奴式的，他怎樣可以逃出這種狀況。

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老爺底允許，不能獲得財產，不能購買土地。現在，農民可以自由購買任何的財產（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任意處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農民在現在也還沒有獲得）。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要受地主底肉刑。現在雖然農民還沒有免除肉刑，可是地主已不能親自處罰自己的農民了。

①在農奴制度之下地主所指定的一塊地代理人和管理者。（編者註）

這種自由就叫做公民自由。——家庭事務，個人事務及財產事務上的自由。農民和工人可以自由（雖不完全自由）安置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個人事情，處理自己的勞動（自由選擇老板），處理自己的財產。

可是，無論是俄國工人，無論是全體俄國人民，他們至今還沒有處理自己全民事務的自由。過去農民是地主底奴隸，現在全體人民同樣還是官吏底奴隸。俄國人民沒有權利選舉官吏，沒有權利選舉代表來製定全國底法律。俄國人民甚至沒有權利召集會議來討論國事。以前不得農民同意而指定地保，現在也是一樣，不得我們同意而任用官吏來統治我們，不得官吏底允許，我們甚至於不能刊印報紙和書籍；我們不能當着大眾和爲着大眾來談全國大事。

農民過去是地主底奴隸，俄國人民至今還是官吏底奴隸。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沒有公民自由；直到現在，俄國人民還沒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即是人民處理自己全民的國家事務底自由。政治自由即是人民選舉代表到國會中去的自由。祇有人民自己選舉的國會才能討論並頒佈一切法律，才能規定一切稅捐。政治自由即是人民自己已有權選舉一切官吏，有權召集會議來討論一切國事，有權不經任何的允許而刊印任何書籍和報紙。

其他一切歐洲人民早已取得了政治自由。祇有土耳其和俄國，人民還是蘇丹政府和沙皇專制

政府底政治奴隸。沙皇專制政體即是沙皇底無限權力。國家底設施和管理，人民絲毫不得參加。一切法律之頒佈，一切官吏之任命，都由沙皇按其個人無限專制的威權獨斷獨行。可是，沙皇自然連俄國的法律和官吏都不能盡行知道。連國內發生的事情他都不能知道。沙皇只是批准幾十個最大最顯貴的官吏底意旨而已。一個人無論如何決不能管理像俄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管理俄國的不是沙皇，——所謂一人專制，不過可以這樣講罷了！——管理俄國的是極少數最富裕最顯貴的官吏。沙皇祇能知道這極少數人隨意告訴他的東西。沙皇絕對不能反對這極少數有名貴族底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貴族，他從小就只是在這些貴人中間生長起來的；他們教育了他，訓練了他；關於全體俄國人民的情形，沙皇所知道的，僅僅是這些有名貴族，富裕地主和少數可以接近沙皇的最富裕的商人所知道的東西。

在每個鄉鎮管理局內你們都可以看到這圖樣的畫：上面畫着一個沙皇（現在沙皇底父親亞力山大三世）。沙皇向拜朝的鄉長們訓話，命令他們：『要聽從你們的貴族老爺！』現在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重複這種話，可見沙皇自己也承認，如不借助於貴族和經過貴族，他們決不能管理國家。我們要牢牢記着這些沙皇教農民聽從貴族的話。我們要明白了解：想把沙皇的行政標榜為最好的行政的那些人們，是向人民說何等的謊話。這些人們說：在別的國家內，行政機關是選舉

的，那裏選舉富人，而富人行政極不公道。他們欺負貧人；但在俄國，行政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沙皇管理；沙皇高過一切，高過貧人和富人。他們說，沙皇對貧人和富人都是一視同仁。

這些話都只是說謊。每個俄國人都知道我們的行政底公道是怎樣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普通的工人和雇農能不能跑到國務會議（註釋六二）中去。可是在其他一切歐洲國家內，即是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雇農都跑進了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而前自由陳訴工人底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為較好的生活而鬥爭。誰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底這些言論，沒有一個警察敢觸犯他們（註釋六三）。

俄國沒有人民選舉的行政機關，而當政者不僅是一種富裕和顯貴的人，而且是他們中間最壞的人。當政的是朝庭中最會獻媚奉承的人，是最會設計傷人的人，是最會向沙皇說謊造謠的人，是善於拍馬屁獻殷勤的人。行政是祕密的，人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那些法律將準備頒佈，那些戰爭將準備進行，那些新稅將開始徵收，那些官吏受賞和為何而受賞，那些官吏被革。沒有一個國家有俄國那樣多的官吏。這些官吏站在無權說話的人民頭上，正如一座陰黑的森林；普通的工人永遠穿不過這座森林，永遠得不到真理。對於官吏之侵吞、掠奪和殘暴，小百姓有冤不得申；官場舞弊，把一切冤孽化為烏有。一入底喊聲，全民始終不能聽到，而消失於這座黑暗的森

林中，埋沒於警察的拘留所內。官吏不由人民選舉而且不必向人民負責；他們結成一幅緊密的蛛網，人們就像蒼蠅一般地在這個網內掙扎。

沙皇專制即是官吏專制。沙皇專制即是人民對官吏尤其是對警察的農奴式的依賴。沙皇專制即是警察專制。

因為這樣，所以工人跑到街上來，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打倒專制政體」，「政治自由萬歲！」因為這樣，所以數千萬鄉村貧民應當幫助和贊成城市工人底這種鬥爭口號。鄉村工人和無產農民應當同他們一樣不怕追究，不怕敵人底任何威嚇和暴力，不因初次失敗而灰心，要起來為全民自由而作堅決的鬥爭，首先要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讓人民自己在全俄各地去選舉自己的代表。讓這些代表去組成最高會議，該會議即在俄國創立選舉的行政機關，使人民解脫對官吏和警察的農奴式的依賴，使人民有權自由集會，自由發言和自由出版！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所首先要求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第一個要求——要求政治自由。

我們知道：政治自由，選舉國會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還不能一下子就使人民解脫貧困和壓迫。要使城市和鄉村貧民一下子就不替富人做工，這種方法，在世界上也沒有。工人階級除了靠望自己本身之外，再不能期望誰，再不能指望誰。工人如不自謀解放，誰也不能使他解脫。

貧困。但要解放自己，工人就應當在全俄組成一個聯盟，組成一個政黨。可是，假使專制的警察式的政府禁止一切集會，禁止一切工人報，禁止工人代表底一切選舉；則數百萬工人就不能共同統一起來。要統一，就要有建立一切會社之權，就要有結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雖不能使工人一下子就解脫貧困，可是牠能給工人以與貧困鬥爭的武器。要與貧困作鬥爭，除了工人自己團結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要是沒有政治自由，數百萬人民便沒有團結之可能。

歐洲各國人民已取得了政治自由，工人也就早已開始團結。既無土地又無作坊，終身替別人作僱傭勞動——這樣的工人，在全歐叫做無產者。還在五十年以前就有人號召工人人民衆統一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呵！」——這句話在最近五十年來已傳遍了全世界，這句話在成千成萬的工人會議上不知重複了幾千百次，這句話你們在各種語言的社會民主黨內書報上都可以讀到。

自然，數百萬工人組成一個聯盟，組成一個政黨——這件事情是極難極難的，牠需要時間、決心、毅力和勇氣。工人迫於貧困，終身替資本家和地主做苦工，所以往往也沒有時間來想：爲什麼他們一輩子總是個窮光蛋，他們怎麼來解脫這個情境。工人的統一總是受人阻礙：或者在俄

國那樣沒有政治自由的國家，採用直接的野蠻的暴力手段；或者不肯收容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的工人作工；或者更採取欺騙和收買的方法。可是，任何的追究，任何的暴力；都不能阻礙工人無產者爲全體工人解脫貧困與壓迫這件偉大事業而鬥爭。社會民主黨工人底數量不斷地增加。如在我們的鄰國德國，已有選舉的行政機關。從前德國也是絕對專制的君主政體。可是德國人民在五十年以前，早已破壞了專制政體，用強力取得了政治自由。德國不像俄國那樣，法律不是由小部份官吏所頒佈，而是由人民代表議會，國會或是德人所謂帝國議會所頒佈。凡是成年的男子都可以選舉這個議會底議員。因此我們可以計算：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有多少票數。在一八八七年，有十分之一的票數是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一八九八年（德國帝國議會最近一次的選舉），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票數差不多增加了兩倍。那時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數贊成社會民主黨人。二百萬以上的成年男子會選舉社會民主黨人當國會議員。德國鄉村工人中間，社會主義底傳佈還不普遍，可是現在牠已特別迅速地向前發展了。當雇農、短工和無產的貧苦的農民這些羣衆與自己的城市兄弟聯合起來的時候，德國的工人就會勝利而且要建立沒有勞動者底貧困與壓迫的那種制度。

社會民主黨工人到底想怎樣來解脫人民底貧困呢？

要知道這點，就須明白了解：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廣大民衆底貧困是從何產生的。富裕的城市正在滋長，繁華的商店和屋宇正在建築，鐵路正在敷設，各種機器和技術改良無論在工業上或農業上都在採用，——可是千百萬的人民大家都沒有逃出貧困，大家都只爲着養活家庭而終身不斷地工作。不懂如此：失業者一天多似一天了。無論鄉村中或城市中，完全不能找到工作的人也一天多似一天了。在鄉村中他們餓着肚皮，在城市中他們變成流氓無賴，如野獸一般鑽在城郊底地窖中或像莫斯科城裏喜特洛夫市場（Khitrov Market）那樣可怕的地道內。

怎樣會有這種事情呢？爲什麼富裕繁華漸次增加，而以自己的勞動創造一切財富的千百萬民衆依然還是貧困呢？農民餓死，工人流離失業，而商人却將千百萬普特的麵包運出國外，工廠因爲商品無處安置，沒有銷路而停頓起來。怎樣會有這種事情呢？

這種現象之發生，首先是因爲大批的土地以及工廠，作坊、機器、房屋、輪船等等都屬於少數富人所有。千百萬的人民在這些土地上，在這些工廠內和作坊內工作；而這些東西則屬於幾千或幾萬個富豪、地主、商人和廠主所私有。人民爲着工資，爲着一小塊麵包而替這些富人作僱傭勞動。除了工人窮苦的生活費之外，其餘一切生產品都落在富豪手裏，這就造成他們的利潤，他們的『收入』。從機器和工作改良方法中所得到的一切便宜都歸地主和資本家所享受；他們積聚着

千百萬的財富，而這些財富中工人所得的只是一點可憐的殘屑。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工作：在大田莊上和大工廠內，有幾百人，有時甚至幾千人作工。勞動這樣聯合起來，同時使用各種機器，因此工作更有成效：現在一個工人所生產的，要比從前單獨勞動而無任何機器的幾十個工人多得多。可是，享受勞動底這種效率和生產率的，不是全體勞動者，而僅是少數大地主、商人和廠主。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人家說：地主和商人『給工作』與人民，『給』窮人找生路。例如有人說：鄰近的工廠或鄰近的大田莊『養活』本地的農民。可是實際上工人用自己的勞動養活了自己，又養活了一切不做工的人。然而，因為允許工人在地主土地上，在工廠內或鐵路上工作，所以工人就將一切做成的東西白白地交給業主，而自己所得的僅能維持窮苦的生活。所以實際上，不是地主和商人給工作與工人，而是工人拿自己的工作養活大家，將自己勞動底一大部份白白地交給人家。

其次，現代各國人民貧困之來源，就是由於工作者為出賣、為市場而製造一切貨物。廠主和工頭，地主和富農，他們生產各種物品，飼養牲畜，播種和收穫糧食，其目的就是出賣，其目的就是拿到金錢。現在金錢到處都成了主要勢力。人類勞動底一切生產品都可以換成金錢。有了金錢，什麼都可以買到。連人都可以用錢來買，就是說有錢的人可以驅使無產者替他做工。從前主

要的勢力是土地，——在農奴制度時代就是如此：誰有土地，誰就有勢力、有權柄。但到現在，金錢、資本已成了主要的勢力。只要有金錢，隨便多少土地都可以買；沒有金錢，即有土地也無多大用處，買不到犁耙或其他工具，買不到耕畜，衣服和其他一切城市商品，至於納稅繳捐更不必說了。地主們爲着金錢，差不多都把自己的田產抵押在銀行裏。政府爲要得到金錢，向全世界的富人和銀行借債，每年繳付數萬萬盧布作爲這些債款底利息。

現在爲了金錢，大家都在互相作殘酷的鬥爭。每個人都想買得賤些，賣得貴些；每個人都想追過別人，多出賣商品，爲競爭而減低價格，使別人不知道有利的銷售地點或有利的貨物承辦。小百姓、小手工業者和小農，在這一個爭奪金錢的總交戰中，最受打擊；他們常常落在大商人和富農之後；他們從來沒有什麼貯蓄，活過一天是一天；每逢困難或不幸事件到來，他們就不得不把最後一些活命工具抵押出去或將耕畜賤賣出去。一經落在某個富農或高利貸者底爪牙內，他們就很少有脫身的希望，大部份終歸於破產。每年總有成千成萬的小農和手工業者關閉茅屋，白白地將份地交給村社，變成僱工、佃農、苦工和無產者。而富人則在這個爭奪金錢的鬥爭中愈更發財。富人把幾千萬幾百萬盧布收集到銀行裏面來，他們不僅拿自己的錢來發財，而且利用別人存在銀行裏的錢來取利；小百姓把幾十個或幾百個盧布存在銀行裏或貯蓄所，祇得到百分之三、四

的利息；而富人可把這幾十盧布合成爲幾百萬盧布，擴大自己的週轉額，賺得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正因爲這樣，所以社會民主黨工人說：要消滅國民貧困，唯一的方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改變全國的現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剝奪大地主底地產，廠主底工廠，銀行家底貨幣資本，消滅他們的私有財產和將這財產轉交給全國工人民衆。那時候，支配工人勞動的將不是以別人勞動爲生活的富人，而是工人自己和他們所選舉的代表。那時候，共同勞動底結果及由各種技術改良和機器所得來的利益，將爲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所享受。那時候，財富將更快地增漲起來，因爲工人替自己工作要比替資本家工作時作好些；工作時間將要短些，工人底衣食將要好些，工人底全部生活將要完全改變。

但是，改變全國底一切制度——這並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情。要做到這點，需要許多時間，許多持久的堅忍的鬥爭。一切富人，一切私有者，整個資產階級^①，將用全部力量來保持自己的財富。官吏和軍隊將起來保護富人階級，因爲政府本身就在富人階級掌握之中。工人應當萬衆一心來反對一切以別人勞動爲生的人；工人自己應當統一起來和把一切無產者統一成爲一個工人階級，統一成爲一個無產階級。鬥爭對於工人階級將不是容易的，可是這個鬥爭的結果一定是工人得

到勝利；因為資產階級或以別人勞動爲生的人們是人民底極少數。而工人階級是人民底極大多數。工人反對私有者，這就是數百萬大反對數千人。

爲着這個偉大的鬥爭，俄國的工人已在開始統一，成爲工人的社會民主黨。這種秘密的、避開警察耳目的統一，無論怎麼困難，總究在鞏固和增長起來。當俄國人民爭得政治自由的時候，那時工人階級的統一事業，社會主義底事業，將更要進展得無限地快些，比德國工人進行得還要快些。

三 鄉村中的財富和貧困，有產者和工人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社會民主黨人所要的是什麼。他們要與整個富人階級鬥爭，使人民解放

⊙ 資產者——即是有產者。資產階級——即是一切有產者之總合體。大資產者即是大有產者。小資產者即是有小產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即是有產者和工人，富者和無產者，以別人勞動爲生的人與替人作僱傭勞動的人。

貧困。但我們鄉村中的貧困現象並不減於城市，甚至還多過城市。鄉村的貧困現象怎樣厲害，這點我們現在不去講牠。每個到過鄉村的工人和每個農民，關於鄉村的貧困、饑寒和破產的情形，都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農民不知道：他因何而貧窮、饑餓和破產；他怎樣來解脫這個貧困。要知道這點，首先就要明白城市裏和鄉村裏的一切貧困是從何而產生的。關於這點我們已很簡單地說過，而且已經知道：無產的農民和鄉村工人應當與城市工人聯合起來。可是這還不够。要進一步地了解：鄉村中那種人跟着富人、跟着有產者跑；那種人跟着工人，跟着社會民主黨人跑。應當知道：有一種農民善於賺取資本和剝削勞動並不亞於地主——這樣的農民多不多呢？如果不澈底了解這點，那末空談什麼貧困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鄉村貧民也不會了解：鄉村中誰應當彼此聯合起來並和城市工人聯合起來；怎樣使得這種聯合成爲可靠的同盟，使得不僅地主，就是農民自己的弟兄（富農），也不能欺騙農民。

要了解這一點，我們現在就來考察：鄉村中地主底勢力如何，富農底勢力如何。

先講地主吧。要知他們的勢力如何，請先看他們私有土地底數量有多少。歐俄的全部土地——農民的份地和私有的土地都在內，約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國家土地除外，關於

這點我們以後要特別講到)。其中屬於農民的，即屬於一千萬以上的農家的共有份地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而在私有者手裏的，即是在不滿五十萬家手裏的有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俄畝。這就是說：就拿整數來講，那末每個農家祇有十三俄畝，而每家私有主則有二百一十八俄畝！可是，土地分配上的不平等更要厲害得多，這點我們下面就要看見。

私有主底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土地中，七百萬俄畝是在皇家手中，即是歸皇室中人所有。沙皇與他的皇族，這是俄國的第一等地主，是最大的地主。一個皇族所有的土地要多於五十萬農家！其次，教堂和廟宇所有的土地，約有六百萬俄畝。我們的牧師向農民宣傳不要貪財，而要戒慾，自己則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抓取了大批土地。

其次，約有二百萬俄畝是屬於各城市和市集的，二百萬俄畝是屬於工商業會社和公司的。九千二百萬俄畝土地（確切的數字是九一，六〇五，八四五俄畝，但爲着簡便起見我們只引用整數

⊙ 這一些數字和下面的數字已經很陳舊了。牠們是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的統計。可是更新的數字是沒有。俄國政府只能在黑暗中間過生活，因此在俄國，關於全國國民生活的完滿確實的消息，收集得非常之少。

）是屬於不滿五十萬（四八一，三五八）家的私有主的。這些家庭底一半是很小的私有主，他們每家所有的土地不到十俄畝。他們總共起來也不到一百萬俄畝。可是有一萬六千家，每家則有一千俄畝以上的土地；他們總共有六千五百萬俄畝。大地主手裏握有的土地何等廣大，這點還可從下面這個事實看得出來：將近一千（九二四）家的戶數，每家都有一萬俄畝以上的土地，他們總共有二千七百萬俄畝！一千家所有的土地等於二百萬農家所有的土地。

很明顯的，如果幾千富人手裏既是佔有這樣廣大的土地，那末，千百萬人民當然要貧困和饑餓，而且永遠會貧困和饑餓下去。很明顯的，要是這樣，則國家政權，政府本身（雖然是沙皇政府）總是依大地主底意志行事。很明顯的，如果鄉村貧民自己不聯合起來，不聯合成爲一個階級來與這個地主階級作堅決拚命的鬥爭，他們便莫想期待任何人的和任何方面的幫助。

這裏必須指出：俄國有許多（甚至許多有知識的人），對地主階級的勢力，具有完全不正確的見解，他們說：『國家』所有的土地還更多得多。農民底這些壞顧問說道：『俄國疆域（即是俄國全部土地）底一大部份，是屬於國家的』（這些話是從『革命俄國』第八期第八頁上摘錄下來的）。這些人底錯誤是這樣來的：他們聽說歐俄有一萬五千萬俄畝土地是屬於國家的。這確是事實。可是他們忘記了：這一萬五千萬俄畝——差不多完全是極北一帶——阿爾漢格爾省（Archan-

bel)、俄洛格達省 (Volokta)、阿洛尼茨省 (Olonez)、維亞特卡省 (Vyatska) 及比爾姆省 (Perm) 的荒地和森林。就是說，剩下給國家的只是至今完全不宜於耕種的土地。國家所有的可耕的土地不到四百萬俄畝。而且，這些可耕的國家土地（如在沙馬拉省 (Samara)，這種土地特別多），都被富人很便宜地租去。富人把成千成萬俄畝的土地租來，然後又把牠們貴三倍地轉租給農民。

不，說國庫內土地很多的人，確是農民底最壞的顧問。實際上，許多好的土地是在大的私有地主手裏（沙皇自己也在內）。這些大地主還把國庫本身都握在自己手裏。鄉村貧民如果不會聯合起來，不會經過這種聯合而成爲可怕的力量，則「國家」永遠還是地主階級底馴良的僕人。還有一點不可忘記的：以前差不多祇有貴族才是地主。貴族現在也還有大批土地（據一八七七到一八七八年的計算，十一萬五千貴族有七千三百萬俄畝土地）。可是，金錢、資本現在已經成爲主要勢力。商人和富農收買了許許多多的土地。根據統計，三十年來（一八六三到一八九二年），貴族失去了（賣出多過於買進）價值六萬萬多盧布的土地。而商人和高等公民却獲得價值二萬五千萬盧布的土地。農民，哥薩克人和「其他鄉村庸人」（我們的政府稱平民爲「庸人」，以別于「貴人」和「君子」）獲得了價值三萬萬盧布的土地。這就是說：全俄農民平均每年買進價值一

千萬廣布的土地，作爲私有財產。

由此可見農民有各種：有的趨于貧困和饑餓，有的却在發財。由此可見那種傾向於地主和將要站在富人方面反對工人的富農，是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想與城市工人聯合起來的鄉村貧民，應當好好地想一想，應當了解：這樣的富農多不多，他們的力量如何，我們須要這種聯盟來與這個力量鬥爭。我們剛才會提到農民底壞顧問。這些壞顧問喜歡說：農民已經有了聯盟。這個聯盟就是村社、鄉會。村社是一種很大的力量。村社的聯合緊密地團結着農民；村社農民底組織（意即聯合，聯盟）是廣大無邊的。

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奇談。雖然這是由善人想出來的，但這到底是種奇談。假使我們要聽這種奇談，那我們祇是弄壞自己的事情，弄壞鄉村貧民與城市工人聯合的事情。讓每個鄉下人已仔細去想一想：村社的聯合，農民的鄉會不像貧農用來反對一切富人和反對一切以別人勞動爲生者的聯盟呢？不，不像而且也不會像。每個鄉村和每個鄉會裏面，有許多雇農和許多貧農，又有自己僱傭雇農和買「絕」土地的富人。這些富人也是鄉會會員，而且在鄉會中佔上風，因爲他們有勢力。像這種有富人加入、富人佔上風的聯盟，我們還需要牠嗎？不，完全不需要。我們需要用來反對富人的聯盟。所以村社的聯盟對於我們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們須要自願的聯盟，須要這些懂得他們應當聯合城市工人的人底聯盟。但鄉會不是自願的聯盟，而是官辦的聯盟。加入鄉會的，不是那些替富人做工而想共同反對富人的人。加入鄉會的人不是依自己的意旨而加入的，而是因為他的父母會靠這塊土地活命，會替這個地主做工而加入的，是因為他們的上司強迫他們加入的。貧農不能自由退出鄉會，他們不能自由接收外人——被警察規定屬於別鎮的人——加入鄉會，可是我們或許就正需要外人加入到這裏來。不，我們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種聯盟，祇是工人和貧農用來反對一切以別人勞動為生的人的自願聯盟。

村社得勢的時期早已過去，而且永遠不再回復。村社得勢的時候，農民中間差不多還沒有漂流全俄謀生活的雇農和工人，那時差不多還沒有富人，農奴主老爺對大家都同樣壓迫。可是現在，金錢成了主要的勢力。同一個鄉會底會員，為着金錢，彼此像惡獸一般地爭鬥。有錢的農夫，壓迫和搶掠本鄉會底會員比有些地主還厲害。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村社的聯盟，而是那種反對金錢勢力，反對資本權力的聯盟，各鄉會一切鄉村工人和無產農民的聯盟，一切鄉村貧民與城市工人用來同等反對地主和富農的聯盟。

地主底力量如何，我們已經看到了。現在要來考察：富農多不多，他們的力量如何。

關於地主底力量，我們曾經根據他們田莊底大小，根據他們土地底數量來判斷的。地主自由

處理自己的土地，自由買賣牠們。因此，關於他們的力量，我們可以根據他們所有的土地底數量來確切地判斷。可是，俄國的農民至今還沒有權利自由處理自己的土地，他們至今還是半農奴式的、被束縛於自己的鄉會的農民。因此，關於富農底力量，我們不能根據他們的份地來判斷。富農並不是在自己的份地上發起財來的：他們購買許多的土地，或是買「絕」（即是變成自己的私產），或是購買「一年」（即是租地）；他們既從地主手裏購買，又從自己的農民弟兄手裏購買，從丟棄土地和因貧窮而出讓份地的人手裏購買。因此，最正確的方法，就是根據他們所有的耕馬底數量來分別富農、中農和無產農民。有許多耕馬的農民差不多總是富農；假使他有許多耕畜，那就是說，他就可以耕種許多田，他除了份地之外土地也有，金錢貯蓄也有。而且我們可以知道：在全俄（即歐俄，把西伯利亞和高加索除外），有許多耕馬的農民共有多少。當然，我們不要忘記：關於全俄，我們祇能大約地講，因為單個的縣份和省份中有很多的區別。例如：城市附近往往有這樣的富農，他們祇有很少的耕馬，他們一部份人從事有利的園藝，另一部份人則少養耕馬，多養母牛而做牛乳生意。全俄各地也有這樣的農民，他們不在土地上而在商業上發財：他們開設榨油廠、碾麥廠和別的工廠。凡是住在鄉村裏的人，都熟悉本鄉本村的富農，可是我們要知道，他們在全俄共有多少，他們的力量如何，使貧農不致閉着眼睛瞎跑一陣，使他能夠確切知

這：他的朋友如何，他的敵人怎樣。

我們現在就來看吧，有許多耕馬的農民和缺乏耕馬的農民多不多呢？他們已經說過，在俄國共計約有一千萬農戶。他們所有的耕馬，現在大概約有一千五百萬匹（十四年以前有一千七百萬匹，可是現在已經減少了）。這就是說：每十家農戶平均有馬十五匹。可是一切問題就在於：一部份人，很少的一部份人，有許多耕馬；而另一部份人，而且是很多的一部份人，或是完全沒有耕馬，或是很少耕馬。沒有耕馬的農民至少有三百萬，有一匹馬的農民約有三百五十萬。這些農民或是完全破了產的，或是無產的農民。我們稱他們為鄉村貧民。一千萬農戶中間他們佔六百五十萬，即是說幾佔三分之二！其次就是中農，他們每人有二匹耕馬。這樣的農民約有二百萬戶，他們約有四百萬耕馬。再其次就是富農，他們每人有二匹以上的耕馬。這樣的農民計有一百五十萬戶，但是他們却有七百五十萬匹耕馬。這就是說：耕馬全數底一半是在約佔六份之一的農家手裏。

知道了這點之後，我們可以很確實地來判斷富農底力量。他們的數量很少：在各鄉會、各村鎮中，每百家只有一二十家富農。可是這少數的農家是最富的農家。所以，他們在全俄所有的耕馬差不多等於其他一切農家共有的總數。這就是說：他們所耕種的土地也差不多佔全數之半。這樣

的農民，其收獲的麵包要比他們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他們出賣許多麵包。他們的麵包不僅供自己的食用，而且大部份是拿去出賣賺錢的。這樣的農民可以積蓄金錢。他們把錢存到貯蓄處和銀行中去。他們購買土地作為私產。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全國農民每年購買的土地有好多，這些土地差不多都由這少數富農所購買。鄉村貧民只能想到怎樣養活自己，那能想到購買土地。他們連

①們我再重複說一遍：我們這裏所引的數字是大約的整數。富農也許不是一百五十萬。而是一百二十五萬或是一百七十五萬，或者甚至二百萬。可是相差並不很大。這裏問題不在於把每一千家或每十萬家都計算進去，而在於明白地了解：富農底力量如何，他們的地位如何，以便能夠辨別自己的敵人和朋友，以便不受一切虛談空話底欺騙，而確切知道貧農底地位和特別是富農底地位。

讓每個鄉村工作人仔細考察一下自己的鄉鎮和鄰近的鄉鎮罷。那時他可以看到：我們的計算是正確的，平均數字各地都是這樣的：每百家中十家或頂多是二十家富農，二十家中農，其餘都是貧農。

買麵包的錢都常常不夠，那裏還有錢買土地呢。因此，一切的銀行，尤其是農民銀行（註釋六四），並不是幫助全體農民獲得土地（好像欺騙農夫的人或是大傻子所說的那樣），而只是幫助那些少數的農民——富農獲得土地。因此，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農民底壞顧問，他們說到農民購買土地，似乎這種土地是從資本流到勞動方面，這也是說謊的。土地永遠不能流到勞動方面，即流到無產的工人方面；因為土地是要錢來買的，而貧民就從來沒有什麼餘錢。土地祇能流到有錢的富農方面，流到資本方面去，祇能流到鄉村貧農應聯合城市工人來與之作鬥爭的那些人方面去。

富農不但買絕土地，而且他們按年租借土地也最多。他們租借大批土地，這樣也就是將土地從鄉村貧民手裏搶出去。舉例來說吧。波爾達夫省（Poltava）底一縣（君士坦丁格勒縣），曾統計了富農租了多少土地，結果如何呢？租地三十俄畝和三十俄畝以上的農家很少，每十五家中祇有兩家。可是這些富農擁有全部租地之一半，每個富農有七十五俄畝的租地！或者就以達夫里達省（Taurida）爲例吧，曾統計了農民用村社、鄉會的名義向政府租來的土地，其中富農佔有多少，原來佔農戶五分之一的富農，佔有全部租地四分之三。土地到處都是按金錢來分配的，而金錢則祇有少數富人才有。

其次，現在農民自己也出租許多土地。他們拋棄份地，因為沒有耕畜，沒有種子，無法來經

營經濟。現時沒有錢，就有土地也全無辦法。例如：在沙馬拉省諾烏先斯克縣（Novonizhsk）內，富農中每三家有一家，有時甚至有二家，是從本鄉會中或在別鄉會中租取份地。而沒有耕馬的和祇有一匹耕馬的農民則出租份地。在達夫里達省，整整三分之一的農家都出租份地。租出的份地佔全部農民份地四分之一，共二十五萬俄畝。而在這二十五萬俄畝中間，有十五萬俄畝（五分之三）是落在富農手中！這裏我們又可看到：村社聯盟、鄉會，對於貧農是否有用。在鄉會內，誰有錢，誰就有勢力。我們所要的是各鄉會中貧民底聯盟。

說什麼賤價購買犁機、割麥機和其他一切精良工具，這與購買土地的話同樣是欺騙農民。開設地方農具堆棧，創立勞動組合，並且說，精良工具將改善農民底地位，——這也只是欺騙。這一切精良工具祇給富人獨佔，貧民幾乎完全得不到。貧民性命都難保，那裏還說得到犁耙機器呢！這一切『對農民的幫助』，祇是幫助富農，再沒有別的了。而大批的貧農，他們既沒有土地，又沒有耕畜，更沒有積蓄，就是有賤價的精良工具也沒有益處。例如：在沙馬拉省底一縣內，曾統計了富農和貧農底一切精良工具底數目。原來五分之一的農家，即是最富的農家，差不多佔有全部精良工具底四分之三；而貧農，即一半的農家，總共祇有全部精良工具底三十分之一。這一縣內沒有耕馬的和祇有一匹耕馬的農家，在二萬八千戶中共有一萬戶；而且這一萬戶總共祇有七。

架精良工具，而全縣一切農家所有的精良工具共有五千七百二十四架。五千七百二十四架中貧農僅有七架——這便是鄉村貧農在這一切經濟改善和所謂幫助「全體農民」的犁機、割麥機之分配中所佔有的份兒！這便是鄉村貧農向空談「改善農民經濟」的人所應期望到的東西！

最後，富農底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僱傭農和短工。富農也像地主一樣，是以別人勞動爲生的。他們也像地主一樣，因爲農民羣衆底貧困和破產而富裕起來。他們也像地主一樣想儘量多榨取自己雇農底勞動和儘量少給他們工資。假使數百萬農民沒有完全破產，沒有被迫得去替別人做工，沒有被迫得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作傭工；那時候富農就不能存在，不能經營經濟；那時候他們就無從收括「衰落的」份地，無從找得工人。而在全俄，一百五十萬富農大概至少僱有一百萬雇農和短工。很明顯的，在有產者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業主和工人之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偉大門爭中，——富農是要站在有產者方面反對工人階級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富農底地位和力量。我們現在來看鄉村貧農生活如何。

我們已經講過，全俄絕大多數的農家——差不多有三分之二都是貧農。首先就是沒有耕馬的農家無論如何至少有三百萬，——現在大概還要多些，有三百五十萬。每遇荒年饑歲總有幾萬農家破產。人口增加，生活漸感窮蹙，而一切肥沃土地已經操在地主和富農手裏。于是破產的人年

年增多，他們跑到城市，進工廠，當雇農，做粗工。沒有耕馬的農民，已經一貧如洗。這是無產者。他不靠土地，不靠營業，而靠被人僱傭的工作謀生活（假使是生活的話，正確些說，是苟延殘喘而不是生活）。這是城市工人底同胞弟兄。沒有耕馬的農民即有土地也無用處；沒有耕馬的農家有一半是出租自己的份地，有時甚至把份地白白地交給鄉會（而且有時還要倒貼！），因為他們沒有力量耕種土地。沒有耕馬的農民祇能種什麼一畝或至多兩畝土地。他常常要買糧食（假使有錢來買的話），——自己的糧食總是不能養活自己，一匹耕馬的農民，——這樣的農民全俄約有三百五十萬家——其地位也好不了多少。當然，也有例外；我們已經講過，有些地方，生活中等的甚至富裕的農民也祇有一匹耕馬。可是我們所說的不是例外情形，不是單個地方，而是整個俄國。假使拿全體沒有耕馬的農民來看，那末，無疑的這都是貧民和貧困羣衆。一匹耕馬的農民甚至在農業省份中也祇種三、四畝土地，種五畝地的很少；靠自己的糧食也不能過活。一匹耕馬的農民，甚至在豐年，其生活也不比沒有耕馬的農民好些，——他們常常吃不够，常常挨餓。莊稼完全衰落，牲畜瘦弱，飼料極少，無力好好地照料土地。一匹耕馬的農民在自己全部莊稼上（牲畜底飼料除外）所能花費的（如在伏龍奈什省（Voronezh）內）一年至多不過二十盧布！（而富農所費的要大十倍）。一年二十個盧布，又要租土地，又要買牲畜，又要修理鋤頭和別的工具。

具，又要放牧，又要其他等等！難道這是莊稼麼？這只是受難，只是苦工，只是終身受苦。難怪一匹耕馬的農民也有把自己的份地出租的（而且這樣的人並不少）。窮人拿着一塊土地也沒有多大用處。沒有錢，從土地上不但得不到錢，而且還賺不到飯吃。穿衣，吃飯，耕田，納稅：處處地方都要錢。在伏龍奈什省內，一匹耕馬的農民，單是納稅，通常每年就要十八個盧布，而他的一切用途，總共起來一年至多不過七十五個盧布。什麼購買土地，什麼精良工具，什麼農村銀行等等，這都是說着頑的，這完全不是爲貧農着想的。

金錢又到什麼地方去找呢？於是不得不去找「外水」。一匹耕馬的農民，與沒有耕馬的農民一樣，也祇是靠「外水」來苟延殘喘。但什麼叫做「外水」呢？這就是替別人作工，作僱傭勞動。這就是說，一匹耕馬的農民，一半已失去了主人底資格而變成了僱傭工人，無產者。因此這樣的農民可稱爲半無產者。他們也是城市工人底同胞兄弟，因爲各個東家也在用各種方法括取他們。他們除了與社會民主黨人聯合起來反對一切富人，反對一切有產者之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敷設鐵道的是誰呢？工頭所搶掠的是誰呢？斬伐和浮運木材的是誰呢？做雇農的是誰呢？做短工的是誰呢？在城內和碼頭上當苦工的是誰呢？這都是鄉村貧民，這都是沒有耕馬的和一匹耕馬的農民。這都是鄉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俄國這樣的人有多少呵！根據統計，全俄（高加索和西伯

利亞除外）每年發出八百萬有時甚至九百萬的國內通行證。這些都是出遠門的工人。他們名義上是農民，實際上是僱傭工人。他們都應當與城市工人結爲一個同盟；每一線曙光和知識灌入鄉村，都將加強和鞏固這個同盟。

講到『外水』，我們還不要忘記一件事情。一切官吏和有官吏思想的人們愛說，鄉下農夫『需要』兩件東西：土地（只不要很多，而且很多也無從去找，因爲富人早已把土地收括完了！）和『外水』。因此，據他們說，要幫助農民，就須在鄉村中多辦實業，多『給』人們『外水』。這樣的話只是一套虛調。對於貧農，外水就是僱傭工作。『給』農民以『外水』，就是變農民爲僱傭工人。好一個幫助！對於富農，則有另外一種需要資本的『外水』，——如開設磨坊和別的行業，購買打穀機，從事商業以及諸如此類的營業。把有錢人底外水和貧農底僱傭工作併爲一談，就是欺騙貧民。當然，這樣的欺騙對於富人是有利的，這樣描寫事情：似乎一切『外水』對於一切農民都有本事和有本錢來辦到；這對於富人自然是有利的。但誰要真正給貧民好處，誰就把一切真理而且祇把真理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還要說一說中農。我們已經說過，就全俄大概說來，凡有兩匹耕畜的農民都可以算是中農，一千萬農家中這樣的農家約有二百萬。中農站在富者與無產者之間，——所以他就叫做

中農。他的生活也是中等的：在豐年可以在自己的莊稼上維持生活，可是貧困總是追隨着他；儲蓄或是完全沒有，或是很少。因此他的莊稼是動搖的。錢是很難到手的：他從自己的經濟上往往很少能夠得到他所需要的款子，而且還很勉強。而去找外水——就是拋棄莊稼，把莊稼荒廢。許多中農不找外水終究不能過活：於是不得不去作僱工，貧困使他不得不受地主底束縛，不得不去借債。中農差不多一輩子脫不了債務：他不像富農那樣有穩固的收入，所以一經借債之後，就無異於上了絕命圈。如果不完全破產，就不能解脫債務。中農最受地主底束縛，因為地主在按件工作上面需要沒有破產的農民，要他還有兩匹耕馬，又有全套農具。中農要出外謀生是很困難的：爲了麵包，爲了牧場，爲了租借地，爲了借多債，他都不受地主底束縛。除了地主和富農之外，壓迫中農的還有富裕的鄰家：這些富裕的鄰家總是與他競爭土地，從來不肯錯過壓迫他的機會。中農正是過着這種非驢非馬的生活。他既不是真正的業主，又不是工人。一切中農都想做業主，都想做有產者，可是能夠做到這點的很少很少。就是僱用雇農或短工，靠別人勞動爲生，從別人身上發財——這樣的人畢竟也很少。而大多數中農總是無力僱用別人，而自己却反得被別人所僱。

凡是富農和貧農，有產者和工人開始鬥爭的地方，中農總是站在中間，不知所從。富農叫他

們到自己方面來：你也是產業主，也是有產者，你同那些赤貧工人一塊幹嗎呢？可是工人則向他們說：富人欺騙你，他們要吞滅你；你除了幫助我們來與一切富人鬥爭外，再沒有別的生路了。這種爭論中農的爭論，凡是工人社會民主黨人爲解放勞動人民而鬥爭的各國，到處都在發生。在俄國，這一個爭論現在剛在開始。因此，我們應當好好考察這件事情而明白地了解：富人用那些騙局來引誘中農，我們怎樣澈底揭破這些騙局，我們怎樣幫助中農找得自己的眞朋友。假使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立刻能够走上正確的道路，那末我們建立鄉村勞動者和城市工人底穩固聯盟，要比德國工人同志快得多，我們將很快地戰勝勞動者底一切敵人。

四 中農到那裏去？到有產者和富人方面去， 還是到工人和無產者方面來？

一切有產者，整個資產階級，都竭力想拉攏中農，其方法是：答應他們採取各種方法來改善莊稼（賤價的犁耙，鄉村銀行，實行種草，賤價出賣耕畜和肥料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又使農民加入各種農業聯合（書本上的所謂合作社），加入以改善經濟爲目的的業主聯合會。資產階級想用這些方法來使中農，甚至小農，甚至半無產者不與工人聯合；牠想激動他們擁護富人，擁護

資產階級，來與工人，與無產階級鬥爭。

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對這點的答覆是：改善莊稼是很好的事情。要賤價購買犁耙，這並沒有什麼壞處，現在甚至每個聰明一點的商人都想賤價出賣商品，來拉攏顧主。可是，如果向貧農和中農說：改善莊稼和廉價出賣犁耙可以幫助他們大家解脫貧困而自立起來，同時並不觸犯一切富人的利益，——這就是欺騙。從這一切改善、廉價和合作社（買賣商品的聯合會）中，最便宜的，是富人。富人逐漸富起來，逐漸排擠貧農和中農。當富人還是富人的時候，當他們掌握大部份的土地、牲畜、工具和金錢的時候，——那時候不但是貧農，就是中農也永久不能解脫貧困。一、二個中農用這些改善和合作而變為富人，而全體人民和全體中農却陷於貧窮。要全體中農都變成富人，——要做到這點就要驅逐富人，可是要驅逐富人，祇有城市工人和鄉村貧民底聯合才有可能。

資產階級向中農（甚至小農）說：我們把賤價的土地，賤價的犁耙賣給你們，但你們要把自己的心靈賣與我們，你們要拒絕反對一切富人的鬥爭。

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則說：假使他們真正賤價出賣，那末為什麼有錢不買呢，這是商業上的事情。可是，你們自己的心靈則永遠不應賣掉。拒絕與城市工人共同作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鬥爭，

這就是永遠使自己陷於貧困狀況。因商品廉價，富人越佔便宜，越是發財。但誰要是沒有錢，要是他不把這些錢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回來的話，則任何廉價無濟於事。

舉例來講吧。資產階級方面的人，把各種合作社（賤價買進高價賣出的聯合會）當作寶貨而到處顯示。甚至自稱爲「社會革命黨人」的人們，也跟着資產階級呼喊，說農民最需要的是合作社。在我們俄國，各種合作社也開始創辦起來了；可是在俄國，牠們的數量還很少，而且在政治自由沒有達到以前牠們將還是很少的。但在德國，農民中間各種合作社却非常之多。看吧，這些合作社對什麼人最有幫助。全德共有十四萬農家參加牛乳和牛乳製造品的銷售合作社。這十四萬農家（爲着簡便起見我們只引個整數）共有母牛一百一十萬頭。貧農在德國計有四百萬。加入合作社的祇有四萬人，這就是說，一百個貧農中祇有一個利用這些合作社。這四萬貧農總共祇有十萬頭母牛。其次，中等的業主，中農，有一百萬，加入合作的祇有五萬人（就是佔百分之五），而他們的母牛祇有二十萬頭！最後，富裕的業主（地主和富農都在其內）共有三十三萬多，加入合作社的有五萬人（即是佔百分之十七），而他們的母牛則有八十萬頭！

看吧，合作社首先對什麼人最有幫助。看吧，那樣呼喊用這類賤價買進高價賣出的聯合會來拯救中農的人們，是怎樣愚弄農夫。資產階級總想很便宜地從社會民主黨人——號召貧農中農到

自己方面來的社會民主黨人——那裏把農夫「收買」過去。

在俄國也設立了各種的乳乾勞動組合和牛乳勞動組合。在俄國也隨時可以找到這樣的人，他們喊着：勞動組合，村社聯合，協作社——這些便是農夫所需要的東西。看吧，這些勞動組合，合作社，村社合租制是幫助誰的呢。在俄國，一百家中間至少有二十家完全沒有母牛，三十家祇有一頭母牛；這些農家因急需而出賣牛乳，兒女沒有牛乳可飲，他們挨餓，他們如蒼蠅一般的餓死。富農則有三四頭母牛或者還要多些。這些富農共有全數農民母牛之半。乳乾勞動組合到底幫助誰呢？很明顯的，首先就是幫助地主和農民資產階級。很明顯的，他們唯願中農和貧農傾向他們，唯願人們認爲解脫貧困的方法，不是一切工人與整個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單個小業主想解脫貧困而變作富人的志願。

一切資產階級方面的人，假裝是小農方面的人或小農的朋友，用各種方法來贊助和鼓吹這種志願。而許多癡漢還不知狼蒙羊皮，重複資產階級的欺騙，以爲這樣就可以扶助小農和中農。譬如，他們在各種書本上和演講中證明，小莊稼是最有利和最出息的莊稼，小莊稼正在繁盛起來。據他們說：正因爲這樣，所以農業中隨處有這樣多的小業主；正因爲這樣，所以他們這樣緊緊地握着土地，（而並不是因爲一切肥沃土地已被資產階級佔據，一切金錢也在他們手中，而使貧

農在小塊土地上終身過着窮蹙痛苦的生活！）。這些甜言蜜語的人又說：小農不需要很多的錢；小農和中農比大農節儉而勤懇，而且會過簡樸些的生活；他們不用乾草，而用麥稈來飼養牲畜；他們不買貴的機器，而會早些開工、晚些停工來趕上機器；他們不拿現錢叫別人來修理一切，而在過節時自己拿着斧頭來做木匠工作——結果比大業主省了許多錢；他們不養貴的耕馬或公牛而養母牛來耕耘土地——德國的貧農都是用母牛來耕耘土地，而俄國人民已破產到這步田地；他們不僅用母牛而且開始用人來耕耘土地哩！這是多麼有利呵！多麼便宜呵！中農和小農這樣勤懇，這樣刻苦，生活這樣簡樸，不事閒遊，不想社會主義，而僅想自己的莊稼——這多麼令人欽佩呵！他們不跟隨那些舉行罷工來反對資產階級的工人，而跟隨富人，想變成上流人物！所以只要大家都這樣勤懇，這樣努力，這樣過簡樸生活，不喝酒，多省錢，少買些花布，少養些兒女，——那時候大家都會過好生活，什麼貧窮困苦都沒有了！

資產階級把這樣的甜言蜜語說給中農聽，而有些傻瓜居然就相信這些論調，自己也去重複牠們！實際上，這些甜言蜜語——祇是欺騙和譏笑農民。這些甜言蜜語的人稱貧窮——痛苦的貧窮——為便宜有利的莊稼。貧窮使中農、小農不得不從早到夜地工作，使他們連麵包都要少吃，一個銅子都不敢花費。一條短褲穿三四年，夏天不穿鞋子，鋤頭壞了用繩索網紮，母牛用蓋屋的

爛程來飼養；當然，這比什麼都『更便宜』『更有利』了！可是隨便請那一億資產者和富農來嘗一嘗這種『便宜』『有利』經濟底滋味吧，——那他們就會立刻忘記自己的甜言蜜語了！

讚揚小莊稼的人有時想給農民以好處，但實際上祇給農民以害處。他們用甜言蜜語欺騙農民，正如開彩欺騙人民一樣。現在我來說什麼叫做開彩。假定我有一頭母牛值五十盧布。我想把這頭牛來開彩，用一個盧布一張的彩票叫大家都來買。一個盧布可以中一頭母牛！於是人們就爭先恐後，拿錢買彩票。一百盧布收齊了，我便實行開彩，什麼人的票中了彩，他就以一個盧布換得一頭母牛，而其他的人都落了個空。這頭母牛對於人民是否便宜呢？不，很貴；因為付了兩倍的價錢，因為毫不費力而發洋財的只有兩個人（開彩的人和中彩的人），而其餘的九十九個人則空

⊖在我們俄國，有些傻瓜想給農民好處，但有時終究還是不知不覺地說這些甜言蜜語，這些人就叫做『民粹派』，或者也叫做『小莊稼底擁護者』。因為缺乏理智而跟着他們走的還有『社會革命黨人』。在德國，說甜言蜜語的人也不少。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叫做愛德華·達維特的，他不久以前寫了一本很厚的書。他在這本書上說：小莊稼比大莊稼有利得無可比擬；因為小農沒有無謂的用途，耘地不用耕馬，而用同時給他牛乳的母牛。

掉了自己的錢。所以，誰要是說開彩對於人民有利益，誰就是欺騙人民。同樣，誰要是答應用各種合作社（賤價買進高價賣出的聯合會）各種經濟改善，各種銀行和諸如此類的方法來使農民解脫貧困，誰就是欺騙農民。開彩時一個人中彩，而其餘的人都吃虧；同樣，一個中農，僥倖成爲富人，而其他的九十九個則一輩子從事苦工，脫不了貧困，甚至更加破產。請每個鄉下人好好地考察自己的鄉會和本府的一切鄉會吧：中農變成富農而解脫貧困的多不多？而終身不能解脫貧困的有多少？破產出鄉的又有多少？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全俄中農之家不出二百萬戶。假定賤價買進高價賣出的聯合會比現在多十倍。結果怎麼樣呢？假使十萬中農能夠升到富農地位，那是最多最多了。可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一百個中農中間祇有五個人發了財。但是其他的九十五個人怎麼樣呢？他們的生活還是一樣困難，而且有許多人的生活還弄得更加困難了！至於貧農則越發破產了！

很明顯的，資產階級祇要中農和小農多多地跟從富農，祇要他們相信。可以不與資產階級鬥爭解脫貧困；祇要他們希望自已勤懇、自己刻苦、自己發財，而不靠望與鄉村工人和城市工人聯合。資產階級想用一切力量來維持農民這種受騙的信仰和希望，想用各種甜言蜜語來哄着他們睡

要揭穿這一切甜言蜜語的人們底欺騙，只要向他們發三個問題就夠了。

第一個問題。當俄國二萬萬四千萬俄畝肥沃土地中有一萬萬俄畝屬於土地私有主的時候，當一萬六千個最大的土地私有主佔有六千五百萬俄畝的時候，勞動民衆能不能解脫貧困呢？

第二個問題。當一百五十萬富裕農戶（而農戶總數則是一千萬）佔有全部農民耕地、農民耕馬及農民牲畜之半，佔有全部農民積蓄和存款之一大半的時候，當這個農民資產階級還繼續富裕，排擠貧農中農，靠雇農短工底勞動來發財的時候，當六百五十萬農戶都是破產的貧農，總是受餓，以各種僱傭工作來賺得一小塊麵包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勞動民衆能不能解脫貧困呢？

第三個問題。當金錢成爲主要力量的時候，當有錢可以購買一切：購買工廠、土地、甚至購買人作爲僱傭工人和僱傭奴隸的時候，當無錢不能生活又不能經營莊稼的時候，當小業主——貧農——應當與大業主爲着金錢而進行鬥爭的時候，當幾千地主、商人、廠主和銀行家抓得數萬萬盧布而且還支配着那一切收集有幾十萬萬存款的銀行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勞動民衆能不能解脫貧困呢？

任何甜言蜜語，說什麼小莊稼和合作社如何有利，都逃不脫這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只能有

一個答覆：能够拯救勞動民衆的眞正『合作』，就是鄉村貧民和城市工人社會民主黨人聯合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這樣的聯合能迅速地擴大和鞏固，則中農會很快地懂得資產階級約言底全部虛偽性，中農會很快地站到我們方面來。

資產階級知道這點，所以除了甜言蜜語之外，還散佈各種關於社會民主黨人的謠言。他們說：社會民主黨人想剝奪中農和小農底財產。這是造謠。社會民主黨人祇想剝奪大業主底財產，祇想剝奪以別人勞動爲生的人底財產。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會剝奪不僱用工人的小農和中農底財產。社會民主黨人擁護並堅持全體勞動民衆底利益——不僅是最有覺悟最有團結的城市工人底利益，並且是鄉村工人底利益，而且還擁護小手工業者和小農底利益，假使他們不僱用工人，不限從富人，不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話。社會民主黨人爲工農生活底一切改善而鬥爭，只要這些改善是在資本主義統治未破壞以前可以立刻實行的，只要這些改善是可以促進與資產階級作這種鬥爭的。可是：社會民主黨人不欺騙農民，他們把全部真理都告訴農民，他們預先直截了當地告訴農民：當資產階級統治着的時候，任何改善都不能使人民解脫貧困。爲要使全體人民知道社會民主黨人是什麼，他們想要什麼，社會民主黨人就製定了自己的綱領。綱領就是黨所要達到所要爭取的一切目的底簡明確實的敘述。社會民主黨是這樣的一個黨，祇有這個黨才能提出明確的綱領，

使全體人民知道而且看到這個綱領，使黨內只能有真正想使全體勞動人民解脫資產階級壓迫，而且正確懂得誰應當聯合起來作這個鬥爭和怎樣進行這個鬥爭的人。此外，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必須公開地、直接地和確實地在綱領中解釋工人、農、民、底、貧、困是從何而產生的，工人底聯合爲什麼逐漸擴大和逐漸強固起來。只說生活惡劣而號召騷動，這是不夠的，這一點每個空喊家也會幹，但是沒有多大意思。要使勞動民衆明白了解，他們因何而貧窮，他應當與什麼人聯合起來爲解脫貧困而鬥爭。

我們已經說過，社會民主黨人想要什麼；說過了勞動民衆底貧困是從何產生的；說過了鄉村貧民應當與誰鬥爭，應當與誰聯合起來作這個鬥爭。

現在我們來講，工農生活上有那些改善是我們現在就可以用鬥爭來取得的。

五 社會民主黨人要爲全民和工人爭得那些改善？

社會民主黨人爲全體勞動民衆解脫一切掠奪，解脫一切壓迫和解脫一切不公道而鬥爭。工人階級要謀解放，首先就應團結；但要團結，就應有聯合的自由，聯合的權利，應有政治自由。我們已經說過，專制政府的行政就是人民受官吏和警察的束縛。因此，除了一小部份在朝的和能够

接近朝廷的貴人大官之外，全體人民都需要政治自由。可是，最需要政治自由的是工人與農民。富人可以因納賄而不受官吏和警察底專橫強暴的行爲。富人有冤可以上訴。因此，警察與官吏之欺負富人比欺負貧人少得多了。工人和農民則沒有錢去運動警察和官吏，有冤無處申訴，打官司又沒有力量。當在國內沒有人民選舉的行政機關，沒有人民代表會議時，工農便不能解脫官吏警察底勒索，專橫與欺壓；祇有人民代表會議才能使人民解脫官吏底束縛。每個覺悟的農民應當擁護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所要求於沙皇政府的，首先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召集人民代表會議。不分等級，不分貧富，人人都應選舉代表。選舉應當是自由的，不受官吏底任何阻礙；監督選舉的應當是人民所信任的人，而不是鄉村巡查官和地方官。那時候，全民的代表會討論各種人民的需要，牠會在俄國建立良好的制度。

社會民主黨人要求，警察不經過法庭不得拘禁任何人。如有任意拘捕事件，官吏應受嚴厲處罰。要停止官吏之專權，就要人民自己選舉官吏，使每人都有權利直接向法庭控告每個官吏。否則向地方官控告鄉村巡查官，或向省長控告地方官，還有什麼意思呢？地方官當然祇袒護鄉村巡查官，省長當然祇袒護地方官，而且原告人還要受罰；或是坐牢，或是充軍到西伯利亞。祇有當我們俄國（像其他各國一樣）每個人都有權向人民代表會議和選舉的法庭實行控告，有權自由申說自

己的需求或在報上發表意見的時候，那時候官吏才會有所警戒。

俄國人民至今還是像農奴一樣依屬於官吏。不得官吏底允許，人民既不能集會，又不能出版書報！這難道不是農奴式的依屬麼？如果不能自由集會和自由出版書籍，那末怎麼樣來揭發官吏和富人呢？關於人民苦痛的一切公正書籍和公正言論，官吏當然都是要禁止的。因此社會民主黨底這一本小小的書也不得不祕密出版和祕密發行；誰要是被查出有這本書的時候，他就要吃官司，坐監牢。可是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則不怕這點：他們還是多多出版和多多散發正確的書籍給人民讀。什麼監獄，什麼追究，都不能阻止為人民自由的鬥爭！

社會民主黨人要求取消等級，要求國內一切公民完全平等。現在我們有納人口稅的和不納人口稅的等級，有特權的和非特權的等級，有貴人門第和賤民門第；對於賤民甚至還保留着打屁股的刑罰。再沒有一個國家裏的工人和農民處於這樣卑賤的地位。除了俄國之外，沒有一個國家對各個等級有各種不同的法律。現在俄國人民也應要求：每個農民應得到貴族所有的各種權利。農奴制取消了四十多年之後還保留着打屁股的刑罰，還存在着納人口稅的等級，這不是可恥麼？

社會民主黨人要求人民有遷移和職業底完全自由。什麼叫做遷移自由呢？這就是說，農民不必得任何人底允許，有權任意跑到什麼地方去，任意搬到什麼地方去，任意選擇那個鄉村或那個

城市。這就是說，俄國也應取消國內通行證（在別國早已沒有了），無論那個鄉村巡官，無論那個地方官，都不能阻止任何農民任意擇地居住和擇地工作。俄國的農夫還受到官吏這樣的束縛：他不能自由移往城市，不能自由移往新的地方。大臣命令省長不准任意移居！省長比農夫知道得更清楚：農夫要到什麼地方去！農夫正像三歲的小孩子，不經官長底允許不得移動一步！這難道不是農奴式的依屬麼？每個傾家蕩產的少爺可以指揮成年的業主農民，這難道不是侮辱民衆麼？

現在的『農業大臣』愛爾莫洛夫（Yermolov），寫了一本書，名叫『荒年與民困』（饑荒）。他在這本書上公開地說：當本地的地主老爺需要勞動力的時候，農夫不應移居。這位大臣公開地說，一點不客氣，他以爲農夫聽不到這些話，不懂得這些話。當地主老爺需要便宜的人工時，爲什麼把人放走呢？人口愈擠，則地主愈有利，人民愈貧困，僱用勞動愈便宜，人民也更能順從地忍受各種壓迫。從前是管莊保正照顧老爺底利益，而現在是地方官和省長照顧他們的利益。從前由管莊保正喝令在馬棚內行刑，現在是由地方官命令在村鎮管理局內實行鞭打。

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消滅常備軍，而代以國民軍，使全體人民都武裝起來。常備軍，這是脫離人民而用以屠殺人民的軍隊。假使兵士不是幾年關在營房，受過非人的嚴厲的軍事教育，難道他們會屠殺自己的兄弟，屠殺工農麼？難道他們會反對饑餓的農夫麼？要保護國家不受敵人底襲擊

，並不需要常備軍，只需要國民軍就够了，假使每個國民都武裝起來，那時任何敵人都不能威嚇俄國。而人民那時也將解除軍閥底壓迫：軍閥制每年耗費數萬萬盧布，這些錢都是從人民身上收括去的，賦稅之所以如此繁重，生活之所以愈形困苦，也是爲了這個緣故。軍閥制更加強官吏和警察對人民的權力。軍閥制是用來掠奪別民族的，例如掠奪中國人底土地。人民從這種掠奪中不但不能減輕負擔，反因徵收新稅而更加困苦。以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這對於全體工人和全體農民有很大的幫助。

社會民主黨人要求取消間接稅，這對於全體工農同樣也有很大的幫助。所謂間接稅，就是直接從土地或產業上徵收的稅，而是由人民間接繳納的，如購買商品時要付更多的錢。政府在糖、酒、煤油、火柴和其他一切消費品上抽稅；這些稅是由商人或廠主繳納給政府的，自然，他們並不是用自己的錢來繳納，而是用買主所付給他們的錢來繳納的。酒、糖、煤油、火柴底價格是提高了，每個買主買一瓶酒或一磅糖時不僅要付商品價格，而且要付商品稅。譬如，假使你拿十四個哥比去買了一磅糖，那末有四個哥比（大概說來）是稅；糖業廠主把這種稅早已繳給了政府，現在祇要從每個買主手裏收回這筆數目。這樣看來，所謂間接稅收入就是消費品稅，這種稅是以提高商品的價格形式由買主來繳納的。人們有時說：間接稅是最公道的稅，誰買多少，誰就繳

納多少。可是，這種話是不正確的。間接稅是最不公道的稅，因為貧人付的稅要比富人付的重得多。富人所得的入款比農民或工人要多十倍，甚至要多一百倍。可是，難道富人所需要的糖也會多一百倍些？他們所需要的酒、火柴或煤油也會多十倍麼？當然是不會的。富家所買的煤油、酒、糖，比貧家不過多一倍，或至多是兩倍。而這就是說：以收入為比例，富人納稅要比貧人少些。假定一個貧農底收入，一年二百盧布；假定他用六十盧布買了那些抽稅的、因而漲價的商品（糖、火柴、煤油——應納出產稅，即是商品未運到市場以前廠主早已付了的稅；政府對於官辦的酒直接提高了價格；花布，鐵和別的商品底價格也騰貴了，因為便宜的外國貨不納高稅是不許進口的）。這六十盧布中間有二十盧布是稅。這就是說，貧農從一盧布中要納十哥比的間接稅（直接稅、贖金、農奴貢金、土地稅、地方稅、鄉鎮稅和村社稅等等還不算在內）。可是，一個富農收入則有一千盧布，他用一百五十盧布買了那些抽稅的商品；這一百五十盧布中他付了五十盧布的稅。這就是說，富農從一盧布收入中祇納五哥比間接稅。人愈富，則他從收入中所納的間接稅也愈少。因此，間接稅是最不公道的稅。所謂間接稅，這就是貧民稅。農民和工人合併起來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他們繳納全部間接稅底百分之九十或八十。可是在全部收入中間，農民和工人所得的大概至多是百分之四十吧！因此，社會民主黨人要求取消間接稅和規定所得的和遺

產的累進稅。這就是說：收入愈多，則賦稅愈高。誰有一千盧布的收入，就請他納百分之二的稅；誰有二千盧布的收入，就請他納百分之三的稅；以此類推。最小的進款（如四百盧布以下的收入）完全不納稅。最大的富人應納最大的稅。這種所得稅，或更正確些說，累進所得稅，要比間接稅公平得多。所以社會民主黨人要求取消間接稅和實行累進所得稅。可是很明顯地，一切有產者，整個資產階級，是不願這點而且要反對這點的。祇有鄉村貧民與城市工人底堅固的聯合，才能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得這種改善。

最後，對於全體人民，尤其是對於鄉村貧民很重要的改善，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所要求的兒童底免費教育。現在鄉村學校要比城市少得多，而且各處祇是富人階級，祇是資產階級，才有可能給子弟以很好的教育。祇有給一切子弟受免費的和義務的教育，才能使人民至少局部地免除現時的愚昧狀態。而鄉村貧民則特別苦於愚昧，特別需要教育。當然，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的教育，而不是官吏和神父所要的那種教育。

其次，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每人都有充分的權利來自由宣傳任何一種宗教。歐洲各國祇有俄國和土耳其，還保留其可恥的法律，這個法律是要反對不信正教而信異教的人，反對分離教派，反對異教徒，反對猶太人。這些法律或是直接禁止某種信仰，或是禁止傳佈這種信仰，或是剝奪有

這種信仰的人底某些權利。所有這些法律，是最不公道的，最強暴的，最可恥的。每個人不僅應當有任意信仰的完全自由，而且應當有傳佈任何信仰和改變信仰的完全自由。無論那個官吏甚至不應有權過問任何人信仰什麼；這是個人的事情，誰也不能干涉。不應當有什麼「佔統治地位的」信仰和教會。各種信仰，各種教會，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各種宗教底教士可由該教信徒來供養，可是國家則不應以國家的款子來幫助任何宗教，來供養任何教士，不管他是正教士，異教士，分離教士和其他任何教士。社會民主黨人就是爲這點而鬥爭。當這些辦法沒有無條件地實行以前，人民不能避免可恥的警察式的對某種宗教的追究，和同樣可恥的警察式的對某種宗教的袒護。

★

★

★

我們已經考察過，社會民主黨人爲全民、尤其是爲貧民要爭得那些改善。現在我們來看：他們爲工人——不僅是工廠工人和城市工人，而且是鄉村工人——想爭得那些改善。工廠工人住得比較擁擠，比較密集；他們在大工場內工作，他們容易得到智識界中社會民主黨人底幫助。因爲這一切原因，所以城市工人之開始與業主爭鬥比其他一切工人都要早得多，他們爭得了更大的改善同時也得了工廠法底編佈。可是社會民主黨人進行鬥爭，是爲一切工人爭得這樣的改善：爲城

市裏和鄉村裏沿家受僱的手藝人，爲那些受小師父和手工業者僱傭的工人，爲建築工人（木匠，石匠等等），爲林業工人，爲粗工，同樣並爲鄉村工人，爭得這些改善。所有這些工人，現在在全國也隨着工廠工人並且得着工廠工人底幫助而開始團結起來，爭取較好的生活條件，較短的工作日和較高的工資。社會民主黨贊助一切工人謀改善生活的鬥爭，幫助一切工人組織（聯合）成爲最結實可靠的工人底堅固聯盟，散佈書報，派遣有經驗的工人到新工人那裏去宣傳，並用各種可能辦法來一般地幫助他們，牠以此爲自己的任務。當我們奪得政治自由的時候，我們在國民會議中也有自己的人，工人代表，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將照着別國同志底榜樣，要求頒佈有利於工人的法律。

這裏我們不想將社會民主黨所要替工人爭得的各種改善，列舉出來：這些改善在綱領上已經列舉過，而且在『俄國的工人事務』①一書上詳細解釋過。這裏我們只要指出幾個主要的改善。工作時間每晝夜不應超過八小時。每星期應當休息一天，額外工作應當完全禁止，夜工也應當完全禁止。十六歲以下的子弟應受免費教育，因此不准作僱傭工作。婦女不應在有害生產中工作。

①馬爾託夫底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曾很通俗地說明社會民主黨綱領底基礎。（編者註）

工作中受傷時，——如因看管打穀機和簸穀機等等而受傷時，——僱主應當撫恤工人。對一切僱傭工人應當發給工資，並且照例應當一星期發一次，而不應像僱傭鄉村工作所常見的現象，二月或三月發給一次。每星期按時領得工資對於工人是極重要的，同時工資必須是現錢而不是商品。僱主最喜歡以各種壞商品貴三倍來代替工資，強迫工人接受；要消滅這種惡劣現象，就須用法律來禁止以商品代替工資。其次，年老工人應當從國庫裏面領得養老金。工人用自己的勞動養活整個富人階級和整個國家，所以他們與官吏同樣有權領得撫恤金。爲使業主不敢濫用自己的地位而破壞有利於工人的規則起見，應當是選派檢察員，檢察員不但監視各工廠，而且也要視察大的地主的田莊以及一般地視察使用僱傭工人的企業。可是這些檢察員不應當是官吏，不應當由總長或省長任命，不應當爲警察服務。檢察員應當是由工人選舉出來的工人，工人自己自由選出的負責人應由政府發給薪俸。這些選出來的工人代表也應當注意使工人的住房設備完滿，使業主不敢逼迫工人住在什麼狗窠內或地窖中（鄉村工人常常是這樣的），使關於工人休息的規例得以遵守和其他等等。同時，不要忘記：在政治自由尚未得到以前，在警察握有全權和對人民不負責任以前，任何工人選出的代表都是沒有什麼益處的。大家知道，警察現在不經法庭而拘捕的，不僅是工人代表，而是凡是敢替大家說話，揭露破壞法律的事情和號召工人團結的工人都遭逮捕。可是，

當我們將有政治自由的時候，工人代表就將給我們許多益處。

應當完全禁止一切僱主（廠主、地主、包工老板、富農）對工人工資任意實行任何剋扣：如藉口廢貨、罰款等等。僱主任意剋扣工資，這是非法舉動和強暴行爲。業主無論藉甚麼名義和無論藉甚麼剋扣，都不得來減低工人底工資。業主不應自己充當法官，自行裁判（剋扣工資的工人自己做法官真是好極了！），而應由真正的法庭來辦；這個法庭應由工人和業主雙方選出代表各半來組成。祇有這樣的法庭，才能公道地判斷業主對工人的不滿和工人對業主的不滿。

社會民主黨人所要爲整個工人階級爭得的就是這些改善。每個田莊上，每個產業上，每個包工老板手下的工人，應當想法與可靠的人來共同討論：他們應當爭得那些改善，他們應當提出那些要求（各個工廠內，各個大田莊中以及在各個包工者那裏，工人底要求當然是不同的）。

社會民主黨底各個委員會幫助全俄工人明確規定自己的要求，同時還出版印刷品來解說這些要求，使得一切工人、業主和長官都能知道這些要求。如果工人能夠親密地萬衆一心地擁護自己的要求，那末業主就要讓步而妥協。城市工人已經用這種辦法爭得了許多改善，現在，手藝人，手工業工人及鄉村工人也在開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要求。在我們沒有爭得政治自由以前，我們祇能秘密地進行這種鬥爭，躲避警察底耳目；因爲警察是禁止工人各種印刷品和

各種聯合的。而在我們奪得政治自由的時候，我們就在大衆面前更普遍地公開地進行這種鬥爭，使全俄全體工人能够聯合起來，能够更親密地擁護自己而反抗壓迫。加入工人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愈多，則他們的力量也愈大，則工人階級也將愈能迅速地完全解脫一切壓迫，一切僱傭勞動及一切替資產階級做的工作。

★

★

★

我們已經講過：社會民主黨不僅要爲工人爭得改善，而且要爲全體農民謀得改善。現在我們來看，社會民主黨想爲全體農民謀得那些改善。

六 社會民主黨要爲全體農民爭得那些改善？

爲着完全解放全體勞動者起見，鄉村貧民應當與城市工人聯合，來進行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富農也在其內）的鬥爭。富農想便宜些付償自己的雇農，強迫他耐勞些和多做些工作；而城市工人和鄉村工人則要求：富農家裏的雇農也能得到較好的工資，工作比較輕鬆而有休息。這就是說，鄉村貧民應當組成自己的特殊聯合會，沒有富農參加的聯合會，——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講過而且永遠還要來重複他。

可是俄國全體農民，富農貧農都在其內，在許多地方仍就還是農奴式的農民；他們大家都是下賤的和納稅的等級；他們大家都被警察式的官吏和地方官所束縛；他們大家往往仍舊爲着割地，爲着水漕，爲着牧場，爲着草地而替老爺做工，——與農奴制下替老爺做工的一樣。農民大家都想解脫這種新的農奴地位，大家都想享有全權，大家都仇恨那至今還強迫他們幹工役（爲土地、牧場、水漕和草地而替貴族老爺「盡義務」，爲賠償「牲畜踐踏田禾」而工作；爲着「謝情」（六五）而派女子「收麥」的）地主。貧農從這一切工役中所受的痛苦比富農還要厲害。富農有時可以用錢來代替工役；可是他們大部份還是受大地主壓迫。這就是說，鄉村貧農應當與富農共同反對自己的無權地位，反對一切工役制，反得一切工租制。只有戰勝整個資產階級（富農也在其內）的時候，我們才能解脫一切束縛和一切貧困。可是有些束縛，我們早些可以解脫，因爲這種束縛對於富農也是不堪忍受的。在我們俄國，還有許多這樣的地方和這樣的省區，那裏全體農民至今往往還完全是一種農奴。因此，俄國的全體工人和全體鄉村貧民應當雙手進行兩方面的鬥爭：一方面與全體工人聯合來反對一切資產者；另一方面與一切農民聯合來反對鄉村中的官吏、地主農奴主。假使鄉村貧民不組成自己的特殊聯盟，與富農分立的聯盟，那末富農將欺騙他們，壓逼他們，自己變爲地主；且不僅是讓他們做一世窮光蛋，而且還不給他們以聯合的自由。假

使鄉村貧民不與富農共同反對農奴式的束縛，那末，他們仍舊會被束縛於本地，他們也不會有完全的自由來與城市工人聯合。

鄉村貧民開始應當打擊地主，至少要剷除地主的最可惡最有害的束縛；——在這一點上，許多富農和資產階級方面的人也會贊成貧農，因為大家都厭惡地主的驕傲態度。可是，祇要我們縮小地主政權的時候，——富農立刻就顯露自己的面目，伸出自己的腳爪來攫取一切，而他們的腳爪則善於抓取東西，而且現在已經抓了許多。這就是說，貧農應當小心提防，與城市工人締結堅固的、牢不可破的聯合。城市工人也將幫助農民剷除地主底舊的老爺習氣，而且還要使富農屈服（正如他們已使自己的廠主稍稍表示屈服一樣）。不與城市工人聯合，則鄉村貧民永遠不能解脫一切束縛和一切貧困；在這一點上，除了城市工人之外，誰也不能幫助他們；除了自己本身之外，對誰也不能指望。可是有些改善，我們早些可以爭得，在這個偉大鬥爭一開始時就立刻可以獲得。有許多束縛在別國早已沒有，而在俄國却還存在着。這種官僚的束縛，這種老爺的農奴主的束縛，俄國全體農民立刻就可以解脫。

我們現在來看：要使俄國全體農民至少能够解脫最可惡的農奴制的束縛，要使鄉村貧民能够解開手來與俄國整個資產階級作鬥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首先要爭得那些改善。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第一個要求：立刻取消放在「納稅」農民身上的一切贖金，一切貢賦，一切義務。當貴族委員會和俄國沙皇貴族政府過去使農民「解脫」農奴式的依屬的時候，他們強迫了農民贖買自己份地，贖買農民向來所耕種的土地！這是一種掠奪。貴族委員會，在沙皇政府幫助之下，直接掠奪了農民。在許多地方，沙皇政府派了軍隊，用武力來實行章程，對不願接受「貧窮的」被剝削份地的農民實行軍法從事。不用軍隊，不用拷打和屠殺，貴族委員會決不能這樣肆無忌憚地掠奪農民，如他們在解除農奴依屬關係時所做的那樣。農民永遠應當記着，他們的地主、貴族委員會怎樣欺騙了和掠奪了他們，——因為就在現在，在爲農民頒布新法律的時候，沙皇政府也總任命貴族委員會或官吏委員會。不久以前，沙皇發了一個宣言（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一日（舊曆二月二十六日）發的）（六六）；在這個宣言上，他曾答應修改和改善關於農民的法律。誰來修改呢？誰來改善呢？還是貴族，還是官吏！要是爭不到設立農民委員會以改善農民生活，則農民將永遠受人欺騙。地主、地方官及一切官吏之指揮農民已經夠了！對一切鄉村巡官，對一切稱爲地方長官、警官或省長的沈醉的貴族公子之農奴式的依屬關係已經夠了！農民應當要求，給他們以自由，使他們自己來安排自己的事務，自己來籌劃、指示和實行新的法律。農民應當要求自由的、選舉的農民委員會，——在他們沒有爭到這點以前，他們將永遠受

貴族和官吏底欺騙和掠奪。假使農夫自己不解放自己，假使他們不統一起來，以便自己親手支配自己的命運，那末誰也不能使農夫解脫貪官污吏底盤剝。

社會民主黨人不但要求完全並立刻取消贖金，農奴資金和其他各種義務，而且還要求將會經取自人民的贖金歸還人民。自從貴族委員會使農民解脫農奴制以來，全俄國的農夫多繳了數萬萬盧布。農民應當要求歸還這些錢。讓政府來向大貴族地主徵收特稅吧，讓農民來取回廟宇的和皇家的（即皇族的）土地吧，讓國民代表大會來支配這些錢以利農民吧。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農民，像俄國農民這樣卑賤、這樣貧困，數百萬農民如此驚人的餓死。我們的農民已到餓死的狀態，因為貴族委員會就已經搶掠了他們，因為從那時起就連年搶掠他們，替舊的末代農奴主搾取舊租，搾取贖金和資金。這一點請掠奪農民的人來負責吧。請從大地主貴族手裏拿出錢來大大地賑濟饑民吧。饑餓的農民不需要區區的恩惠，不需要小小的賞賜。讓農民來要求把逐年付給地主和國家的錢歸還他們吧。那時候，國民代表大會和農民委員會就會真正地大大地來救濟饑民。

其次，社會民主黨要求立刻取消連保制和阻撓農民處理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一日（舊曆二月十六日）沙皇的宣言，答應了取消連保制。現在，關於取消連保制的法律已經頒佈。可是這還不够。此外應當立刻取消阻撓農民處理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不然，農民即無連

保制也仍舊是不完全自由的農民，仍舊還是半農奴式的農民。農民應當獲得處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不必問誰許可讓賣土地於任何人。沙皇的指令正是沒有允許這點：一切貴族、商人和市民都能够自由處理土地，而農民則不能。農夫——是小孩子。地方官應當監督他們，像奶娘一樣地看護他們。應當禁止農夫出賣自己的份地，不然他。浪費金錢！——這便是農奴主底論調，現在竟有傻瓜相信農奴主，帶着同情農夫的神情說道：應當禁止農夫出賣土地。甚至民粹派（關於他們，我早已講過了）和自稱「社會革命黨人」的人們，在這一點上也實行投降，他們認為最好是讓我們的農夫仍舊帶些農奴性，而土地則不要出賣。

社會民主黨人說：這祇是一種虛偽論調，祇是一種老爺觀點，祇是一種甜言蜜語！當我們爭得社會主義的時候，當工人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時候，一切土地將歸公有，誰也沒有權利出賣土地。可是，在沒有達到這點以前怎麼樣呢？貴族和商人可以出賣土地，而農民就^不可以出賣土地嗎？貴族和商人可以自由，而農民就依舊還是做半農奴式的農民嗎？農民依舊還是要求得上司底允許麼？

這祇是一種欺騙，雖然用甜言蜜語來掩飾的，但終究是一種欺騙。

在地主和商人能够出賣土地的時候，農民也應有出賣自己土地的全權和處理自己土地的完全。

自由，完全同地主和商人一樣。

當工人階級戰勝整個資產階級的時候，那時候他們將奪取大業主底土地，那時候他們將在經濟上創立合作經濟：由工人共同耕種土地，自由選擇可靠的人來當管理員，設備各種機器來減省勞動，按班工作，每日至多八小時（有時甚至六小時）。那時候，甚至還想照舊經營個人經濟的農民，也將不會為市場而經營，不會為出賣給顧客而經營，而將為工人合作社而經營：小農將給工人合作社以麵包、牛肉、青菜，而工人也將不要錢地給農民以機器、耕畜、肥料、衣服以及其他農民所需要的東西。那時候就不會有大業主與小業主爭奪金錢的鬥爭，那時候就不會有僱傭勞動和替別人工作的事情，而一切工作人員都將替自己工作，工作中的改良及機器都將有利于工人自身，將減輕他們的勞動，將改善他們的生活。

可是，每個有理智的人都懂得，社會主義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的：要做到這點，須要與整個資產階級及一切政府作拚命的鬥爭；要做到這點，須要使全俄一切城市工人與鄉村貧民合併成爲一個堅固的牢不可破的聯盟。這是一種偉大事業，這種偉大事業終身來幹也是不可惜的。可是，在我們還沒有爭得社會主義以前，大業主始終將與小業主為着金錢而鬥爭；難道大業主可以自由出賣土地，而小農民就不可以嗎？我們重複說一遍：農民不是小孩子，不能讓人家來號令自

已；農民應當得到貴族和商人所享的一切權利，而不受任何限制。

人們還說：農民手裏的土地不是自己的，而是團體的。團體的土地，不准每人隨便出賣。這也只是騙人的話。難道貴族和商人沒有這樣的團體麼？難道貴族和商人不是組織公司，共同購買土地、工廠和其他麼？爲什麼對於貴族團體沒有想出什麼阻撓的方法，而對於農夫則一切警察的混蛋東西極力想出限制和禁令來呢？農民從官吏方面向來沒有看見過一些好處，祇看見過毆打、勒索和侮辱。在農民沒有親自處理自己一切事務以前，在農民沒有爭得完全平權和完全自由以前，農民永遠希望不到好處。如果農民想使他們的土地成爲團體的土地，——那誰也不能阻止他們；他們按自願的協定要吸收什麼人來組織團體，要怎樣組織，要訂立任何的團體契約，這都由他們完全自由辦理。要使任何官吏不敢干涉農民的團體事務，要使誰也不敢對着農民來賣弄聰明和想出各種對於農民的限制和禁令來。

★

★

★

最後，社會民主黨人還想爲農民爭得一個重要的改善。他們現在就想立刻限制農民所受的老爺的束縛，農奴式的束縛。當然，當世界上還有貧困的時候，我們還不能解除一切的束縛；而當土地和工廠還操在資產階級手裏的時候，當世界上的主要勢力還是金錢的時候，當社會主義社會

還沒有實施的時候，——貧困是不會消滅的。可是，俄國鄉村中還保留着許多特別可惡的束縛，這種束縛在別國是沒有的，雖然別國也還沒有實施社會主義。俄國還有許多的農奴式的束縛，這些束縛有利於一切地主而壓迫着一切農民，對於這些束縛，可以而且應當首先立刻加以消滅。

我們要來說明，我們所稱爲農奴式的束縛是那種束縛。

每個鄉人都知道這樣的事情。地主的土地與農民的土地是毗連着的。在農民解放的時候，地主從農民方面割去了農民所必需的土地，割去了草地和牧場，割去了森林，割去了水溝。沒有這些被割的土地，沒有牧場，沒有水溝，農民便沒有一點辦法。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總要跑到地主那裏去，請求地主准許放牲畜到水溝內飲水，或到草地上吃草，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而地主則並不經營自己的經濟，或許連一個銅錢也沒有，而專以束縛農民爲生。農民爲着要借用割地，替地主做義務工，用自己的耕馬來耕種地主的土地；替他收麥子和青草，替他打麥，在有些地方甚至用自己的糞料來肥老爺的土地，拿布匹、雞蛋和各種家禽送到老爺家裏去。這種情形，與農奴制度時代完全一樣。那時候，農民住在那個老爺家地上，就白白地替那個老爺做工；可是現在，爲了貴族委員會在解放農民時從農民那裏割去的這塊土地，農民往往還是白白地爲地主做工。這仍舊是一種工役制。在有幾省內，農民自己也稱這種工作爲工役制。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農奴式

的束縛。地主、貴族委員會，解放農奴的時候，故意這樣做，使他們還能够照舊束縛農民；他們故意割去了農夫的份地，故意把地主的土地弄成尖角形，使農民放雞的地方都沒有；他們故意把農民搬到最壞的土地上去，故意用地主的土地來隔絕通水溝的道路，——總而言之，他們故意做得這樣：使農民陷於羅網，仍舊可以被空手捉住。我們不知還有多少鄉村，那裏的農民還做隣近地主的俘虜，與農奴時代一樣。在這樣的鄉村中，不論富農或貧農，大家都是從頭到腳被人縛住，完全聽命於地主。貧農這裏所受的痛苦，要比富農更厲害得多。富農有時有自己的土地，又可以叫雇農代自己去作工役；但貧農則全無辦法，只好任憑地主發落。在這樣的束縛之下，貧農連喘息往往都沒有時間；既因替老爺做工而不能外出，又不能想到與全體鄉村貧民和城市工人自由結成一個聯盟，一個政黨。

這樣說來，有沒有什麼方法，現在立刻就來消滅這種束縛呢？社會民主工黨要告訴農民兩個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可是我們還要重複說一遍：祇有社會主義才能使貧農解脫一切束縛；因為當富人還有勢力的時候，他們無論如何總是要壓迫貧農的。要完全消滅一切束縛，一下子是不可能的；可是把最可惡最卑賤的農奴式的束縛——壓迫貧農、中農、甚至富農的農奴式的束縛，加以嚴厲的排斥，馬上替農民減輕壓迫，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要做到這點，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由鄉村雇農和最貧農以及富農和地主自由選舉信託的人來組織的法庭。

第二個方法——自由選舉的農民委員會。這些農民委員會應當不僅有權討論和採取各種辦法來消滅工役制，來消滅農奴制度殘餘，而且也有權奪回割地而歸還給農民。

現在我們把這兩個方法來稍微詳細考察一下。自由選舉信託的人來組成的法庭，將要審理農民反對束縛的一切訴狀。這樣的法庭將有權減低土地底租金，假使地主利用農民底貧苦而把地租定得過高的話。這樣的法庭將有權使農民避免過高的付價，——譬如，假使地主在冬天以半價僱定農民作夏天工作，那末法庭將審查這種事件而規定公道的工資。當然，這樣的法庭不應由官吏組成，而應由自由選出的信託的人來組成；同時鄉村雇農和貧農一定要有自己的代表，而其人數不應少於富農和地主底代表。這樣的法庭也將審查工人與業主之間的一切事件。在這種法庭之下，工人和鄉村一切貧民將容易保持自己的權利，彼等將容易聯合起來，容易確切地知道：那些人能够忠實可靠地援助貧農和工人。

另外一個方法還更重要。這就是自由的農民委員會，是由每縣雇農、貧農、中農和富農選出信託的人來組成的（假使農民認為必要時，一縣也可成立幾個農民委員會；或者他們竟可以在每

個鄉鎮和每個大村中成立農民委員會。至於那種束縛壓迫農民，則誰也沒有比農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最會揭發地主——至今以農奴式的束縛爲生的地主——底面目的，也莫過於農民自己。農民委員會將割斷：那些割地、草地或牧場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是從農民手裏不公道地割去的；這些土地應不應當無代價地奪回，還是取價於大地主來報酬這些土地底買主。農民委員會至少將使農民解救許多貧農地主委員會捉弄他們的圈套。農民委員會將使農民不受官吏底干涉，表示農民自己願意而且能料理自己的事務，幫助農民陳訴自己的貧窮狀況，好好認識那些能够忠心擁護鄉村貧民和擁護與城市工人聯合的人。農民委員會是使窮鄉僻壤的農民也能自立起來自己操縱自己命運的第一步。

因此，工人社會民主黨人警告農民：

不要相信任何貴族委員會，任何官吏委員會。

要求召集全民代表會議。

要求設立農民委員會。

要求出版一切書報的完全自由。

當大家都有權利不怕什麼人而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自己的願望時——無論在全民代表會議

上，無論在農民委員會中，或是在報紙上，——立刻就會看到：誰走到工人方面來，誰走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現在呢，絕大多數人都根本沒有想到這點，有些人隱瞞自己真正的意見，有些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些人故意欺騙人家。可是到那時候，大家都會想到這點，隱瞞也用不着隱瞞，一切事情都會弄清楚。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把富農吸引到自己方面去。農奴式的束縛，消滅得愈快愈多，農民獲得真正的自由愈多，則鄉村貧民彼此的團結也愈快，富農與整個資產階級的聯合也愈速。讓他們去聯合吧，這點我們是不怕的，雖然我們明知道，富農將因這個聯合而更有力。要知我們也在聯合起來，們的聯盟——鄉村貧民與城市工人的聯盟——其人數要比他們多得不可比擬；我們是數千萬人底聯盟，他們是數十萬人底聯盟。我們也知道：資產階級將要想法（而且現在已在想法！）把中農甚至小農吸引到自己方面去，想法欺騙他們，想法誘惑他們，分散他們，答應把他們每個人也提拔為富農。我們已經知道，資產階級用那些方法和那些欺騙來吸引中農。因此我們應當預先掀開鄉村貧民底眼睛，預先鞏固他們與城市工人的特殊聯盟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

讓每個農村居民好好地來看一看自己的週圍吧。富農怎樣常常說反對老爺，反對地主！他們怎樣埋怨人民之被壓迫，埋怨老爺之白白荒廢土地！他們怎樣喜歡私相談論，主張土地落到農夫

手裏！

富人所說的話能不能相信呢？不能相信的。他們不是爲人民，而是爲自己要求土地。他們現在已有買地和租地，不過他們還是嫌少。這就是說，鄉村貧民與富農共同反對地主的時期是不長久的。祇有第一步我們能與他們共同進行，往後就要各走各的路。

因此，要明確地分清這第一個步驟，和別個步驟，以及我們最後的主要的步驟。鄉村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完全解放農民，給農民以全部權利，建立農民委員會來收回割地。無論在都市或在鄉村，最後的步驟祇有一個：奪取地主和資產階級底一切土地和一切工廠，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在最初一個步驟和最後一個步驟之間，我們還須經過不少的鬥爭，誰要是把最初一個步驟和最後一個步驟混淆起來，誰就損害這個鬥爭，誰就是不知不覺地堵塞鄉村貧民底耳目。

最初一個步驟，由鄉村貧民與全體農民來共同進行；也許有幾個富農會落在後面，也許幾百個農夫中有一個不嫌惡任何的束縛。可是大多數人當時還會一致行動：平等權利對於全體農民都是需要的。地主奴役束縛着全體農民底手足。可是，最後一個步驟永遠不會由全體農民來共同進行的；當時一切富農都將起來反對雇農。當時需要鄉村貧民與城市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底堅固聯盟。誰要是對農民們說，他們一下子就可實現最初一個步驟和最後一個步驟，誰就是欺騙農民、誰

就是忘記農民自己中間的偉大門爭，鄉村貧民和富農之間的偉大門爭。

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並不答應農民一下子就進入黃金世界。因此，社會民主黨人首先要求完全自由來鬥爭，來作整個工人階級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偉大的、普遍的、全民的鬥爭。因此，社會民主黨人要指出第一個步驟——雖然是很小的，但倒是可靠的步驟。

有些人以為我們要求設立農民委員會來限制束縛和收回割地，這彷彿是築一座什麼城牆，叫人家到此止步。這樣的人沒有好好地想一想社會民主黨人底要求。要求設立農民委員會來限制束縛和收回割地，這並不是一座城牆，這是一扇大門（註釋六七）。首先要走出這扇大門，爲的是要繼續前進，爲的是要照舊開放的、廣闊的道路走到盡頭處，達到俄國全體勞動人民底完全解放。當農民還沒有走出這扇大門的時候，則農民總還處在黑暗、奴役的狀態中，沒有完全的權利，沒有完全的真正自由，甚至彼此不能澈底分別：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指着這扇大門，叫各村社和全人民首先衝破這扇大門，把牠拆個乾淨。而竟有這樣的人，他們自稱爲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也想給農民好處，他們大呼大叫，指手劃腳，想來幫忙，但是這扇大門却沒有看見！這些人甚至糊塗到這步田地，他們說：不要給農民以自由處理土地的權利！他們想給農民好處，可是其議論有時完全同農奴主一樣！從這樣的朋友方面所

得幫助是很少的。假使你看不見應當衝破的第一扇大門，那末你就是極力想使農民得到好處，又有什麼意思呢？假使你看不見怎樣走上自由的人民鬥爭底道路，不僅爲城市中的社會主義而鬥爭，而且爲鄉村中的社會主義而鬥爭；不僅與地主鬥爭，而且與村社內部鄉會內部的富人鬥爭，——假使你看不到這點，那末，你就是想努力於社會主義，又有什麼意思呢？

因此，社會民主黨人這樣堅持地指出這眼前第一扇大門。現在的困難不在說出一切好的希望，而在正確指明道路，明確了解：應當怎樣進行最初的一個步驟。至於俄國的農夫受人束縛，俄國的農民一半還是奴農，——關於這一點，農民底一切朋友們四十年來就已這樣說，這樣寫。地主如何用各種割地來無理掠奪和束縛農民，——關於這點，還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出現以前好久，農夫底一切朋友們都早已有許多著述。說現在立刻應當幫助農夫，說多少應當使農夫解脫一些束縛，——這一點現在一切忠實的人都已看到，甚至我們警察政府底官吏也開始談到了。現在一切問題就在於：怎樣着手工作，怎樣進行第一個步驟，首先要衝破那一扇大門。

對於這個問題，各種人（想給農民以好處的人）有兩個不同的回答。每個鄉村無產者應當想法更明確地解這兩個回答，而確定一定的和強固的意見。一個回答是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他們說：首先應當在農民中間發展各種協作社（合作社）。應當鞏固村社的聯合。不應當給每

個農民以自由處理自己土地的權利。讓村社有更大的權利吧，讓俄國一切的土地逐漸變成村社底土地吧。在購買土地方面要使農民有各種便利，使土地容易從資本方面流到勞動方面來。

另一個回答是社會民主黨人的。農民應當首先爭得貴族和商人所享的一切（無例外）權利。農民應當有全部權利來自由處理自己的土地。爲着消滅最卑賤的束縛起見，應當設立農民委員會來收回割地。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村社的聯合而是全俄各村社中鄉村貧民底聯合，鄉村無產者與城市無產者底聯合。各種合作社和由村社購買土地，將始終是多有利於富農而欺騙中農。

俄國政府知道要減輕農民的負擔，可是牠想用些無足輕重的讓步來敷衍了事，牠想一切都由官吏來辦理。農民應當小心謹防，因爲現在的官吏委員會將與從前的貴族委員會一樣欺騙他們。農民應當要求選舉自由的農民委員會。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希望官吏減輕農民底負擔，而在於要農民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開始不妨祇進行一步，開始不妨祇解脫那最可惡的束縛，——只要農民能够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只要他們能够自由發言和自由團結。沒有一個忠實的人可以否認，割地往往是最惡劣的農奴制的束縛底工具。沒有一個忠實的人可以否認，我們的要求是最初步的和最公平的要求。讓農民自由選舉沒有官吏的自己的委員會來消滅一切農奴式的束縛吧。

在自由的農民委員會中（同樣，在自由的全俄代表會議中），社會民主黨人將立刻竭盡全力

來鞏固鄉村無產者與城市無產者底特殊聯盟。社會民主黨人將要堅持有利於鄉村無產者的各種辦法，幫助他們走了第一步之後，儘可能迅速而親密地來進行第二步，第三步，——以此類推，直到最後的一步，直到無產階級底完全勝利。可是，能不能現在立刻就說定，到明天，爲着進行第二步，應當提出那種要求呢？不，這是不能說定的；因爲我們不知道，富農和許多忙於議論各種合作事業和忙於議論什麼土地從資本方面流到勞動方面來的有智識的人，他們到明天將取什麼態度。

也許到明天他們還不會同地主妥協而還願意澈底消滅地主的政權。那就很好。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所極希望的，而且社會民主黨人將勸告鄉村和城市的無產者要求奪取地主一切土地，把牠交給自由的人民國家。社會民主黨人將留神觀察，使鄉村無產者不受人欺騙，使他們能够更好地鞏固起來，爲無產階級完全解放而作澈底鬥爭。

可是，情形也許會完全不同。甚多半是會不同的。祇要惡劣的束縛制一經受了限制和縮小，富農和許多有智識的人明天就可以與地主聯合，那時整個鄉村資產階級都要起來反對整個鄉村無產階級。那時我們如果單與地主鬥爭，那就很可笑了。那時候，我們應當與整個資產階級鬥爭，應當首先要求儘多的自由和餘地來作這樣的鬥爭，要求改善工人生活來促進他們的鬥爭。

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第一件事情，我們的主要的和必做的事情是：鞏固鄉村無產者及半無產者與城市無產者底聯盟。爲了這個聯盟，我們現在立刻要人民獲得完全的政治自由，農民享受完全的平等權利和消滅農奴制的束縛。而當這個聯盟建立和鞏固起來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就容易揭穿資產階級用以誘惑中農的各種欺騙，那時候我們就容易而且很快地爲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反對政府一切力量而實行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後一步；那時候我們就一直往前地走向勝利而很快地爭得全體勞動民眾底完全解放。

七 鄉村中的階級鬥爭

什麼叫做階級鬥爭？這是一部份人民反對另一部份人民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羣衆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僱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俄國鄉村中，這個偉大鬥爭也是向來就有的，而且現在還在進行，雖然不是大家都看到牠，不是大家都懂得牠的意義。當農奴制存在的時候，一切農民羣衆曾經與那些由沙皇政府所保衛袒護和幫助的壓迫者——地主階級作過鬥爭。那時農民還不能統一起來，那時農民還完全被黑暗所籠罩着，農民在都市工人裏面還沒有找得助手和兄弟；可是，農民終究盡其所能作了鬥爭。農民不怕政

府野蠻的追究，不怕屠殺和剿滅，農民不信神父的話；神父拚命證明農奴制是聖書所贊同和上帝所批准的（當時的教主斐拉列特竟公開地這樣說過！）；農民四處騷動起來，結果政府害怕全體農民底總暴動，於是作了讓步。

農奴制是取消了，可是沒有完全取消。農民仍舊是沒有權利的，仍舊是卑賤的、納稅的和低下的等級，仍舊是處在農奴制束縛底鐵蹄之下。農民也還是繼續發動，還是在尋找完全的真正的自由。然而，在農奴制取消之後，已經產生了新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財富增多了，鐵路和大工廠建築起來了，城市裏的人數更多和繁華更甚了；可是，所有一切財富都操在極少數人之手，而民衆則日益貧窮，破產，饑餓，替別人去作僱工。城市工人開始組織了一切貧者反對一切富者的新的偉大的鬥爭。城市工人已組織到社會民主黨裏去，堅強而親密地進行自己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前進，準備作偉大的最後的鬥爭，爲全民要求政治自由。

最後，農民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去年一九〇二年春天，波爾達夫省，哈爾可夫省和別省的農民暴動起來了；他們跑到了地主家裏，打開了倉庫，彼此分配了地主底財產，把糧食分發給饑民（這些糧食原來是由農夫播種收穫而由地主奪來作爲私產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農民已不能忍受過度的壓迫而起來尋找好運了。農民已打定了主意（而且是完全正確的）：與其不鬥爭而餓

死，不如與壓迫者鬥爭而死。可是，農民沒有獲得好運。沙皇政府簡直宣佈他們爲暴徒和盜匪（因爲他們從地主那裏奪取了由農民播種和自己收穫來的糧食！），沙皇政府會派軍隊去攻打他們，把他們當作敵人來攻打，結果農民被打敗了，軍隊槍擊農民，農民大遭屠殺，受拷打，——打得死去活來，就是土耳其人拷打自己的敵人（基督教徒）時也從來沒有這樣厲害。沙皇的使者，省長，打農民打得最厲害，他們是真正的劊子手。兵士強姦了農民的妻女。農民受了這些痛苦之後，還要受官吏法庭底審判，還要強迫農民向地主繳納八十萬盧布，在法庭上——在這個可恥的、秘密的、監禁式的法庭上甚至不准辯護人陳訴沙皇的巡官，省長奧伯連斯基和別的沙皇走狗怎樣拷打了和虐待了農民。

農民爲正當事業而作了鬥爭。俄國的工人階級將永遠紀念被沙皇的走狗所殺死的打死的烈士。這些烈士會是爭取勞動民衆自由和幸福的戰士。農民被打敗了，可是他們還要再發動，他們並不因初次失敗而灰心失望。覺悟的工人將竭盡全力，使城市和鄉村中儘多的做工民衆知道農民鬥爭底情形並準備新的更順利的鬥爭。覺悟的工人將盡力設法使農民明白了解：爲什麼第一次農民暴動（一九二〇年）被鎮壓下去，應怎樣設法使得勝利仍歸農民和工人，而不歸沙皇的走狗。

農民暴動所以被鎮壓下去，是因爲這次暴動是愚昧的不覺悟的羣衆底暴動，牠沒有固定明確

的政治要求，即沒有改變國家制度的要求。農民暴動所以被鎮壓下去，是因為這次暴動沒有準備。農民暴動所以被鎮壓下去，還因為鄉村無產者還沒有與城市無產者聯合。這便是第一次農民失敗底三個原因。要暴動能夠得到勝利，就要暴動是自覺的和有準備的暴動，要暴動普及全俄，要聯合城市工人來共同進行。城市中工人鬥爭底每個步驟，社會民主黨的每種書報，覺悟工人對鄉村無產者的每次演說，都日益使暴動復起的時期，暴動勝利的時期接近我們。

農民所以曾經不自覺地發動，只是因為他們已經忍無可忍，只是因為他們不願無聲無嗅地無抵抗地死去。農民曾經受盡各種掠奪、壓迫和蹂躪底痛苦，他們曾經連一分鐘都不能不聽信沙皇恩賜的謠言，不能不相信，凡有理智的人都承認下述的辦法是很公道的：把糧食分給饑民，分給終身替別人做工、播種和收穫麵包而現在餓死於「老爺的」倉庫旁邊的人。農民似乎忘記了，好的土地和一切工廠，都被富者奪去，都被地主和資產階級奪去，其目的正是要饑民替他們做工。農民忘記了：擁護富人階級的不懂是教士的宣傳，而且也是統率大批官吏和兵士的整個沙皇政府，關於這點，沙皇政府已經提醒了農民。沙皇政府殘酷野蠻地指給農民看：什麼叫做國家政權，牠替什麼人服務，牠擁護什麼人。我們祇要對農民更時常提及這點，那時候農民就容易懂得：爲什麼需要改變國家制度，爲什麼需要政治自由。當懂得這點的人日益增多的時候，當每個

有知識和有思想的農夫知道。先應當爭取的三個主要要求的時候，農民暴動才不致再成爲不自覺的暴動。那三個要求呢？第一個要求——召集全民代表會議以便在俄國建立人民選舉的而不是專制的行政機關。第二個要求——大家都有出版各種書報的自由。第三個要求——法律上承認農民與其他等級完全平等並召集選舉的農民委員會來首先消滅一切農奴制的束縛。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底主要的基本要求，農民現在將不難了解這些要求，不難了解：爭取人民自由的鬥爭應當從何着手。當農民懂得這些要求的時候，他們也會懂得：應當及早地、持久地、堅固不拔地準備鬥爭；並且不是單獨準備，而是與城市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共同準備。

讓每個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去集合最懂事的、最可靠的和最勇敢的同志吧。讓他盡力去向他們解釋社會民主黨人底目的，使大家懂得應當進行那種鬥爭和應當提出那些要求。讓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去開始慢慢地、慎重地、但不斷地拿自己的學說去教導農民，給農民閱讀社會民主黨的書籍，在可靠的人底小組中講解這些書籍吧。

可是，解釋社會民主黨的學說，不僅要根據書本，而且要根據每個實例，根據我們週圍所看到的每個壓迫事情和不公道的事件。社會民主黨的學說，是關於反對各種壓迫、反對各種掠奪、反對各種不公道事情的鬥爭的學說。祇有知道壓迫原因而且終身反對每件壓迫事情的人，才是真

正的社會民主黨人。怎樣進行這點呢？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在本城和本鄉集合起來，並且決定：應當怎樣進行這點，使整個工人階級得到更多的益處。我舉一兩件事情來做例子吧。假定一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回到本鄉去休假，或者是，某個城市工人社會民主黨人跑到別個鄉村中去了。那裏，整個鄉村，如蛛網裏的蒼蠅一樣陷在隣近地主底爪牙之中，終身不能解脫束縛，無法脫逃這種束縛。那時候就立刻應當挑選最懂道理、最懂事情和最可靠的農民（這種農民，正在尋找真理，不怕任何警察狗子），向這些農解釋，他們無出路的束縛狀況是從何產生的；說明地主怎樣在貴族委員會內欺騙和掠奪了他們，說明富人底勢力和沙皇政府對富人的幫助，說明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底要求。當農民懂得這一切簡單的关键的時候，那時候就應當好好地共同想一想：能不能給這個地主以一致的打擊，農民能不能提出自己首要的和主要的要求（像城市的工人向廠主提出自己的要求一樣）。假使很大的鄉村或幾個鄉村都受這地主底束縛，那末，最好就是經過可靠的人，從附近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方面得到傳單：在傳單上，社會民主黨委員會首先就應當好好說明，農民受那些束縛，他們首先應當要求的是些什麼（要求租地底租金便宜些，或者要求冬季備儲雇農時應按實價，而不應按半價計算工資，或者要求在農民的牲畜踐踏地主底田地時不要這樣追究，不要這樣壓迫；以及其他各種要求）。一切識字的農民從這張傳單中可以知道究竟是什麼

麼一回事，而且他們也能向不識字的農民去解釋。那時候，農民看得很清楚：社會民主黨人是擁護他們的，社會民主黨人是反對任何掠奪的。那時候農民會開始懂得：那些改善，——雖然是極小的改善，然而終究是改善，——如能親密一致地行動，現在一下子就可以爭得到手；那些全國的大改善，應與城市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共同作偉大的鬥爭來取得。那時候，農民將一批一批地起來準備作這個偉大的鬥爭，起來研究：應當怎樣找尋可靠的人，應當怎樣共同擁護自己的要求。他們有時或者可以像城市工人那樣舉行罷工。不錯，鄉村中罷工比較困難，可是有時終究是可能的；而且別國，譬如在地主和富農非常需要工人的工忙時期，曾有過勝利的罷工。假使鄉村貧農對罷工已有準備，假使大家早已同意了一般的要求，假使這些要求已在傳單上作過解釋或就在會議上作過很好的說明，——那時候，大家會親密一致地行動，使地主不得不讓步或至少是稍許限制自己的掠奪。假使罷工能親密一致，能在工忙時期舉行，那末地主，甚至率領軍隊的長官，也難得想出什麼辦法來，——時光易過，地主快有破產的危險，於是他就很快地變為好講話的人了。當然，這是新的事情。新的事情開始往往是很難着手的。城市裏的工人開始也不肯作親密的鬥爭，不知道應當共同提出那些要求，而祇是跑去搗毀機器和破壞工廠。可是，現在工人已經學會親密的鬥爭了。一切新的事情開始都應加以學習。現在，工人懂得：如能親密地行動，一下子就

能達到的只是改善，……而人民却慣於親密一致的反抗，日益準備作偉大的堅決的鬥爭。農民也是這樣地去學習了解：怎樣反抗最殘酷的掠奪者，怎樣親密地去要求改善，怎樣應當逐漸地、堅忍地和隨時隨地準備爲自由而作偉大的鬥爭。自覺的工人和農民底數量將逐漸增多，鄉村社會民主黨人底聯合將漸次鞏固，而每次地主的束縛，教士的微斂，警察的橫蠻和長官的壓迫都將逐漸掀開人民底耳目，教導人民來作親密的反抗，教導人民想到用暴力來改變國家制度之必要。

我們在本書一開始就講過：城市工人現在跑在街上和廣場中，當衆公開地要求自由，旗幟上寫着並喊着：『打倒專制政體！』在不久的將來，城市工人將不僅起來沿街呼喊，而且起來作偉大的最後的鬥爭，工人將萬衆一心地說：『我們或是死於鬥爭或是爭得自由！』成千新的還更堅決的戰士將起來代替鬥爭中的成百的犧牲者。那時候，全俄的農民也將發動起來，幫助城市工人，爲農民和工人的自由而奮鬥到底。那時候，任何的沙皇軍隊都抵當不住。勝利將歸勞動民衆，工人階級將走上平坦大路，爲全體勞動者解除一切壓迫，工人階級將利用自由來爭取社會主義！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註釋六八）

第七 章

……我們現在來分析懷疑者⊖（註釋六九）所提出的各個論據。這些論據可以概括爲下面幾點：（A）歸還割地這個要求是否適合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和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原則？（B）要求糾正歷史上的不公道事（這種不公道事底意義隨着經濟逐步發展而減弱），這從政治的妥當性上看來是否合理？（C）這個要求實際上能否實現？（D）假使承認，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提出這一種要求，並且在我們的土地綱領上我們可以而且應當不提出最低要求而提出最高要求；那

⊖ 所謂懷疑者列寧是指反對歸還割地這個要求的人。（編者註）

未從這個觀點上看來，歸還割地的要求是否徹底？這樣的要求實際上是不是最高要求呢？

據我所知道的，『反對割地』的一切反駁都與這四點中的某一點相接近，而且大多數的反對者（馬丁諾夫也在其內）都否定地答覆這四個問題，認為歸還割地這個要求原則上是不正確的，政治上是不妥當的，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邏輯上是不徹底的。

我們就重要性的次序來考察這四個問題：

(A) 他們認為歸還割地的要求在不正確，他們根據着兩個理由：第一，他們說，這要『觸犯』資本主義的農業，即是阻止或妨礙資本主義底發展；第二，他們說，這個要求，不僅加強而且直接繁殖小私有制。這些論據中的第一個論據（馬丁諾夫特別着重指出的論據），完全是無根據的，因為標本式的割地反而阻止資本主義底發展，歸還割地將加強這種發展；至於說到非標本式的情形（不消說，例外的情形是隨時隨地可以產生，可是牠們祇能證實一般的規律），那末，在『火星報』上和綱領上都作了附帶申明（……『被割去而當作束縛工具的土地……』）。這一個反駁，只是因為不懂得俄國鄉村經濟中割地和工用制實際意義而產生的。

第二個論據（有幾封私人的信內特別詳細加以闡發的論據）要嚴重得多，而且一般地說來，牠是反對我們所擁護的綱領時的最有力的論據。一般地說來，發展、幫助、鞏固、尤其是繁殖小

經濟和小私有制，這並不是社會民主黨底任務。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問題就在於：這裏我們所看到的恰恰不是小經濟底「一般的」例子，而是例外的例子，這種例外性在我們土地綱領底引言內表現得很清楚，那裏說：「消滅農奴制殘餘和自由發展鄉村中的階級鬥爭」。一般地說來，幫助小私有制是反動的；因為這種幫助是反對大資本主義經濟的，因此也是阻止社會發展，蒙蔽和緩和階級鬥爭。但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願意幫助小私有制，其目的恰恰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農奴制度，——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幫助小農以大大地推動階級鬥爭底發展。實際上，這樣一來，一方面我們作最後的企圖來燃起農民對農奴地主階級仇恨（等級仇恨）底殘餘；另一方面我們掃清道路來發展鄉村中的資產階級的階級衝突，因為這一個衝突，現被農奴制殘餘對全體農民一般的似乎相同的壓迫性所蒙蔽着。

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有兩方面。西方的農民私有者，在民主運動中已經盡了自己的作用，現在正在堅持自己對無產階級的特權地位。俄國的農民私有者，現在還處在他所不能不同情的堅決的和全民的民主運動底前夜。他的前進心還大於後退心。他反對等級制農奴制的特權（這種特權在俄國還很厲害），比堅持自己的特權地位還更厲害得多。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中，我們簡直定要幫助農民，設法使他那種還很模糊曖昧不滿的情緒用來反對他的真正的敵人。假使在下一個歷史時

期中，當目前社會政治的「行市」底特徵消失的時候，當農民（假定說）以一小部份有產者底微薄贈品爲滿足而「咬牙切齒」地堅決反對無產階級的時候；——到那時候，我們從自己綱領中刪去與農奴制殘餘鬥爭這一點，也絲毫不會自相矛盾。那時候，我們大概還要從綱領上刪去與專制制度鬥爭這一點，因爲無論如何不能設想：在政治自由以前，農民能够解脫最可惡和最痛苦的農奴制的壓迫。

在資本主義經濟統治之下，小私有制阻滯生產力底發展，把工作者束縛在小塊的土地上，保持陳舊的技術，使土地難於捲入商業流通中去。在工租經濟底統治之下，小的土地私有制，一經解脫工租，便能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使農民脫離那種把他束縛在地方的束縛，剝奪地主底「義務」僕役，剝奪那種以「宗法的」剝削底無限加緊來代替技術改善的可能，使土地易於捲入商業流通中去。總而言之：小農在農奴制度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交界上的矛盾地位，完全證明社會民主黨這種例外的臨時的幫助小私有者是正確的。我們再重複說一遍：這不是我們綱領底編輯上和措辭上的矛盾，而是實際生活底矛盾。

人們反對我們說：「無論工租經濟屈服於資本主義進攻時的態度怎樣頑強，牠終究還是屈服，——不僅如此：牠定會完全消失；大工租經濟將要讓位而且正在直接讓位給大資本主義經濟。」

你們想用一種方法來加速農奴制消滅底過程，而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分散（雖然是局部的，但終究是一種分散）大經濟。這樣一來，你們是不是爲着目前的利益而犧牲將來的利益呢？爲了最近將來農民反對農奴制的暴動這個尙成問題的可能性，你們却阻礙着較遠的將來鄉村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暴動！」

這樣的議論，表面上無論說得怎樣動聽，終究是太片面了：第一，小經濟也會屈服於資本主義底進攻，——雖然態度強硬，但終久還是屈服。小經濟結果也一定不免受排擠；第二，大工租經濟並不總是「直接」讓位給大資本主義經濟，而往往是造成半依賴農，半雇農，半有產者的階層。同時，歸還割地這種革命辦法正因爲牠用公開革命轉變的「方法」來代替——雖然只有一次的代替——漸變農奴制度依賴爲資本主義依賴的「方法」，所以能供獻很大的幫助：對於全體鄉村勞動羣衆的抗議和獨立鬥爭底精神不能不有極深刻的影響。第三，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竭力要利用歐洲底經驗，而且比我們西歐同志更要及早、更要熱心地吸收「鄉下人」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西歐的同志，奪取政治自由之後，對工業工人運動底路徑還「暗中摸索」了好久：在這一方面，我們「從德國人那裏」得到許多現成的東西；可是在土地問題方面，我們也許要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來。要使我們的雇農和半雇農以後易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極重要的事就

是要使社會主義黨現在就開始「擁護」小農，「盡可能的」幫助他，不拒絕參加解決各種困難的複雜的「別人的」（不是無產階級的）問題，教導全體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把社會黨認作自己的領袖和代表。

再講下去吧。（B）他們認爲歸還割地的要求在政治上是不妥當的：把黨底注意力轉移到糾正一切已失去現代意義的歷史上的不公道事件上面去，——使黨底注意力離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這個基本的日益迫切的問題，這是不合算的。馬丁諾夫諷刺地說：人們想「遲四十年來重新解放農民」。

這種議論，僅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好的。要知歷史上的不公道事件各有不同。有些不公道事件，與主要的歷史潮流無關，不阻礙牠，不妨礙牠的流動，不阻止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加深和擴大。要着手糾正這樣的歷史上的不公道事件，那的確是不聰敏的。德國吞併麥爾薩斯·勞倫^①就是一例。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想要在自己黨綱上主張糾正這樣的。不公道的事件，雖然同時也沒有一

①這裏列寧是指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德、法戰爭結果，德國強佔法國底愛爾薩斯·勞倫區而歸併於德國。（編者註）

個社會民主黨肯放棄自己的責任：反對這種不公道事件，並因牠而責罵一切統治階級。假使我們要求歸還割地的動機是這樣而且僅僅是這樣：聽說發生了不公道事件，讓我們來糾正牠吧，——那末這是民主主義的空話。可是，我們要求底動機，並不是因歷史上的不公道事件而傷心，而是由於消滅農奴制殘餘和掃清道路來發展鄉村階級鬥爭之必要，即是在無產階級看來是極「實際的」和極迫切的必要。

我們這裏却看到另外一個歷史上的不公道事件：這種不公道事件直接繼續阻礙社會發展與階級鬥爭。不肯糾正道。歷史上的不公道事件，這無異於「根據鞭答刑是歷史的現象因而擁護鞭答刑」。使我們鄉村解說「舊制度」殘餘底壓迫，這是現代各黨派（農奴主的黨除外）所提出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所以藉口於遲晚，一般地說來是不適當的，而出諸馬丁諾夫之口則簡直是滑稽之至。俄國資產階級「遲了」起來執行自己的任務——掃除舊制度底一切殘餘，——在這個缺點未被糾正以前，在俄國未得政治自由以前，當農民底地位幾乎在一切資產階級智識界羣象中都會養成不滿情緒（如我們在俄國所看到的），而不會在這些羣象中養成保守的自滿情緒——這情緒以為似乎最有力的反社會主義的柱石是「牢不可破的」——以前（如我們在西歐所看到的，那裏各種秩序黨——從地主黨人和最極端的保守黨人起，經過自由主義的和自由思想的資產階級，

甚至直到……請威爾諾夫先生和『俄國革命導報』^①不要生氣……土地問題上時髦的『馬克思主義底批評家』(註釋七〇)爲止，都有上面所說的那種自滿情緒)，我們應當要改正這個缺點。當然，有些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也『遲了』；他們按着原則跟在運動尾巴後面，僅僅從事『能給與可以感覺得到的結果』的問題^②。這些『尾巴主義者』，因爲自己在土地問題上也沒有及時拿出一一定的方針來，所以他們祇能給革命的非社會民主黨的派別以最有力的和最可靠的武器。

至於說歸還割地的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C)，那末，這個反駁(馬丁諾夫特別着重指出的反駁)是最軟弱的反駁之一。講到在那些情形之下和怎樣來實行剝奪、贖買、交換、分界等等這些問題，那末，農民委員會在政治自由底條件之下，解決牠的時候，比少數人底代表所組成的和爲少數人底利益而活動的貴族委員會要容易十倍。祇有慣於過分賤視羣衆革命積極性的人，才能認爲這個反駁有很大的意義。

①『俄國革命導報』是社會革命黨底理論機關雜誌，其出版時期自一九〇一年六月起至一九〇五年三月止，共出四期。(編者註)

②列寧是指屬於經濟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參看本卷的『做什麼？』。(編者註)

這裏提出了第四個和最後一個反駁。假使已指望到農民底革命積極性，替農民提出的不是最低綱領而是最高綱領；那時候就應貫徹到底，或是要求「農民的」平分土地[⊖]，或是要求「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馬丁諾夫寫道：「假使我們想替土地很少的農民尋找真正的（是啊！）階級口號，那我們就應當更進一步，我們就應提出平分土地這個要求；但那時候我們就要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告別了」。

這一種議論極顯著地暴露出「經濟派」底面目，使我們想起一句俗話：叫他禱告上帝，他就把額角磕破。

你們既然贊成那些實現某部份小生產者底某種利益的各個要求中的一個要求，那末，你們就應當放棄自己的觀點而轉到這一部份人底觀點上去！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祇有把規定適合於某個階級底明顯利益的綱領和專替這個階級的服務併為一談的「尾巴主義者」，才會這樣推論。我們是無產階級底代表，但我們公開反對落後的無產者底這個偏見：以為我們祇要為「能給與可以感覺

⊖ 平分土地是一八六一年改良後農民想重分土地來消滅地主大地產和規定——據農民的意見——大家對土地的平等權利的一種傾向。平分土地是民粹派底口號。（編者註）

得到的結果」的要求而鬥爭。我們贊助農民底進步的利益和要求，同時我們堅決反對他們的反動的要求。而「平分土地」，這個老民粹派最鮮明的口號之一，本身正是包含革命原素和反動原素的混合體。社會民主黨人已再三肯定地說過：他們決不把整個民粹主義都籠統拋棄，而要從中找出其革命的一般的民主的原素，並把這些原素認作自己的東西。在平分土地這個要求中間，反動的就是想把小農生產施於四海而傳之百世的空想，可是其中也有（除了認爲「農民」能做社會主義革命底負擔者這個空想之外）革命的方面，這就是：想用農民發動的方法來剷除農奴制度底一切殘餘。據我們的意見，在農民一切模稜的和矛盾的要求裏面，歸還割地的要求，正是這樣一個要求，這個要求，在整個社會發展方向中祇能發生革命影響，因此而值得受到無產階級底幫助。馬丁諾夫請求「更進一步」，實際上祇陷於這種無謂觀點：要我們從農民「真正」的偏見上，而不是從無產階級「真正」已經了解的利益上，來決定農民「真正」的「階級口號」。

土地國有（註釋七一）——是另外一回事。這個要求（假使在資產階級的，而不是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去了解牠的話），比歸還割地的要求的確要「更進一步」；而且在原則上我們完全同意這個要求。自然，在某個革命時期，我們也不拒絕提出這個要求。可是，目前我們規定自己的綱領，不僅爲了革命發動時代，甚至與其說是爲了革命發動時代，不如說是爲了政治奴役時代，爲

了未得到政治自由以前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土地國有的要求，其表現反農奴制的民主運動的直接任務，要軟弱得多。設立農民委員會和歸還割地的要求，直接激發鄉村中現有的階級鬥爭，因此，這個要求不能給人家藉口來作什麼國家社會主義的試驗。正是相反，土地國有這個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使注意力離開農奴制度最顯著的表現和最厲害的殘餘。因此，我們的土地綱領可以而且應當立刻提出，當作推動農民底民主運動底手段之一。可是，提出土地國有的要求，不僅在專制制度之下，而且在半立憲君主政體之下也簡直是不正確的，因為在沒有完全鞏固的和根深蒂固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時候，這個要求，與其說是能夠推動「鄉村階級鬥爭底自由發展」，不如說是使人想作國家社會主義的荒謬試驗①。

①考茨基在其反對福爾馬的一篇文章內很正確地指出：「在英國，先進工人可以要求土地國有。可是，假使像在德國那樣軍事的和警察式的國家裏，一切土地都變成國家底財產，這會引起什麼結果呢？這樣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底實現，我們至少在梅克倫堡（Mecklenburg）可以看到許多。」（「福爾馬國家社會主義」，載於「新時代報」，一八九一號一八九二年十

所以我們以為：在現社會制度底基礎上，我們土地綱領底最高限度，不應超過民主式的修改農民的改良（註釋七二）。土地國有的要求，雖在原則上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對於某個時期是完全適當的，但是現時牠在政治上是不適當的。

很有趣味的一回事：當拿齊金正想提出土地國有這個最高綱領的時候，他就走入了歧途（一部份是因為他僅僅把「農夫所了解所需要的要求」列入綱領的緣故）。拿齊金提出土地國有的要求如下：「把國家的、皇家的、教堂的、地主的土地變為人民的財產，變為國有的基地，以便在最優待的條件之下長期租給勞動農民」。這個要求，對於「農夫」當然是會了解的，可是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大概是不會了解的。土地國有底要求，只有當作資產階級的辦法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辦法時，才是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原則上正確的要求；因為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我們要求一切生產資料國有。如果我們留在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上，則我們祇能要求將地租轉交給國家；這種轉交，本身不僅沒有阻礙，而且甚至加速農業底資本主義的進化。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在幫助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時，他應當第一，並不把農民的土地除外，好像拿齊金所做的那樣。如果我們保留土地上的私有經濟，而只消滅土地的私有權，那末，在這一點上要把小私有者除外，這簡直是反動的。第二，在這樣一種土地國有之下，社會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將國有土地寧願租給「勞動農

民」而不願租給資本家（農業企業家）的辦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統治和保留底條件之下，這種辦法仍舊是反動的。假使有一個民主國實行了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那末這國底無產階級就不應當寧願將土地租給小佃戶或寧願大佃戶，而應無條件地要求：一切佃戶都應遵守關於保護勞動（最高限度的工作日，遵守衛生章程等等）以及關於合理照料土地和牲畜的法定規則。在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之下，無產階級底這種行為實際上自然等於加速大生產對小生產的勝利（如工廠立法加速了工業中這種勝利一樣）。

想無論如何都要為「農夫所了解」的傾向使拿濟金陷於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

總之，我們一分析各種反對歸還割地要求的反駁，我們就相信這些反駁是沒有根據的。我們應當提出民主式的修改農民改良的要求，即民主式的修改農民改良中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但為了確切決定這種修改底性質、範圍和方法起見，我們就應當提出設立農民委員會的要求，這種農民委員會有權剝奪、贖買和交換那些維持農奴經濟殘餘的「割地」。

一九二〇年二月到三月

我們的綱領中的民族問題

我們的綱領中的民族問題（註釋七三）

在黨綱草案上，我們曾提出了關於建立有民主憲法的共和國的要求，這個民主憲法並應當保障『承認國內各民族自決權』。這樣的綱領要求，有許多人以為是不十分明確，所以在第三十三期上說到阿美尼亞社會民主黨人底宣言時，我們會解釋了這一條底意義如下（註釋七四）。社會民主黨將始終反對那種想用暴力或用任何不公道的方法從外面來影響民族自決的一切企圖。可是，無條件地承認爭取民族自決自由的鬥爭，這並不是一定要我們贊助民族自決任何要求。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其積極的和主要的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自決，而是促進各民族中無產階級底自決。我們應當始終和無條件地努力於各民族無產階級底最親密的聯合。只有在單個的特別情形之下，我們方能提出和積極贊助建立新的階級國家或以比較軟弱的聯邦統一來代替一個完滿的政治統一等等要求。

對於我們的民族問題纏繞的這一種解釋，曾引起了波蘭社會黨底堅決的抗議（註釋七五）。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這篇文章上（一九〇三年，三月「Przegląd」①），波蘭社會黨因爲我們的「玄妙的」自決有這樣「奇怪的」解釋和「含糊色彩」，表示忿怒；牠責罵我們陷於理想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說我們認爲「工人只要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其餘什麼都不要管，因爲語言、民族、文化等等據說都只是資產階級杜撰出來的，以及其他等等的話」。這個論據把社會黨人對民族問題的各種極平常極普遍的誤解差不多都暴露出來了，因此值得把牠詳細講一下。

爲什麼我們的解釋這樣「奇怪」呢？爲什麼認爲是離開「字面的」意思呢？難道承認民族自決權就要贊助任何民族自決的任何要求麼？要知承認一切公民自由聯合的權利，並不一定要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贊助組織任何新的聯合，並不妨害我們發言和鼓動來反對組織某種新聯合的觀念。這不適當性和不合理性。我們甚至承認耶穌教徒有自由鼓動的權利，可是我們反對（當然不是贊

①「黎明報」是波蘭社會黨底領導機關報。上面提到的這篇文章是沒有署名，牠是一篇綱領式的文件；因此列寧在這裏不是同單個人爭辯，而是同波蘭社會黨爭辯。（編者註）

察式的反對）耶穌教徒與無產者底聯合。因此，當『黎明報』說：『假使自由自決這個要求應當按字面的意思去了解（而我們直到現在是這樣了解牠的），那末，這個要求就能使我們滿意了』，——可見違反綱領上字面的意思的正是波蘭社會黨。從形式方面看來，牠的結論底不合邏輯是無容疑義的。

可是，我們不願只限於形式上審察我們的解釋。我們也要在實際上直接提出這個問題：社會民主黨是否應當無條件地始終要求民族獨立，還是只在某些條件之下並且在那些條件之下？波蘭社會黨解決這個問題時始終主張無條件地應當承認民族獨立。因此，牠對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表示好感，這是絲毫不足使我們驚奇的，因為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要求聯邦制的國家制度，主張『完全無條件地承認民族自決權』（『革命的俄國』，第十八期，『民族的束縛和革命的社會主義』一文）。可惜這只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空話，這種空話千百次地指出了所謂社會革命者底所謂黨底本性。波蘭社會黨為這種空話所欺騙，為這種囂張論調所迷惑；牠這樣正是證明：牠在理論意識上和政治活動上，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聯繫，是何等的薄弱。我們正是應當使民族自決的要求服從這一個鬥爭底利益。我們對民族問題的提法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對民族問題的提法，其差別也就在這個條件上。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跟牠的足跡走的現代社會黨裏的機會主義），以為

民主制度可消除階級鬥爭，所以他們很抽象地、籠統地、『無條件地』用『全民』利益底觀點或甚至用永久不變的道德絕對原則底觀點來提出自己一切的政治要求。社會民主黨人隨時隨地都是揭露這個資產階級的幻想，不管牠表現於抽象的唯心哲學上還是表現於提出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上。

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有條件地而且正是在上述的條件之下承認民族獨立的要求，這一點如果還要證明；那末，我們就來引一個作家底話，這個作家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上擁護了波蘭無產階級提出波蘭獨立的要求。卡爾·考茨基在一八九六年的『波蘭亡了嗎？』這篇文章上寫過：『波蘭無產階級只要一關心波蘭問題，他們就不能不主張波蘭獨立，因此而不能不歡迎在這一方向中現在即可實行的每個步驟，要是這一種步驟與國際作戰的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一般地是相容的話。』

考茨基繼續說：

『這一個附帶條件，無論如何是必需加上的。民族獨立與作戰的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並不這樣不可分離地聯繫着，以至於在任何情形之下都無條件地要努力於民族獨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十分堅決地主張意大利底統一和解放，可是這並不妨害他們在一八五九年反對

意大利和拿破崙聯合』。(『新時代』第十六卷：第二冊第五二〇頁) ②

你們可以看到：考茨基絕對反對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他絕對要求不僅要在一般的歷史基礎上提出問題，而且正是要在階級基礎上提出問題。假使我們來觀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波蘭問題的提法，那我們就會不感到：他們一開始也正是這樣提出了這個問題。『新萊茵報』(1848年)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對波蘭問題會作了許多文章，牠不僅堅決要求波蘭獨立，而且還堅決地要求德國為波蘭自由而對俄宣戰。但同時，馬克思曾攻擊盧格 (Ruge)。盧格在佛蘭克福的國會裏曾發言主張波蘭自由，但祇用關於『可恥的不公道事』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空話去解決波蘭問題而不作任何的歷史分析。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最怕在革命的歷史關頭上『爭辯』，馬克思就不是這樣的人。馬克思無情地嘲笑『人道主義的』盧格先生，根據法國北方壓迫南方的例子告訴他，並不是任何的民族壓迫而且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引起民主派及無產階級所認為合法的獨立要求。馬克思引了一些特殊的社會條件，由於這些條件：

① 着重點是我們加上的。

② 『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雜誌。(編者註)

「波蘭已成了俄國、奧國和普魯士底革命部份……甚至其中有一部份人還站在封建基礎上的波蘭貴族，也帶着空前的犧牲態度贊助了民主的土地革命。當德國還處於最粗陋的立憲思想和矜誇的哲學思想狀態中的時候，波蘭已經成了歐洲民主運動底發源地……。當我們（德國人）還幫助壓迫波蘭時，當我們還使波蘭底一部份受着德國底束縛時，那我們自己就還是受俄國和俄國政治底束縛，我們自己也不能在本國澈底地解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創立民主制的波蘭是創立民主制的德國底首要條件」。

我們所以這樣詳細地摘引這些話，是因為牠們很明顯地指出，幾乎整個十九世紀下半期內實際社會民主黨對波蘭問題的提法，是在那些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不注意從那時到現在的千變萬化的條件，却堅持馬克思主義底舊的決定，這就是忠於學說底字面而不忠於學說底精神，這就是背誦過去的結論，爾不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新的政治局面。當時與現代，——最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底時代與拚命的反動，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一切勢力極端緊張的時代，這兩個時代彼此的區別是最明顯不過的。當時，正是整個波蘭，不僅農民，而且貴族羣衆也是革命的。爲民族解放鬥爭底傳統竟這樣厲害和這樣深刻，即在本國失敗之後，波蘭底優秀子弟曾到處幫助革命階級，韋勃洛夫斯基（Wojrowski）和佛魯勃列夫斯基（Wollowski）底名字，與十九世

紀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與巴黎工人最後一次的——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失敗的——暴動彼此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當時，如不恢復波蘭，歐洲民主制底完全勝利的確是不可能的。當時，波蘭的確是反沙皇制度的文明的柱石；民主制底先驅。現代，波蘭底統治階級，德、奧的貴族地主，俄國的工業財政大王，都起來擁護那些壓迫波蘭的國家裏的統治階級；而與英勇地承受過去革命波蘭底偉大傳統的波蘭無產階級一塊的，還有德國和俄國的無產階級也在爲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現代，鄰國底馬克思主義底先進代表，仔細考察歐洲底政治發展而完全同情於波蘭人底英勇鬥爭；但是他們也公開地承認：『彼得堡現在已成了比瓦薩（*Wasa*）重要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國革命運動比波蘭革命運動已有更大的國際意義』。還在一八九六年，當考茨基主張在社會民主黨人綱領上可以要求恢復波蘭的時候，他就這樣說過。而在一九〇二年，梅林格考察一八四八年到一九〇二年間波蘭問題底進化的時候，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假使波蘭無產階級想在自己的旗幟上寫出恢復波蘭的階級的國家（關於這種恢復，各統治階級自己連聽都不願聽）的要求，那末，牠就會排演出一齣歷史的滑稽劇：有產階級是會作這種事件的（如一七九一年的波蘭貴族就作過這種事件），可是無產階級則不應降到這步田地。假使把這種反動的空想，提出來爲的是要把那些還相當響應民族鼓動的智識份子

小資產階級吸引到無產階級鼓動方面來，那末，這種空想就加倍值得斥責，因為牠是一種不值一錢的機會主義底表現，這種機會主義貪一時的微小和便宜的暫時勝利而犧牲工人階級底深切利益。」

「這些利益絕對地要求：在瓜分波蘭的三個國家內的波蘭工人，與自己同階級的同志肩並肩地共同鬥爭，而沒有任何的隱瞞思想。在從前，資產階級革命可以創立自由的波蘭；在現在，祇有用社會革命，當現代無產階級打斷自己的鎖鍊時，波蘭底復興才有可能。」①

我們完全同意梅林格這個結論。我們只要指出：即使在論據方面我們沒有像梅林格跑得那樣遠，這個結論還是千萬萬確的。無疑的，現在的波蘭問題底情形與五十年前根本不同了（註釋七六）。可是現在這個情形是不能當作永久的。無疑的，現在的階級衝突已把民族問題遠遠地推在後面，可是還不能絕對肯定說（如果不想陷於理想主義的話）：某個民族問題就不能暫時出現於政治舞台的前面。無疑的，在資本主義未顛覆以前，波蘭底恢復只有極少的可能性；可是不能說，

① 錄梅林格在一九〇二年德文版的『馬恩全集』（一八四一到一八五〇年的作）上所作品的序言。（編者註）

牠絕對沒有可能，不能說，波蘭資產階級不能在某種局面之下站到獨立方面來等等。而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點也不來束縛自己的手足。當牠在自己的綱領上承認民族自決權時，曾估計到各種可能的，甚至各種一般可以設想的局面。這個綱領絕對不否認波蘭無產階級提出波蘭自由獨立共和國口號的可能性，雖然在社會主義以前，牠的實現底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這個綱領祇是要求：真正社會主義的黨不要淆亂無產階級的意識，不要蒙蔽階級鬥爭，不要用資產階級民主空話來欺騙工人階級，不要破壞無產階級現代政治鬥爭底統一。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們才承認民族自決。全部實質也正是在這個條件之內。波蘭社會黨把事情描寫得這樣：似乎牠之所以與德國或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分歧，是因為後者否認自決權，否認要求自由獨立共和國的權利。不是這點，而是忘掉階級觀點，用國家主義蒙蔽階級觀點，破壞目前政治鬥爭底統一，——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我們不能把波蘭社會黨看作真正的工人社會民主黨。請看波蘭社會黨對問題的通常的提法吧：『我們祇能使波蘭脫離俄國以削弱沙皇制度；而俄國同志則應推倒沙皇制度』。又如：『……專制制度推翻之後，我們不過是這樣來解決自己的命運：使波蘭與俄國分離』。看吧，甚至從綱領要求恢復波蘭這一觀點上看來，這個奇怪的邏輯得出何等奇怪的結論。因為恢復波蘭是民主進化的可能的（但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大概是絕對沒有保障的）結果之一，所以波蘭無產階級不能與俄

國無產階級共同爲推翻沙皇制度而鬥爭，而「只應」使波蘭脫離俄國以削弱沙皇制度。因爲俄國沙皇制度與德、奧等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訂結日益親密的聯盟，所以波蘭無產階級應當削弱自己與俄、德等國的無產階級的聯合，雖然現在牠與牠們都在反對同一種壓迫。這無非是爲着資產階級民主派對民族獨立的了解而犧牲無產階級最迫切的利益。我們以推翻專制政體爲目的，而波蘭社會黨則與我們的目的不同，牠以想分散俄國爲目的；當經濟發展將使一個政治整體底各部份更緊密團結的時候，當各國資產階級日益親密地聯合起來反對牠的公敵（無產階級）和擁護牠的公友（沙皇）的時候，所謂分散俄國永遠還是一句空話。可是，現在受專制壓迫的痛苦的無產階級力量底分散，這倒是悲慘的實情，倒是波蘭社會黨錯誤底直接結果，倒是波蘭社會黨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公式的直接結果。爲要掩飾無產階級底這種分散起見，波蘭社會黨就不得不降到國家主義的地步；例如，牠不得不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觀點解說如下：「我們（波蘭人）當期待社會革命，而在社會革命以前則應耐心忍受民族壓迫」。這簡直是造謠。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但從來沒有這樣勸人，而且正是相反，他們自己反對並號召全體俄國無產階級反對俄國的一切民族壓迫，他們在自己的綱領上不僅提出語言、民族等等完全平權的要求，而且還提出承認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權利的要求。假使在承認這種權利的時候，我們使我們幫助民族獨立的要求服從無

產階級鬥爭的利益，那末，祇有國家主義者才會以俄國人不相信外族人這一點來解釋我們的立場；因為實際上，這個立場是從覺悟的無產者不相信資產階級這一點上所一定應當產生出來的。波蘭社會黨這樣觀察問題：以為祇要把『我們』（波蘭人）和『他們』（德國人，俄國人和別國的人）對立一下，就了結了民族問題。而社會民主黨人首先提出這樣的對立：『我們』——無產者和『他們』——資產階級。『我們』無產者已屢次見過，當資產階級看見革命無產階級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怎樣叛賣了自由、祖國、語言和民族底利益。我們見過，在法國民族受着最厲害的壓迫和屈辱的時候，法國的資產階級怎樣把自己賣給普魯士人，護國的政府怎樣變成了賣國的政府，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怎樣求助於壓迫民族底兵士來鎮壓敢於伸手奪取政權的本國人——無產者（註釋七七）。因此，我們絲毫不怕國家主義的和機會主義的攻擊，始終將要告訴波蘭的工人：只有與俄國無產階級作最完滿最緊密的聯合，才能滿足目前當時的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底要求；只有這樣的聯合，才能保障完全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解放。

我們關於波蘭問題所說的話，對其他一切民族問題也是完全適用的。專制制度底令人咀咒的歷史，把這個專制制度所壓迫的各民族內工人階級之間極大的隔膜性，遺留給了我們。這種隔膜性，是反專制制度鬥爭中最大的惡現象和最大的障礙。我們不應認這個惡現象是應該的，不應用

什麼黨的分立性或黨的「聯邦制」底「原則」使這種醜惡現象成爲神聖現象。最簡便的當然是走阻力最少的道路，各人獨自建立小門戶，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現在猶太工人同盟就願這樣做。我們愈覺悟到統一之必要，愈深信沒有完全統一就不能共同進攻專制制度，在現時政治制度之下，鬥爭底集中組織愈是必需——則我們就愈不能滿足於問題底表面上似乎「簡單的」和實質上非常虛偽的解決。假使不了解隔膜性底害處，假使不想無論如何要澈底消滅無產階級黨內的這種隔膜性，——那就用不到「聯邦制」底假面具，那就用不到來着手解決問題，因爲有一「方面」實質上不想解決這問題，那時最好還是讓實際經驗和實際運動底教訓去說服：爲了受專制蹂躪的各民族內的無產階級反對這個專制制度和反對日益緊密團結的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底勝利起見，集中制是必要的。

一九〇三年七月

猶太無產階級是否需要「獨立的政黨」

猶太無產階級是否需要『獨立的政黨』 (註釋七八)

在『立陶宛、波蘭和俄國猶太工人總同盟國外委員會』所出版的『最近新聞』(Postahivye Izv'estiya)『第一〇五期上』(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舊曆十五日))，在『論一個宣言』(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葉加傑林諾斯特夫(Я. Е. Яковлев)委員會底宣言)這篇小文中，我們可以找到下面一句又奇怪又重要、真正又『富於結果』的斷語：『猶太無產階級已形成了(是呵!)獨立的(是呵!)政黨——猶太工人同盟』。

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知道這點。這是一件新聞。

直到現在，猶太工人同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組成部份，而且還在(還在!)『最近新聞』第一〇六期中，我們看到猶太工人同盟中央委員會底申明，其標題上還寫着『俄國社會民主黨』。不錯，猶太工人同盟在自己最近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曾決定改變自己的名稱，(沒有附

帶申明：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某部份底名稱問題，牠願聽俄國同志底意見，決定在俄國黨底章程上『通過』新的聯邦制的原則。猶太工人同盟底國外委員會甚至已『通過了』這個原則，假使可用這三個字來代表牠的退出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而與這個協會訂結聯邦協定的話（註釋七九）。可是，當『火星報』與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作爭辯的時候，猶太工人同盟自己就完全明確地申明過：牠只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通過自己願望和決定；就是說，牠公開地和絕對地承認：在黨未通過新章程以前，在黨未確定對猶太工人同盟新關係以前，牠還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一部份。

可是現在忽又說，猶太無產階級已形成了獨立的政黨！我們再重複說一遍：這是一件新聞。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對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可怕而愚魯的攻擊，同樣是一件新聞。我們終於得到了這個宣言（雖然，可惜得到得太遲了），並毫不猶豫地說：攻擊這樣的宣言，無疑地是猶太工人同盟方面很大的政治步驟①。這一個步驟，與宣佈猶太工人同盟為獨立政黨是完全相符合的，並且又對於這個新黨底面目和行動方式作了許多的揭露。

可惜篇幅有限，不能使我們把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的宣言完全抄錄下來（牠差不多要佔『火星報』兩欄篇幅）②；我們只要指出：這種很好的宣言，把社會民主黨對西翁主義③和反猶

太主義的態度向。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城（我們馬上就要解釋：爲什麼我們特別着重這幾個字）底猶太工人作了很好的解釋。同時，這個宣言對於猶太工人底感覺、情緒和希望這樣關心，這樣同志般地跳心，以至於竟特別講到和着重指出：『甚至爲了保存和繼續發展你們的（宣言對猶太人們說）民族文化起見』，『甚至爲了純粹民族的利益起見』（着重點在宣言原文上就加上的）也必需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旗幟之下進行鬥爭。

但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我們幾乎要說牠爲：『新黨底中央』）却攻擊了這個宣言，說牠一字也沒有提及猶太工人同盟。這就是牠唯一的，但不可寬恕的、駭人聽聞的罪惡。這就是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被人責備缺乏『政治思想』的原因。葉加傑林諾斯拉夫的同志受責備，說

○當然假使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是代表整個猶太工人同盟底觀點的話。

○我們想在正在準備付印的小冊子上把這個宣言和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對牠的攻擊完全轉載出來。（註釋八〇）

○西翁主義（Sionism）即猶太殖民主義，猶太人爲宗教及建國之故，運動復返故土或殖民至其他各地。（校者註）

他們『都還沒有理解單獨組織』好深奧而重要的意思！（猶太無產階級力量（日）之必要），說他們『都還有一種無謂的妄想，總想來棄絕牠（猶太工人同盟）』；說他們傳佈了關於說反猶太主義與各資產階級的階層及其利益有聯繫，而不是與各工人階層及其利益有聯繫的『流言』——『與西翁主義同樣有害的流言』。因此勸告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拋棄那種抹殺獨立的猶太工人運動的有害習慣』，而『承認猶太工人同盟存在底事實』。

現在要問：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這裏是否的確有罪呢？牠是否會應提起猶太工人同盟呢？對這些問題只能給以否定的答覆，其原因是很簡單的：這個宣言並不是向一般的猶太工人講話（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這樣了解牠是完全不對的），而是向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城的猶太工人講話（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忘記了引證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城這幾個字！）。在葉加傑林諾斯拉夫沒有什麼猶太工人同盟的組織。（關於俄國底南方各城，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曾議決：在猶太組織加入黨委員會的城內，在不退出這些委員會也能滿足牠們需要的城內，不應建立單獨的猶太工人同盟委員會）。既然葉加傑林諾斯拉夫的猶太工人已組織於特別委員會內，那末就是說：他們的運動（與本地的整個工人運動是不可分離的）完全應由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來管理，他們應直接經過該委員會而隸屬於俄國社會民主黨，而黨應當號召他們為全黨而工作。

，而不是爲黨底局部而工作。很明顯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不但必提及猶太工人同盟，而且正是相反，假使牠想宣傳「單獨組織猶太無產階級力量（正確些說：不是組織力量，而是組織無力量）之必要」（如猶太工人同盟所想的），那末，在牠這方面是一個莫大的錯誤，不僅直接破壞了黨章，而且直接破壞了無產階級鬥爭統一底利益。

其次，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受人責備，說牠在反猶太主義問題上缺乏「方針」。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對於極大的社會運動表現真正幼稚的觀點。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會說到近十年來國際反猶太主義運動，並指出：「這個運動已經從德國蔓延到別國，而且正是在資產階級內（而不是在工人階層中）到處找到了牠的擁護者」。可是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完全生氣

⊖譬如「猶太工人同盟」應用這句話：「基督教的工人組織」裏面我們的同志，就正是幫助「組織無力量」的事業。這一點和反對「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的一切攻擊是同樣的野蠻。我們不知道甚麼「基督教的」工人組織。屬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各組織，從來也沒有按照各組員所奉信的宗教來區別他們，從來也沒有過問他們的宗教而且將來也決不會這樣做，——甚至「猶太工人同盟」實際上「已形成爲獨立政黨」的時候，也不會這樣做。

地說：「這是與西翁主義的流言同樣有害的流言」。反猶太主義「已傳佈到工人羣衆」；爲要證明這點，「有方針的」猶太工人同盟舉了兩件事實：（一）工人參加了仁司託霍伏城反猶太人的摧殘運動；（二）齊託米十二個（十二個！）工人基督教徒，佔據罷工工人底位置，並以「殺盡一切猶太鬼子」相威脅。證據果然嚴重，尤其是後一個！「最近新聞」底編輯部這樣慣於玩弄五人或十人的大罷工，竟把齊託米十二個落後工人底行爲拿來估計國際反猶太主義與某部份「人民階層」底聯繫。這確是妙不可言！假使猶太工人同盟派自己不忍聽地和滑稽地對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生氣而稍微想一想這些問題，或至少讀一讀不久以前他們用猶太普通話譯出的考茨基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註釋八一）——那末，他們就會懂得：反猶太主義正是與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與工人的利益有確實的聯繫。只要稍微想一下，他們也就會明白：不要說幾十個無組織的和十分之九還全不覺悟的工人，就是幾百個這樣的工人參加某個反猶太的摧殘運動，這也不能改變現代反猶太主義底社會性。

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起來反對（而且反對得很正當）西翁主義者關於反猶太主義永久性的流言，而猶太工人同盟自己這種生氣的糾正只把問題弄模糊，在猶太工人中間散播足以蒙蔽他們階級意識的觀念。

從俄國整個工人階級爲政治自由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觀點上看來，猶太工人同盟之攻擊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是太不可解了。從「猶太工人同盟獨立政黨」的觀點上看來，這種攻擊就變爲可解的了：無論何地你們不要把「猶太」工人與「基督教」工人共同地和不可分離地組織起來！你們不要以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委員會底名義，直接向猶太工人講話，不要不經過猶太工人同盟和不提及猶太工人同盟！

要知，這件事非常痛心的事實——不是偶然的。你們既然不是要求對有關於猶太無產階級的事務的自主而是要求「聯邦制」，——你們就不得不稱猶太工人同盟爲「獨立的政黨」，以便有可能無論如何來實現這個聯邦制。可是，稱猶太工人同盟爲「獨立的政黨」，正是把民族問題上的基本錯誤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結果一定成爲猶太無產階級和猶太一般社會民主黨人觀點轉變底出發點。一八九八年章程底「自主」，保證了猶太工人運動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用猶太普通話來作宣傳和鼓動，出版書籍和召集代表大會，提出特殊要求來闡發總的社會民主黨綱領，滿足地方上的需求——從猶太人生活底特點中產生出來的需求。其餘各方面都必需與俄國無產階級作完滿的和最緊密的結合，必需以俄國整個無產階級鬥爭利益爲出發點。在這樣的結合之下害怕什麼「多數壓制」，實際上是沒有根據的，因爲在猶太運動這個特殊問題上，正是自主可以保證不受多

數壓制，而在與專制制度鬥爭、與全俄資產階級鬥爭這些問題上，我們應當是一個統一的、集中的、鬥爭的組織；我們應當依靠整個無產階級（無語言和民族之分），由於始終共同解決理論的和實際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問題而團結起來的無產階級，而不應建立各走各的道路的組織，不應分散成許多獨立政黨來削弱自己進攻底力量，不應散播隔膜性和分離性，然後又用有名的「聯邦制」這個膏藥來醫治自己故意造作的病。

一九〇三年二月

附

錄

註釋

(一)見正文第五頁。還在聖彼得堡鬥爭同盟裏面工作的時期和充軍於西伯利亞的時候，列寧已有了必需創辦政治報的意見。局部說來，列寧曾參加恢復基輔『工人報』(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的企圖，列寧底這個努力，沒有成功。這個報紙，曾由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批准為中央機關報。列寧甚至還被指定為這個報紙底編輯員。

在一九〇〇年初，當列寧和聖彼得堡鬥爭同盟底其他老工作人員充軍回來的時候，他們(列寧，馬爾託夫【Martov】，波特列索夫【Potresov】，拉卿科【Radevniko】)與著名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特魯威【Struve】，杜幹·巴朗諾夫斯基【Ivan Iaromovskij】，在普斯可夫城【Petrov】)舉行了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曾討論了辦報(將來的『火星報』)的計劃。決定應當吸收『勞動解放』社來參加辦報事宜。

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列寧和波特列索夫特地跑到瑞士去組織辦報事業，關於這點，他們同「勞動解放」社作了談判。這次談判結果幾乎失敗，因為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害怕，如照原定計劃的編輯部設在德國，則編輯部將脫離「勞動解放」社及其事實上的領導者——普列漢諾夫本人。（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十五頁——三一頁「火星報幾乎消滅了」一文）。

從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起，「火星報」（Izvestia）開始出版於德國的慕尼黑（Munich）城。

參加編輯部的人：代表「勞動解放」社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洛德（Aksel'rod），查蘇利赤（Zasulich）；代表俄國工作人員的有列寧，馬爾託夫，波特列索夫。主要的編輯工作是由「火星報」底實際領導者列寧担任，普列漢諾夫和馬爾託夫在「火星報」上也寫了許多文章，編輯部底書記（從一九〇一年四月起）是克魯普斯加亞（Krupskaya）。與「火星報」同時出版的還有理論雜誌「曙光」（Narodnaya），也是由這六個人編輯的。從一九〇二年四月起，「火星報」已移到倫敦出版了。

「火星報」一下子就引起了俄國整個社會民主黨運動底注意。「火星報」秘密轉運到俄國之後，各社會民主黨人小組，革命職業家和工人都把牠讀得破爛不堪。

「火星報」——而在該報內部，首先就是該報的領導者列寧——與經濟主義、與經濟主

義否認革命的政治鬥爭之艱難，與經濟主義之尾巴主義及組織上的手藝主義，作了無情的鬥爭。在『火星報』思想底週圍，在『火星報』本身底週圍，逐漸團結起了絕大多數的地方組織，『火星報』把地方組織一個一個地從經濟派手裏奪了過來。火星派——『火星報』路綫底積極擁護者——成了社會民主黨運動中最顯著的人物；他們推銷『火星報』，他們與工人建立新的關係，他們領導各委員會，他們想把每個社會民主黨組織變成火星派，他們與國外的編輯部發生切實的關係。

『火星報』因為得到了列寧底領導，不僅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思想上的鬥爭中心，而且成了實際上的和組織上的社會民主黨的中心，各地組織都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在形成俄國整個社會民主運動的事業上，『火星報』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火星報』不僅為社會民主黨人隊伍中間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底勝利而鬥爭，而且使社會民主黨人竭盡全力，根據列寧的組織原則來建立全俄集中的黨的組織。

『火星報』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基本問題都作了回答。牠對於工人運動理論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各種複雜問題都給了答案。『火星報』明確估計了國內階級力量底對比，特別指出了工人階級政治鬥爭底偉大意義；同時又正確決定了與專制制度鬥爭中各社會集團和份

子底作用。「火星報」曾留意到自由派在野黨運動底一切表現，與牠們的半途性作了不斷的鬥爭，解釋了和揭穿了社會革命黨人底小資產階級的實質，擁護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火星報」曾關心到羣衆的工農運動底每個步驟。

「火星報」而在該報內部，首先又是該報底領導者列寧（從各方面闡明了西方工人階級底鬥爭，會特別指出工人運動底國際性；同時，牠同樣努力地反對世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和俄國變相的機會主義（經濟主義）。在「火星報」派漸趨鞏固而能奪得一大部份地方組織之後，「火星報」就着手準備召集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牠預先擬定了社會民主黨底綱領草案，而且除了一般的綱領之外，編輯部還特別詳細準備了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在討論綱領問題的基礎上，「火星報」編輯部內部曾發生了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之間的第一次嚴重的爭論。

「火星報」實際上是第一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報紙。

在一九〇三年黨底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火星報」已被承認爲黨底中央機關報。大家知道，關於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成份問題的爭論，在代表大會上是使大會分成多數派和少數派的近因之一。多數派和少數派就是社會民主黨中的正統派和機會主義派（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

克）。爲着保證報紙得到統一而堅固的領導起見，列寧曾提議由列寧，普列漢諾夫和馬爾託夫組成編輯三人團；另一方面，馬爾託夫和其他的人提出了一個要求：照舊由六人組織編輯部，就是說除這三人外再加上波特列索夫，阿克雪洛德和查蘇利赤。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底提議，結果馬爾託夫中明退出編輯部。在代表大會之後，列寧也退出了編輯部，於是只剩下普列漢諾夫一人，他在孟塞維克底牽制之下站了模稜兩可的立場，他擅自用了編輯部底全體舊編輯員（列寧在外），這樣就把『火星報』送到孟塞維克手裏，然後自己也走上了他們的立場。舊『火星報』底歷史就從此結束；舊『火星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報紙底最光榮的模範。牠在列寧底編輯之下，出版了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是由普列漢諾夫一人編輯的，而從五十四期起至一百〇四期（最後一期、一九〇五年）止，牠已成了孟塞維克底機關報，已成了通常的社會機會主義的報紙。

「火星派」底理論刊物是『曙光』雜誌，牠開始出版於一九〇一年春季。「曙光」上登載了許多綱領性的政治文章，其中有兩篇文章：『地方自治運動底追究者和自由主義底安尼巴』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已編入本卷了。

（二）見正文第七頁。列寧在自己的論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一個後退的派別』（見

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五六二——五七八頁）當中，論到「工人思想附刊」時，曾詳細地分析了這期「附刊」底社論，「我們的實際情形」。在這個社論中，曾發揮一種議論，認為：頂好進行在現有環境之下所能够進行的那種鬥爭，而這種可能的鬥爭，就是工人們現在已在進行的鬥爭。同時此地還解釋道：這種「可能的鬥爭」，一方面就是各個別工廠中工人們要求改善地位的「局部」鬥爭，別方面，就是「要求改善全體工人狀況的——如採取頒佈勞動保護法的方法——政治鬥爭」。

這樣，據「工人思想報」（*Rabochaya Mysl*）底機會主義的結論講來，政治鬥爭以及經濟鬥爭，祇應是要求逐漸改良的鬥爭。「工人思想報」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解釋，也是同樣機會主義的。

「工人思想報」底社論中講道：「……社會主義發生於現代生產底社會方法之發展，這種發展必然引起現代生產底一切資料之完全社會化，牠祇是「現代社會組織」進一層的高度的發展」。列寧曾指出：這篇社論，蒙蔽社會主義底目的，一切自由派以及一切資產者——社會主義底敵人——都會贊成這個從伯因斯坦那裏借來的立場。列寧寫道：非常明顯的，「工人思想報」編輯者所列入於社會主義的，祇是那些用和平方法能够取得的那些事體，同

時却除去了革命的方法。這種縮小社會主義範圍的立場以及將社會主義簡化為普通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和俄國全體社會民主黨人底觀點以及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底觀點比較起來，是一種極大的退步。工人階級，自然寧願和平地奪得政權（我們前此已經指出：祇有經過了階級鬥爭之鍛鍊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才能够實行奪得政權），可是放棄革命手段來奪得政權，那就是無產階級在理論上和實際政治上糊塗，那就祇是向資產階級和一切有產階級作可恥的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五七〇——五七一頁）。

（三）見正文第七頁。『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社』是一個很小的、沒有多大影響的組織。牠於一八九九年一月產生於彼得堡城，是山樸波夫（Popov），考捷夫尼可夫（Kochennikov）和工人馬利寧（Malinin）組織起來的。同年四月，牠就被警察所消滅了。在其短的存在時期內，牠發表了告工人的宣言（在『做什麼？』這本小冊內，列寧曾提及過這個宣言），章程和二三種傳單。

（四）見正文第七頁。『工人事務報』（Рабочее Дело）——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底機關報，曾寫過：『我們現在深深地相信：「信仰」至多是代表幾個人底意見，表現其作者頭腦中思想上的混亂』。

列寧在寫給克魯普斯加亞的信中，對於工人事務派底這個立場，曾給了如下的說明：「工人事務派底策略，是用來掩護經濟主義底極端的；是用來保護經濟主義，使之免受直接反對的；是資產階級一切公開的和「改裝的」思想家們，用來自由批評馬克思主義的」。

(五)見正文第二五頁。「工人事務報」曾發表了一篇論文：「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這篇論文，使列寧得到根據，去揭破工人事務派底無原則性。

「昨天他們還在與經濟主義吊膀子」這句話，是指「工人事務報」底編輯部，祇擁護了那些反對政治鬥爭的人們，擁護了那些認為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為知識界之空想的人們。「工人事務報」曾反對「勞動解放」社（一八八五年）綱領中的條文：推翻專制政體應是工人們底第一個政治任務。「工人事務報」認為：「在現在以及在最近的將來（況且在一八八五年）……推翻專制政體，不能成爲「工人小組底第一個政治任務」。工人小組一般地不能擔任政治任務，——真正的實際的政治任務，即適當的和順利的謀政治要求的實際鬥爭」。其次，「工人事務報」還認爲具有羣衆性質的工人運動，能够進行政治鬥爭。可是就策略上着想，也不能把推翻專制政體這個任務提出來當作這個羣衆運動底「第一個」政治任務。

發表了這種言論以後，「工人事務報」編輯部，在示威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高漲

底影響之下，在「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這篇論文中，突然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同時着重指出：國家處於革命底前夜。這篇論文中講道：「如果我們的黨擁有堅固的戰鬥組織和相當的實力，那末我們的黨就會已經找得了鞏固的基礎」來向專制政體作直接的和大規模的進攻」。

(六) 見正文第二七頁。在「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這篇論文（載於『工人事務報副刊』第六期）內，經濟派將恐怖手段的問題，提出來當作首要的問題，當作社會民主黨所應該領會的新策略。

由一九〇一年年初起，恐怖主義的發動，層出不窮，加爾波維奇(Karpovich)因教育總長波哥列頗夫(Bogolipov)強迫學生當兵而刺殺了他，拉哥夫斯基(Lagovskiy)刺殺了大理院院長波別端洛斯采夫(Pobdonostsev)。這種情形，會使恐怖主義的情緒大大地活躍起來。不僅俄國自由派，而且西歐一些社會黨的領袖，都同情牠們。即個別的社會民主黨人，都醉心於恐怖主義。

『工人事務報』編輯部在「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這篇論文中（參看註釋第五條）寫道：「加爾波維奇和拉哥夫斯基的行刺，以及他們在青年中間和一切革命份子中間所得到的那種熱烈的同情，明顯地證明：沙皇政府底白色恐怖，以自然定律底不可遏制的力量而造成革命者

施行紅色恐怖的基础」。

「火星報」曾發表了一些文章，堅決地反對個人恐怖行動的策略，並且反對經濟派對於這個問題所持的不正確的態度。

(七)見正文第二八頁。列寧所提及的事變，發生於一九〇一年二三月間。這就是些羣衆的示威，牠們採取了反政府的直接革命發動底形式。在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舊曆二月十九日），哈爾可夫發生了示威。三月十三日（舊曆二月二十八日），得地方工人援助的學生，組織了示威。莫斯科所發生的學潮釀成了大規模的示威。三月十七日（舊曆三月四日），又有彼得堡學生底示威，牠得到了全俄國同情的響應。這次示威結果在喀山廣場上毆打大批的示威參加者。工人非常積極地接受了政治口號，雖然運動的本身大部份還是自發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當時許多地方是在經濟主義底影響之下，因此牠們對於這些示威——政治鬥爭——的響應開始是非常軟弱的。祇因「火星報」底堅決反抗，才改變了情形，使社會民主黨領導了這個運動。

(八)見正文第三七頁。「做什麼？」這本小冊子是這樣一部列寧底著作，沒有牠就不能研究列寧主義和黨史。在這本小冊子中特別完滿明確地發揮了列寧論黨的學說。牠雖在

火星派與經濟派劇烈鬥爭時期，第一次與第二次代表大會之間寫就的，可是即在現在也還沒有失去其實際意義。牠之所以帶有實際意義，是因為三十年前一九〇二年時黨的任務，與現在歐、美許多共產黨面前的任務相同；同時又因為當時在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形成布爾塞維克派底前夜，「問題在於一切社會民主黨政策底一般基礎和根本任務之決定」（列寧）。

幹部問題和黨機關問題，在該小冊子中是用建立「職業家革命組織」——除秘密工作外無其他職業的、在革命工作中審察過的黨員底組織——來解決的（在當時的條件之下，這些黨員大多數是智識份子，以及單個出色的工人，如巴布希金〔Babushkin〕之類）。

現在，當我們的黨早已擴張成爲羣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時候，這些問題是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解決的。可是根據這點而認爲「職業家革命組織」這個思想是錯誤的，那就是不對的。牠完全證實了自己的正確性。沒有這一種鐵一般的骨幹，我們的黨就不能有這樣的戰鬥力，就不能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和領導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

職業革命家——這就是「那些比別人更努力培養黨而且培養出了黨的新的基本中堅份子」（列寧）。即現在含有「吾黨最大的團結性、穩固性和決定性」（列寧）的新的列寧的先鋒隊，也是職業革命家本着這個光榮傳統底精神而發育起來和訓練出來的。這些光榮的傳統

也應當成爲我們黨內新進的積極份子底財產。職業家革命就是竭誠忠實於黨底事業和工人階級事業的人。

當然，在這本小冊子上有幾個組織原則已經陳舊了，因爲第一，牠們只打算到數十數百人的組織，而沒有打算到數百萬人的組織；因爲當時黨的組織是在沙皇時代的秘密條件下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裏面建立起來的。

「做什麼？」一書闡發了「火星報」時期底思想的精華。「火星報」時期是這樣一個時期，當時黨僅僅開始形成起來，當時統一集中的組織還未將散漫的社會民主黨小組（牠們「手藝式地」工作着，彼此間沒有必要的聯繫）團結成爲一個整體。

經濟派擁護手藝主義。祇有當頭打擊了經濟派之後，「火星報」才能召集黨底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使黨開始成爲有組織的整體。在打倒經濟主義的事業中，「做什麼？」這本小冊子曾起了偉大的作用。「做什麼？」一書基本上說明了建立集中政黨的問題，這問題曾是無產階級的黨所藉以順利前進的「基本環節」。

在「做什麼？」一書上，列寧不僅堅持集中的無產階級組織的觀念，「無產階級黨性」的觀念以反對機會主義者，而且還爲着身爲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爲着以革命理論武裝着

的黨而奮鬥。

在「做什麼？」一書中（見第一、第二兩章），列寧爲革命政黨而鬥爭，反對以修改馬克思主義基礎的伯因斯坦爲代表的西歐機會主義，並反對伯因斯坦底俄國同伴——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和經濟派。機會主義理論會做了經濟派的根據，使他們「傾心於最狹隘的實際行動形式」，使他們崇拜「自發性」，列寧會堅決反對這一點。

經濟派會想把黨底意識程度降到「最落後的羣衆階層底理解程度」，就是說會想把黨從運動底領導者、從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變成工人階級底後衛隊，強迫黨作運動底尾巴。因此列寧會稱經濟派爲「尾巴主義者」（Кивостиса）。崇拜工人運動底自發性和不覺悟性，結果就否認了獨立的無產階級理論與策略底必要。這種崇拜就是想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政策。因此，列寧特別着重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於自發的工人運動之變爲自覺的社會主義運動，有絕大的意義。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際，並補充說：「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學說底產生與工人運動底自發增長全無關係」，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學說「祇能從外界灌輸進來」。列寧最後這幾句話曾引起了機會主義者對他的攻擊。機會主義者認列寧輕視自發的工人運動底意義，認他不正確地似乎非馬克思

主義地理解革命理論底產生。實際上，這些攻擊是不對的，列寧這幾句話祇是嚴格地指出：理論並不是簡單地從自發的工人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對工人階級長期堅決鬥爭各種豐富經驗的科學研究之結果。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科學是工人階級——尤其在第一個發展階段上的工人階級——所不能接近的；所以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是由轉向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觀點的智識界「從外界灌輸進來的」。在工人運動底第一個階段上，這一部份智識份子（就是說站在無產階級觀點上的那部份智識份子）做了「革命細菌」和酵母：牠們加速了工人階級中的醞釀，加速了工人對自己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戰士——歷史任務的理解。這並不是說：列寧曾把社會主義理論同工人運動隔開，曾把社會主義理論與工人運動對立起來；恰恰相反，正是列寧極周到地提出了教育工人先鋒隊，由先進工人組成職業革命家之鐵的幹部的問題。列寧僅想指出：如沒有以革命理論作武裝的黨——先鋒隊，工人羣衆決不能獨立地「造成」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並不是從工人運動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

關於「自發性」和「自覺性」的問題也是如此。列寧沒有用不可超越的城牆把自發性和自覺性彼此隔離起來。九十年代有組織的罷工運動，與六七十年代破壞機器等等的工人騷動

比較起來，可說是「覺悟的」運動。列寧寫過：「這一點可以指給我們看。自發成份實際上無非就是覺悟性底萌芽形式。」『覺悟性』——這就是對無產階級一般階級利益和歷史任務的理解。這一種不同程度的階級自覺性底萌芽，在羣衆運動底各個階段上是存在的；可是像社會主義思想這樣成熟的形式，則沒有『理論家』底幫助，沒有『革命細菌』底幫助，牠是不能從工人運動中產生出來的。當工人階級成熟到建立自己的黨的時候，這個黨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出站在無產階級階級利益觀點上看來最爲正確的策略，並根據這個策略而領導工人羣衆。

以後，普列漢諾夫，馬爾託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洛德和其他辦『火星報』的列寧底同事，轉到了機會主義方面去之後，放棄了舊『火星報』澈底的革命觀點之後，在「做什麼？」「這本小冊子上，他們也認爲有各種『列寧的邪說』（他們過去會大大地稱讚過『做什麼？』（這本小冊子）。他們會想把『做什麼？』一書論自發性和覺悟性以及論職業革命家組織的基本觀點解釋得這樣：列寧強迫工人接受這種『保護人』幹部；以這些『保護人』去「干涉」無產階級，「壓制」牠的自動性，摧殘民主制和培植官僚主義。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會反對經濟派而擁護「做什麼？」一書底基本觀點的普列漢諾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也重

覆了過去經濟派所說的話。瓦羅夫斯基 (Vorobey) 所著『總底結果』一文揭穿了孟塞維克攻擊『做什麼？』一書的言論，該文載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四號（舊曆三月二十三日）『前進報』第十一期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五四四—五四九頁）。一九〇七年在『十二年來論文彙集』裏面翻印『做什麼？』一書的時候，列寧對該書未曾作過任何重要的修改，他祇在該論文集底序言上（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五七—七〇頁）關於『做什麼？』一書作了一個附帶聲明：『做什麼？』一書，『是用爭辯形式來批評經濟主義的，如果了解該小冊子底這個任務而去考察牠的內容，那是不正確的』。

（九）見正文第三八頁。爲着規定建立統一的黨底條件起見，一九〇一年六月在日內瓦召集了五個國外團體代表會議：（一）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工人事務派』），（二）社會民主黨人社（國外的一個團體，加入該團體的有普列漢諾夫，查蘇利赤等人），（三）火星社，（四）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五）鬥爭社（Borba Group，加入鬥爭社的有斯節克洛夫 [Steklov]，梁尙諾夫 [Rybanov] 和斯密爾諾夫——達涅維奇 [Smirnov Danievich]）。該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會指斥了經濟主義，伯因斯坦主義，米萊蘭主義 (Millerandism)，就是指斥了各種俄國的和國際的機會主義。工人事務派後來會拒絕執行六月的決議，對

這個問題站在顯然是機會主義的立場。

(十)見正文第四二頁。列寧這裏所指的國際工人運動裏面的兩派（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底鬥爭，是共產國際與第二國際社會法西斯蒂之間現在所作的那種鬥爭底開場。還在一九〇八年，列寧已預言過：這個思想鬥爭將變成武裝鬥爭。在一九〇二年，列寧寫了「做什麼？」這本書的時候，曾指出：機會主義與革命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鬥爭「已從民族範圍的鬥爭變成了國際的鬥爭」。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德、法、英、俄各國底社會主義運動中，已發生了兩種傾向（革命傾向和改良主義傾向，無產階級傾向和小資產階級傾向）底鬥爭，可是這個鬥爭還未帶有國際的性質。

在六十年代下半期和七十年代上半期，德國發生了拉沙爾（Lassalle）派（拉沙爾底信徒）與愛森拿赫（Eisenach）派（以培培爾【Reich】和李卜克內西【Lieberich】為領袖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愛森拿赫城組織了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鬥爭。使這個兩個黨分立的基本問題就是統一德國的問題。列寧說：「在當時階級力量底對比之下，德國統一底完成，可有兩種方法：或者是取革命的方法，這個革命，由無產階級領導而建立全德共和國；或者是取由普魯士進行皇朝戰爭的方法，這種戰爭足以鞏固普魯士地主們在統一的德國內的霸權。拉

沙爾與拉沙爾派，認為無產階級的和民主主義的道路底實現機會很少，而採取了動搖的策略，使自己適應於地主和俾斯麥底霸權。他們底錯誤，近於使工黨傾向於拿破崙式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反之，培培爾和李卜克內西則主張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道路，反對向普魯士主義，俾斯麥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絲毫的讓步』（『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六四七頁：「阿古斯得·培培爾」）。與這個問題根本上的鬥爭同時發生的，還有拉沙爾派和愛森拿赫派之間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的鬥爭，可是這些鬥爭，都循着一個總的路線：即是對統治階級（在這裏就是以俾斯麥政府為代表的普魯士地主）的妥協政治（拉沙爾派底主張）與革命的階級鬥爭之策略（愛森拿赫派底主張）這兩者間的鬥爭。可是這兩派底鬥爭，並不會越出德國的範圍。

從八十年代起，法國也開始了以蓋斯德（Guesde）為首領的馬克思學說底信徒（所謂蓋斯德派）與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可能派）之間的鬥爭。可能派勸告工人祇要求「可能」的東西，就是說為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東西。爭論底對象是黨內集中制和聯邦制的問題，參加資產階級城市自治局的策略問題。這一個爭論，雖然除了策略上的分歧之外還顯然帶有綱領上理論上的分歧，但是也還未帶有國際的性質。

八十年代初（一八八四年），在英國同時發生了兩個組織。一個是由雖然極不澈底，但却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們（漢德曼 [Hyndman]，湯姆·梅恩 [Tom Mann]）組織起來的，名爲『社會民主同盟』，另一個組織，是社會改良主義的，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名爲『費邊社』（Fabian Society，費邊是羅馬一個上校底名字，他因自己謹慎的期待政策而聞名）。費邊派，就是這樣一批作家和大學教授底團體；他們企圖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對立而進行『市區社會主義』這種宣傳，開發一種理論：由『市區自治局』來施行改良，以便從資本主義逐漸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除了這種市區社會主義之外，費邊派還在工人階級中間散佈了不列顛帝國主義底思想。因爲資產階級有系統地腐化了英國工人運動底上層份子，以殖民地利潤來『營養』他們，所以費邊派底宣傳有了很大的成績，而『社會民主同盟』這個團體底影響却很小。這裏，這兩派之間的鬥爭仍顯然帶有英國工人運動底特性。

八十年代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與民意主義之間的鬥爭，仍然不曾越出俄國的範圍，這是因爲民意主義以及一般的民粹主義，就那個時候講來，還祇是俄國的現象。

一千八百九十年代末與一千九百年代初，是歐洲先進各國財政資本統治時代底開始。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幼稚的國家，已開始追上而且局部地追過英國。英國是最大的握有殖民

地的強國，牠因爲自己想斷殖民地的緣故，就養成了大批的工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工人政治家」。隨着其他各國帝國主義底發展，別國工人階級底上層份子（他們有較有保障的生活條件）中間，也形成着足以發展機會主義思想的基礎。於是機會主義就成爲國際的現象。國際帝國主義就把機會主義當作自己在工人運動中的代辦。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派的鬥爭就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列寧在這個註解底結尾上指出，「在這次與機會主義所作的第一次的真正國際的鬥爭中」，國際底革命派應將鞏固起來，應將結束「早已統治了歐洲的政治反動」，列寧這個指示是有深刻的意義的。這裏列寧指出了工人運動中兩派鬥爭新階段底到來與世界經濟中結束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代的變遷之間的聯繫。列寧認爲這個「和平」時期是開始於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而完結於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前夜。

（十一）見正文第四二頁。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因斯坦（Bernstein），還在一八七〇年，即已表明自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還在他開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進行活動時，在一八五七年，他已進行了公開的運動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原則。在自己的論文「社會主義問題」（後來曾用單行本發行）中，他曾企圖在理論上來證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底

必要性，創造出資本主義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樣一來，也就否認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必要性和必然性。與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性。這樣看來，伯因斯坦曾說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可以合作；而米萊蘭參加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時候，則表明過「怎樣來實行這點」。

(十二)見正文第四五頁。這裏是指俄國大寓言家克立洛夫(Krivoi)關於「兩個木桶」的寓言。作者底結論是：「凡是把自己一切事情都喊給大家聽的人，一定是沒有多大意思的」。

(十三)見正文第四七頁。在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法國大革命底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個主要的彼此鬥爭的黨。一個是溫和的黨——基郎特黨(Gironde)，另外一個是革命的黨——雅可賓黨(Jacobins，或稱山嶽黨[Montagnards])。基郎特派是依靠資產階級的，而資產階級則要求私有財產底自由，企圖避免與國內反動封建份子作厲害的衝突，願意與別國統治階級攜手合作。雅可賓派是革命小資產階級底政黨，牠依靠於人民中小資產階級的階層(手工業者也在內)，並依靠於城市貧民。他們絕對不會做過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戰士。恰恰相反，他們會澈底地擁護資產階級私有權，並且還反對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可是他們會極

堅決地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而鬥爭，爲保持和鞏固這種革命之勝利而鬥爭。列寧關於他們曾寫道：『無產階級底歷史家，認爲雅可賓主義，是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最厲害的高漲之一。雅可賓派給了法國以民主革命底好模範，並抵抗了反共和國的君主聯盟』（『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五五六頁）。當革命受着西歐各封建農奴制國家合力進攻的危險而國內地主反革命派亦已抬頭的時候，資產階級爲推翻雅可賓派政權起見，曾與地主反革命勾結，雅可賓派對這一點的答覆，不僅是組織革命戰爭來反對外來的反革命，而且還建立無情的恐怖制度，來反對貴族以及反對已經叛賣革命的資產階級。雅可賓派，還採用這種恐怖手段對付與反革命妥協的政黨——基郎特黨。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他自己很快地就領導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派）在與經濟主義鬥爭的時候，他在自己的論文『二十世紀初』中，講到工人運動中能够發生出獄派與基郎特派，他所指的，就是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之間的鬥爭。

（十四）見正文第四七頁。『無題派』（Безъголовы）是指團結於『無題』（Безъ Назва）雜誌（出版於一九〇六年）週圍的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底觀點很接近立志民主黨人。加入這個團體的有過去的『經濟派』：古斯科瓦（Кушкова），普羅科波維奇（Прокопович）

其他的人。

(十五)見正文第八頁。革命以前曾有過一本依洛瓦斯基(Hierstein)所著的歷史教科書。這本教科書底任務，就是本君主政體的精神和大俄羅斯國家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小學生。這本教科書底任務不在對歷史發展底過程給以一種科學的解釋。牠的出發點就是：全部歷史是沙皇底動盪，而沙皇就是天子。依洛瓦斯基式的觀察歷史——就是說不認真地、不科學地觀察歷史。

(十六)見正文第四九頁。一八七八年，根據俾斯麥底建議，國會通過了一個反對社會黨人的非常法。這個法律禁止社會民主黨底存在並追究社會民主黨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此項法律實行時期，不得不轉到秘密狀態，牠建立了極有紀律的、善於進行羣衆工作的黨組織，並利用各種合法的可能。結果政府不但不能消滅社會民主黨，而且黨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大大地增加了。反對社會黨人的非常法在一八九〇年取消了（正確些說：不是取消，而是國會以後就沒有批准繼續實行這個法令）。非常法底取消是統治階級所不得不顧到的德國無產階級力量雄厚底明證。

(十七)見正文第四九頁。大學教授社會主義者(Socialism of the Chair, 德文爲：

Katheder-Sozialisten) 是一種變相的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底代表，主要的是由德國各大學底教授組成的，因此他們的名稱是大學教授社會主義者。他們會極力證明：國家政權實行社會改良，這個方法可以消滅階級矛盾；國家應當壓制資本家過份的剝削和改良工人底地位而不用階級鬥爭。

大學教授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想「推翻」馬克思階級鬥爭論的一種企圖，使工人階級服從資產階級影響的一種企圖，其方法是想把資產階級國家理想化，把牠當作是主持「公道」和保護勞動者利益的超階級的一種力量。

(十八)見正文第五〇頁。一八九九年社會黨人米萊蘭(Milrand)加入法國資產階級政府，這就是機會主義路線——與資產階級合作——底實施。這種行動，受到了以列寧爲首的俄國火星派以及國際社會民主黨內一切比較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份子(例如當時法國的蓋斯德派)底嚴厲指斥。可是當時已經採取調和態度和中派立場的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領導份子，對於這一點所作的指斥是不徹底的，他們在一九〇〇年第二國際底巴黎世界大會上，反對蓋斯德提出的決議案而通過了考茨基提出的橡皮式的決議案。而在右傾機會主義者當中，這個在資產階級政府中與資產階級合作的路綫，自然得到了完全的贊同。法國一

部份社會黨人底代表若勒斯（Jahres），德國的伯因斯坦派，都慶祝了米萊蘭之加入內閣。而「工人事務報」在克里却夫斯基所發表的論文中，也附和他們，列寧這裏所引證的，正是里却夫斯基底文章。

（十九）見正文第五〇頁。所謂「諾士德列夫式的歷史」，列寧是指俄國名小說家果戈里（Gogol）所著的「死靈魂」中的一個主角——諾士德列夫（Nostrev），他以其糟糕的「歷史」而聞名的。

（二〇）見正文第五〇頁。一八九九年在漢諾維城（Hanover）召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代表大會上，曾專門討論了伯因斯坦修正主義的問題（伯因斯坦當時寫了許多文章和專書）。曾通過了一個決議，其結尾如下：「黨沒有任何理由來改變自己的主要要求和基本觀點，或改變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名稱——就是說把社會民主黨變為民主的社會改良黨。黨堅決地反對蒙蔽或改變他對現存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及各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之一切企圖」。

一九〇一年九月在留比克城（Lubec）召集的代表大會上，爲了答覆修正主義者關於「批評由自」的要求起見，對上述問題又通過了以下的決議：

「爲了吾黨今後思想上的發展起見，代表大會認爲自我批評是絕對必要的。可是伯

因斯坦同志近年來所作的那種批評底極端的片面性（牠沒有去批評資產階級社會及其代表們），使他處於模稜兩可的地位而引起了大多數同志底不滿。大會相信伯因斯坦同志能够覺悟到這點而改變自己的行爲，因此進而討論其他的迫切的事項」。

這個決議是由培培爾提出來的，當時培培爾與考茨基都採取了中派的調和態度。以公認的領袖爲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批評伯因斯坦主義的時候，曾表現與牠鬥爭得不堅決，不徹底，持「外交態度」，寧願「苟且偷安」。對修正主義的這一種調和態度，促成了機會主義者底勝利，而機會主義者後來就奪得了黨底領導。

（二一）見正文第五二頁。斯大羅維（Stalov，即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論文：「發生了什麼事情？」（載於一九〇一年四月第一期的『曙光』雜誌上，第四八頁）中寫道：「這種學說（即修正派的學說——編者）在俄國的曖昧的同情人極多，而鮮明的同情人却極少，好像伯因斯坦主義，是一種秘密病，患有這種秘密病的人，通常都不高聲地公開地承認」。

（二二）見正文第五四頁。這裏是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特魯威，布爾加可夫[Bulakov]，杜幹，巴朗諾夫斯基和其他的人）的「聯盟」。這是在合法著作中

共同反對民粹派的臨時聯盟。列寧之揭破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這是革命社會民主黨底暫時同路人——底資產階級實質，在任何人來作這種揭破以前，他在自己的論文「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司特魯威先生書中對於牠所作的批評」中，即指出了這一點。這篇論文上的署名爲 K. 士林，一九〇八年時列寧對於這本小冊子上這段話所作的註釋，曾引用過這篇文章中的言論。列寧之所以將「聯盟」兩字加上括弧，是要着重指出，這裏祇能有條件地講到聯盟。

(二三) 見正文第五六頁。修正派著作底發行，並不會受沙皇時代出版檢查局底阻礙。例如一九〇一年時，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一下子就有伯因斯坦著作底三種俄文譯版發行。伯因斯坦在這部著作中，批評了當時革命社會民主派綱領上和策略上的觀點。

這個事實尤其值得注意，因爲在這個時期內，甚至自由資產階級底刊物，都受政府底追究。列寧將這個事實與政府「楚巴託夫的」政策直接地聯繫起來，同時指出：著名的暗探楚巴託夫 (Zubakov) 會勸告落到他手上的工人們讀伯因斯坦底著作，認爲這些著作是反對革命社會民主派影響的「抗毒素」。

列寧指出伯因斯坦是海洛斯多得式的著名人物。古埃及的傳說中，說有一個名爲海洛斯多得 (Herostatus) 的人，爲要使得自己垂名不朽，於是焚毀了當時聞名的愛弗蘇斯地方的

地雅娜神廟。列寧借用這個故事來作比喻。

(二四)見正文第五八頁。「給工人事務報編輯部的指南」，是「勞動解放」社所出版的關於經濟主義的各種材料彙刊底題名(一九〇〇年出版於日內瓦)。這個彙刊中載有下述各種材料：「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本「選集」第二卷最後一篇)；阿克雪洛德對於「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現代任務和策略」這本小冊子所作的答覆；關於恢復「勞動解放」社刊物的通告。此外還編入了兩封信，這兩封信，是致阿克雪洛德個人的，可是牠們却具有很大的一般的意義，因為這些信明顯地說明了一種真正機會主義的立場，站在這種立場上的，有該信作者M·M·(即古斯科娃，「信仰」底作者)，G·(猶太工人同盟派「格里新」[Grishin]——即柯俾爾松[Копelson])，和這兩位作者所提及過的一個經濟派(普羅科波維奇)，這個經濟派，據該信作者們底意見講來，在自己的批評中，曾「完全推翻了」當時社會民主派綱領上和策略上的原則。

普列漢諾夫對於這一切文件，作了一篇很長的序言(該序言載於「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七卷)，在這篇序言中，他講明出版本彙刊的原因，並批評工人事務派底個別的觀點。

這個彙刊，揭露了經濟主義底全部虛偽性及其與西歐機會主義在思想上完全同類的情

列寧曾贊同普列漢諾夫在指南中所採取的立場。

(二五)見正文第五九頁。「兩個代表大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在公佈關於召集該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消息上所用的標題。代表大會召集於一九〇一年十月，其目的是想把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各個國外組織統一成爲一個團體。統一底企圖結果沒有成功。經濟派(工人事務派)拒絕了日內瓦籌備會議(一九〇一年六月)所通過的決議，該決議公開指斥了經濟主義，伯因斯坦主義，米萊蘭主義和別種機會主義。因此，火星社和社會民主黨人社都退出了代表大會。

退出了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曾作了一個提議，主張共同編訂會議的記錄，可是工人事務派拒絕了這個提議，並獨立地發表了自己的記錄，同時在紀述代表大會上之爭論過程時，犯有一些錯誤。火星社和社會民主黨人社(牠們聯合成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同盟)轉過來也發表了「聯合代表大會」底文件集(一九〇一年，日內瓦出版)，以便揭破工人事務派在記錄中所犯的錯誤。這本小冊子底序言是列寧作的(『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二——三三四頁)。

「做什麼了」一書，對於工人事務派底「兩個代表大會」這本小冊子，作了詳細的分析。

(二六)見正文第六三頁。關於恢復勞動解放社刊物的通告，曾有單行本出版（一九〇〇年出版於日內瓦），同時在上面提到過的普列漢諾夫底「指南」上面也登載過了。「通告」曾指出：因為社會民主黨最近作了很多的實際工作，理論工作已推後而去了。理論與革命實際之間的破裂有了極壞的結果。這一種破裂促進了修正主義思潮（經濟主義，伯因斯坦主義）底出現。現在，在繼續增長的工人運動基礎上，該社想恢復自己的文字工作，其口號是：與社會民主黨內部革命份子作不可調和的理論鬥爭。

而列寧這裏所指的第二個文件却恰恰相反，牠完全沒有注意理論底作用，把黨底要求降到了工人階級中最落後階層底要求。這個文件（「工人事務報底綱領」，載於第一期「工人事務報」上），曾有單行本出版。

(二七)見正文第六四頁。「哥達綱領」(Götha Programme)——是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哥達城內舉行的拉沙爾派和愛森拿赫派聯席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大體上組成大會上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愛森拿赫派，對代表大會上的機會主義派作了許多讓步

，以求與他們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的是不同意綱領草案中拉沙爾派的幾段條文，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前對這個綱領草案作了嚴格的批評（見馬克思所著『哥達綱領批評』一書）。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這個綱領草案的信是寄給布拉克（Bracke）的，布氏會將此信內容通知威廉·李卜克內西，可是威廉·李卜克內西却向代表大會隱瞞了這封信。

一八九一年在哈爾（Halle）所召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認為必須修改『哥達綱領』。馬克思底『哥達綱領批評』就是在那個時候發表的。一八九一年十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所謂『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代表大會召集於愛爾福特城，故名『愛爾福特綱領』），這個綱領是由考茨基提出來的，這個綱領中所包含着的一些機會主義的地方，也受了恩格斯底批評。

（二八）見正文第七二頁。關於一八九六年代的工人運動，可參看本『選集』第二卷註釋第十七條。這種運動使工人們取得了某些讓步，這些讓步，或是直接向廠主們本身取得的，或是從政府方面取得的。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四日（二日），曾頒佈了一個法規，限止全俄工作日為十一小時半（見本『選集』第二卷註釋第二一條）。雖然所得的勝利非常之小（例如，用實行『額外』工作這種辦法來逃避關於工作日的法律），可是這些勝利終究使工人

產生了一種幻想（欺騙的幻想），以為可以用純粹經濟的鬥爭奪得真正的和嚴重的勝利，並造成了一種基礎，使正在開始形成的經濟主義，在工人中間發生影響。

（二九）見正文第七五頁。「論鼓動」這本小冊子（見本『選集』第二卷註釋第二〇條）有了很大的成功，因為牠會適合於當時正在成熟的這個時機：從訓練少數革命者的小組宣傳過渡到工人羣衆中間的鼓動。

可是這本小冊子闡發了一個不正確的理論，認為祇有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才能過渡到政治鬥爭。這一種『階段論』在小冊子上是這樣說的：『祇有當經濟鬥爭在無產階級面前指出在現存政治條件下顯然不能改善自己命運的時候』，無產階級才能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這一種『階段論』（就是說開始祇要經濟鬥爭，祇有在經濟鬥爭之後才能過渡到政治鬥爭），經濟派會用來作為自己策略底根據。

列寧這裏曾指出，小冊子上對問題的這樣一種不明顯的提法，在小冊子還未付印的時候就已指出了。阿克雪洛德對於這本小冊子作了一些批評，他替該小冊子作了一篇敘言。普列漢諾夫對於該小冊子曾作了特別的批評式的分析（見『再論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一文，『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到第五章，第七四——八六頁）。

(三〇)見正文第七九頁。『工人小報』(『Рабочая Рабочница』)——是由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所出版的，由『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阿克雪洛德和查蘇利赤)所編輯的。當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開始採取機會主義的，即經濟主義的立場的時候，『勞動解放』社就拒絕編輯小報了。牠們兩者之間就發生了破裂。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終究還出了一期的『工人小報』(一八九八年第九至十期)，這一期是本經濟主義精神而編成的。這是最後一期的『工人小報』，『工人小報』停辦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就着手出版新名稱的機關報——『工人事務報』。

在最後一期『工人小報』上(第九至十期)，曾發表了列寧這裏所提到的『工人貯蓄會章程』，那裏把貯蓄會底任務規定如下：貯蓄會幫助罷工者，供給書籍以供閱讀，繳付小組底房金，出版工人報紙，幫助爲工人事業鬥爭而受難的人。

接着還講明：如何應該在工廠中成立儲蓄會(工人以下的小組選出會計員，這些會計員，每年至少應開三次全市會議)。

(三一)見正文第八九頁。由喜爾雪(H. Esch)和董克爾(Dunkler)所創辦的德國喜爾雪、董克爾黃色工會，是工人運動裏面資產階級底柱石。他們想把職工會變爲工人互助會

。放棄政治鬥爭和其他某些社會民主黨的要求，是加入他們工會的必需條件。德國資產階級底代表們，想用這一類的組織（這種組織不僅工人可以加入）來把工人運動引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可是他們不能建立一個羣衆的組織。喜爾雪、董克爾黃色工會只有數萬會員，而社會民主黨的工會則有數十萬會員。

（三二）見正文第九一頁。「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上曾登載了一個「工人儲蓄會章程」——這個章程與後來「工人小報」第九至十期中所登載的完全相同（見本卷註釋第三〇條）。列寧這裏所指的一個條文如下：「儲蓄會底主要目的，就是促進工人團結成一個總的團體，去反對業主、資本家及其利益底擁護者——政府。」

（三三）見正文第九九頁。這裏所指的是一八七一年的事：普魯士戰勝法國和併吞愛爾薩斯、勞倫之後，南德意志各國就歸併於北德意志聯盟（一八六七年與奧國戰爭後正式成立這個聯盟），這樣就統一了德國。那時德國宣佈爲帝國，而普魯士國王宣佈爲德國國王。國會也成立了全國的國會。

（三四）見正文第一一二頁。列寧是指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上以下這一段話：「吸收廣大羣衆參加運動的最好工具，就是經濟鬥爭，在經濟鬥爭基礎上應當發展政

治鼓動，擴大政治鼓動使其超出經濟鬥爭底範圍；可是沒有什麼必要一開始就僅在經濟鬥爭基礎上進行政治鼓動」。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通告曾印有單行本：「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境內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一書（一九〇一年日內瓦出版），此外「工人事務報」第十期上也載有該項通告。

（三五）見正文第一三一頁。列寧在「專制政體與無產階級」這篇文章內，曾說明了自由資產階級對於恐怖手段的態度，曾指出自由資產階級對於恐怖事件的同情態度。他在這篇文章內講道：「自由主義浪潮底高漲與低落，與各部總長底情緒，有緊密的聯繫，而各部總長之更換，則由炸彈來加速。所以毫不奇怪的，在俄國，恐怖行動常得到資產階級在野派急進的（或者正在急進化的）代表們中間的同情。在革命知識界中間，特別迷戀於恐怖行動的，……正是那些不信任無產階級和無階級鬥爭之生機性和實力的人們，這也是毫不奇怪的」。『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九頁）。

（三六）見正文第一三一頁。「革命社會主義自由社」（『Svoboda』）產生於一九〇一年五月。這個團體底領袖是拿齊金（Nadezhdin）。該社底綱領非常糊塗而不澈底。該社雖承認工人階級政治鬥爭底必要，但同時却主張「醒世的」恐怖，就是說，足以激發工人起來

參加政治鬥爭的恐怖。在彼得堡社會民主黨組織內兩派底鬥爭中，該社會擁護了經濟派。這樣看來，牠的特徵就在於：牠自己的綱領是由經濟派，社會革命黨人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個別論點所組成的。當然，從這樣的混亂觀點中是弄不出什麼東西來的。所以一九〇三年該社就解體了。

稍微經過了一些時候，在別一部著作中，列寧對於「革命社會主義自由社」作了下列明：「綱領是兩面性的，策略是兩面性的，而實際活動，則是招搖撞騙——這就是「革命社會主義自由社」底相貌」。

在列寧所引舉而加以批評的該社底刊物中間，我們可以指出下面這幾點：「自由雜誌」，「俄國革命主義底復活和革命底前夜」兩本小冊子。

(三七)見正文第一三二頁。阿克雪洛德在列寧所提及的著作中曾指出下面兩個前途：第一個前途：「工人運動不出工人與廠主作純粹經濟鬥爭這種狹隘範圍，牠本身，整個講來，就失掉政治性。至於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則無產階級底先進階層跟隨……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們不在自己的旗幟之下而在別人的旗幟之下爭取自由」。

另外一個前途：「社會民主黨把俄國無產階級組織於爭取自由的獨立政黨內，這個政黨

局部地與資產階級革命黨派並列，且與之聯合（如果有資產階級革命黨派的話），局部地把智識界中最愛民的和最革命的份子直接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或者使其跟從自己。很明顯地，後面這一個前途比第一個前途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政治自覺程度，因為在第一個前途中，資產階級代表是革命運動底領導者，而無產階級祇是被領導的盲從他們的羣衆。

（三八）見正文第一五三頁。列寧從『火星報』中列舉了下述各篇論文：

『火星報』第三期上，論必須將階級鬥爭灌入農村的論文，其標題為『工黨與農民』，是列寧寫的（已編入本卷）。

『火星報』第四期上論地方自治和專制政體兩者不能調和的論文，其標題為『專制政體與地方自治』。這篇論文，是司特魯威還未與『火星報』完全斷絕關係以前所寫的。該文講到沙皇政府總長維特（Vitt）論地方自治運動的秘密呈文。列寧在自己的論文：『地方自治運動底追究者和自由主義底安尼巴』（參看本卷註釋第四八條）當中，曾特別論到這個呈文。這篇論文，已局部地編入本卷。

『火星報』第八期上反對農奴主貴族土地佔有的論文是由列寧寫的，這篇文章，論到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八日）所頒佈的關於把西伯利亞官地交給私人的法令。這個法

令底實質，就在於專制政體給農奴主貴族以新的贈品。這篇論文底標題為：『農奴主正在工作了』（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六九——一七三頁）。

同在『火星報』第八期上，曾載有一篇無人署名而標題為『自治局代表大會』的短文。這篇短文，論到秘密的自治局代表大會。這篇短文，號召參加地方自治運動的人們，與專制政體作堅決鬥爭。

一九〇一年二三月間，發生了學潮。『火星報』第三期，發表了查蘇利奇底論文『論現代事變』而擁護了這些學潮。

政府派報紙『俄羅斯』（Rossiya）勸告青年（學生）脫離過激黨序影響，這個報紙諄諄勸道：政府不待任何的鬥爭已願意走上國家改良和改造的道路。關於這一點，『火星報』第五期，曾登載了波特列索夫底論文：『論無意義的幻想』。在同期中，『火星報』登載了一篇不知作者是誰的短文『警察追究刊物』。列寧曾指出這篇短文。

『火星報』第六期上，曾載有一篇估計『新時期報』（Novoye Vremya）所主張的從上而下之改良的論文。這篇論文是列寧作的。（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五八——一六三頁，『有價值的承認』）。

「火星報」曾鼓勵統計家底反抗，這種鼓勵，表現於「火星報」第七期上所登載的「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地方自治局中的事件」一文中，此文發表時沒有署名。

「火星報」曾指斥統計家之工賊行動，這種指斥，表現於「火星報」第九期內所登載的「維亞特卡的工賊」一文中。該文指斥了維亞特卡地方的統計家底行動，因為他們沒有擁護抵制本地地方自治局主席羅查楊科（Rodzanko）的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地方的統計家。

（三九）見正文第一五四頁。勃連唐諾（Bronko）教授承認階級鬥爭底存在，但根據資產階級利益來解釋階級鬥爭。據他的意見，工人階級不必為自己的專政而鬥爭，因為牠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國家幫助下（照勃連唐諾底意見，國家不是階級統治和壓迫底機關）也可滿足自己的要求。漸次改良的道路與階級間的經濟合作——這便是他的理論；這理論現在完全被社會民主黨人叛徒們所採用。列寧所講的對階級鬥爭之勃連唐諾式（即資產階級式的）的了解，就是這個意思。

（四〇）見正文第一六二頁。關於自我解放社參看本卷註釋第三條。勞資鬥爭社存在時期約有二月，以後就被偵探局所消滅，而未及表顯自己的行動。

（四一）見正文第一六四頁。在「指南」（參看本卷註釋第二四條）發表以後，「工

人事務報」編輯部，特別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工人事務報編輯部對於阿克雪洛德底「信」和普列漢諾夫底「指南」所作的答覆」，一九〇〇年，出版於日內瓦），來答覆「指南」。列寧所指的，就是這個「答覆」。

（四二）見正文第一六六頁。拿爾息蘇斯（Narcissus）是古希臘神話上一個神底名字。關於他有過這樣的傳說：拿爾息蘇斯自恃美貌而拒絕了一個女神底愛。於是上帝就對他愛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叫他目不轉睛地觀望水中。這樣一來，拿爾息蘇斯就自殺了。在比喻上講，引証拿爾息蘇斯即表示「自愛」，「自滿」的意思，——列寧這裏所借用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四三）見正文第一七五頁。所謂廣泛的組織（Loose Organisation）——是德文中特有的措詞，其意思就是自由的組織）就是一種比較能自由加入的組織，因為能自由加入，所以這種組織本身，少有固定的形式，例如這種組織可以沒有固定的綱領，沒有章程，而祇有幾條徵收會員的條例等等。

（四四）見正文第二一三頁。「工人事務報」編輯部受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底委託，擬就了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運動現狀的報告書，而且提交於第三國際底國際大會。這個報告

書印有單行本（並附有猶太工人同盟關於猶太工人運動史的報告書），題名爲：『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運動的報告』（一九〇一年出版於日內瓦）。

（四五）見正文第二一六頁。吉訶德先生（Don Quixote），是西班牙大文豪西凡提斯（Cervantes）的一篇同名的小說中的主人翁。吉訶德先生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家，他爲自己的幻想所迷惑，竟完全忘記了現實世界。

（四六）見正文第二三〇頁。『工人報』是由基輔社會民主黨人團體所組織的。在一八九七年曾出版了兩期。『工人報』曾被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承認爲黨底中央機關報。以後因爲被捕的緣故，已行準備付印的第三期『工人報』並未會出版。

當列寧指出『火星報』編輯部不繼續出版『工人報』時（開始關於編輯『工人報』問題，後來關於參加『工人報』一般工作問題，猶太工人同盟曾與列寧作過談判，列寧曾同意這點而且還寫了幾篇原則上的文章），列寧正想以這件事實來特別指出：『火星報』編輯部並沒什麼圖有要命令黨，如經濟派實屬『火星報』時所說的那樣。

（四七）見正文第二五九頁。社會革命黨產生於一九〇一年，是俄國各地和國外幾個

革命民粹派團體底統一底結果。黨「對於日常生活問題」的正式機關報是『革命俄國』(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是由高則【Гольц】和威爾諾夫【Чернов】領導的)，而黨底理論機關報是『俄國革命導報』(是由泰拉索夫【Тарасов】及盧山諾夫【Лусанов】編輯的)。新成立的社會革命黨底理論觀點，是舊民粹主義與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兩者無原則的混合觀點。社會革命黨不能以比較一貫的理論學說來與馬克思主義對抗，牠追隨西歐修正派而想照自己的意思來『修改』馬克思主義底各種基本學說。

社會革命黨人用自己的關於一切被剝削者(工人、農民、勞動智識份子都包括在內)反對剝削者(產資階級和地主)的理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說，這樣也就是抹煞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農民之間的區別，否認鄉村中的階級鬥爭。

社會革命黨綱領底標本特點就是要求土地社會化——「在增加公有地產的基礎上實行平均的農民土地享用制」。據他們的意見，他們社會化綱領底實現定使社會主義勝利，而完全不戰勝資本主義的最好方面，就是在資本主義存在和統治下組織合作經濟，組織『公有』農業。

抹煞鄉村中資本主義發展底過程，看不見農民底分化和農民之分成階級，這樣社會革命

黨人也就散播了「一種幻想：以爲行將爆發的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使農民完全脫離他們所受的一切剝削（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在其內）。

在政治策略方面，社會革命黨人認爲個人恐怖有中心的意義，個人恐怖使他們看不見其他各種革命鬥爭方式，使他們在其實際行動上耗費大部份的注意和力量。

按其思想、策略與成分來講，「社會革命黨」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標本式的黨，牠之所以有害，首先就是因爲這個黨底小資產階級實質是用社會主義底旗幟隱藏着，而在自己的工作與社會民主黨團結工人到獨立政治工黨中去的這種努力相對抗。

「爲什麼社會民主黨應向社會革命黨人宣佈堅決無情的戰爭」一文和「社會革命黨人所復活起來的庸俗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是列寧反對社會革命黨人的早期著作之一。他認爲反對口頭上極「左」而實際上極機會主義的黨，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後來（在一九二〇年）在「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一書上，當列寧把布爾塞維主義所走過的一切路程作一總結的時候，當列寧說到布爾塞維主義在與工人運動裏面那些敵人鬥爭中發展、鞏固和鍛鍊出來時，他特別着重地指出了這件事實底意義：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性作殘酷的鬥爭，這種傳統開始於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當時正是革命無產階級羣衆的黨底

基礎已經形成的時候。「布爾塞維主義會接受並繼續鬥爭，以反對那個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傾向最厲害的黨，即反對社會革命黨」。

(四八)見正文二七九頁。一九〇一年，國外(在德國)發表了財政總長維特底秘密呈文：「專制政體與地方自治」。在這個給沙皇的呈文上面，維特詳細講到俄國地方自治底意義和歷史，並證明：地方自治「與國家專制制度不相適合」，地方自治按其本性是立憲制度底基本要素之一，地方自治往前發展祇能加強「社會」欲以立憲制度改革俄國專制君主制度的要求。維特反對地方自治繼續的擴張，並在自己的呈文上證明必需加強和改善各地的政府官僚機關，認為現有的機關沒有充分的強固，可靠和積極。這個「呈文」(共有二百十二頁)是在國外印行的，上有司特魯威底極長的序言。本着自由主義精神而寫的這篇序言，已證明司特魯威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破裂，證明他已澈底變成了堅決否認與專制政體進行革命鬥爭的自由派。在「地方自治運動底追究者與自由主義底安尼巴」一文上(初次發表於一九〇一年第二——三期「曙光」雜誌)，列寧分析了維特底「呈文」和司特魯威底序言。全文共分六章。前四章分析維特底呈文，同時詳細說明地方自治底實質。列寧解釋地方自治改良是亞力山大二世政府受六十年代「社會覺悟與革命打擊」壓迫而不得不作的讓步。可是，另一

方面，這個讓步底實行，絲毫沒有有限止沙皇官僚制度專權與放肆。政府用最小的改良來收買和平服一大部份溫和自由派，同時殘酷無情地摧殘革命民主份子，因為這些革命民主份子不能以可憐的改良為滿足，他們不僅會談自由，而且能為自由而鬥爭。然後政府就把過去所作的讓步一個一個地奪回來。地方自治的自由派屢次企圖反抗專制政府底這種反動政策，可是因為自由派最怕革命和激烈的鬥爭形式而希望純用「和平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們表現自己在政治上全無能力。當政府已開始加緊警察式的壓迫和反動的時候，他們不幫助在野黨中的革命份子，而祇會呼冤哭喊。這樣看來，地方自治的改良，與六十年代其他許多改良一樣，不僅不與專制制度相抵觸，且反而加強了牠，分裂了在野黨，促使大體上滿意於這個讓步的某部份自由派與專制政體親善。

列寧這篇文章底最後兩章曾分析了司特魯威底序言並估計了以他為代表的當時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

因為篇幅不夠，在本卷內祇能登載最有興趣的最後兩章。

在一九〇一年時，「曙光」雜誌（這篇文章曾在「曙光」雜誌上發表）編者中間就已經因列寧這篇文章而發生了意見分歧。例如普列漢諾夫極不滿意於列寧這篇文章內反對自由派

的語調：他在給列寧的信上寫道：「不應當在現在謾罵一般自由派，這是很魯莽的。應當不理壞的自由派而理好的自由派。要知我們應當視自由派爲可能的同盟者，而你的語調——這是應當承認的——完全不是同盟者的語調……你說話像個敵人，而實際上應當像同盟者那樣……對自由主義說話現在不應當採取激烈態度；——否則就是很大的錯誤。」

（四九）見正文二八一頁。政府看到六十年代農民革命爆發平靜之後，就開始（還在亞力山大二世時代）一步一步地奪回在所謂『大改良』時代所作的各種讓步。亞力山大三世即位後（一八八一年），反動更加厲害了。開始了所謂亞力山大三世『反改良』時期。鄉村裏設立了農事官，使農民受其全無督監的處置；對農民局部地恢復了肉刑制；大大的縮小了地方自治局底權利；本來已極可憐的地方自治局差不多化爲烏有；改組了法庭，在這一方面更加强了官僚的放肆行爲。

列寧所謂亞力山大三世『根本改造』亞力山大二世底改良，也就是指這一種政策。

（五〇）見正文二八四頁。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一日）民意黨刺殺了亞力山大二世。隔了幾天之後，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十日）那一天，民意黨執行委員會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亞力山大三世。在這封信上，民意黨執行委員會向亞力山大三世提出了，以和

平工作替代革命運動所必需的「條件。這些條件就是：大赦一切政治犯，不分階級和等級而召集全民代表會議，出版言論集會等自由。以這些條件爲交換，民意黨執行委員會曾答應：將自動停止自己的活動，而組織於其週圍的力量，將從革命鬥爭轉到和平的文化工作。

（五一）見正文第二九四頁。關於六十年代貴族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由派份子退出在野黨的問題，參看本卷註釋第四八條。

從七十年代起，革命情緒又開始高漲，這一次主要的是在城市平民知識界中間和工廠工人中間。這一點表現於革命組織底大大發展及其活動底加緊（尤其是民意黨活動底加緊）。在貴族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由派中間，也有了繼長增高的不滿情緒底徵兆。在地方自治的自由派中間，不僅暴露了立憲趨勢，而且甚至暴露了成立秘密組織出版秘密報紙的企圖。可是，這些企圖同時也表明了地方自治派自由派政治上的完全無力。當革命運動可以用來威嚇專制政府的時候，自由派並不拒絕加以利用；可是當政府用撤換最反動的總長而用含糊不清的允諾來向自由派作些讓步的時候，自由派便極端仇視『過激革命黨底破壞行動』。政府用這種允諾和欺騙底政策又把溫和的自由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民意黨人刺殺亞力山大二世之後，溫和的自由派特別堅決地跑去與政府作了妥協。亞力山大三世政府『還不一下子就把獠牙毒爪

進行顯露，而認爲必需暫時嘗試一下麻醉「社會」的企圖」（列寧）。牠那種蠱惑的和虛偽的申明，使自由派深信可用和平方法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改良。祇有隔了一些時光之後，當政府澈底明瞭在最近不能發生羣衆的革命爆發的時候，——政府才進而採取反攻策略，着手實現自己的反改良（參看本卷註釋第四九條）。

（五二）見正文第二九五頁。列寧是指「工人思想報」對政治鬥爭任務的觀點。「工人思想報」雖不否認無產階級政治鬥爭底必要，可是牠所謂政治鬥爭不是謀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而是在沙皇制度下謀漸次改良的鬥爭。這樣一來，「工人思想報」就把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降到了落後工人底政治偏見的程度，這些落後工人希望在專制制度保存之下達到自己地位某種改善（參看本卷註釋第二條和第八條）。

（五三）見正文第三〇二頁。列寧是指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法國階級鬥爭」一書中所寫的話。馬克思說到革命失敗時寫道：

「但在這些失敗中，戰敗的却不是革命。戰敗的是革命以前的殘餘……一些人物、幻想、觀點、草案；在二月革命（即一八四八年法國的二月革命——編者註）以前革命黨沒有解脫這些殘餘；使革命黨解脫這些殘餘的不是二月勝利，而祇是許多的失敗。」

馬克思特別指出：這次革命底意義，不在於牠本可給與我們的那種直接的微小的成績，而在於牠打破了革命以前的幻想和偏見，幫助了鍛鍊真正革命的黨。

（五四）見正文第三〇五頁。「火星報」在策略上和組織上的成績一表明後，編輯部就着手起草綱領。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編輯部各委員之間曾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普列漢諾夫底草案和列寧底草案成了彼此對立的形勢。

列寧會責備普列漢諾夫，說他寫了一個「學生用的綱領」，而不是向俄國資本主義宣戰的鬥爭的黨底綱領。

列寧責備普列漢諾夫，說他只說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未說俄國的資本主義，同時還指出普列漢諾夫所犯的許多最重要的錯誤。

列寧特別指出：普列漢諾夫曾經不正確地描寫社會主義革命準備過程中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沒有特別指出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唯一澈底的革命階級——底作用，沒有把無產階級從一般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中「分別出來」，好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列寧還主張在綱領中編入無產階級專政一節，這一節會被普列漢諾夫第二次校訂自己的草案時刪去。

列寧的綱領草案後面附有「火星報」編輯部下面這個註釋：「這個草案底原則部份是由這個編輯部委員弗立（Фли）即列寧，編者註）提出的（根據普列漢諾夫原來的草案而作的）。草案底實際部份（從下指的一段話起一直到底）是由整個委員會，即五個編輯部委員提出的。」

（節也是由整個委員會通過的。）

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爭論立刻從一般綱領問題轉到與規定土地綱領有關的各種問題（參看本卷「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一文及其註釋）。

（五五）見正文第三二三頁。『工黨與農民』一文寫於一九〇一年，即農民運動高漲底前夜。在一九〇二年，尤其在俄國南部，農民運動採取了非常廣闊的範圍。如果將這一年內的情形與其他年代內的情形作一比較，即可以表明這一年內農民運動之高漲，如何厲害。例如在一九〇〇年，曾有過四十八次農民暴動，一九〇一年，有五十次，而在一九〇二年，則達三百四十次之多。農民運動底浪潮，波及於俄國底許多區域，而最厲害的，則在南俄：哈爾可夫省，波爾達夫省，以及沙拉托夫省，在這些省份內，除一般原因：束縛制的剝削（工制租）之統治，資本主義剝削之增長，農村中階級鬥爭底緊張化，城市中工人運動底影響等

等以外，還有以下的原因，例如這些省份內的荒年使本來已極痛苦的農民狀況更加惡化了。農民底這些發動，特別表明：在農民羣衆中具有巨大的革命的憤激情緒，並表明：國家已處於革命底前夜，土地問題，是這個革命底中心問題，農民將以革命實力的資格而參加這個革命。在無產階級政黨面前，就發生了一個問題：要規定自己對農民土地問題的態度，要規定無產階級對於整個農民及其各個階層的態度。

列寧底「工黨與農民」一文在火星上第一次十分明確地解釋了土地綱領底基本問題和無產階級黨對農民的策略問題。列寧下面這段話足以證實這篇文章確帶有綱領的性質：「火星報」在最初幾期中有一期（一九〇一年四月，第三期）發表了土地綱領大綱，在「工黨與農民」一文中決定了自己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土地政策基礎的態度。一九〇二年夏，俄國社會民主黨用「火星報」及「曙光」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了牠的土地綱領，而且在吾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八月）上牠已成了我黨底正式綱領；而「工黨與農民」一文可以看出這個土地綱領底第一個草稿」（參看「列寧全集」第九卷第五六一—五七頁）。

列寧在其許多著作中都發表了自己對農民土地問題的態度，而且在列寧論土地政策和土地綱領問題的一切著作中都以下面這個基本思想為基礎：「我們認為階級鬥爭是俄國農業制

度方面的中心事實，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土地政策（因而也是土地綱領）建築在徹底承認這件事實及其各種結果上面。可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掃清道路來自發展鄉村中的階級鬥爭，來自自由發展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以便實現全世界社會民主黨底最終目的，以便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便創造社會主義社會底基礎」。（『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一二〇頁）。

列寧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俄國的鄉村，因此他能夠確定俄國鄉村中有兩種階級矛盾，一方面，由鄉村資本主義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矛盾，即是鄉村工人與企業家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全體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據列寧底意思，反對農奴制殘餘的鬥爭是最近的任務，整個農民階級都應當參加這個鬥爭。

在列寧看來，消滅鄉村底農奴制度關係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消滅專制制度，消滅大地主階級底統治——底一部份，而且這個革命，按其社會經濟性講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牠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而祇是消滅一切妨害資本主義發展和妨害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發展的東西。

（五六）見正文第三二四頁。除了贖金之外，農民還擔負許多的稅：地方稅，人頭稅，保險稅，自然品稅和其他的稅。因此，農民的支付對於份地上所得收入之百分比如下：特

維爾省——百分之二五二，司莫林斯克省——百分之二二〇，科司特洛姆省——百分之二四〇，普斯可夫省——百分之二一三，佛拉基米爾斯克省——百分之二七六，維亞特卡省——百分之二〇〇（這是八十年代的統計）。不能糊口的一塊份地，曾使農民不得不交付價金，所以農民放棄份地而單身脫逃，還比較有利些。

政府把農民最後一滴血汗榨取到什麼程度，則他對地主底利益也留意和關心到什麼程度。例如，在葉高列夫斯克縣，有二百五十三俄畝土地的地主貴族，他所付的稅與只有九又十分之四俄畝份地的農民所付的稅完全相等。

（五七）見正文第三三四頁。這裏是指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克里姆戰爭中的軍事失敗。這次戰爭底原因是：尼古拉一世政府想爲地主和俄國資產階級（主要的是商業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佔領黑海海底峽，來保障對外貿易，尤其是麵包底輸出。爲了這個目的，俄國的海陸軍於一八五三年開始進攻土耳其；可是，沙皇俄國底勝利完全無利於英、法、奧等國底資產階級，所以俄國的沙皇政府就不僅要與土耳其開戰了。英、法底陸戰隊上了克里姆海岸，經過十一月的圍攻之後佔領了俄國的重要軍港舍華斯托堡，而黑海艦隊則完全沉沒。根據一八五六年巴黎和約，俄國不得在黑海留駐艦隊。在一八七一年，沙皇政府的外交界才爭得

了這一個禁令取消。

（五八）見正文第三二四頁。在一八六一年改良前夜，農民底風潮，曾增長得非常迅速。如果我們以十年為單位來考察農民風潮底增長，那末，我們可以知道：由一八二六至一八三四年，曾有過一百四十八次風潮，從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四年，有二百十六次，由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四年——則有三百四十八次。

由一八三五至一八五五年，曾殺死了一百四十四個地主。在改良前夜最後五年中，即是由一八五五至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二月十九），曾有過四百七十四次風潮。我們從此地所舉出的數字中可以看出：正是在一八六一年宣言未發表的前夜，在所謂農民解放以前，農民運動，曾發展得特別厲害。而且農民的風潮，有時還具有非常劇烈的性質，當局只用軍隊才能加以壓服。一八五八年憲兵名譽軍長向沙皇所作報告中的下面一段話，就可以證明這種情形：『現在發生得最多的騷亂，就在於農奴們或者是拒絕繳納租稅以及拒絕履行其他的義務，或者是不服從莊頭以及業主本人。整個農村底風潮，要各省最高當局親身顧付，要利用軍隊底協助；這種風潮發生的處所，就是地主們在發命令時並不遵守現代真正精神的地方，或者是有人挑撥的地方。這種比較重要的現象，在二十五省內曾繼續一年之久。』

從上面所指出的情形中可以看出，農村簡直是沸騰起來了，正是這種情形，會逼迫政府急於實行改良。

(五九)見正文第三二五頁。約章——是規定地主與農民間關係的一個文件。在得到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舊歷二月十九日)的『條例』之日起一年內，地主應當製定約章。如果在一年內地主沒有製定，則由中間人來製定。約章上應載明農民所使用的土地數量，載明在農民土地使用方面應該實行那些改變，載明各種賦稅，義務等等。約章實際上是正式掠奪農民的一種文件，因此在宣言頒佈後最初四個月內，發生了六百四十七次農民風潮，即比過去十年內還要多；在改良實行後二年內(從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在二千一百十五個村莊裏面不得不採用武力來強迫農民簽訂約章。在喀山省拜茲納農村內，曾發生許多戰鬥，結果殺死了五十一人，受重傷的四十人。農民底領導者安東·彼得洛夫被槍決，等等。當時人們說：『從來沒有像宣佈「自由」以後，打得這樣厲害』。

(六〇)見正文第三二五頁。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舊歷二月十九日)所頒佈的所謂解放農民的宣言，是由莫斯科大教主費拉特(Metropolitan Philaret)擬就的。宣言上所說的純粹是虛假的話，宣言底結尾會叫農民祈求『上帝賜福』於他們的『自由勞動』。祇有非常的

個君子（耶穌教徒，如列寧所稱呼的一樣）才會說：爲這「解放」所掠奪和因而受地主新束縛的農民，得到「自由勞動」。

（六一）見正文第三三五頁。「告鄉村貧民書」這本小冊子寫於一九〇三年，用單行本在外國出版的，列寧用非常簡單明瞭的形式說明一切基本思想，作爲以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綱領底基礎。在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五日）寫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上，列寧關於自己著書底計劃寫了如下的話：「我現在正在寫一本給農民讀的通俗小冊子，來說明我們的土地綱領。我很想根據關於村民中四個階層（地主、農民資產階級、中農、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具體材料來解釋我們關於鄉村階級鬥爭的思想。」（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二二三頁）。

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十四日），馬爾託夫在給阿克雪洛德的信上寫道：「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寫了一本「告鄉村貧民書」，在我們看來寫得復得法。他把我們的綱領在農民中間通俗化。我想，這本書給與人們的印象也不亞於「做什麼？」一書」。實際上，列寧這部著作底革命意義確是很大，因爲在這部著作中，列寧不僅對鄉村階級鬥爭作了一個包羅盡致的分析，而且確定了黨對全體農民及其各社會階層態度的策略基礎。

(六二)見正文第三四一頁。國務會議是沙皇下面由沙皇指定上級官吏而組成的參議機關。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影響之下，在成立了國會之後，國務會議於一九〇六年已改造成了所謂最高立法院，其任務是審察和批准國會所通過的決定。改造過的國務會議底成份如下：沙皇指定一百人，各統治階級集團選舉一百人；這一百人是山地主代表大會，各省地方自治代表大會，貴族，正教僧侶，大資產階級和上層資產階級智識界等等選舉出來的。國務會議是由被指定的主席和副主席所領導的。國務會議底這樣一種成份，完全保證了沙皇政府能把國會底甚至最溫和的，可是因某種緣故却不合意於統治黨派的決議，都加以埋葬。

(六三)見正文第三四一頁。我們不應忘記，列寧曾極重視歐洲各國政治自由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對於無產階級繼續順利鬥爭的意義。他把國會制度與統治於沙皇俄國的政治制度比較時，總是特別指出：在沙皇制度的俄國，人民完全無權，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工人階級沒有可能正確地組織起來與資產階級鬥爭。與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比較起來，資產階級民主制，國會制度——列寧屢次着重地指出這點——要高出萬倍，牠給今後的鬥爭以一個很大的優勢。因此，他把專制政體看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熟時期中的主要敵人。可是，列寧那時就警告過工人和農民：「政治自由不能使勞動民衆解脫貧困，但牠能給工人以一種與貧困現象

作鬥爭的武器』，就是說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武器。自然，甚至『最自由的（資產階級的，——編者註）國家』底階級性，當時列寧就已看得很清楚了。列寧說：『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無非就是資產階級壓迫工人階級，一小部份資本家壓迫勞動羣衆的一架機器』（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四卷，『論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

（六四）見正文第三五九頁。農民土地銀行設立於一八八二年。該銀行最初的任務就是，爲要給感受困難的地主們以財政上的援助起見，加速農民土地底贖買（這種土地是一八六一年『農民』改良時所分給農民的，參看本『選集』第一卷註釋第二條），並一般地協助地主們將自己所不需要的土地用高價賣給農民。爲完成這種交易起見，銀行就須貸給農民以借款。該銀行底真正目的，在於剝削農民而給貴族以財政上的幫助，——而在當時財政總長朋格（Bunge）底最初計劃中，曾用愛民的詞句來掩蔽真相，說什麼幫助地少的農民用經過銀行從事購買的方法來得到土地。可是這種『假裝愛民的』詞句，在統治階級看來也很危險。在國務會議中討論這個草案的時候，有人公開地指出：允諾（甚至祇是允諾！）幫助農民，可引起產業很少的農民底『不能實現的希望』，這個允諾可以被誤解爲進而把地主土地交與農民的步驟。

因此，在農民銀行條例上曾經指出，銀行底任務不是幫助無土地者，而是『在地主願意出賣和農民願意購買的條件下設法使各種農民便於購買土地』。

實際上，農民銀行完全變成了沙皇政府貴族地主政策底武器。經過農民銀行買得的土地，其價格比向私人購買還要高得多，例如：在一八八三年，經過農民銀行買得的土地，買價為五十二盧布，而向私人買得的土地，買價為二十七至二十八盧布；在一八九五年，經過農民銀行買得的土地，買價為五十二盧布，而向私人買得的土地，買價為四十二盧布。

當農業遭受恐慌，土地價格跌落，而地主底利益因此受到損失的時候，農民銀行即趕快幫助他們，以高價收買大批土地，然後照此高價將土地賣給農民，有時還用延期付款來引誘農民。

受割地（一八六一年改良底結果）壓迫的農民，不管價格如何，無論如何總想從地主手裏購買這些割地，這樣就陷入了新的束縛——依靠銀行。

農民付與農民銀行的借貸利息要高過其他銀行的利息。譬如：在一八九四年，貴族銀行的借貸利息為百分之四·五，而農民銀行的借貸利息則為百分之六·五。富裕的農民，其所處的條件要比貧窮的農民好些。假使在一八八三年，一切買得的土地，其百分之九十是用餘

贖買的，就是說要買某塊土地只須繳付百分之十的定錢就够了；那末在一八九五年，定錢已增至百分之三四。這樣的款子祇有比較富裕的農民才能繳付。所有這些：土地價格之高，借貸利息之重——結果使農民日趨貧困。欠賬是增加了，因欠賬而把買進的土地拍賣於人。這裏最吃虧的就是鄉村貧農。例如：因欠賬而失去購自農民銀行的土地的，村社佔百分之二·九；個別的大業主，即鄉村資產階級，僅佔百分之二·四。村社出賣的土地大部份是由本地的富人所買去的。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之後，當政府採取堅決方針來形成鄉村裏面「有力的」、即堅強的、富農的、資產階級經濟的時候，農民銀行會有特別的意義。

（六五）見正文第三八七頁。為「謝情」而工作，就是為一番款待而無代價的工作。地主安格加爾特（Fritz Jandt）在「農村實況」一書中，敘述自己對於農民生活之觀察時，曾透澈地揭破了這種為「謝情」而工作的階級內容：他寫道，問題不在於款待，不在於飲酒，「因為來作工的，也有那些並不飲酒的農婦，有時甚至在農民們知道了有什麼工作要做的时候，他們不待呼喚，就來做工。自然，這種情形發生的原因，是因為農民們即在現在，總是有賴於鄰近的地主：農民也需要木材，也需要草地，也需要牧場，有時也許不能不借點錢

』等等（『農村實況』第一一七頁，一八九七年出版）。安格加爾特接着寫道：這樣一來，地主底全部茶園都由人『謝情』收穫完事了。

在農村內部，也發生相同的情形：人們也到富農那裏爲『謝情』而做工，因爲即在此地，農村中貧窮的一部份人對於富農的依賴，也是很顯著的。

（六六）見正文第三八九頁。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的事件已指明俄國到了革命底前夜。包羅各主要工業部門的經濟恐慌，更惡化了本來已極痛苦的工人狀況：工人大批的失業，工資減少，工價跌落等等。

罷工運動有力的高漲就是對這種情形的答覆。俄國南部的許多罷工變成了總罷工。

全國——尤其是南部和沙拉托夫省——掀起了農民革命發動底潮流，這些發動大多數是反對地主的。例如：在一九〇二年這一年內，農民各種革命發動已有三百四十次。同時又有學生運動底高漲，自由派資產階級反對運動底增長。列寧所提到的一九〇三年三月九日（二月二十六日）的沙皇宣言，就是在這樣的緊張空氣中發表的。

這個宣言，表示『惋惜』，說『混亂局面，一部份由於仇視國家制度之陰謀所致，一部份由於迷戀於不合俄國國情的原則所致』，接着又講了一些完全含糊和不肯定的允諾，說要

重新審查「農村狀況法令」，而對農村生活狀況之改善，則作了比較肯定的允諾，最後還號召「祖國之願子」依據「信仰、法律和政權」而同心協力。

(六七)見正文第四〇〇頁。這一段話完全證明：列寧提出歸還割地的要求並擁護這個要求時，絕對不會認為歸還割地的要求，是一種已達盡頭的不可更進的要求（參看本「選集」本卷註釋第七一條）。

(六八)見正文第四一五頁。「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一文發表於一九〇二年「曙光」雜誌上，解釋綱領草案土地問題部份（牠大體上是由列寧所寫成而以後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的一篇文章，全文十章都發揮以下的思想：

一。俄國社會民主黨應當規定土地綱領。列寧說：「所謂土地綱領，我們是指在土地問題上，即對農村經濟、對鄉村各階級、階層和集團的關係上，社會民主黨政策基本原则之確定。像俄國那樣的「農民」國內，社會黨人底土地綱領，主要的是——假使不是完全是的話——「農民綱領」，決定對農民問題態度的綱領。大地主、鄉村僱傭工人和「農民」——這便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俄國也在其內——裏面鄉村人口底三個主要的組成部份。」（參看「列寧全集」第五卷第八七頁）。

二·社會民主黨一方面幫助農民反對大地主，同時應當「站在真正的階級的觀點上，無論如何不應爲着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放棄無產階級底階級觀點，正是相反，牠應當要求爲現代整個資本主義所蹂躪和壓迫的小農，放棄自己的階級觀點而站在無產階級底觀點上」（參看『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一〇〇頁』）。「自由發展階級鬥爭」的條件建立得愈完滿，則小農之轉向無產階級底觀點也愈容易；但要自由發展階級鬥爭，就須消滅鄉村中的一切農奴制殘餘。列寧認爲「無產階級政黨綱領上的農民要求」，應當「服從」上面這兩個條件。

三·土地綱領底目的是創造鄉村中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反對資產階級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自由發展底條件，牠「不僅能够防禦自己的敵人（即是直接或間接地，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的人，他們是我們反農奴制殘餘鬥爭中臨時的和局部的同盟者）；而且能防禦這樣一些不可靠的朋友，這些人對土地問題不澈底的提法祇能給（而且實際上是能給）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以許多害處」（參看『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一〇〇頁）。

四·列寧把綱領中工人問題部份與農民問題部份兩相比較時，曾規定出牠們兩者

間的原則上的區別：

『在綱領底這兩部份中，我們所指出的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是我們的最近要求。因此，在綱領底這部份中，我們都應留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上。這是這兩部份底相同之點。可是牠們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工人問題部份所包含的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要求，而農民問題部份所包含的則是反對農奴地主的要求……在工人問題部份裏面，我們應以局部改善現有的資產階級制度為限。在農民問題部份裏面，我們則應要求在現有的制度中完全肅清一切農奴制殘餘……在最低綱領底工人問題部份裏面，我們不能提出社會革命的要求，因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革命已經是實現我們最後目的的無產階級革命了。在農民問題部份裏面，我們就提出社會革命的要求，因為推倒農奴地主統治的社會革命（即是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社會革命），即在目前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也『是可能的』（參看『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九四——九五頁）。

因為篇幅不夠，這裏僅能發表該文底第七章。其他各章底內容大部份已為『工黨與農民』和『告鄉村貧民書』兩文所發揮盡致了。從分析經濟派（馬丁諾夫等等）和社會革命黨人對於列寧底農民土地問題觀念的反駁以及『火星報』編輯部內部關於土地國有化問題所引起的

那些分歧（參看本卷註釋第七一條和七二條）底觀點上看來，該文第七章是有特殊意義的。還在討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一文以前，「火星報」編輯部內部的關係，尤其是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之間的關係，由於綱領討論過程中所發現的原則分歧而非常劇烈（參看本卷註釋第五四條）。火星社情況之所以愈加複雜化，是因為列寧會是「火星報」底實際領導者這一點，會使普列漢諾夫大不滿意。普列漢諾夫這種不滿情緒中含有他與列寧間關於某些綱領問題的——因之也就是關於政策問題的——一定的原則分歧。在討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這篇文章的過程中，這種不滿更加緊張了。普列漢諾夫不同意這篇論文中的某些議論，這種不同意的表示，曾採取了極其粗野和極不客氣的形式，致使普列漢諾夫與列寧在事務上和個人關係上的分裂，成爲必不可免的事了。此後，一九〇二年七月三日（舊曆六月二十日），普列漢諾夫在致列寧的信中，要求列寧「不要見怪」他，同時還申明：他們，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兩人之間，有百分之七五「同」編輯部」內其他一切編輯員比較，彼此更爲接近，而其餘的百分之二五，則是分歧的意見，可是百分之七五比較百分之二五多過兩倍，所以爲思想統一。起見，應該忘記意見分歧。」（見「列寧全集」第三卷，第四三〇頁）。

同時，列寧在自己的文章內也作了某些修改，而引起了特別劇烈之意見分歧的地方——即論土地國有的地方——列寧完全加以刪去了。因此，在『曙光』雜誌第四期上所登載的文章，與列寧最初的原稿不同。本卷中所編入的這一章是從『列寧全集』第五卷中摘來的，而該卷中所載入的文章，是完全按照最初的原稿的。關於兩種底稿間特別重要的區別，會附有相當的註釋。

關於『火星報』編輯部內討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這篇文章的一切材料，會發表於『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二二三頁——三九五頁。這個材料，對於研究列寧在土地綱領和土地政策問題上的觀點，有絕大的價值。

（六九）見正文第四一五頁。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中，關於農民問題的一段內講道：

『爲劃除直接給農民以重大壓迫的農奴制殘餘起見，以及謀農村中階級鬥爭之自由發展起見，黨首先要：

- 一、取消贖金和貢金以及現時落在農民這個納稅等級身上的一切義務。
- 二、取消一切限制農民處理自己土地的法律。

三、將向農民徵收的全部贖金和貢金發還農民；爲實現這個目的起見，應沒收廟宇和教堂的產業以及封地，沙皇土地以及皇室土地，並且對於利用贖金借款的地主貴族底土地加以特別的稅捐，這樣集成的款項應變爲特別的人民基金以供村社文化上和慈善事業上的需用。

四、組織農民委員會，以便（a）將農奴制取消時從農民那裏割去的並由地主用來束縛農民的那些土地，交還村社（其方法或者是剝奪手段，或者是——在土地已經轉賣的情形之下——由國家贖買，而取價於大地主的地產）；（b）將高加索農民現時以暫時未解放者、農奴等資格而耕用的那些土地，轉交他們作爲私產；（c）消除烏拉爾、阿爾泰、西部邊疆和其他區域內尚存留着的農奴制關係殘餘。

五、給法庭以一種權力，使牠能够減低太高的地租，並將具有束縛性質的契約宣佈無效」。（參看『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三八八頁）。

根據列寧學院所發表的關於起草綱領的各種材料，可以知道：列寧會堅決地反對允許任何贖買。『列寧全集』第二卷內載有列寧對於綱領中土地問題一部份所提出的下述修正案：

「我主張對於我們土地綱領第四條作以下的修正：『組織農民委員會，以便（a）將農奴制取

消時從農民那裏割去的……土地，交還村社（其方法或者是剝奪手段，或者是——在土地已經轉賣的情形之下，——由國家贖買……）等等這一段話，應改爲「組織農民委員會，以便（a）將……土地交還村社（其方法是剝奪手段）等等，即是刪去加上着重點的那些字眼」（第一四八頁）。

接着列寧還說明自己提案的理由道：「（1）在土地政綱內，我們提出我們的「最高綱領」，我們的「社會革命的要求」（參看我的說明①）。允許贖買的主張，與整個要求底社會革命的性質相矛盾。（2）就歷史傳統講來（一八六一年前的贖買），以及就牠底內容來講（記住著名的公式：「贖買就是購買」②），「贖買」具有假仁假義的和資產階級的辦法底氣味。人們拿住我們允許贖買的主張，能够污毀我們要求底全部實質（而幹這種勾當的惡徒是非常之多的）。列寧對於這一段，還作了下述的註釋：「允許贖買的觀點，將使交還割地這種非常革命的辦法墮落到最普通的「改良」」（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一四九——一五〇頁）。

① 列寧這裏所指的，正是自己的論文：「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編者註）

② 「贖買就是購買」——這是齊內雪夫斯基論一八六一年改良的說法。（編者註）

『火星報』編輯部底全體編輯員反對列寧而否決了列寧底提案。

後來，在討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土地綱領一文時，普列漢諾夫關於贖買作了下述的註釋：
『剝奪手段並不排除贖買手段；贖買手段並不排除剝奪手段』。列寧當時即答覆普列漢諾夫道：『「剝奪手段」底通常前提，就是剝奪私有權，即是無代價的剝奪』（見『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三六四—三六五頁）。

綱領中所通過的關於贖買的一節，比較列寧所指的並對之提出了修正案的最初的綱領草案，已大有改善。『取價於大地主的產業』以施行贖買的詞句，是後來加上的，在最初的草案中，並不會有這些字句。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講到擁護農民運動的問題時，列寧申明道：『我們堅決地反對任何的贖買手段』（見『第三次代表大會底記錄』第二五六頁）。

（七〇）見正文第四二二頁。一八九九年時，列寧在自己的一封信內寫道：『馬克思主義中司特魯威和布爾加可夫所戀戀不捨的那種整個的「新的批評潮流」，……在我看來，是極其可疑的』（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二二頁）。

列寧底疑慮，很快地就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因為布爾加可夫以及其他的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公開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業發展和農村中階級關係

的學說。

馬克思和列寧底出發點就是，農業的發展雖然有些特點，但農業與工業依照同樣定律而發展。甚至落後部門的農業也在捲入商品經濟系統之中。農業中也與工業中一樣，大的經濟比小的經濟要佔優勢；在農業中也與在工業中一樣，資本集中底法則都是佔着統治。同時，列寧曾指出，在規定農業裏面大經濟和小經濟這兩個概念時，不能祇從土地面積大小出發。『資本主義農業發展底主要路綫恰恰就在於：小經濟按其土地面積講來儘管是很小；可是按其生產底範圍，按其畜牧底發展，按其肥料底多寡，按其機器底採用發展等等，牠正在變成大經濟』。（『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六一八頁）。

『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方法就是：土地面積比較「小」的，但生產力比較高的、比較深耕的和比較資本主義的農業，排擠土地面積比較「大」的、但生產力比較低的、比較不深耕的和比較少帶資本主義性的農業』（同卷第六二五頁）。

在農業中發生這些經濟現象，同時在農村中也發生了相當的社會現象：鄉村底階級分化，鄉村中等階級減少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增長；一部份人發財而另一部份人則破產；僱傭勞動使用底發展和其他等等。鄉村底資本主義發展也引起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底增長：農業

的恐慌，階級鬥爭底加劇，因此馬克思和列寧就得出在鄉村裏面也必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底時勢批評家』正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切基本要點。國外的達維特、伯因斯坦之流和俄國的布爾加可夫、司特魯威之流，都肯定地說過：農業是按着自己的、與工業不同的法則而發展的。

『批評家』否認了農業中的集中法則，反而證明小經濟比大經濟有很大的優勢；否認了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僱傭勞動採用底發展的事實，否認階級分化底增漲，因此而否認階級鬥爭底加劇。當然，『批評家』因此就否認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必然性，並證明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農業已可借助於各種合作組織而『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土地問題上的批評家先生們』，以及『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定律的新材料』中，詳細分析了『批評家』底觀點（參看本『選集』第二十卷）。

（七一）見正文第四三四頁。從『土地國有——是另外一回事』這句話起，到『使拿齊金陷於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這句話止，曾是『火星報』編輯部討論列寧此文時爭論得最厲害的地方，在『曙光』雜誌第四期中所登載的這篇文章內，這一段曾被列寧刪去。

關於國有化問題，列寧這裏會着重指出下面兩點：

第一，國有化口號底意義和性質，可因提出這個口號的歷史環境之不同而有分別。在反對農奴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條件之下，與革命暴動時代有關的國有化，是一種革命的辦法。

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土地國有化，本身並不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辦法，如社會革命黨人所想的那樣；而正是相反，是一種更快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土地私有制底取消，就是盡資本主義社會力之所及、最高限度地消滅一切的和任何的障礙，這些障礙使資本不得自由應用於農業中，不得從一個生產部門自由轉入別個生產部門。資本主義發展底自由、廣泛和迅速，階級鬥爭底完全自由」，——列寧就是這樣確定國有化底任務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四一〇頁）。

『火星報』編輯部底其他委員，尤其是普列漢諾夫，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完全不同。普列漢諾夫在列寧關於國有化問題的草稿上曾寫過：「在警察式的國家內，國有化是有害的，而在立憲政體的國家內，國有化是一切生產資料國有化底要求之一部份」（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三八—五三—八六頁）。這裏，普列漢諾夫根本否認國有化是一個革命暴動底口

說，同時把國有化僅僅看作是社會主義的辦法，看作是「一切生產資料社會化底直接的開端」。（這是馬爾託夫底說法，普列漢諾夫也是同意這種說法的，關於這點亦可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三八五—三八六頁）。這樣的了解國有化，指明普列漢諾夫等人沒有懂得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因為馬克思認為土地國有化僅僅消滅地主階級，而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則完全用不着地主。因此，列寧堅決反對了『火星報』編輯部全體委員關於要指出國有化非革命性的提議，而迫不得已地避開了這個問題，刪去了有關於國有化問題的各點。

國有化——是對於私有制的一個打擊，在相當條件之下，牠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辦法之一，——列寧後來曾屢次地着重指出這一點，參看本『選集』第一卷註釋第一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國有化底意義，可參看斯達林『在馬克思主義者農業學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詞』。

（七二）見正文第四二五頁。從原文中可以看到，列寧與『火星報』編輯部其他各委員相反，他原則上同意了土地國有化的要求，從資產階級發展底觀點上看來，土地國有化的要求比歸還割地的要求『更進一步』。同時從原文中也可看到：在一九〇二年，在俄國南部農民暴動未開始以前，列寧認為國有化的要求『在當時政治上是不妥當的』。後來，在一九

○三年，列寧在『告鄉村貧民書』這本小冊子上公開地指出過：『歸還割地並不是一座城牆，而是一扇大門。要繼續前進，首先應當走出這扇大門。』

還在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四月）上，根據列寧底提議，通過了一個對農民運動態度的決議。這個決議實際上是改變了綱領上面歸還割地的要求，因為在決議上曾經指出：『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要最積極地幫助農民底各種能够改善農民地位的革命辦法，直到沒收地主的、國家的、教堂的、廟宇的和皇家的土地』（『第三次代表大會紀錄』第二二頁）。這裏已經提出了一個問題：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不僅沒收一部份地主的土地——割地。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了新的土地綱領，主張土地國有。

（七三）見正文第四三一頁。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前，以及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進行時，爭取階級立場堅定的黨綱的鬥爭，也包含有爭取民族問題綱領上正確措詞的鬥爭。而且還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明顯地表明了後來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的討論中所極度擴大的那些意見分歧。在那個時候，列寧已不能不向左右兩方鬥爭，向右反對猶太工人同盟底『對民族主義的迷戀』和『動搖』，向左『反對某些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懷疑『民族自決權』的蠢拙企圖

……」（列寧）。

「我們的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文是列寧對波蘭社會黨批評民族問題綱領的答覆（關於波蘭社會黨問題參看本卷註釋第七五條）。該黨當時不察時間與環境而提出了波蘭必須獨立的要求，這無非是公開擁護波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波蘭社會黨會以自己的觀點與波蘭社會民主黨底觀點相對立。波蘭社會民主黨會反對波蘭脫離俄國而獨立，他們底出發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承認民族自決並分離而組成特別的國家，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是完全不能允許的，並且好像是與無產階級國際統一的利益相矛盾。列寧反對波蘭社會黨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也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底「左傾」立場，他給了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綱領立場。據這種立場講來，解放民族問題底基礎已在於承認民族自決權，同時這個問題底解決應服從無產階級總的階級鬥爭的任務，並隨這個鬥爭底歷史條件為轉移。列寧在這篇文章內所發揮的思想，後來會由他在上面已經提出過的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的討論中，尤其是在他的著作「論民族自決權」（參看本「選集」第七卷），「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參看本「選集」第七卷），「民族自決權討論底總結」（「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三九—二七九頁，此文會局部地編入於本「選集」第七卷）等等內，會加以很廣泛的擴充。

(七四)見正文第四三一頁。在列寧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上，對當時初成立的阿美尼亞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底「宣言」作了一個分析，在這個「宣言」上，民族問題大體上是提得正確的。這裏僅重複了該文底主要意思。

(七五)見正文第四三二頁。波蘭社會黨產生於一八九二年。在一九〇六年，牠分裂成了兩派：右派，隘狹的民族主義派，牠於一九一九年成立了現在的所謂「波蘭社會黨」；左派，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一部份左派及波蘭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人於一九一八年組織了波蘭共產黨）。波蘭社會黨底基本綱領是：無產階級奪取獨立的波蘭共和國以統一俄、普、奧所管轄的三部份。鬥爭底方法：用武裝暴動反對沙皇專制和用恐怖鬥爭反對沙皇政府在波蘭的走狗。波蘭社會黨底民族主義的和愛國主義的口號，在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智識界以及一部份波蘭無產階級中間，找到了牠的基礎。在許多地方，波蘭社會黨很像俄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現在，波蘭社會黨對俾蘇茨基（Piłsudski）法西主義專政表面上雖採取反對黨的態度，但實際上則幫助這個專政而成爲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底公開傳達者。

(七六)見正文第四三八頁。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波蘭歷史上是一個革命

民主運動底時代——爲波蘭解脫俄、普、奧等國底統治而鬥爭的時代（波蘭當時曾爲俄、普、奧三國所瓜分）。在一八四六年一月，克拉可夫發生了暴動，這次暴動是西歐革命運動潮流底一個先聲，而這種革命運動潮流就引起了法、德、奧底一八四八年革命。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又起了波蘭人反對俄國沙皇政府壓迫和屠殺政策的暴動，而且其範圍比過去不知擴大了多少。大家知道，波蘭民主派首先反對的俄國，當時是反動底支柱，是全歐的憲兵。沙皇政府底反動作用，其所以特別巨大，是因爲：國內沒有任何比較嚴重的革命力量能够抵抗牠，當時俄國還沒有廣大的羣衆革命運動。在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後來巴黎公社時代也是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歡迎波蘭的解放運動並主張恢復波蘭，其理由有三：（a）波蘭人的反對俄國鬥爭，不僅是純粹波蘭人底事情，而且是全歐民主派的事情，因爲這是反對全歐的憲兵（俄國）的鬥爭；（b）民主波蘭底恢復等於使波蘭成爲反動俄國與民主歐洲之間的有力屏障，與俄國反動隔離的西歐反動，比與俄國反動聯絡的西歐反動不知要軟弱多少；（c）「凡是繼續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沒有一個能够得到解放的」（恩格斯）。德、奧所屬的波蘭底解放，足以打擊這些國家底反動，足以破壞十八世紀末參加「瓜分」波蘭的國家（奧、普、俄）底連保制，足以打斷奧、德反動與俄國帝王間的鏈條。

自然，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革命是解決波蘭問題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因為當時俄國沒有革命運動，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宣傳德國應向俄國宣佈「革命戰爭」以謀波蘭底獨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問題的一切提法，是由具體的歷史分析中產生出來的；他們主張波蘭獨立的要求會服從於革命利益，這個要求是他們革命綱領底環節之一。列寧所提到的馬克思反對盧格的爭辯，就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盧格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德國的著作家，「佛朗克福特左派」底一員（即是佛朗克福特國會左派底一員），他在國會中爲着波蘭問題爭論三天的時候，作了一篇洋洋千言的演說辭；在這篇演說辭中，他不以具體環境底歷史分析爲出發點，不從革命底利益出發，却以法英德三國的志願底公平和一致（髣髴是的一致）這種抽象議論爲出發點。馬克思在當時與恩格斯共同編輯的「新萊茵報」上，在「佛朗克福特國會中對波蘭問題的辯論」一文中，對盧格底這種立場作了致命的批評。列寧所謂「馬克思攻擊盧格」也就是指這個批評。

（七七）見正文第四四一頁。列寧這裏是說巴黎公社時期。在法國國會因受暴動民衆強制而宣佈德人俘虜下的拿破崙第三爲廢王之後，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六日（四日）在巴黎成立了「國防政府」。這是巴黎資產階級底政府，牠應當繼續拿破崙所開始的，實際上已經失

敗了的戰爭，來防守巴黎和全國，使其不受德國軍隊底侵犯。可是在巴黎民衆、巴黎手工業者、一般小資產階級底運動，主要的是無產階級底運動也隨之而高漲了，在這資產階級看來，這種運動比包圍巴黎的德國軍隊更要危險得多（包圍巴黎開始於一八七〇年九月）。爲着鎮服工人運動起見，「國防政府」決將巴黎讓於德人。因此，這個政府防守城市的一切辦法都是外表上的。這樣國防政府就變成了賣國政府。因爲這樣「防守」巴黎的結果，最後就在可恥的條件之下實行投降（一八七一年二月九日（一月二十八日））。根據投降條件，德人佔領了一部份砲台，這種情形後來使資產階級非常便於鎮壓巴黎公社——世界上的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

（七八）見正文第四四五頁。猶太工人同盟在起草黨綱時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已過渡到了分立主義，即是過渡到了組織上脫離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要求。無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底前夜，無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面，列寧都與猶太工人同盟作了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結果使猶太工人同盟底代表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會，退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隊伍（猶太工人同盟從一八九八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起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一部份）。

在「猶太無產階級是否需要「獨立的政黨」」一文上，列寧揭破了猶太工人同盟底這種

分立主義及其對無產階級整個階級鬥爭利益的各種害處。

在民族問題底解決上和在組織問題底解決上，猶太工人同盟所認為最主要的是「民族的」（正確些說：民族主義的）利益；而列寧認為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鬥爭底利益。民族自決權的要求和黨底組織原則，列寧正是使其服從無產階級整個階級鬥爭底利益的。

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與猶太工人同盟鬥爭底教訓，即在現在也還沒有失去牠的意義。現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與各民族共產黨組織上的相互關係，正是建築在一九〇〇年代列寧所堅持的那些原則之上（其原則是民族共產黨在地方問題上有自主之權，同時牠們必須服從一個中央底集中的領導）；而不是建立在猶太工人同盟所堅持的那些原則之上（就是各單個的、實際上是獨立的黨底聯邦制，其中央由各分黨代表組成，各分黨有權從中央召回其代表，代表不向全黨負責，而僅向自己的組織負責）。

（七九）見正文第四四六頁。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〇一年四月。關於猶太工人同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地位問題，代表大會底決議說：「代表大會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是俄國境內各民族社會民主黨底聯邦同盟，因此決議，猶太工人同盟——猶太無產階級底代表，曾以聯邦底一部份的資格而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並委託猶太工人

同盟中央實行這個決定』。列寧所提及的猶太工人同盟之退出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協會，是從這個決議中得出的邏輯上的結論。猶太工人同盟第五次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〇三年，牠以自己的第四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各社會民主黨聯邦組織的原則為出發點，規定了根據聯邦原則來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詳細計劃。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不僅推翻了這個計劃（猶太工人同盟底最高要求），而且還推翻了猶太工人同盟底代表要求僅與猶太工人同盟建立聯邦關係的主張（最低綱領）。結果猶太工人同盟就退出代表大會並退出俄國社會民主黨。

（八〇）見正文第四四七頁。『火星報』編輯部，原定出版一本小冊子，此小冊中應載有俄國社會民主黨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委員會所發出的『告葉加傑林諾斯拉夫猶太工人書』（一九〇二年年底）和猶太工人同盟海外委員會的論文『論一個宣言』（載於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日）第一〇五期的『最後新聞』上），可是這個計劃，未見實現。

（八一）見正文第四五〇頁。這裏所指的，是一九〇二年用德文出版的考茨基底小冊子『社會革命』底猶太文譯本。

